

天主教輔仁大學

外語學院－歷史、使命、傳承

1933~1950 北平輔仁

1962~迄今 新莊輔仁

摘自

《理外民使命與特色叢書系列「真、善、美、聖」》

外語學院宗輔室彙整

2013.2.14



目錄

序.....	3
[輔仁大學].....	4
聖言會與北京輔仁大學.....	4
在台復校之天主教輔仁大學.....	21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My Spiritual Legacy	35
聖言會及其大學事業為落實教會的福傳使命而做.....	47
蔣百鍊神父生平及其精神.....	70
Reflections on Fu Jen as a Catholic University	75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94
談如何以福音精神落實輔大的辦學，以回應當今台灣社會的需要.....	101
[外語學院].....	105
從時代考驗中，看輔大/外語學院 歷史與使命	109
英文系.....	114
系史: Gospel Witness to Service and Collaboration - The SVD – SSpS	
Mission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14
典範人物.....	124
文訥神父 Fr. Peter Venne, SVD (1913.01.25 ~ 2009.03.25)	124
李素美 修女 Sr. Rose Michelle Boudreau, SP. (1928-2004)	128
謝德樂 老師 Ms Donna Scheafer (1931~ 2001).....	129
賀永光 修女 Sr. Heliena Krenn.....	131
歐陽瑋 老師.....	132
德語系.....	133
系史.....	133
The German Department at Fu Jen University : A Wellspring of Service	
and Learning	133
典範人物.....	154
齊德芳 神父 Fr. Franz Giet, SVD (1902.02.01-1993.09.18)	154
孫志文 神父 Arnold Sprenger, SVD (1929~).....	166
古怡心 修女 Sr. Fidelis (1936~)	173

裴 德 修女 Sr. Agathe Bramkamp (1939~)	174
法文系	175
系史：外語學院法文系系史	175
典範人物	201
趙德恕 神父 Fr. Impre Zsoldos, SVD (1913.01.25 ~ 2009.03.25)	
.....	201
路瑞 老師 André NOUGÉ (1924~ 2008)	204
杜葉 老師 Annick TROUILLET	205
西文系 系史：外語學院西文系系史	208
典範人物	239
安秀貞 修女 Á ngeles de Dios Trilla F.I. (1910-2008)	239
劉巴丁娜 教授 Dra. Remedios Bardina de Liu (1907-1999)	251
莫若蘭 教授 Dra. Carmen Morales (1929-1979)	252
范靜貞 修女 Mar ía Josefa Garc ía (1920-)	253
日文系	254
系史：外語學院日文系系史	254
典範人物	276
原土洋 教授 (1930-2005)	276
山崎洋子 老師	278
義文系	280
系史：外語學院義文系系史	280
跨研所	294
外語學院翻譯研究所所史	295
外語學按語言研究所所史	309
外語學院比較研究所所史	334

序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系辦學使命與歷史 編寫說明

基於落實理工、外語、民生學院與創辦單位的聯結，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於 2003 年起邀請理外民師長共同就本校辦學使命之角度，撰寫院、系所歷史，以及資深師長之典範事蹟。

2002-2005 逐年完成「天主教輔仁大學理外民使命特色叢書系列一~四」。今特將與外語學院相關之系、所、人物歷史，抽印彙整成本手冊，暫定名為：

「外語學院 系、所、人物歷史 2002--2005」，並收錄相關檔案之電子檔，供外語學院各系所參考。

宗輔室秉持對本校辦學使命與傳承的關懷，期望能與各系所師長針對歷史資料的更新，做進一步的合作與協助，誠摯盼望各系主管、師長慷慨指正並提供寶貴的意見。

外語宗輔 呂慈涵 謹識

2013/3

[輔仁大學]

聖言會與北京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二位創立者



英斂之
(1867~1926)



司泰萊
(Aurelius Stehle, 1878~1930)

聖言會與北京輔仁大學 (1933~1950)

魏思齊 神父 (Zbigniew Wesolowski, SVD)

- 一、輔仁大學之歷史淵源
- 二、聖言會接辦輔仁大學
- 三、聖言會團隊的工作表現
- 四、北京輔大的學生人數統計
- 五、北京輔大的一些特殊貢獻
- 六、北京輔大的後繼使命

附件一

附件二

一、輔仁大學的歷史淵源

基督教率先意識與強調高等教育於傳教工作的重要性，隨後天主教致力於此。巴利省耶穌會在馬相伯(1840-1939)的領導下於1903年在上海創立了震旦學院，後改制為震旦大學(Aurora University)。於1923年香巴尼省耶穌會在天津創立一所工商業學院(Hautes Etude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並於1948年(25週年)被政府批准成立大學—津沽大學(此乃根據兩個港口—天津、塘沽而命名)。1925年十月一日，美國本篤會於北京成立「輔仁社」，又名「國學專修科」，英文名為 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此乃輔仁大學的前身。

其實，於北京成立天主教大學的想法首先萌生於1906年的華北主教區域會，然而因人力和籌畫等問題而未能實現。1912年7月12日，身為記者和教育家的中國天主教教友，英斂之(1867-1926)，上書教宗碧岳十世，尋求設立天主教大學的支持。翌年，他於北京西郊的香山靜宜園創立「輔仁社」，又名「國學研究社」，招收天主教青年進行中國文化研究。1917年，英氏以十篇題為「勸學罪言」的文章重新呼籲中國天主教跨越當今基督教高等教育的領域。但其呼籲似乎無人聽聞，一年後因經費拮据，「輔仁社」停辦。1919年，教宗本篤十五世派光總主教(de Guebriant)為詢閱使，來中國視察教務，寄發有關修道院教育及廣設高級學院等問題之問卷。他向教宗提出的報告中，特別強調中國華北地區缺乏天主教高等教育組織。同年3月30日教宗發表通諭"Maximum Illud"，論證信仰的擴展於地球，其中也含有英斂之的建議在內。之後，教庭決心於北京成立一所天主教大學。

1920年本篤會第三會士奧圖爾神父(George Barry O'Toole)，於休假時前往中國，之前曾於1917年在美国本篤會賓夕凡尼亞州(Pennsylvania)聖文森神學院(Saint Vincent Archabbey)擔任哲學教授，他去中國，希望學習中文並藉機進一步了解天主教於中國的傳教工作。那時，奧圖爾抵達北京商討辦學事宜，贊成英斂之的創校構思。1921年他回美國，途經羅馬時，利用機會把旅行之成果向教宗本篤十五世和新的傳信部長樞機主教汪勞松(William von Rossum)以及本篤會總長史托辛根(Fidelis von Stotzingen)提出報告。結果，傳信部長汪勞松轉諭本篤會進行在中國創辦「公教大學」，(此名稱的建議來自英斂之)，同年十二月，本篤會總長史托辛根提議賓夕凡尼亞州聖文森會院最有資格擔任此項工作。教宗本篤十五世逝世於1922年正月22日。新任教宗碧岳十一世更積極地支持於北京建立大學的計劃，並且於1923年2月先捐助義幣十萬元。同年8月7日全美本篤會決議由賓夕凡尼亞州聖文森會院司泰萊(Aurelius Stehle)院長負責建校。1924年6月教廷委派司泰萊院長為新學校的第一

任監督。1925年10月1日成立北京公教大學的前身—「輔仁社」，其社長為英斂之。不久之後，他逝世於1926年1月10日。他和司泰萊院長算是輔仁大學的兩個創立者。1926年1月26日身為有名的歷史學家的陳垣（1880~1971），繼任社長。1926年9月4日聘奧圖爾神父為校長，陳垣為副校長。

1927年7月29日北洋政府准予試辦，並將「公教大學」改名為「輔仁大學」，英文(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同年9月26日輔大舉行開學典禮，計有文科四系：中國文學系，英國文學系，歷史系及哲學系。1929年6月輔大依照國民政府的大學法，改文科為文學院，並增設另外兩個學院——理學院及教育學院。大學總部總共有九個學系，其中亦含美術學系。比利時本篤會藝術家格瑞斯耐(Adalbert Gresnigt)已於1926年7月來中國設計建築中國式的校舍，他也安排當時所有校舍的擴展。1931年7月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輔仁為大學。屆時，共有530位中國青年在輔大就讀。

二、聖言會接辦輔仁大學

自1925年至1930年，輔大不斷興建新式校舍，負債累累，因此總會院負責應對這些無力償還的債務。1930年輔仁大學第一任監督司泰萊院長逝世，於是當美國本篤會會士遴選司泰萊的繼承人時，那些曾反對建校的人利用這個機會，選出可區神父(Alfred Koch)為聖文森第五任總院長，因為大家知道他將會把輔大與修院區分開來。1930年教宗岳碧十一世任命高福德神父(Francis X. Clougherty)為第二任監督，他也向教宗提了相關報告。同年6月可區神父拜訪了聖言會總會部，先和葛蘭德神父(Josef Grendel)商談，之後又與總會部的其他參議們磋商。其實，他們之間並不陌生，因為可區院長曾是嘉博修院(St. Gabriel, Austria)的修生，也曾是葛蘭德神父的學生。他做晉鐸之後，轉往美國，並於美國脫離聖言會，轉入了聖文森的本篤會。當時以本篤會院長的身分到了羅馬，說服聖言會總會部接管北平輔仁大學。初步擬定的思考模式為：如果聖言會美國省合法接管此大學，主導並提供資源的話，美國人經營輔大的性格將依舊不變。除此之外，可區院長也有把握教宗會批准。1933年2月18日教廷傳信部長夫瑪松尼一白翁迪(Pietro Fumasoni-Biondi)正式邀請到聖言會接辦北平輔仁大學。經過一連串的磋商，總會部終於接受，當時葛蘭德神父已被選為聖言會的新任總會長。同年4月29日夫瑪松尼一白翁迪通知葛蘭德總會長碧岳十一宗教的渴望和教廷傳信部的決定。

當時聖言會堪稱大規模的修會，有很多飽腹學問的神父們。自1875-1909年，揚生神父(Arnold Janssen, 1837-1909)創立聖言會以來，在訓練傳教士身上，一至重視自然科學，也包括理論與實驗，神學方面的理由是「大自然之經」(the Scripture of the Nature)和聖經(the Holy Scriptures, the Bible)之啟示是合一且相成的。

天主教相信藉著聖言(天主聖三的第二位格，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創造了天下萬物，因此天地萬物有在某方面反映出天主的完善和完美。如此，科學研究可以補充和完成聖經中對天主的啟示。所以不少聖言會的傳教士，除福傳之外，也做自然科學、人類學及語言學的研究。這樣，自創聖言會以來，修會就有場所提供做自然科學之研究，如：史泰爾(Steyl, the Netherlands)、嘉博修院及聖思定修院(St. Augustin, Germany)。另外，當時聖言會有眾多的聖召也能派比本篤會多幾倍的神父到北平。此因素與大學的延續和將來發展有密切的關係。當然，對聖言會來講，經營北平大學也是一種當時最有效的福傳方法，也符合聖言會會祖的神恩以及表示它在中國傳教的成長。

北平聖言會輔仁大學隸屬於山東省區，所以 1933 年 6 月 19 日，其會長舒德祿(Theodor Schu, 1892-1965，德國人)、鮑潤生(Franz Xaver Biallas, 1878-1936，德籍漢學家)、和商樹勤神父(William Cremers，當時聖言會上海助理財務長)，來輔大辦校務移交。1933 年 7 月 4 日葛蘭德總會長任命穆爾菲神父(Joseph Murphy, 1895-1935，美國人)，為校務長。1933 年 8 月 5 日教廷任命葛總會長為第三任監督。並委請協助中國司鐸進修培訓。1933 年 9 月 9 日慕爾菲神父來輔大，之前還有韓克禮神父(Joseph Henkels, 1901-1997，美國人)以及宋德剛神父(Robert Sonderkamp, 1886-1952，德國人)和歐思德神父(Franz Oster, 1899-1979，德國人)，兩位來自河南傳教區，還有來自山東傳教區的白立鼎(Franz Br kner Berchmans, 1891-1985，奧國人)修士。在這種團體領導之下，於 1933 年 9 月 18 日開始新的學年度，陳垣繼任(始於 1929 年)輔大的校長。

拉爾夫神父(Ralph Thyken)在芝加哥(Chicago)成立了一個輔大特別聯絡處，專為大學捐款之用。可是台克尼(Techny)的長上和會計員對這個新擔子卻不很熱心。他們深怕輔大的募款會拉走他們省會的施主。他們像美國本篤會一樣，正在遭遇 1929 年之「黑色星期五」，華爾街股市大崩盤，不景氣帶來的後果。自 1936 年以來，在德國也有一個輔大捐款處，由禾利葛爾(Anton Hilger)管理。

三、聖言會團隊的工作表現

在北平輔仁大學最初的幾年，聖言會有許多重大的損失發生。新的計劃是建立於很大的犧牲。1934 年夏，李察思神父(Stephan Richarz, 1874-1934，德國人)中暑而死。他出版了不少地質學方面的作品，特別是在台克尼的年代。翌年，穆爾菲校務長死於心臟病；1936 年鮑潤生死於傷寒。他於 1935 年在輔大創立了一份名為「華裔學志」的漢學刊物，但不幸，才出版第一期就去世了。

他的接辦人當作顧若愚神父(Hermann K 颺 ter, 1904-1978，德國人)新的校務長為

雷冕神父(Rudolf Rahmann,1902-1985，德國人)，他是一位人類學家。當時是《Anthropos》此人類學刊物(希臘文指"人"，自1906年至今)的總編輯。比較出名的還有身為歷史學家的胡魯士神父(Henry Kroes,1903-1989，荷蘭人)，擔任校務長。以及嚴師神父(Augustin Jaensch，生於1882年，德國人)為輔大理學院的院長。當聖言會接辦輔仁大學，第一學年度結束時，輔仁大學有613位學生，97位教師同仁(34位教授，63位講師及助理)。其中有16位聖言會教授，他們來自美國、德國、荷蘭、奧地利、巴西、日本和中國。聖言會中國神父，名伏開鵬神父(1904-2002)擔任訓導長(1935-1948)。

一般來說，聖言會的輔大團體有神父和修士廿至卅人左右，是一個國際性的團體，但他們中絕大多數是德國人和美國人。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神父辭掉了學校的行政職務，只是教書，這樣直到他們與荷蘭神父一同被集中(1943年3月-1945年)戰爭結束後，美國神父返回學校，繼續負責他們以前的行政業務。美國的芮歌尼神父(Harold Rigney，1900-1980)也到了，他接替了雷冕神父校務長的職位。他任職直到中共政府接辦輔大為止(1946年8月至1950年10月12日)。之後，即1951年7月25日，他與其他的被監禁，在獄中度過四年，受盡酷刑和折磨。

1947學年度結束時，輔大有78位教授(其中48位天主教徒)，講師104位(其中40位天主教徒)，聖言會的會士有23位教授以及12位講師，另外有8位神父即修是在行政崗位上。聖神會有9位教授以及7位講師。自1938年以來，聖神會修女屬於輔大教師團體，其實她們從1935年開始管理女中學。

四、北京輔大的學生統計

年 度	男大學生+研究生	其中 天主教徒	女學生+研究生	其中 天主教徒	總 計
1933/34	613	64			613
1934/35	684	92			684
1935/36	792	80			792
1936/37	810	83			810
1937/38	581 + 2	52			581 + 2
1938/39	937 + 22	84	306	21	1243 + 22
1939/40	1067 + 29	114	489	39	1556 + 29
1940/41	1209 + 31	120	735	56	1944 + 31
1941/42	1327 + 41	159	899	75	2226 + 41
1942/43	1378 + 57	166	968 + 10	55	2346 + 67
1943/44	1210 + 38	106	800 + 13	51	2010 + 51
1944/45	1349 + 34	100	898 + 22	57	2247 + 56
1945/46	1341 + 44	98	859 + 27	58	2200 + 71
1946/47	1537 + 24	165	1039 + 11	88	2576 + 35
1947/48	1433 + 21	246	915 + 14	130	2348 + 35
1948/49	1368 + 21	303	900 + 10	148	2268 + 31

北平的輔大，在學院及學生人數上，都比上海及天津的兩所耶穌會大學多，影響也大，也更受人重視。自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以來，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學生人數方面，(除了 1937 年當學年度之外)，一直到 1942 年，(為一個高峰增加的學年度)，總是增加，其來有自：

- (一) 很多公私立大學被關閉，因中日戰爭爆發，雖然 1938 年有些大學可重新運作，不過因有日本色彩而被避免。
- (二) 當時教育部決議文學院和教育學院，每年只能各別招 30 位新生。
- (三) 自 1937 年開始創立研究所。
- (四) 1938 年秋，接收女學生，由聖神修女會主持。
- (五) 1937-1945 年期間有 1500 至 2000 學生要考入學考試。至 1948 年 6 月為止，輔大頒布 3636 位學士及 75 位碩士學位。1948 年，輔大學院系和學生人數情況如下：

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國文系、中文系)—136 位

西洋語言文學系(英文系、西語系、外文系)—223 位

史學系(歷史學系)—202 位

社會學系(自 1943 至 1952)—261 位

經濟學系(自 1943 至 1952)—376 位

人類學系—7 位

理學院：數學系—52 位

物理學系—117 位

化學系—130 位

生物學系—116 位

家政學系(1948 年之前屬於教育學院)—120 位

教育學院：教育學系—297 位

哲學系(1929-1934)—54 位

心理學系(哲學系，1929-1934；哲學心理系，1934-1952) —
79 位

美術學系—52 位

農學院：(農學系)—64 位

總括起來，從 1933 年聖言會接管輔大，共有 3 個學院及 9 個學系，到 1949 年，有 4 個學院，16 個學系。1933 年有了 613 位學生，1949 年共有 2299 位學生。

研究所發展情形如下：

文科研究所：史學部(歷史學研究所)—1937 年成立

人類學部(人類學研究所)—1943 年成立

經濟學部(經濟學研究所)—1947 年成立

理科研究部：物理學部(物理學研究所)—1938 年成立

化學部(化學研究所)—1941 年成立

生物學部(生物學研究所)—1941 年成立

這樣，除了學士學位外加了碩士學位，那時還沒有博士班，因此博士生大部分去外國(尤其美國)讀博士，如 1949 年在美國共有 2700 位左右的中國博士生。

在天主教輔仁大學中，身為天主教徒的學生只有少部分，他們的人數在 1948-1949 年間，增至 451 人(303 男，148 女)，約全體學生的五分之一。新領洗奉教的人不算多，每年只有 10 至 15 人。但絕大多數的學生，在大學期間都增強了對天主教的了解。由於輔大的天主教同學人數不多，在學校他們所產生的影響也不甚顯著。但伏開鵬訓導長支持他們出版「磐石」月刊。以及做監獄牧靈的工作。這也配合全國「公教進行會」的精神。1935 年 9 月 8 日至 15 日於上海有了第一期全國

公教進行會的會議。

1947年田耕莘樞機(1890-1967)把北京的堂區重新劃分，輔大也被化成一個獨立堂區。它是全市廿個堂區的第二大堂區。雖然它面積不大，卻有教友二千五百人，分屬於四百多個教友家庭，非教友則有七萬多人，這本堂裡也成了一個聖母軍支團，團員們非常積極活躍。

有趣而值得強調的是，自1938年以來，女生當中，有幾個出自最好的家庭，她們入了聖神會，做了修女，相對的有更多的天主教男生卻沒有入聖言會，甚至連一個也沒有。其實當聖言會1933年接管輔大時，同時接辦兩個中學，一所男中學建立於1929年，一所女中學建立於1932年。1935年聖神會接管女中學。1947年，男中學有869位學生，女學校有432位學生。1943年輔仁大學成立了一所小學和幼稚園。1947-1948年期間，總共有350個孩子。

五、輔仁大學的一些特殊貢獻

因為北平輔仁大學有不少卓越的中外學者和科學家，就對當時中國做了不少貢獻。

(一) 聖母聖心會神父 Joseph Rutten 於1931年(在發現傷寒預防疫苗者 R.Weigel 於Lwów【利沃夫，當時波蘭，今烏克蘭】的領導下)在北京成立一間微生物學的實驗室，為製造傷寒預防疫苗。

1936年該研究中心轉為輔大的機構。自1931至1947年間那邊所製造的疫苗幫助了很多人。之後，因發現既新又便宜的製造方式就停止。

(二) 出版工作：

在北平輔大出版的三種漢學方面的期刊。

(甲)《輔仁學誌》1929年第一期創刊號問世(自1929年至1947年)

(乙)《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1935年鮑潤生神父主編的半年期刊第一期出版，由英、德、法所寫的文章，至2000年已有48本。

(丙)《民俗學誌》(Folklore Studies)(1942-1945年)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刊物，如英文的《Fu Jen Magazin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自1932年初版每三個月一次於芝加哥，為通知美國有關輔大的發展。另外，輔大也有輔仁大學叢書，發表相關的著作。輔大有自己的中西印刷廠以及一家書店。輔大也準備出一部中文的天主教百科全書，大家也做了許多紙上的作業與計劃，這是教宗願輔大去做的。首先因戰爭而然後中國內在情況的關係，終於此項重要的計劃無法實現。

(三)在北平的聖言會團體中，有三位修士，其中有白立鼎修士，在大學教授美術。在他的領導下，幾位中國畫家放棄了強烈的西方畫風，而創造出純中國式的天主教繪畫，中國第一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Celso Constantini)非常支持中國式的天主教繪畫，他本身也懂藝術，接觸一個當時年輕的中國畫家陳緣篤，以及讓他認識最有名的基督宗教歐洲藝術品，然後剛宗座促進他發展中國式天主教繪畫。輔大成立之後，當時有美術系的系主任，皇兄堂溥忻。陳緣篤作該系教授之一。除他之外，比較有名的畫家是陸鴻年和王肅達。為了更了解天主教的藝術精神，他們都研究聖經及學習天主教教義的問答手冊。終於，他們三位都領洗進教。1935年9月8日至15日有公教進行會的會議在上海，那時也第一次作他們的畫展；第二次舉行1936年於北平。兩個畫展是很成功的。戰爭後，有些年輕傳教士曾批評他們的畫作，但他們的繪畫是經得起人的鑑定和批評的。後來連在台灣繪製的畫像，也多是以原先的畫作為範本的。因此，白修士及中國教授們在輔仁大學所創作的中國天主教繪畫，成了聖言會在北京工作的不朽貢獻。

(四) 司鐸書院(Collegium Sinicum Ecclesiasticum)：

開辦司鐸書院，此建議是來第二任駐華宗座代表蔡寧總主教(Mario Zanin 1933/11/20 被教廷任命)，但卻由聖言會去計劃與執行。1938/10/16 司鐸書院開始運作。當時中國整個學校正是在現代化過程當中，只教會絕大多數的小修道院和大修道院則趕不上腳步。為了改善這種情況，蔡寧宗座代表請輔大開一些學科，供年輕的中國神父修習，以便將來在修道院教書。自1934年來，輔大為中國神父開始開了一個暑期進修班，課程是中國文學及自然科學。至1937年已做了規定，不再只是短期的受訓，而應是多年的讀書，但因中日戰爭爆發，此計畫首先無法實現。第一期於1938年開辦，有神父十人，課程仍是中國文學與自然科學。1940年，一座大的新建築完成了，那邊有五十四位神父單人房間，有餐廳、會客廳、圖書館、物理實驗室和五間教室。1943年開始，司鐸書院停止教學，神父們和其他的同學一樣，都在大學上課。雖然他們沒有參加畢業考試，但政府卻承認他們的全部學歷。所以他們與其他畢業同學一樣，具有學士學位的資格。1938-1940年期間在輔大讀書的神父們有566位；其中，1941-1948年期間的畢業者有67位。

司鐸書院為中國教會的意義，無須過分誇張。很可惜的是1949-1950年期間中國政治上的變化，即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使司鐸書院慘遭關閉。其實，這算是整個輔仁大學的命運。

六、輔仁大學的繼續使命

1948 年春天，鑒於局勢動盪有遷校計劃。事務主任徐思本(Peter Hünsberg，生於 1909 年)及富施公(Friedrich Fuchs，1899-1983)二位聖言會德神父來台灣考察遷校的可行性。同年八月徐神父再度來台灣進一步安排遷校的構思，但因局勢急轉，聖言會羅馬總部停止一切活動。如此，遷校計劃擱置了。1949 年 2 月中共陷北平，之後，激進份子以輔大作為反教會的中心。1950 年春天一部份輔大教職員進行極端反教會的活動。學校當局擬不予續聘。中共教育部以不合規定未予同意。同年 9 月他向聖言會提出五個基本原則，其中規定教職員生有反宗教的自由，教會絕對無權否決人事聘任案。羅馬教廷無法接受這種原則。1950 年 10 月 12 日中共教育部正式接辦輔仁大學。原有神父繼續留校任教。1951 年 7 月芮哥尼與其他聖言會神父於輔大被捕入獄。輔仁大學改為北京師範大學之一部。

總之，聖言會接手中的北京輔仁大學(1933-1950 年)，在學院及學生人數上，都比上海及天津的兩所耶穌會大學多，影響也大，也更受人重視。它屬於當時北平大的五所大學裡面。整個輔仁大學的事業使許多人很驚訝，至今為止。北京的輔大像其他傳教地區的天主教大學一樣，有其特殊使命，因為一所天主教大學，一方面是一所大學，即強調學術層面，另一方面與教會有著為其大學身分所不可或缺的關係。這樣，他與其當地教會有著直接的生活分享。

1961 年輔仁大學由三個主辦單位在台灣復校，這三個單位中也有聖言會。鑒於台灣的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性的變革，即三個創辦單位於 2002 年 8 月 1 日的整合，可用輔大的宗旨重新指著昔今及將來的基本使命：

「本大學為追求真善美聖，全人教育之師生共同體，致力於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宏揚真理，以促進社會均衡發展及增進人類福祉」。(私立輔仁大學組織規程，第三條)

附件一：

教廷傳信部夫瑪松尼·白翁迪擔任傳信部長時(Fumasoni-Biondi)教廷正式通知聖言會接管輔仁大學的文件

Copia

S. CONGREGAZIONE
„DE PROPAGANDA FIDE“
Protocollo N. 1302/33

Roma, 29 Aprile 1933

Reverendissimo Padre Giuseppe *Grendel*
Superiore Generale della Società del Verbo Divino

Reverendissimo Padre,

La Paternità Vostra Reverendissima conosce come Sua Santità Papa PIO XI vigili con cura speciale e con il più amoroso interessamento sulle Missioni Cattoliche sparse ovunque nei vari continenti.

Tra le altre missioni occupano un posto privilegiato nel cuore Augusto del Pontifice le Missioni di Cina. Quell' immenso popolo costituisce infatti quasi una quarta parte dell'umanità intera, ed in esso l'insegnamento evangelico trova un terreno particolarmente adatto, tanto che la Chiesa ha potuto già allietarsi di rigogliose e promettenti fioriture spirituali.

La nobile nazione Cinese possiede un'antica e famosa civiltà, ed in essa fin da remotissimi tempi si è sviluppata un'ampia ed ammirabile cultura scientifico-letteraria.

Conquistare pertanto alla fede non soltanto le anime dei poveri e degli umili agricoltori cinesi, ma anche le menti dei dotti e dei dirigenti, costituisce l'aspirazione più viva del Santo Padre. Quando la cultura cinese fosse pervasa di spirito cristiano verrebbe non solo innalzata e vivificata, ma costituirebbe il pegno più certo di un radioso avvenire cristiano per l'intera Nazione.

Da tali intenti fu ispirata la fondazione dell'Università Cattolica di Pekino, intrapresa pochi anni fa con animo ardito e generoso da un nucleo di benemerite persone.

L'opera, incoraggiata e sostenuta validamente dalla Santa Sede, fu benedetta dal Signore, ed assunse ben presto un consolante sviluppo. La competenza e la fama del numeroso corpo insegnante, in cui figurano i più bei nomi della cultura cinese, la bontà dei metodi e la disciplina delle scolaresche, che superano la cifra di mille, furono meritamente apprezzate dal Governo Nazionale Cinese, che riconobbe giuridicamente l'Università conferendo ai suoi titoli valore pari a quello delle altre Università dello Stato.

Già frutti copiosi di bene sono derivati alla religione ed alla civiltà dall'Ateneo, ma molto maggiori, è lecito sperarne per l'avvenire che si annuncia ricco delle migliori promesse se lo zelo e l'affetto dei cattolici, in ispecie dei cattolici di America e di Cina, si volgeranno sempre più fervidamente verso la provvidenziale istituzione, e se verranno superate le difficoltà dell'ora presente.

Per dirigere e amministrare con successo così vasta ed alta impresa si richiedono infatti abilità e mezzi non comuni.

Ora la Società del Verbo Divino che Ella degnamente dirige, ed in specie la sua fiorente Provincia Nord-Americana si dimostrano ben atte a conseguire il fine desiderato ed a vincere gli ostacoli di vario genere che si oppongono alla vita ed allo sviluppo dell'Università.

Codesta Società invero pur nella sua breve esistenza ha dimostrato tanta vitalità a così alacre attività nelle Sante Missioni, che apparisce idonea a intraprendere felicemente la nuova impresa. L'Istituto infatti ha già in Cina vaste e importanti missioni, conta nel suo seno insigni sinologi e dotti, gode della stima e delle simpatie di un grande numero di cattolici sparsi nelle varie nazioni specialmente nel Nord dell'Europa e dell'America.

Perciò il Santo Padre, mentre fa appello allo spirito di sacrificio della Paternità Vostra Rev. ma e dei Suoi Confratelli affinché vogliano addossarsi con la consueta alacrità anche questo nuovo e importantissimo incarico, che certamente richiederà grandi e diuturni sforzi, è sicuro di trovare la più large e generosa corrispondenza.

L'Università Cattolica di Pekino viene da ora in poi esclusivamente affidata alla cure di codesta Società, la quale ne terrà il governo e l'amministrazione con piena autorità alle dipendenze di questa Sacra Congregazione di Propaganda Fide.

L'Università stessa sta talmente a cuore alla Santa Sede che giustamente va considerata Opera Pontificia, e come tale si raccomanda alla generosità di tutti i cattolici ed in particolare dei cattolici americani che già in passato hanno dimostrato il loro più vivo interessamento per questa impresa di capitale importanza missionaria.

La grazia Divina che invoco fervidamente, e la Benedizione specialissima del Santo Padre diretta tanto ai dirigenti che ai benefattori dell'Università, valgano a procurare a quest'ultima nuovi ed insperati progressi per la maggior gloria di Dio e per la conversione della Cina.

Augurando frattanto a Lei ogni miglior bene e rinnovando l'espressione dei sensi di profondo ossequio mi raffermo

di Vostra Paternità Reverendissima
devotissimo servo

(sig.) P. Card. *Fumasoni - Biondi*, Pref.
+ *Carlo Salotti*
Arc. tit. di Filipp
Segr.

附件二：

以下是有關聖言會接管北京輔仁大學的歷史之暫時參考資料目錄(由馬雷凱神父〔Roman Malek〕所提供的)

Bornemann, Fritz, P. Wilhelm Schmidt S.V.D. 1868-1954, Romae 1982, Apud Collegium Verbi Divini (= Analecta SVD-59) (v.a. 228-252).

Bornemann, P. Fritz (Hrsg.), *Geschichte unserer Gesellschaft*, Romae 1981, Apud Collegium Verbi Divini (= Analecta SVD-54), 311-315.

Bulletin No. 1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Sept. 1926):

- "Pei-Ching Kung Chiao Ta Hsüeh. The Chinese Name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7-9.
- "Buildings and Grounds", 11-12.
- "A General Prospectus of the Institution", 13-16.
- "Obituary of Sir Vincent Ying, K.S.G.", 29-33.
- "The 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 39-50.
-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57-61.
- "Chronicle of Events. Connected with the Orig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1912-1926)", 63-70.

Bulletin No. 2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March 1927):

-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A Catholic Missionary of Northern China", 31-36.
- "The Chronicle (1926)", 41-46.

Bulletin No. 3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Sept. 1927):

- "The Chronicle (Jan.-July 1927)", 61-64.

Bulletin No. 4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May 1928):

- "Sir Theodore F. MacManus, K.C.S.G.", 11-12.
- "The Inaugur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the School of Arts", 15-27.
- "Know thyself. Adress of the Most Rev. Celso Costantini at the Inaugural Ceremony", 29-32.
- "The Chronicle (August 1927-March 1928)", 77-79.

Bulletin No. 5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October 1928):

- "The Chronicle (March-August 1928)", 105-108.

Bulletin No. 6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July 1929):

- "The Chronicle (August 1928-April 1929)", 127-133.

Bulletin No. 7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December 1930):

- "In Memoriam (Rt. Rev. Archabbot Aurelius Stehle, O.S.B.)", 5-7.

- "The Chronicle (May 1929-December 1930), 129-154.

Bulletin No. 8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December 1931):

- "From Provisional to Final Registration. A Record of Events Intervening between the University's First and Fifth Year", 103-130.

- "The Chronicle (Jan.-December 1931)", 149-172.

Bulletin No. 9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November 1934):

- "The Chronicle (1932-1934)", 189-198.

- "Table of Contents of Bulletins No. 1-9", 199-203.

Clougherty O.S.B., Dom Francis,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in: *Bulletin Number 6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July 1929), 67-91.

Danzer O.S.B., P. Beda, "Benediktiner auf dem Missionsfeld der Gegenwart", in: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61 (1933), 234- 238.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57 (1929), 293; 319.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56 (1928), 257 (Kurzinformationen).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58 (1930), 1; 58.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59 (1931), 144.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61 (1933), 76; 185; 329.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62 (1934), 16-17; 50; 194; 308.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64 (1936), 20; 251.

Emmerich, P. Heinrich, "Die Steyler Missionare in China. Chronik eines Jahrhunderts: 1879-1979", in: *Steyler Missionschronik 1978*, 41-47.

Fabregues, Rt. Rev. Joseph, "A Surve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ity of Peking" in: *Bulletin No. 1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Sept. 1926), 51-56.

Freitag SVD, P. Anton, *Glaubenssaat in Blut und Tränen. Die Missionen der Gesellschaft des Göttlichen Wortes*, Steyler Missionsbuchhandlung, Kaldenkirchen 1948, 104-118.

Fu SVD, P., "China: Peiping", in: *Steyler Chronik* Bd. 5, Nr. 1 (1935), 61-62.

Fuchs, Friedrich, *Das Collegium Sinicum*, in: *Lektoren in St. Augustin* (Hrsg.), *In Verbo Tuo, Festschrift zum 50jährigen Bestehen des Missionspriesterseminars St.*

Augustin bei Siegburg, Rheinl. 1913 - 1963, Steyler Verlag 1963, 73-83.

Generalleitung der SVD (Hrsg.), "Pflege der Wissenschaft", in: *Gesellschaft des Göttlichen Wortes 1936*, Missionsdruckerei Steyl, Post Kaldenkirchen, Rheinland, 76-80.

Gesellschaft des Göttlichen Wortes (Hrsg.), "Die Katholische Universität in Peking, China", in: *75 Jahre im Dienste des Göttlichen Wortes. Gedenkblätter zum 75jährigen Jubiläum des Steyler Missionswerkes (1875-1950)*, Steyler Missiondruckerei 1950, 155-161.

Goertz SVD, P. Joseph, "Die kathol. Universität Peking im Jahre 1936/37",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65 (1937-1938), 214-218.

Goertz SVD, P. Joseph, "Die Katholische Universität Peking im Jahre 1935/36",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64 (1936-1937), 205-207.

Goertz SVD, P. Joseph, "Die katholische Universität Peking. R kblick und Ausschau",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62 (1934-1935), 184-186.

Gumbrecht, Cordula, *Die Monumenta Serica - eine sinologische Zeitschrift und ihre Redaktionsbibliothek in ihrer Pekinger Zeit (1935-1945)*, Greven Verlag: Köln 1994 (v.a. S. 19-28).

Healy O.S.B., Dom Sylvester, "The Import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to the Catholic Missions of China", in: *Bulletin No. 4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May 1928), 69-76.

Healy O.S.B., Dom Sylvester, "The Plans of the New University Building", in: *Bulletin No. 6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July 1929), 3-12.

Heiar SVD, Rev. James A. (Ed.), *My China Memoirs (1928 - 1951)*, Rev. Joseph Henkels, SVD,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Techny, Illinois 1988, 37-72.

Huppertz, J., "Aus den Anfängen der ‚Monumenta Serica‘", in: H. Köster (Hrsg.), *China erlebt und erforscht, Partielle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Chinakunde*, München 1974, 191-233.

Kroes, P. Heinrich, "Die katholische Universität in Peking", in: *Steyler Missionschronik* '67, 14-16.

Mathews SVD, P. Gregor, "Wie man einem Todfeind der Missionare zu Leibe rückt",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64 (1936-1937), 173-177.

Murphy, P. J., "Anfang und Entwicklung der Katholischen Universität in Peking",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62 (1934-1935), 46-47.

Murphy, P. J., "Über die katholische Universität in Peking", in: *Steyler Missionsbote* 61

(1933-1934), 178-180.

Nuntius Societatis Verbi Divini, Vol. II., Fasciculus 1-5 (1934-1938), Romae, Apud Curiam Generalitiam 1938: "*Peking: Ü bernahme der Kathol. Universität*", 48, 51-55; "*P. Gen.-Sup. Josef Grendel zum Kanzler ernannt*", 58; "*Rundschreiben zur Ü bernahme*", 98-99; "*Niederlassung der Region Shantung eingegliedert*", 122-123; "*Antwort auf Jahresbericht über 1934*", 204-205; "*Antwort auf Jahresbericht über 1937*", 501; "*Das Haus der Gesellschaft dem Generalat unmittelbar unterstellt*", 327.

O'Donnell, Rev. Wm., "Progress 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in: *Bulletin No. 7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December 1930), 115-119

O'Toole, G.B.,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in: *Bulletin No. 1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September 1926), 17-22.

Rahmann SVD, Prof. P. Dr. R., "Katholische Universitäten im Fernen Osten", in: Dr. Johannes Thaurer (Hrsg.), *Weltkrise und Weltmission*, Verlag St. Gabriel, Modling bei Wien 1951, 83-95.

Rivinius SVD, P. Karl Josef, "Die Katholische Fu-Jen-Universität in Peking und ihre Ü bernahme durch die, Gesellschaft des Göttlichen Wortes' im Jahr 1933", in: *Verbum SVD* 21 (1980), 206-228.

Schmitz, P. Josef, "Die neue Fu Jen-Universität in Taipei, Formosa", in: *Steyler Missionschronik* '67, 51-52.

Schramm O.S.B., Dom Gregory, "The Laying of the Corner Stone", in: *Bulletin No.7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December 1930), 19-30.

Steyler Chronik, "*China: Peking*", Nr. 3 (1933), 90-93; "*China: Universität Peking*", Bd. 5, Nr. 6 (1937), 226-230; 265-267; "*Katholische Universität Peking*", Bd. 5, Nr. 7 (1938), 299-301; "*Peking*", Bd. 5, Nr. 8 (1939), 437-438.

Steyler Missionsbote 61 (1933-1934), 21; 115; 262;

Steyler Missionsbote 62 (1934-1935), 50; 94; 276; 304.

Steyler Missionsbote 63 (1935-1936), 134; 172; 311-314;

Steyler Missionsbote 64 (1936-1937), 52; 79-80; 269; 276; 301; 334.

Steyler Missionsbote 65 (1937-1938), 24; 108-110; 136; 193; 276-277; 287; 335-336.

Steyler Missionschronik '67 , "Saat und Ernte", 53-55.

Tellkamp SVD, Dr. A., "Die Katholische Fu Jen in Peking während der Kriegszeit, (1937-1945)", in: *Missionswissenschaft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1 (1947),

71-78.

Väth S.J., Alfons, "Papst Pius XI. und die Missionen in Asien", in: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57 (1929), 199-204.

在台復校之天主教輔仁大學

在台復校之天主教輔仁大學 ~~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歷史淵源之二~~

魏思齊 (Z. Wesolowski, SVD)

- 一、在台復校前的階段
- 二、輔仁大學在台復校
- 三、輔仁大學聖言會單位—理工學院，外語學院及民生學院
- 四、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永恆的緣分
- 五、在台輔仁大學從事教職及工作的聖言會和聖神會會士

一、 在台復校前的階段

聖言會自 1933 年至 1950 年接手北平輔仁大學，在學院及學生人數上都比上海及天津的兩所耶穌會大學多，影響也較大。1933 年聖言會接管輔大時，共計有三個學院、九個學系及 613 位學生，到了 1949 年，擴增至四個學院、十六個學系及 2299 位學生。因中國大陸政治上的變革，中共教育部自 1950 年十月正式接辦輔仁大學，次年七月輔大改為北京師範大學之一部份，此舉對聖言會而言為一大損失。鑒於中國大陸的局勢動盪，聖言會早有遷校計劃。1948 年春天，當時的輔大事務主任徐思本 (Peter H. Hüingsberg, 1909 年出生) 及富施公 (Friedrich Fuchs, 1890-1983 年) 二位聖言會神父即來台灣考察；同年八月，徐神父再度來台，購買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房屋一棟 (即今長安天主堂地址，包括現在的中央大樓及主徒會所在的地方都是)，做為輔仁大學在台辦事處，並約聘董事。省政府亦允贈圓山附近的土地作為校址。當時的輔大校務長雷冕 (Rudolf Rahmann, 1902-1985 年) 也是聖言會的神父，奉派來台主持共同籌劃遷校或建立一所高等學府的可能性，一切都進行的極為順利。還有兩位另外聖言會神父與他配合，然而，1951 年時聖言會總會長卡李伯 (Aloysius Grosse

Kappenberg，任期 1947-1957 年）停止活動，遷校計畫因而擱置，聖言會神父們賣掉已購置的房子，離開台灣。爾後聖言會亦對此決定感到非常遺憾，不過此種決定也必須配合當時不安的情況加以衡量。1954 年嘉義主教—牛會卿要求聖言會省會長再派神父來台，同年三月一日，第一批聖言會神父—賈德良（Leo Kade, 1903-1981 年）、陶賀（Aloysius Tauch, 1909-1987 年）、紀福泰（Aloysius Krieffewirth, 1904-1990 年）隨即抵達嘉義教區。當時聖言會對北平輔仁大學的損失有所共識，即輔大是宗座的財產，自中共佔據北京時，聖言會管理大學的教宗授權令即已終止。當時的總會長卡李伯神父也情願接受這個決定，因為當時在菲律賓和日本的聖言會大學極需要受過訓練的教授，在台復校計劃之可能性幾乎是微乎其微，不過聖言會並沒有完全放棄輔大在台復校的希望。

二、輔仁大學在台復校

1956 年七月十五日輔大校友正式在台成立校友會，發起復校運動，遂上書教廷呼籲在台復校，獲得教廷之贊同。同年八月北平輔仁前教務長—荷籍胡魯士神父（Henry Kroes, 1903-1989 年）來台商討復校事宜。其後數載，校友會即以復校為奮鬥之目標，與教廷及聖言會保持密切聯繫，並獲得聖言會的會士田耕莘樞機主教（1890-1967 年）及胡魯士神父和聖言會新總會長（Johann Schütte, 任期 1958-1967 年）之積極贊助。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謝壽康也以復校事宜與教廷進行聯繫。田樞機主教於 1957 年十一月來台之後向教廷重申復校事宜。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總主教也表示贊同輔仁在台復校。其實，按聖言會的紀錄顯示，最先向聖言會提出輔大在台復校的人為之前南京的總主教于斌（1901-1978 年）。自 1955 年開始，在他所到之處，常提及聖言會應該在台灣辦理輔仁大學的復校事業。當時于斌樞機主教鍥而不捨地建議開辦教育學院及社會學院。1958 年十一月廿六日，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抵台支持復校計劃。

1959 年二月輔大校董于斌總主教自美來台，在台輔大校友與他進一步商洽復校相關事宜。同月廿四日，羅馬教廷傳信部署理部長雅靜安（Gregory Peter Agagianian）樞機主教在其遠東的行程中也抵達台灣，輔大校友為其安排了政府級的隆重歡迎，並表達他們的期待，希望輔大能早日在台復校。雅靜安樞機主教隨即允諾！同年六月于斌總主教赴梵蒂岡，特訪雅靜安樞機主教，建議邀集數個修會合作。同年十二月三日，教廷發表任命于斌總主教為復校首任校長（Rector Magnificus），並蒙受若望廿三世教宗的祝福及其率先捐助之美金十萬

元，以為倡導。美國波士頓谷欣（Cardinal Cushing of Boston）樞機主教隨即響應，募集美金一百萬元做為初步建校經費。輔大在台復校的責任不再由聖言會獨自承擔。聖言會會士田耕莘樞機主教亦於 1959 年擔任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任董事長。

新的輔仁大學由中國聖職（中國主教團）、耶穌會、聖言會連同聖神修女會和道明會（後者後來退出）聯合承辦。期間，方濟會也表示願參與復校過程辦理外語組教學，後來其總部於 1960 年由傳信部批准在新加坡辦一個學院，方濟會於是放棄在輔大的合作，而由聖言會接辦外語組教學。當時僅在台北總主教區的耶穌會神父就有 60 位左右，他們在各大學教書，但卻無人提拔。這些神父們先前早已在上海或天津大學籌備復校，當時連傳信部也無此種計劃，所以他們立刻參加輔大復校的工作。

三個創辦單位本是如此不同的團體，不過決心合作辦大學，實為創舉，雖然過程中也曾遭遇一些困難，但三單位彼此間仍然合作良好。此三個教會團體的合作，展現出真誠使徒的精神，不但舒解了各團體財務上的負擔，也減輕了人才不足的問題。

1960 年三月一日，田耕莘樞機抵達台北，就任台北教區的署理總主教，同年四月五日，田樞機正式擔任台灣輔仁大學新董事會的董事長。此新董事會通過「分地設校」原則向政府申請復校。稍早，即 1960 年四月四日，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再度抵達台灣，參加此次新董事會的會議。同年七月七日第二次董事會議決定：由中國聖職單位負責文學院，在台北復校；耶穌會負責法學院和工學院，聖言會負責理學院及外語各系，二者同在高雄大貝湖附近復校。

1961 年一月購妥台北吉林路樓房兩幢為籌備處，由牛若望、龔士榮二位神父出任正、副主任。同年九月報准教育部，先行成立文學院的哲學研究所，同月廿日哲學研究所於吉林路開學了！

第一屆哲學研究生共計有八名，為輔大在台復校的第一批學生，而他們的開學典禮則為復校的正式日期（1961 年 9 月 20 日）。1962 年輔大董事會更改對耶穌會及聖言會復校最初計劃之地點，有鑑於各地擬捐贈之土地均不適宜等問題，董事會重新決定中國聖職單位、耶穌會單位及聖言會單位在同一校區設院，且在台北附近購地建校。1963 年二月購妥台北縣新莊鎮營盤呈卅餘甲土地為大學地址，隨即於三月分別興建文、理、法三院教室及學生宿舍大樓五棟。聖言會神父林慎白（Friedrich Linzenbach, 1904-1981 年）為總建築師，各單位分別另請建築師設計，由林神父核准後營建。

當時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任命蔣百鍊神父(Richard Arens, 1913-1990 年)為聖言會開辦理學院及外語各系的負責人(可參考本冊其簡單生平介紹,第[?]頁)。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聖言會中儲備人材。聖言會當中年青和年長的會士們有些曾經在北平輔大服務多年,有些則對科學或語言學感興趣。無論如何,他們都熱切盼望年輕學生分享耶穌的福音。1962 年聖言會團體的成員及其任務是:

- 1) 蔣百鍊神父為團體院長;
- 2) 李嘉士 (Michael Richartz, 1893-1983 年) 神父為理學院院長;
- 3) 杜誼華 (Bernard Doyle, 1930-1965 年) 神父為總務主任;
- 4) 文訥 (Peter Venne, 出生 1913 年) 神父為外語各系主任, 外語圖書館館長;
- 5) 齊德芳 (Franz Giet, 1902-1993 年) 神父為外語實習所所長;
- 6) 潘國樑 (Albert Behrla, 出生 1937 年) 修士為工程師;
- 7) 侯光華 (Patrick Hogan, 出生 1936 年) 修士為出納主任;

1963 年扈伯爾神父 (Franz Huber, 1913-1994 年) 擔任生物系主任。當時聖神會團體中有:

- 1) 吳秉雅修女 (Urbania Tüshaus, 1907-2000 年) 為家政營養系主任;
- 2) 柯蘭修女 (Laetifera Corazon) 為英文系副教授。

1963 年十月廿一日, 在新莊建設並復校的輔仁大學招收新生共 518 名, 分配三個學院: 文學院設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外國語文(分英文、德文兩組, 由聖言會辦理) 四學系; 理學院設數學、家政營養兩學系(由聖神會修女會辦理); 法學院設法律、經濟、工商管理三學系等共計九個學系。對聖言會而言, 當時有 180 名左右第一屆的學生入學了。他們一方面上著課, 一方面聽著起重機、挖土機和堆土機隆隆作響的聲音。那時聖言會單位已建立三棟大樓: 外語各系大樓、家政系大樓和男生宿舍(117 間房間共有 234 個床位)。

三、輔仁大學聖言會單位—理工學院, 外語學院及民生學院

(一) 理工學院:

當聖言會同意參與輔大在台復校並負責理學院(此為原來的名字)時, 就

很清楚地知道在財政上會遭受許多困難，且在數年之內將需要國外（尤其德國政府及教會）和國內熱心人士的支持。當時台灣已有不少大學具有設備完善的理學院，要與他們競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外，公立大學的經費完全由政府負擔，理科方面的師資編制不需依賴學生的人數，而研究計劃在人事、器材和實驗場所上，亦得到政府國科會的全力支持。為了建立一個好的理學院，前北平輔大理學院院長李嘉士於是擔任新輔大理學院院長，與他一起自菲律賓來的德籍 Brüller 博士及聖言會神父艾浩盧（Edgar Oehler, 1907-1974 年）一起努力奮鬥。聖言會也從 AID（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國國務院的國際開發署），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聯合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及台灣大學得到了支持。同時在蔣神父領導之下，勇敢的開始自己籌募經費，辦理募款事業。除此之外，由於聖言會獻身並參與教職，輔大理學院很快地就成為國內一所完善的理學院。當聖言會肩負承辦理學院的責任時，也清楚知道理學院並不是進行福傳工作的好環境，因為現代世界及大學中太強調科技，而輔仁大學永遠不會成為一所純學術或技術性的大學。當輔大於去年整合時，由於聖言會會士及聖神會修女長期的奉獻，輔大理學院各系間早已發動許多學生和教授的宗教活動。自復校以來，理學院已有十幾位女同學當了修女；很可惜的是，男同學方面的聖召似乎比較不容易。

1982 年九月理學院更名為「理工學院。」以下列出理工學院現況及各學系成立之年代：

- 1) 數學系（1963 年成立；自 1973 年設碩士班，並分為純數學、應用學二組）；
- 2) 物理系（1964 年成立；自 1974 年設碩士班）；
- 3) 化學系（1964 年成立；自 1980 年設碩士班；自 1991 年設博士班）；
- 4) 生命科學系（前身為生物學系，1964 年成立；1981 年設碩士班；自 2001 年 8 月 1 日起更名為生命科學系）；
- 5) 電子工程系（1977 年成立；自 1998 年設碩士班）；
- 6) 資訊工程系（1988 年成立；自 1996 年設碩士班）；
- 7) 心理學系（1972 年成立於文學院；原名「教育心理學系」，1978 年改名為「應用心理學系」，2000 年改隸理工學院，並更名為心理學系）；

- 8)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2002 年成立；為一獨立研究所)；
- 9) 科學與宗教研究中心 (2001 年成立)：為一提供宗教與科學間關係之研究與教育支援的單位，為推動宗教與科學之間對話教學的介面，以台灣與中國文化的脈絡為基礎。
- 10)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2001 年建立)：為教育支援單位，期使生物技術能成為輔理工學院的教育及研究特色之一，藉以整合理工學院各領域知識，並與醫學院及民生學院合作，規劃跨領域之生物技術教育。
- 11) 理工學院宗教輔導室 (1981 年成立)：為使理工學院各系所學生除了專業知識之外，也作一個快樂的人，並選擇一個有意義的生活，陪伴同學在理工學院的讀書、成長。

歷任理工學院院長為：1) 蔣百鍊神父 (任期 1963-1973 年)；2) 郝思漢神父 (Heinz Hesselfeld；任期 1973-1984 年)；3) 柏殿宏神父 (Frank Budenholzer；任期 1984-1990 年)；4) 周善行教授 (任期 1990-1996 年)；5) 張康教授 (任期 1996-2002 年)；6) 華魯根教授 (任期自 2002 年起)。

希望前理工學院院長張康教授去年所提出的理念，繼續被現任院長華魯根教授落實於該學院：「輔仁大學理工學院的理念是在科技快速進展的 21 世紀中，獻身於教學和學術研究，並服膺與弘揚真理。」

(二) 外語學院：

方濟會放棄辦理外語各系，而改由聖言會接掌時，聖言會便已預見身為國際修會從事語言教學的便利性，譬如在師資方面，聖言會相當容易找到德籍會士負責德文系或美籍會士的負責英文系等等。

在體制上，外語各系隸屬於文學院，但師資的聘用、教學的管理和經費的籌措則由聖言會負責。

外文系最初於 1963 年成立英文組和德文組；1975 年成立台灣第一所德國語文學研究所；次年又成立有英國語文學研究所。1964 年成立外文系法文組 (於 1984 年成立法國語文學研究所) 及西班牙文組 (1982 年成立全國第一所西班牙語文研究所)，1967 年四組各自獨立成系，1969 年又設立東方語文學系 (1984 年更名為日本語文學系；自 1993 年有日本語文學研究所)。同年創立「西洋語文研究所」，並於 1972 年轉型為台灣第一所「語言學研究所」。1980 年二月教育部特開先例，正式核准輔仁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的成立。1988 年成立台灣第一所翻譯學研究所，1994 年創立全國第一所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1996 年成

立台灣第一個義大利語文學系。

由上而知，輔大外語學院在外語教學方面努力進行許多開拓工作及創新研究。而外語學院的畢業生很少有就業的困難。畢業的校友也為輔大外語學院獲得良好的聲望。

外語學院的一大成就，便是創立外語實習所，提供英文和其他外語的教學方法。有些方法還得到國內不少中學和大學語言教師的肯定和採用。外語學院也有視聽教學中心（原名：語言實習所，成立於1963年），提供視聽與電腦教學的完整服務。自1980年以來外語學院也增設宗教輔導室，目的是為了陪伴外語學院各系所的學生，每一個同學都可以很自由地來到這裡，宗輔室希望幫助學生開創一個有意義的大學生活，無論是求知、交朋友或激發自己的潛能，都可以到這裡尋求協助的管道。

歷任外語學院院長為：1) 孫志文神父（Arnold Sprenger，任期1980—1984年）；2) 歐陽瑋神父（Edward Vargo，任期1984—1990年）；3) 雷孟篤教授（José Ramón Alvarez，1990—1996年）；4) 林水福教授（任期1996—2001年）；5) 康士林修士（Nicholas Koss，任期自2001年起）。

希望現任院長康士林教授，繼續實現他於去年所提出的理念：「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的理念是在國際化資訊化中，戮力培育國際專才，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以追求世界和平與美善。」

（三）民生學院：

民生學院之創立及其存在特別呈現出聖言會與聖神會的合作精神。此歷史可追溯至1939年在中國大陸北京的輔仁大學，當時吳秉雅修女（Urbania Tüshaus，1907—2000）創立家政系（可參考本冊其簡單生平介紹，第[?]頁），為全國少數設家政系的大學之一。1963年輔仁大學在台復校時，由吳修女克服萬難繼續領導，成立全國第一個家政營養學系（一班50人），屬於理工學院。1970年此系衍生出全國唯一的織品服裝系，由羅麥瑞修女（Maryta Laumann）擔任創系系主任（初時只收女生，後改男女兼收）。1971年家政營養系之營養組獨立成為食品營養系，由何來蘭修女（Eva Monica）擔任首任系主任（男女兼收），家政營養系則更名為家政系，直至1986年，家政系為適應社會需要與變遷，改名為「生活應用科學系」（男女兼收）。食品營養系及織品服裝系碩士班則分別於1983年及1991年成立。

1994年（國際家庭年），全國第一個民生學院（College of Human Ecology）正式成立，以其涵蓋食、衣、住、行、育、樂範圍而命名之。食品營養系並於

1995 年成立該院第一個博士班。織品服裝技術系隨後於 1997 年成立，生科系則於 1998 年正式分組為餐飲管理組和兒童與家庭組。民生學院現有五個系：1) 食品營養學系；2) 織品服裝學系；3) 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4) 餐飲管理學系；5) 兒童與家庭學系。

另外，博物館學研究所於 2002 年正式成立，此研究所可追溯至織品服裝研究所，該所於 1993 年成立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收藏並保存傳統衣飾文化。1969 年吳修女創辦輔園餐廳，為學生提供應用所學之專業知識的實習機會；1978 年她還創設了輔仁大學幼稚園中心。和理工學院及外語學院一樣，民生學院也有宗教輔導室（於 1994 年成立），陪伴學生尋找及確立他（她）們人生的方向。首任院長為李寧遠教授（1994—2000 年），第二任院長為黃韶顏教授（自 2000 年起）。

希望現任院長黃韶顏，繼續於民生學院落實去年的理念：「輔仁大學民生學院的理想是，在 21 世紀中重新探討生命的意義，及促進國人之家庭生活幸福美滿，民生樂利。」

四、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永恆的緣份：

1933 年，教宗碧岳十一世邀請聖言會由美國傳教本篤會手中接辦北平輔仁大學。當時聖言會已經開始致力於卓越之天主教大學教育。在基督信仰的激勵下，聖言會不斷地邀請輔仁大家庭的所有成員，為人性尊嚴與每一個文化的價值努力，並且也為當地社會和世界
的福祉而播種耕耘。

在台復校之初，輔仁大學分別由中國聖職單位、耶穌會及聖言會及其合作者一聖神修女會共同合辦。聖言會輔大團體除了負責理工學院、外語學院及民生學院之外，也在輔大校園聖言會單位內附設一個語言中心。該中心於 1969 年獲得教育部的核准，但其教學並不授予學位，因為此語言學習機構原來的目的是專供外籍傳教士、男女會士及外籍學生學習中國語言（幾乎都為國語）與中國文化之用。自成立至今，學生來自五大洲三十餘國，人數逾 3000 名，本中心的歷任主任為：1) 艾文神父（1925-1983 年）；2) 趙德恕神父（Imre Zoldos）；3) 歐陽瑋神父（Edward Vargo）；4) 郭育才神父（Lothar Kreitz）；5) 侯光華修士（Patrick Hogan）；6) 郭維夏神父；7) 于柏桂神父（Victor Yparraquirre）。

自 1980 年起，聖言會在輔仁大學附近一泰山，開設了一個海外培訓計劃班（Overseas Training Program，簡稱為 O.T.P.），專供外籍聖言會年青會士學習國

語及中國文化。23年來已有大約65個不同國家的會士參加，其中有很多聖言會的青年留在台灣工作，甚至在今日的輔大還可以找到他們。參加此海外培訓計劃者基本上需經歷兩年的培育，除了學習中文之外，有透過服務直接接觸本地文化之經驗，也有關於中國文化的講座等活動。如此一來，聖言會年青會士們便得以發揮他們使徒生活中的福傳精神。會士們可以在兩年內完成此基本計劃，之後還能留一年從事直接牧靈方面的工作。此種計劃為聖言會及台灣教會帶來了不少的貢獻。其歷任主任為歐陽瑋神父 (Edward Vargo)、蔣斌神父 (Gregorio Sebastian)、安大森神父 (Donald Anderson)、高田春神父 (Dennis Callan)、菲倫京神父 (Louis Viera)、耿哲磊神父 (Miguel Angel González)、聶達安神父 (Leszek Niewdana)、鄭文興神父 (Joseph Tran Huynh)。經過三年 O.T.P. 之後，許多聖言會年輕會士有機會於輔大神學院繼續研讀神學。自1983至1993年，分別由柯博識神父 (Jac Kuepers)、田默迪神父 (Matthias Christian)、于柏桂神父 (Victor Yparraguirre)、鄭穆熙神父 (James Vyathappan) 擔任陪伴他們的導師。

總括而言，自1961年輔仁大學由三個主辦單位在台復校迄今，包括聖言會在內的三單位努力耕耘的結果，如今已成效斐然。為因應台灣高等教育的新挑戰，此三單位於2002年8月1日起正式整合。此舉可說是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性的變革。不過，聖言會及聖神會仍肩負著天主教大學的使命，也是本校獨具之特色，將會繼續參與教學、研究、服務及關懷等工作。

其實，在亞州聖言會除了不少中小學之外，還創辦了以下的五所大學：

- 1) 自1932年以來有菲律賓宿霧城的 San Carlos University (Cebu)；
- 2) 自1949年以來有日本名古屋的南山大學 (Nanzan University/Nagoya)；
- 3) 自1941年以來聖言會接辦菲律賓教區的 Tacloban Catholic Faculty，1966年改名為 St. Paul's College—Divine Word University of Tacloban /Philippines(聖言大學於 Tacloban City)；
- 4) 自1982年以來有印尼帝汶島的 Widya Mandira (Universitas Katolik Widya Mandira, Kupang/Timor)；
- 5) 自1990年以來還有新幾內亞 Divine Word University (聖言大學，Madang/Papua New Guinea)。

2002年8月1日—正在輔大整合的時刻—天主教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與聖言會德國 Sankt Augustin 華裔學志研究所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共同成立「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本中心的成立具歷史性的意義，代表著聖言會華

裔學志研究所與輔仁大學的緣份。其淵源可追溯至 1934 年聖言會的神父，德國漢學家鮑潤生（Franz Xaver Biallas, 1878-1936 年）決定創辦一個漢學方面的學術性刊物 *Monumenta Serica*，中文：「華裔學志」。聖言會在台開辦理學院及外語各系的負責人蔣百鍊神父當時也期待把華裔學志研究所重新遷設於輔仁大學。今日的華裔學志漢學中心可說是蔣神父夢想的一部份。如此，聖言會將要繼續不斷地共同合作，推動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目標，並特別著重於推動中西文化交流之宗旨，致力於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

聖言會及聖神會中華省在輔仁大學於 2003 年 3 月 25 日（天使報喜節日）開始慶祝恩寵之年，為的是要感恩天主，因為聖言會和聖神會的會祖楊生神父（Arnold Janssen, 1837—1909 年）與第一批聖言會赴中國傳教的傳教士福若瑟神父（Josef Freinademetz, 1852—1908 年），即將於 2003 年 10 月 5 日一同被冊封為天主教的聖人，但願這二位神父特別降福聖言會及聖神會往後於輔大所接續的工作。

讓輔仁大家庭重新把握我們的共同宗旨，面對其昔今及將來的基本使命：

「本大學為追求真善美聖，全人教育之師生共同體，致力於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弘揚真理，以促進社會均衡發展及增進人類福祉。」

五、在台輔仁大學從事教職及工作的聖言會和聖神會會士

聖言會會士名錄：

姓名		在輔仁大學 服務期間	服務單位與 最高職稱
Cardinal Thomas Tien	田耕莘	1963 – 1967	輔仁大學董事長
Fr. Richard Arens	蔣百鍊	1963 – 1973	理學院院務長
Fr. Bernhard Doyle	杜誼華	1963 – 1965	總務分處主任
Br. Albert Behrla	潘國樑	1963 – 1970	總務分處
Fr. Franz Giet	齊德芳	1963 – 1993	德文系語言實習所 主任
Br. Patrick Hogan	侯光華	1963 – 1999	語言研究所語言中 中心主任
Fr. Michael Richartz	李嘉士	1963 – 1969	物理系 理學院院長

Fr. Peter Venne	文 訥	1963 – 1992	英文系 英文系系主任
Fr. Paulinus Aiwen	艾 文	1964 – 1983	德文系
Br. Michael Helsper	麥昆山	1964 – 1970	總務分處
Fr. Franz Huber	扈伯爾	1964 – 1982	生物系 生物系主任
Fr. Franz Oster	歐思德	1964 – 1968	物理系 物理系主任
Fr. Joseph Stier	司文德	1964 – 1987	英文系
Fr. Paulinus Suo	薛保綸	1964 – 迄今	人生哲學 夜間部主任
Fr. Imre Zsoldos	趙德恕	1964 – 迄今	法文系 法文系系主任
Fr. Josef Detig	戴德古	1965 – 1967	英文系
Fr. Arnold Sprenger	孫志文	1965 – 1987	德文系 外語學院院長
Fr. Josef Meiners	閔明我	1965 – 1979	人生哲學
Fr. Wilhelm Mueller	彌維禮	1965 – 1969	德文系
Fr. Angel Armendariz	安明德	1966 – 1970	西班牙文系 西班牙文系系主任
Fr. Hesselfeld Heinz	郝思漢	1966 - 1987	物理系 理工學院院長
Fr. Karl Specht	白 熙	1966 – 1989	化學系 化學系系主任
Fr. Raymond Lennon	藍 諾	1967 – 1970	英文系
Fr. Albert Czech	柴 熙	1967 – 1977	哲學系
Fr. Ernst Boehm	彭加德	1968 – 1978	聖言會院長
Fr. Matthias Christian	田默迪	1968 – 迄今	共同科 校牧
Fr. Dieter Klementa	柯明道	1968 – 1971	自然科學圖書館主 任

Fr. Paul Huang	黃貴謙	1969 – 1971	人生哲學
Br. Lucas Quint	官路嘉	1969 – 1972	總務分處
Br. Gil Aranas	梁安	1970 – 1972	總務分處
Br. Franz Freisinger	傅良敬	1972 – 迄今	總務分處
Fr. Matthias Hardegen	韓剛	1972 – 1973	總務分處
Fr. Jac Kuepers	柯博識	1973 – 迄今	人生哲學 聖言會單位代表
Br. Vincent V • Holzen	賀文振	1974 – 1988	總務分處主任
Br. Francis X • Lee	李傳綬	1974 – 1998	輔大保管組主任
Br. Kephass Spee	蓋書沛	1974 – 1975	總務分處
Fr. Edward Vargo	歐陽璋	1974 – 1996	英文系 外語學院院長
Fr. Lothar Kreitz	郭育才	1975 – 1986	語言中心主任
Fr. Aloys Yang	楊世豪	1975 – 1995	人生哲學
Fr. Daniel Bauer	鮑端磊	1976 – 迄今	英文系 英文研究所所長
Fr. Frank Budenholzer	柏殿宏	1978 – 迄今	化學系 副校長
Fr. John Koster	高思達	1978 – 1994	物理系 理學院電腦中心主任
Fr. Hermann Weckenbrock	汪廣澤	1979 – 1980	物理系
Fr. Julian Fernandez	方友良	1979 – 1983	西班牙文系
Fr. Rudolf Kalesse	葛理思	1983 – 1992	德文系
Fr. G. Amaldoss	堯慕德	1987 – 1991	生物系
Fr. Michael Kwo	郭維夏	1986 – 迄今	共同科 副校長
Fr. John Hung	洪山川	1986 – 1992	共同科 宗輔中心主任
Br. Norbert Ruf	陸甫	1987 – 迄今	總務分處
Fr. Susumu Sakamoto	板本進	1988 – 1992	日文系
Fr. Victor C. Yparraguirre	于柏桂	1991 – 迄今	全人教育

Fr. Arul Joseph	周賜福	2002 – 迄今	語言中心主任 資訊工程系
Fr. James v .	鄭穆熙	1994 – 迄今	生活應用科學 學輔中心主任
Fr. Dennis Callan	高田春	1995 – 1998	總務分處主任
Fr.Chinnasamy Irudayaraj	易儒德	1996 – 1997	宗教輔導中心
Fr. Miguel A. González	耿哲磊	1996 – 1997	神學院
Fr. James Liebner	李柏傑	1997 – 1998	英文系
Fr. Leszek Niewdana	聶達安	1997 – 迄今	夜間部宗教輔導
Fr. Zbigniew Wesotowski	魏思齊	1999 – 迄今	全人教育 發展委員會主任
Fr. Pauliuo Belamide	畢連德	2002 - 迄今	全人教育中心

聖神會會士名錄：

姓名		在輔仁大學 服務期間	服務單位與 最高職稱
Sr. Urbania Tüshaus	吳秉雅	1963 – 1980	家政系
Sr. Edna Polt	鮑德明	1963 – 1978	健康中心
Sr. Clemens Dietl	鄧迪德	1963 – 1984	修女院
Sr. Laetifera Colet	柯 蘭	1963 – 1970	英文系
Sr. Hildegard Pohanka	白恆光	1964 – 1983	數學系
Sr. Rita Liu	劉 英	1964 – 1977	化學系
Sr. Cornelita Buck	周慕貞	1964 – 199	宜真、宜善宿舍
Sr. Julita Ruelos	陸慰樂	1964 – 1981	生物系
Sr. Eva Monica	何木蘭	1964 – 1976	食品營養系
Sr. Ellen Marchner	梅貽納	1964 – 1971	英文系、宿舍
Sr. Annemarie	安修女	1964 – 1969	英文系
Sr. Maryta Laumann	羅麥瑞	1966 – 迄今	織品服裝系
Sr. Angela Mennemann	安祺樂	1966 – 1968	法文系
Sr. Theresa Baues	鮑坤儀	1968 – 1990	德文系、宜真宜善宿 舍

Sr. Heliena Krenn	賀永光	1969 – 1999	圖書館、英文系
Sr. Raffella Hofer	芮莉	1969 – 1971	輔導中心
Sr. Agathe Bramkamp	裴德	1969 – 迄今	英文系、德文系
Sr. Esterangela Chiong	鍾淑德	1971 – 1974	總務處
Sr. Erlinda Kemper	海景星	1971 – 1977	宜美宿舍
Sr. Fidelis Goebbel	古怡心	1972 – 2002	法文系、德文系
Sr. Wen Li Chuang	莊文嬋	1973 – 1988	家政系、食品營養系
Sr. Philomena Yamazaki	山崎陽子	1976 – 1996	日文系
Sr. Mariebenedicta Sporer	施納德	1977 – 1979	宜美宿舍
Sr. Lucia Lenfort	任若夫	1978 – 1983	健康中心
Sr. Hilda Chen	陳彩音	1979 – 1981	宜真、宜善宿舍
Sr. Victoria Chang	張素治	1986 – 1989	健康中心
Sr. Elisabeth Shima	島美惠子	1981 – 1983	日文系
Sr. Lynn Marie Morrison	莫立杉	1982 – 1989	玫瑰宿舍
Sr. Therese Ann Yu	余碧真	1986 – 1988	宜美宿舍
Sr. Maria Carmen Castro	甘佳玲	1983 – 1986	健康中心
Sr. Felisa Liu	劉錦萍	1985 – 迄今	宗教輔導室
Sr. Pacis Li	李偉平	1982 – 1992	化學系、夜間部
Sr. Victoria Ann Huang	黃淑媛	1985 – 1992	家政系、總務處
Sr. Antsila Yau	姚景如	1986 – 1993	宜真、宜善宿舍
Sr. Leonora Sudhoff	雷華	1988 – 迄今	宜美宿舍
Sr. Marianeldis Loewe	呂薇	1989 – 2000	玫瑰宿舍
Sr. Cora Lorenzo	柯惠蘭	1990 – 1992	宜美宿舍
		1999 – 迄今	
Sr. Frances Chang	張寶華	1996 – 2000	夜間部
Sr. Marta Chang	張萃文	1993 – 迄今	國語中心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My Spiritual Legac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My Spiritual Legacy

Arnold Sprenger, SVD

孫志文神父(Fr. Arnold Sprenger, SVD), 1929年生於德國的Paderborn地區。1952年進入聖言會, 1958年晉鐸神父。之後被派到美國華盛頓天主教大學取得德文碩士, 及喬治城大學語言學博士。1965年到輔仁大學德文系教書, 1967-1983年任系主任, 1981-1987年任所長, 同時建立外語學院並擔任院長(1980-1984)。1987年到北京於師範大學和北京第二外語學校交英文教學方法。2000年在北京社會科學院作研究工作。專精於德文文學及外語教學。

在此篇〈天主教輔仁大學---我精神的遺產〉一文中, 孫神父在他於輔大22年生活與服務的背景上, 把基督信仰對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則和層面, 有所詮釋和闡明, 尤其是輔仁大學做為在台灣天主教大學的精神與特色。其中, 發揮自深刻信仰而來的天主教大學的辦學精神和理念。

I. Introduction

During my work at Fu Jen University (1965-1987) I reflected time and again on the topic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Taiwan.” As a teacher and later on also as an administrator I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Taiwan has to be a university in the fullest sense of the word. It has to be seen and understood in its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t has to share its special Catholic message with every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family and even with society at large.

In my former publications I concentrated first on my experience in the classroom, discussed then topics of a more general nature, and finally focused on religious (philosophical-theological) aspects of respective questions. When I was asked to contribute a paper for the present volume on “Mission and Identity” (the Catholic character) of Fu Jen University, I thought first to follow the same pattern. But after some reflection I decided to start with the “Catholic” aspect of Fu Jen University. After so many years of service at Fu Jen 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it is

my Catholic Faith that has sustained and strengthened me during all these years:

-- my faith in God who has created me and loves me, who is my hope, my future and the goal of my life

-- my faith in God who has created the universe and therefore is its origin and absolute arbiter

-- my faith in God who created humankind and is its Lord and final Judge

-- my faith in God who sent his own Son to free us from all evil, sins and aberrations and lead us to his final destination

-- my faith in God before whom all people are equal

-- my faith in God who is the Father of Jesus Christ and also "Our Father"

-- my faith in Jesus Christ in whom all are brothers and sisters

-- my faith in Jesus Christ who gave us these commandments: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This is the greatest and first commandment. And a second is like it: '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Mt 22, 37-39).

These are some articles of the Catholic faith that have been the guidelines in my work, that have sustained me throughout these years, that have made my work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 joyful enterprise. Many more aspects could be listed here. Some of them will be referred to in my further deliberations. In the following I can only deal with a few issues.

II. Catholic University in Taiwan

The Students

Our present pluralistic situation is caused by the on-going differentiation and complexity of modern life. Students come to the college or university because they are searching for orientation, and do not yet understand the world. Students, of course, want to be introduced to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need enlightenment in his personal concerns. Students are puzzled by the wealth of informational knowledge, and by the many choic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Students

are deeply puzzled at the discovery that modern adult education does not offer a sound value system and reliable guidance with regard to moral behaviour. Heretofore unquestioned principles of order are dissolved. Suddenly many issues never before dreamt of become important. There appear different potentialities, different ways of life, different world-views,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which stand – seemingly equally legitimate – side by side.

It is here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has to make its impact on modern education. It is here th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enlightened and challenged by its faith in God and humanity, should raise its voice.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should place great emphasis on good teaching, on counselling of students and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trust,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If our students are to learn to live responsibly and joyfully, fulfilling their promise as individual humans and their obligations as citizens in a democracy, they must com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we are living in, which exists only in community. They must be made to appreciate values such as self-respect, selflessness, friendship, love, honesty, trust, hope and patience. They must come to see the importance of sacrifice for others or for a common good, for the search of truth, the dignity of life and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on all levels. They should also open themselves to so-called transcendent values which are treasured in different religious traditions. It is these values which are the hardest to acquire, yet they will be decisive for prudent and mature jud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in students' future lives.

However, none of these values can be taught through programmed instruction, or instilled via “obj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pproaches. Education in general, and moral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is essentially an affair between human persons, be this in the family, schools, or any other institution in society. Great educators have stressed this fac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humankind. It is here that the great sages of humankind, and among them those of China, should be called upon to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solving modern problems.

The Role of the Teacher

What all this amounts to is the call for a thorough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teacher. We may set up excellent programs for students, but who is to teach truly worthwhile courses, and how can they be taught effectively? Who is to teach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that lead to genuine appreciation of art, of values that instil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average teacher or professor may be considered an expert in an academic field, but does not venture to step beyond the borders of that single discipline.

There is a great need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teaching. This type of work could be carried out by groups or committees of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from varied academic fields. They might discuss a problem or an issue from the point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valuable information on the problem of abortion – to raise just one issue – could be provided by biologists, sociologists, philosophers, theologians, historians, etc). Teaching materials might be provided for individual teachers with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truly effective teaching.

Today, as in the days of Confucius (551-479 BC) and Socrates (470-399 BC), the teacher may be said to play the dominant role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However, in our modern age authority as it was known and exercised in the past is to a large extent already replaced by so-called “democratic processes.” That is why intellectual, moral, and spiritual integrity are so crucial. In other words, the powers of reasoning, persuasion and convi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teacher, and motivation and trust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on.

In our ever more complex society, solving problems becomes one of the primary goal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Students should be made aware of all kinds of problems surrounding them. They should be made to see how they can now already and more so in the future contribute to problem-solving. Students who are deeply impressed or even shocked by problems, malfunctions, injustices, and evils in society, who begin to realize that tomorrow already they will be full members of this

troubled society, may very well sense their opportunities in college years to prepare carefully and thoughtfully for their future.

Teachers do their students a great service by implanting social virtues in them. If the words of Jesus “you must love your neighbour as yourself” are heeded, the teacher can initiat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hat help foster community spirit in the classroom. In group work students may be given chances to discuss matters. Bonds of friendship develop that will in many cases last beyond the college years.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in many instances students turn to their former student friends when meeting problems and hardships in their careers and private lives.

The teacher’s personality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effective social, moral, and spiritual education. The goal of a teacher is to create a pedagogic atmosphere which the well known German educator O.F. Bollnow describes as determined by trust, security, gratitude, obedience, love, patience, hope, cheerfulness, humour, and kindness (see his “On the Virtues of the Educator” in *Education* , vol. 20 (1979), 69-79). This necessarily involves the self-education of the teacher who must come to grips with himself or herself. A teacher must know whether students perceive in classes a spirit of scepticism or trustful patience.

The list of virtues and skills the teacher is expected to possess could be prolonged. But they all depend particularly on whether and how teachers come to terms with their personal lives, or how they perpetrate their unresolved conflicts in class.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we can understand the great, in many instances appalling, burden of the teacher and educator. Confronted with failures and finding little appreciation in society, it becomes only too understandable that many teachers become prematurely weary and embittered and then carry on their profession as a matter of routine. With O.F. Bollnow we ask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whence does the teacher obtain the strength to summon up new faith in students in spite of all disappointments?

His answer is:

He can succeed in doing that of his own accord on the strength of pure determination. That is only possible if the educator, for his part, is sustained by another, deeper faith, the faith that in spite of all setbacks and failures his activity has a significance. And that, in turn, is only possible if in performing his work he is convinced of an ultimate purposefulness of the world, if in the final analysis he feels himself to be sustained by a divine order after all. It is from that alone he can derive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with his work and without it all his endeavors would be in vain and clutching at the wind. (Bollnow 77)

One or two more questions may be added to this section of the paper. Whence did Jesus obtain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with his message of love in spite of so much opposition? He knew that he was sustained by a Divine power, and he trusted in his Father. His Father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thereby testifying that every moment and activity of Jesus on earth had been filled with God's blessing. A second question. Whence did Confucius obtain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for so many years to work for his lofty ideals in spite of so many disappointments and setbacks? A careful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suggests that he was convinced of an "ultimate purposefulness of the world" and that he felt "sustained by a divine order after all." It is these questions and our responses to them that point to what a Catholic University should be.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we arrived at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eachers need "divine guidance" if they are to carry out their duties as responsible educators. We will turn now to students and suggest that they, too, have to be sustained by a divine order if they are to master their lives in this modern world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to fulfil their moral duties as responsible citizens.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Harry Hauke refers to this point in the following way:

We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at trust does not relate to one's fellow-citizen only but extends far beyond interhuman relations. Thus we speak in general of a trust in being and in life or a trust in God and what we mean by that is a direct turning of the human being to a transcendental power that not only supports and preserves him but also gives him the certainty of standing under a benevolent protection in the midst and uncertainty of this world. (Harry Hauke, "The Pedagogical Significance of Trust," in *Education*, vol. 21 (1980), p. 74)

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citizens of the modern world. Confronted with today's world-wide problems, they share modern people's anxiety and pose anew, in a rather radical way, age-old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ll this? What is life all about? People are no longer content with prefabricated answers. As citizens of our turbulent age people have tasted and are being fed with all kinds of food presented to them by a great variety of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philosophies and different "humanisms," but their appetite for spiritual and moral values is not satisfied. Our students are searching for ways to enhance their human and personal dignity and provide meaning for their existence in a overwhelmingly inhuman world. Karl Jaspers has written:

The question is: How will the content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 be preserv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age of Technology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whole human community? How shall we preserve the infinit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the dignity and rights of man, the freedom of the spirit, the metaphysical experiences of the millennia? The specific question of the future, however, which conditions and includes everything, is how and what man will believe. Man cannot live without faith. For even nihilism, as the opposite pole of faith, exists only in relation to a possible, but denied, faith. (*The Goal of History*, Rainbow-Bridge Book Co., Taipei, 1971, 214-215)

Thus it seems clear that a Catholic university must meet students' concerns to

link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its implication to the meaning of life itsel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 the place where the best of East and West meet

In our time and age East and West meet on various levels of culture. Special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moral and spiritual issues. These are the elements, in the final analysis, which bring about the much heralded universal culture.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hat especially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values are investigated on a level of reflection and experience where they challeng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at the same time. The richness of Confucian concepts such as Absolute and *Jen* (仁) could very well challenge Christian thinking to strive for a much closer union of man (and mankind) with God, for which the gospels and the sacraments actually call. Many Christian mystics have shown how deeply the Oneness of God and Man can be experienced.

The Christian belief in a personal God could very well challenge neo-Confucian thinking by suggesting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bsolute and related terms with the personal deity (Heave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would bring the God of the philosophers closer to the common people or rather to the “masses” of the future. The Confucian cult of Heaven, which was the prerogative of the Emperor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pulace) alone, does not exist any longer: why not encourage the mass of the populace and each individual to turn directly to the personal Lord-on-High (上帝), the source and principle of all things, the Lord of Nature and History? Couldn't it be possible that East and West would meet in the future in their common origin and goal, in the Lord of all mankind and the whole universe?

As was mentioned above, we are living in a highly pluralistic society. The human person, who in the future will more and more have to rely on personal choices and individual moral and spiritual decisions, needs more than answers offered by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systems of the past. Only God can

provide the answers we truly need. God, however, cannot be controlled by anybody, through either rational or irrational means. In radical openness to the mystery of existence in a world that is not of their own making, people discern the voice of God in their moments of loneliness, suffering, failure and despair. Christian faith speaks even about God who revealed Himself as a human person - Jesus Christ - and he is always ready to enter into dialogue with every human person.

The relevance of the previous discussions to the education in a Catholic university is obvious. Teachers who are conscious of God's presence within themselves and their students or at least who believe in the uniqueness and greatness of each individual human being, will treat their students with respect and honesty, consider their teaching job as a vocation and find fulfilment in it. Students who believe in God's love will find courage in trying circumstances, grow in self-respect and self-confidence, come to terms with moral decisions, and discover the joys that come from sacrifice and selfless service for others.

We could go further into this subject by discussing in detail how deeply religious awareness would affect the entire educational atmosphere. Of course, it could be held against us that these are religious questions which belong to a person's private sphere and should not be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 visible and rather general breakdown in moral education. Would it be too far off the mark to suggest that the breakdown is – at least to a large extent – due to the exclusion of genuine religious issues from modern education? Furthermore, it could rightly be claimed that our present educational system is permeated by pseudo-religious beliefs – belief in the omnipotenc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adherence to positivistic philosophies and materialistic ideologies – which are little concerned with moral and spiritual values. Is there any authority or ideology that has the right to deprive our students of genuine opportunities to grow and to be enriched through meaningful confrontation with the most elementary questions and challenging issue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 the place where basic issues of the Sciences and of Technology have to be discussed and clarified

For the university studen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have at least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w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o avoid falling prey to the very dangerous belief in the omnipotenc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 at least as far their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 imports from the West and hence alie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we should clarify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e need to train students in independent work and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introduce them to philosophical,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ies of th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Above all, students should be taught to see the limits of the different disciplines imposed on them by their own presuppositions. Richard Schlegel, in “Is Science the Only Way to Truth?” refers to the following limits of science: the partial, fragmentary nature of science; the necessary limitation on explan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science. What he means by the limit of science may be illustrated by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f we wish to gain a scientific account of a human being we must obviously employ

many different sciences. The anatomist, psychologist, biochemist, physician, physiologist, educator, and economist – each of these and others has something important and different to contribute. However, in religion and also to a degree in philosophy, the person functioning as a whole being is of interest. Questions of guiding in living and relations to other persons are paramount. Information and elucidation from any one special science do not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n *Zygon.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vol. 17 (No. 1, March 1982, p. 351)

The point made in the above statement is that science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the whole-person, whole-situation knowledge that is important for moral

and spiritual decisions demanded in a free human life. Neither is technology. Furthermore, whether a person finds meaning in life, gains self-respect, self-confidence and respect, is in love with others and their work, looks with hope to the future, is at peace with him- or herself and with God ... all this does not depend so much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or technology, but rather on spiritual insights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s.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our discussion so far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e many and important purposes, and are indispensable in modern life. But they are blind as far as spiritual and moral values are concerned. Consequent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not promise any future happiness or claim to solve all future problems of man. Furthermore, they should not be employed as weapons against religious faith or convictions as has been done so often in the past. Science and religion should in the future be acknowledged and accepted in their own rights. How this could be accomplished is shown in the experience and work of a great scientist of our age. We give him the last word:

For too long a time, for half a century in fact, psychiatry tried to interpret the human mind as a mechanism, and consequently, the therapy of mental disease merely as a technique. I believe this dream has been dreamt out.

A human being is not one thing among others; things determine each other, but man is ultimately self-determining.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for example, in this living laboratory and this testing ground, we watched and witnessed some of our comrades behave like swine while others behaved like saints. Man has both potentialities within himself; which one is actualised depends on decisions but not on conditions.

Our generation is realistic, for we have come to know man as he really is. After all, man is that being who has invented the gas chambers of Auschwitz; however, he is also that being who has entered those gas chambers upright, with the Lord's Prayers or the Shem Ysrael on his lips. (Viktor E.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Pockett Books, Gulf and Western Corporation, New York, 1963, 212f.)

III. Conclusion

These are just some reflections on academic life in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Taiwan from the background of my own 22-year life and service at Fu Jen University. Much more could be said on the topic. As can be seen, a value system shaped by articles of the Catholic faith makes normal university activities such as studying, teaching, doing research appear in a new light.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above discus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not only addressed to Catholic students,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Quite a few articles of the Catholic faith are of universal value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the various academic fields and activities could help shap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to an academic family with common goals and a common vision.

聖言會及其大學事業為落實教會的福傳使命而做
魏思齊
(Z. Wesolowski, SVD)

引言：聖言會會祖與高等教育和科學

一、天主教大學的歷史脈絡

- (一) 大學的成立與發展歷史
- (二) 大學與傳教和福傳工作
- (三) 大學與中國傳教

二、聖言會傳教區域的大學

(一) 北平輔仁大學 (1933-1950 期間、中國) 與在台復校的天主教輔仁大學

(自 1961 年、台灣、新莊)

(二) San Carlos University (自 1935 年、菲律賓)

(三) 南山大學 (自 1949 年、日本)

(四) Divine Word University of Tacloban (1966-1993 期間、菲律賓)

(五) Universitas Katolik Widya Mandira (自 1982 年、印尼帝汶島)

(六) Divine Word University Madang (自 1996、新幾內亞)

(七) Holy Name University (Tagbilaran City、菲律賓)

三、聖言會在大學事業上之使命

引言：聖言會會祖與高等教育和科學

聖言會是一個天主教傳教修會，其宗旨目標是憑藉教會的傳教任務執行福傳工作，換句話說，即把所謂「非教友」看成近人或鄰人（靜態），以愛心和服務的態度宣傳福音（動態），並帶給他們天主於耶穌基督內為全人類和每一個人所完成的救恩計畫。當聖楊生神父（Arnold Janssen, 1837-1909）於 1875 年 9 月 8 日創立聖言會時，他特別想到還不認識天主的廣大中國民族。1879 年，他把第一批聖言會傳教士—安治泰神父（Johann Baptist Anzer, 1851-1903）及聖

福若瑟神父（Josef Freinademetz, 1852-1908）遣發到中國。目前聖言會在全球共有 6,000 多位會士從事不同的福傳工作，如牧靈、教育、社會服務、出版事業等，其中也經營很多中等教育機構和幾所大學；聖言會可說是一個國際性的傳教組織。

聖言會會祖—楊生神父生長於德國西北部鄉下靠近荷蘭邊界的小康家庭，自幼受到天主教信仰的教育，因為他的父母都是虔誠的教友。在就讀中學階段時，年輕的楊生在學習外語上（如拉丁文）必須下很大的功夫，而他最有興趣的學科則是數學。1855 年楊生進入閔斯特（Münster）皇家學院哲學系就讀，修習三個學期的數學課程及其它相關的學門，如邏輯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為了能夠獲得教學文憑，他把握了在晉鐸前兩三年的時間專研數學與自然科學。為了得到多元的學習經驗，1857 年楊生轉赴波昂大學（Bonn）。當時的他勤學且成績優越，於 1859 年通過中學教師甄試，獲得教師資格，並教授數學、物理學、礦物學、化學、宗教等課程。1861 年 8 月 15 日，在閔斯特教區晉升為神父，之後於伯荷特（Bocholt）中學教書達 12 年之久。

聖言會所創辦的教育事業和其會祖對自然科學的嗜好，及其所接受的培養訓練應該有相當的關連。楊生神父創立聖言會之後，就想在傳教工作上把科學素養當作對聖言會會士們的基本訓練，希望他們秉持徹底研究的精神來處理在傳教區所面對種種不熟悉的情況，諸如新的文化、語言、氣候等等。他追求更精準明確的認知與解釋，所以聖言會自創立之後，在傳教士的培育學程中，除了神學之外，更將培育初期一半的時間用來學習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學科。楊生神父認為科學是天主所賜予的禮物，人應盡其可能在生活與工作上將之善用，尤其是在傳教工作上。此外，在教會傳統中有一神學方面的格言：「聖經」（the Bible, the Holy Scripture）的啟示和「大自然之經」（the Scripture of the Nature, Natural Sciences）的知識是合一且相輔相成的。

在此種肯定科學精神的態度之下，楊生神父並未忽略當時科學主義所產生的疑問和危機，他希望藉著科學教育吸引非基督徒來認識其宗教。因此，自聖言會創立以來，有不少聖言會會士除投身傳教事業之外，都很認真地做不同的研究工作，如人類學或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研究，並將其研究成果發表在學術期刊上。聖言會的知名人類學家 Wilhelm Schmidt 於 1901 年創辦了一份人類學刊物—Anthropos（人、人類）；另一位聖言會第一位漢學家，鮑潤生（Franz-Xaver Biallas, 1878-1936），則於 1934 年在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創辦了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華裔學志》）。聖言會會祖楊生神

父於 1906 年，即其過世前三年，在日本開始經營中高等學校時，曾重新強調在聖言會傳教工作中所推動的科學精神：

「我們向來較其他傳教修會更重視科學的研究精神，我想這是神在無形中為我們往日本傳教的安排，當然為其他傳教區亦然；.....日本人在對較深度的研究，如哲學與自然科學上似乎有高度的興趣.....。天主教應在優秀的中高等教育中培育出有知識與學問，及能與當地人士相襯的人才，以便能為當地的民族風格帶來有效的影響力，進而使對信仰產生好感。有鑑於高等教育在日本及其他各傳教區的重要性，因此對科學專業的栽培，自一開始便是我們傳教會的第二目標」(請參柯博識神父〈聖言會會祖楊生神父與科學〉，載於葉乃實等《求真之道—徹悟生命，洞悉萬象與知識》、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79)。

一、天主教大學的歷史脈絡

(一) 大學的成立與發展歷史

大學本身跟中世紀的歐洲—「西方」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讓我們對所謂的「西方」做初步的詮釋。自系統性的立場來看，西方歷史有三個層面：

一、希臘羅馬的文化產業—羅馬帝國（興起於公元前三世紀左右）吸納希臘文明。

二、猶太基督宗教最特別的部分為其宗教思想—福音。在羅馬天主教的體制運作下，其福音宗教思想也成為拉丁語系的文化原則。羅馬天主教傾向多採行羅馬法制，而較少採納國家制度，並與歐洲中古社會的精神結合。基於拉丁字源 *ecclesia*（教會）、*res publica Christiana*（基督性共和）或 *christianitas*（基督宗教）等概念，顯示其為一信奉耶穌基督、正統宗教信仰的多民族組織生命共同體。

三、印度歐洲族群，如羅馬民族、凱爾特民族、日爾曼民族、斯拉夫民族，他們都被歷史事件所襲捲，而其個別歷史沒有特別的意義。歐洲歷史的特殊點在於很多民族和國家內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中，出現一種精神或政治方面的領導力量，進而影響到時代的性格，以保持歐洲的結合並將它重新實現。在此背景上，大致可將歐洲文化共同體之歷史分為三大階段：

(1) 歐洲中古社會的時代：以羅馬天主教為中心的信仰與文化之多民族共同體，當時的特色為封建制度、城市與大學的興起、神學和基礎自然科學蓬勃發展。

(2) 近代歐洲的時代：因著「新世界」的發現而擴大了歐洲版圖，又因歐洲發生宗教改革而造成基督宗教生命共同體的分裂（形成多教派）。當時已逐漸發展出民族國家的原則，也因著啟蒙時代提出的理性原則而導致世界觀的多元化，並從中加速了世俗化的過程；終因著歐洲啟蒙時代後的文化使命感，而進入了殖民和帝國主義的時代。

(3) 歐洲侏儒化：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時代削弱了歐洲的人文主義、政治保護主義，亦減少了些許宗教傳統的動機。世界發展出三大趨勢，化解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情愫：一、美國興起；二、其後蘇聯強權的出現（包括今日的中國大陸在內）；三、傳統歐洲海外局勢之驟變。

從以上對歐洲西方概念的簡介中，我們可以明瞭基督宗教對西方文化起源

的樞紐地位。大學興起於中世紀歐洲，跟當時城市的發展及其內的學府中心息息相關，而城市中的學府中心，乃是由修道院學校所建立的。十一至十二世紀期間，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歐幾里德（Euclid，約公元前三世紀）和普多雷梅烏斯（Ptolemaios，活動時期公元二世紀）的著作由希臘文被譯為拉丁文。此外也有羅馬法學的復興，並且也因透過和阿拉伯界的接觸而產生新的求知欲。當時修道院學校的教學範圍包括七種技能（拉丁：artes liberales、「自由藝術」），語言課業方面有：語法學、辨證法和修辭學（拉丁：trivium：三者）；數學課業方面有：算數、音樂、幾何學和天文學（拉丁：quadrum：四者）。這些技能於進入大學後，成為學習更深的課業知識—即哲學、神學、法學和醫學的基礎條件。

城市學府的發展促使神學、法學、醫學及哲學等跨領域的合作。其師生形成一個團體，一個生活的共同體。藉著宗教（教會）與皇帝（國家）的特權，universitas（大學）受到保護。其實，歐洲大學的興起也意味著新權威的出現，除了宗教（教會：拉丁：sacerdotum、〔聖者〕）和國家（拉丁：imperium）之外，開始有了大學（拉丁：universitas）的新興勢力。不可諱言，當時的國家和教會自大學（拉丁：studium：教學）得到了無形的幫助，因著大學的存在而得以藉由教書推動知識，進而產生智慧（拉丁：sapientia）的力量來支配自己。譬如十三世紀的 Paris 大學有四個學院：哲學（為基礎）以及三個較高級的學科領域：神學、教會法和醫學。其他歐洲中世紀大學還包括如 Bologna（義大利）、Prague（捷克）、Salerno（西班牙）、Heidelberg（德國）、Oxford（牛津、英國）、Wien（維也納、奧國）、Krak（波蘭）、Salamanca（西班牙）。在大學裡，教學方法為講課（拉丁：lectio），教師所提出的問題當作 questiones；所有討論的問題即成為 disputationes。Magister（講師）所演講而由大學生記錄下來的內容則是 reportationes。

第 16 世紀初，歐洲大學事業面臨精神的危機，當時的解決方法為：藉著唯名論的哲學（拉丁：via moderna）更新舊多馬斯的士林哲學（拉丁：via antiqua），但卻終告失敗。雖然改革仍舊持續，但人道主義者的批判卻使此危機日益嚴重，例如 Leuven 大學（比利時）有埃拉斯木（Erasmus，1469-1536）推動人道精神，其他歐洲大學也逐漸接納文藝復興的精神。不久之後，又有宗教改革的影響力。在 Wittenberg（維滕堡，德國哈勒區）所成立的大學則成為基督教國家的大學新類型。

在天主教方面，大學的更新因其對宗教改革的運動而晚一些開始。三十年

戰爭（1618 至 1648 之間在歐洲以德意志為主要戰場的國際性戰爭）之後，歐洲採行緩和政策，並取消教派和信條主義的精神，此種新經驗使自然科學與哲學在 academia（學術大學，學術界）找到新的位置（如 Académie française），而大學更成為君主（邦君）支配的學府。其間，德國 Göttingen 大學（1737 年）的成立帶給歐洲大學新的生命力。其成立之初的理念為：在教會與國家權益之間劃清界線之下，大學應該只從事自由研究和教學，追求真、善、美。藉著對研究對象採行的嚴謹學術方法，大學生應養成實事求是的精神。在此基礎上，新人道主義的精神也在於培養一位「受過大學教育者」。啟蒙運動（尤指十八世紀歐洲以推崇「理性」為人類社會及與自然界互動的基礎，懷疑教會的權威等精神態度為其特點的文化思想運動）影響教會與神學至鉅。另外，法國大革命（1789-1799）掀起了新世俗化的浪潮，幾乎全歐洲大學事業都受到很大的影響。此段時期，大學就在不停地生生滅滅過程中。不過，所成立新的大學大部分是由國家而來的，譬如 Wilhelm von Humboldt（洪波特，1767-1835），普魯士的教育部教務長，便對大學提出新的構想：他不再願意繼續為培養一些固定的職業（如神學家、醫師、法學家等）而推動專業大學，他希望使大學成為一提供學術教育的場所。他並且提倡唯心論和新人道主義的精神，基於柏拉圖（公元前 427-約 348）的信念——（科學）知識為形成人的力量。

於是，新類型的大學教師出現了一亦即應作為一位獨立的研究者，而不只是教書而已，還要同時進行自身專長的研究工作，並精通其學術範圍。大學本身應為所有科學的有機單位（universitas litterarum），在此教育與學術的場所上，大學生不只對自己所學習的學科領域有足夠的知識，而且也應具備相當的能力，對其它學門的研究成果提供批判。大學教育的理念為培育一個能夠獨立思考、具批判精神、並對學術研究富責任感的受教育者。學術自由及大學本身固有的規律性應受國家所尊重。影響所及，在德意志境內創立的新大學、或是接受改造的舊學校，便是根據此種理想進行運作，並且也影響到俄羅斯等東歐國家。法國則繼續發揮其 academia（學術大學）式的大學事業，英國掌握著其遺留下來的 College（學院）式的大學培育，而美國更進一步建立自己的大學構思，將 College 和德國式的大學加以結合。大學於一開始時以私立的居多（其中不乏自由創辦者，以基督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為主），一般來說，當今歐美幾乎所有新建立的大學都是國立的。

若談及現代天主教大學的理念，則不能不提到紐曼（Henry Newman，1807-1890；參考其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對大學的構思》，1852；也請參考

柏殿宏《對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省思》，載於周善行等《致善達仁—善省己身、明達道與科技》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 2003，頁 220-235)。

如今全世界高等教育（大學）的危機有許多成因，其中，比較重要的為：

一、學術研究的分化和專業化（不斷地有新研究領域的獨立化過程）— universitas litterarum 無法保持而逐漸消失，新的科技整合研究越來越不容易做。

二、學術教學與研究工作失去其平衡。大學教師經常面臨因深入研究而疏離學生的危機，或相反的，若為了多接觸學生而無形中失去機會鑽研其研究領域的最新專業知識。因此總有「研究式」大學與「教學式」大學之間的張力。

三、對大學生的看法也改變了—譬如當今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四、人文與自然科學（尤其生命科學）對人類道德倫理所帶來的挑戰，因此有各科專業倫理學的必要性。

（二）大學與傳教和福傳工作

自歷史脈絡來看，大學本身來自中世紀天主教的文化核心，天主教大學到目前為止所代表的是我們人類大家庭，以創造力尋求真理，也是一個為了人類的福祉而傳播知識的教育場所。在南美洲，大部分的大學是由教會所建立的。十九和二十世紀期間，基督宗教在美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系統（自小學、中學、高中至大學），更遑論教會在非洲對學校教育的貢獻，在當地天主教可說是此類工作的開路先鋒。在亞洲，如中國、印度、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家，教會在教育工作也有一定的貢獻。此與教會傳教和福傳工作有著密切的關係。教會是基督在世上建立的團體，是天主救恩臨在人類間的記號，因此它不但在本質上是傳教性的，且其基本使命也是傳教：「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谷十六 15）。新約教會就是全面性的傳教，它的歷史（《宗徒大事錄》）和神學思想（四部福音和所有的新約書信）就是傳教歷史和傳教神學。到今天為止，教會不斷地生活出其傳教和福傳工作的基本使命感。

自十五和十六世紀以來，因為歐洲發現所謂的「新世界」並擴大其版圖，而更注意其向外傳教工作的重要性。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時代，尤其是十九世紀末時，受到西方國家（特別是德、英、法等國）在殖民地地區的文明使命感的影響，以及基督徒和傳教組織的傳教熱誠，而興起了全球性的教學事業。教會除了經常派傳教士到新發現的地區之外，也開始系統性地反省傳教工作並

建立學校制度。

教會的事業當中，以改善窮人和窮困的生活（教育、醫院、經濟，發展等活動）作為福傳工作和基督徒生活見證的方法。聖言會的幾所大學亦秉持此種精神傳統，繼而發展為一種「傳教大學」。不過，在接近二千年的教會歷史中，有必要澄清長久以來的謬誤：基督宗教竟然被等同視為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又被視為最優越的文化/文明。其實，教會本身絕不同於任何一種文化，因而傳教工作也不應該傳揚任何一種文化，但不可否認的是歐洲或西方文化與基督宗教的來龍去脈。

（三） 大學與中國傳教

承上所述，大學形成一個獨立的組織乃源起於十二世紀的天主教社會。當時，大學的形式為教師與學生們在幾個城市裡集合的團體（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最早成立的大學為義大利北部城市 Bologna（波倫亞，亦譯波落尼亞）與法國的 Paris。那麼中國大學是由何處而來的呢？中國整個現代的大學教育並非來自於中國的教育傳統，而是由西方來的。基督教率先意識到並強調高等教育於傳教工作的重要性，隨後由天主教致力發展之。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文化一定佔有一席之地，它雖然不是人類最早的文化，但至少從四千年（傳統中國為五千年）以前就不斷的成長與發展到今日。中國文化的特殊之處在於其發展過程中所呈顯出一治一亂的循環，或停滯不進的現象；但在現有的世界文化中它卻是最長久的。其間，中國文化樹立自身歷史的獨特型態，而此種對歷史的意識，使其民族自然產生對自我文化的使命感、對文化的驕傲與優越感，更發展出一套對自我的瞭解與詮釋—儒家傳統。從鴉片戰爭以來，因遭逢武器衝突，顛覆了中國文化自我的信心，迫於情勢而不得不瞭解西方文化。迄今，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大陸）尚未完全恢復對自我文化的自信。

此為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過，此種西方化的過程，或更恰當的說，現代化、國際化或全球化所帶來的貢獻的確是不勝繁數；尤其在大學教育制度方面。成立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教會學校（天主教在中國：巴黎耶穌會於 1903 年在上海創立震旦大學，巴黎耶穌會於 1923 年在天津創立一所工商業學院，美國本篤會於 1925 年成立輔仁大學），可說是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典範，因為外國教會大學所引進的西方教育制度，譬如課程安排和

教學法，幾乎都被當時的新學堂所仿效、吸收。清末廢科舉後，傳統的私塾和書院大都改為新式的學校，然而其內容與制度皆來自西方的教會大學（美國，英國），更不用說男女教育平等的觀念，以及加入體育和音樂等課程。不過，現代的中國大學雖然模仿了教會大學的制度，卻反對基督宗教進入其大學，因為中國政府認為早期設立在中國的西方式大學把教育事業當作一種傳教的手段，影響所及，大學生也連帶地開始集體大反彈，掀起一股中國知識分子反基督宗教的運動。於是，教育部於 1926 年明訂私立學校一律不以宗教科目為必修科，亦不得在課內做宗教宣傳。如今在台灣，教育部對宗教信仰團體在大學方面的投入又開放了許多，譬如容許佛教設立大學（已有五所），也批准宗教學研究所及宗教學系的成立。

二、聖言會傳教區的大學

根據以上的背景，更有助於讀者了解聖言會，作為一個天主教傳教男修會在大學教育的工作。聖言會在全世界除了孕育無數的幼稚園、許多的中小學之外，在亞洲地區還有創辦、管理以下七所大學，並於其中從事教學工作：

（一）北平輔仁大學（1933-1950 期間、中國）

與在台灣復校的天主教輔仁大學（自 1961 年、台灣、新莊）

如前所述，基督教率先意識到並強調高等教育於傳教工作的重要性，隨後天主教致力於此。1925 年 10 月 1 日，美國本篤會於北平成立「輔仁社」，又名「學專修科」，英文名為 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

此為輔仁大學的前身與開端。自 1925 年至 1930 年，輔仁大學不斷興建新式校舍，負債累累，因此總會院負責面對這些無力償還的債務。另外，1930 年輔仁大學第一任監督（1878-1930）司泰萊院長 Aurelius Stehle 逝世（身為輔仁大學二位創立者之一，另一位是英斂之〔1867-1926〕），於是當美國本篤會會士遴選司泰萊的繼承人時，那些曾反對建校的人便利用這個機會把輔大與修會區分開來。1933 年 2 月 18 日，教廷傳信部長 Pietro Fumasoni-Biondi（夫瑪松尼—白翁迪）正式邀請聖言會接辦北平輔仁大學。經過一連串的磋商，聖言會總會部終於接受。當時葛蘭德（Josef Grendel）神父已被選為聖言會的新任總會長，1933 年 4 月 29 日，教宗碧岳十一通知總會長教廷傳信部的決定。

聖言會自 1933 年至 1950 年接手北平輔仁大學，在學院及學生人數上都比上海（1903 年）及天津（自 1923 年）的兩所耶穌會大學多，影響力也較大。1933 年聖言會接管輔大時，共計有三個學院、九個學系及 613 位學生，到了 1949 年，擴增至四個學院、十六個學系及 2,299 位學生。

因中國大陸政治上的變革，中共教育部自 1950 年 10 月正式接辦輔仁大學，次年 7 月輔大已為北京師範大學的一部份。就聖言會及教會高等事業而言，此為一大損失（有關聖言會在北平輔仁大學之事業請參考魏思齊〈聖言會與北平輔仁大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之歷史淵源之一〉，載於葉乃實等，《求真之道—徹悟生命、洞悉萬象與知識》，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 2002 年，頁 81-104）。

1956 年 7 月 15 日，北平輔仁大學校友正式在台成立校友會，發起復校運動，遂上書教廷呼籲在台復校，獲得教廷之贊同。同年 8 月，北平輔仁前教務

長一荷籍胡魯士神父（Hendrik Kroes，1903-1989）來台商討復校事宜。其後數載，校友會即以復校為奮鬥之目標，與教廷及聖言會保持密切聯繫，並獲得聖言會會士田耕莘樞機主教（1890-1967）、胡魯士神父和聖言會新總會長（Johann Schulte，任期 1958-1967）之積極贊助。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一謝壽康也以復校事宜與教廷進行聯繫。田樞機主教於 1957 年 11 月來台之後向教廷重申復校事宜，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總主教也表示贊同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其實，按聖言會的紀錄顯示，最先向聖言會提出輔大在台復校者為之前南京的總主教于斌（1901-1978 年）。自 1955 年開始，在其所到之處，常提及聖言會應該在台灣辦理輔仁大學的復校事業。當時于斌樞機主教鍥而不捨地建議開辦教育學院及社會學院。1958 年 11 月 26 日，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抵台支持復校計劃。

新的輔仁大學由中國聖職（中國主教團）、耶穌會、聖言會、連同聖神修女會與道明會（後者後來退出）聯合承辦。期間，方濟會也表示願意參與復校過程，辦理外語組教學，後來其總部於 1960 年由傳信部批准在新加坡辦一個學院，方濟會於是放棄在輔大的合作，而由聖言會接辦外語組教學。當時僅在台北總主教區的耶穌會神父就有 60 位左右，他們在各大學教書，但卻無人提拔。這些神父們先前早已在上海或天津大學籌備復校，所以他們立刻投身參加輔大復校的工作。

三個創辦單位本是如此不同的團體，不過決心合作辦大學，實為創舉，雖然過程中曾遭遇一些困難，但三單位彼此間仍然合作良好。此三個教會團體的合作，展現出真誠使徒的精神，不但舒解了各團體財物上的負擔，也減輕了人才不足的問題。

1961 年 1 月購妥台北吉林路樓房兩幢為籌備處，由牛若望、龔士榮二位神父出任正、副主任。同年 9 月報准教育部，先行成立文學院的哲學研究所，同月廿日哲學研究所於吉林路開學了！

第一屆哲學研究生共計有八名，為輔大在台復校的第一批學生，而他們的開學典禮則為復校的正式日期（1961 年 9 月 20 日）。1962 年輔大董事會更改對耶穌會及聖言會復校最初計畫之地點，有鑑於各地擬捐贈之土地均不適宜等問題，董事會重新決定由中國聖職單位、耶穌會單位及聖言會單位在同一校區設院，於附近購地建校。1963 年 2 月購妥台北縣新莊鎮營盤里卅餘甲土地為大學校址，隨即於 3 月分別興建文、理、法三院教室及學生宿舍大樓 5 棟。聖言會神父林慎白（Friedrich Linzenbach，1904-1981）擔任總建築師，各單位分別

另請建築師設計，由林神父核准後營建。

當時的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任命蔣百鍊神父（Richard Arens，1913-1990年）為聖言會開辦理學院及外語各組的負責人。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聖言會中儲備人才。聖言會當中，年輕和年長的會士們有些曾經在北平輔大服務多年，有些則對科學或語言學感到興趣。無論如何，他們都熱切盼望年輕學生分享耶穌的福音。1962年聖言會團體的成員及其任務是：

- 1) 蔣百鍊神父為團體院長；
 - 2) 李嘉士神父（Michael Richartz，1893-1982）為理學院院長；
 - 3) 杜誼華神父（Bernard Doyle，1930-1965）為總務主任；
 - 4) 文納神父（Peter Venne，出生1913年）為外語各組主任，外語圖書館館長；
 - 5) 齊德芳神父（Franz Giet，1902-1993）為外語實習所所長；
 - 6) 潘國樑修士（Albert Behrla，出生1937年）為工程師；
 - 7) 侯光華修士（Patrick Hogan，出生1936年）為出納主任；
- 1963年扈伯爾神父（Franz Huber，1913-1994）擔任生物系主任。

當時聖神團體中有：

- 1) 吳秉雅修女（Urbania Thaus，1907-2000年）為家政營養系主任；
- 2) 柯蘭修女（Laetifera Corazon）為英文組副教授。

1963年10月21日，在新莊建設並復校的輔仁大學招收新生共518名，分配三個學院：文學院設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外國語文（分英文、德文兩組，由聖言會辦理）四學系；理學院設數學、家政營養兩學系（後者由聖神會修女會辦理）；法學院設法律、經濟、工商管理三學系等共九個學系。對聖言會而言，當時有180名左右第一屆的學生入學了。他們一面上著課，一面聽著起重機、挖土機和推土機隆隆作響的聲音。那時聖言會單位已建立三棟大樓：外語各組大樓、家政各系大樓和男生宿舍（117間寢室，共234個床位）。

總括而言，自1961年輔仁大學由三個主辦單位在台復校迄今，包括聖言會在內共同努力耕耘的結果，如今已成效斐然。為因應台灣高等教育的新挑戰，此三單位於2002年8月1日起正式整合。此舉可說是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性的變革。不過，聖言會及聖神會仍肩負著天主教大學的使命，也是本校獨具之特色，將會繼續參與教學、研究、服務及關懷等工作（有關聖言會與輔仁大學在台復校請參魏思齊〈在台復校之天主教輔仁大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歷史淵源之二〉，載於周善行等《致善達仁—善省己身，明達道德與科學》，新莊：輔

大出版社 2003，頁 108-129)。

(二) San Carlos University (自 1935 年、菲律賓)

San Carlos University (聖卡羅斯大學〔Cebu：宿務島；菲律賓中部〕) 屬於菲律賓最早的學院之一，於 1595 年 8 月 20 日由耶穌會會士 Antonio Sedeno、Pedro Chirino 和 Antonio Pereira 成立。1606 年被命名為 Colegio de San Ildefonso (學院)，在其四百多年的歷史中，此學院由不同的天主教機構接管。1785 年，此學院改名為 Colegio Seminario de San Carlos(教區 San Carlos 修道院和學院)，1924 年學院正式獨立。1935 年，聖言會被主教邀請接辦此學院，當時有 351 位學生。第一批聖言會會士和神父們於 1909 年 8 月 15 日抵達菲律賓 Manila(馬尼拉)；而原先最早抵達菲律賓的歐洲人是 Fernao de Magalhaes，他於 1521 年 3 月 16 日來到 Samar 島，此地區於那時開始接觸天主教。到今天為止，菲律賓仍為亞洲地區唯一的天主教國家。

自聖言會於 1935 年接管 San Carlos University 以來，一直致力於為地方教會服務，培養天主教的知識份子。San Carlos University 於 1948 年 7 月 1 日被政府批准為大學，分為 9 個學院，如今有 30 個學系。其中，有三個基本學院：(一) 人文科學、(二) 社會科學和 (三) 自然科學。其他的學院為 (四) 法學院、(五) 經濟學院、(六) 技術學院、(七) 教育學院、(八) 藝術學院、(九) 病人護理學院。

San Carlos University 有一千多位教職員工，其中有許多聖言會會士一起為大學生服務，其設備、基本配備都相當良好。其大學空間包括城市中四個不同的地方。San Carlos University 對當地各方面的發展持續地進行貢獻，因此菲律賓教育部於 1992 年授予 San Carlos University 全面的獨立，即包括行政、教學和財政方面的自主權。

San Carlos University 自我定位為一個為菲律賓中部服務的教育場所，到目前為止，其校務仍著重於教學方面。雖然也陸續接受地方政府委託進行有關當地居民生活品質的研究計劃，但若想發揮自己的研究計劃，對 San Carlos University 而言，將面對無法承擔的經費壓力。

精采的教材和研究成果報告登在其出版品，如：

- 1.The Philippine Scientist (菲律賓科學)
- 2.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文化社會菲律賓季刊)

3. 專題叢書：一、人文科學方面

二、社會科學方面

三、宗教方面

四、不定期叢書系列

除了教學、研究工作、一般教育事業，San Carlos University 也扮演著很重要的宗教教育角色。聖言會受菲律賓主教團邀請，繼續把信仰傳承給當地的知識份子，期望透過他們為社會帶來果實，因為天主教大學的教育目標原是如下：

一、使學生們在學術上出類拔萃，在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培養學生對時代的使命感，基於此基督徒的使命感努力於學術研究，養成獨立思考，正確判斷之能力，關心並能貢獻自己於家庭、社會、國家之發展。

二、使教友學生們將來在社會負起更大的責任。培育出類拔萃且關心社會的專家，如教育家、企業家、政治家等，其願意負起改善社會、教育群眾，真正為民服務的重大責任。

為落實以上兩個目標，San Carlos University 特別著重於有關宗教知識、宗教與科學、宗教與社會的探究，因為惟有透過自身、天主與人的關係，才能了解人性尊嚴及人權的來源，萬物的根源和歸宿以及一切知識的基礎和終極對象。如此 San Carlos University 可以落實天主教大學特有的使命，即是「藉著理性的努力，把兩個經常容易視為對立，好像矛盾的存有層面，即探索真理及肯定已知的真理的泉源，生活化地結合在一起」（若望保祿二世於 1980 年 6 月 1 日對「巴黎天主教學院」的講話。請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天主教大學憲章》，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 1993 年，頁 1）。

（三）南山大學（自 1949 年、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期中，基督宗教學校事業於日本總是碰到很多阻礙，幾乎無法發展。1906 年聖言會開始在日本從事學校教育，此方面的開路先鋒 Josef Reiners 在 Akita（秋田：日本本州島西北岸港市）和 Niigata（新潟：日本本州島中北岸港市）努力建立中高學校，不過沒有完全成功。之後，Nagoya（名古屋：日本本州島中南岸港市）教區的宗座副主教（Apostolic Prefect）J. Reiners 於 1932 年終於成功建立了「南山中學」；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之前，此學校為軍部所沒收，並遭受美國轟炸。大戰之後，私立學校建立的條件改善了很多，

日本新大學法令亦促使建立新的高等機構。聖言會神父 Alois Pache 於 1946 年在「南山中學」成立「外語學院」(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包括英文系和中文系，次年增加德文系和法文系。

當時日本大學法要求一個外語學院應具備大學資格。A. Pache 神父憑藉其信仰基礎，在努力奮鬥的過程當中，於 1948 年 7 月 31 日將日本教育部所要求的條件都圓滿了。1949 年 2 月 10 日，南山大學終於獲得教育部的認可！首先成立了哲學學院，其科系包括德文系、英文系、法文系及中文系。1949 年 3 月，有 441 位學生。1951 年已成立了社會系和人類學系。1979 年哲學系有 8 個系：4 個語文學（英、法、德、日），其他 4 個為教育學、人類學、哲學和神學。1960 年成立經濟學院，自那時以來，其商業與貿易科系即成為名古屋中學生心目中的熱門志願。1963 年成立了外語學院（跟哲學學院的語文系有所不同），包括英美語系和西語系，其教學重點在於會話和科技整合的現代科學。1969 年，企管系成為獨立的學院。

南山大學的現存結構如下，共有 7 個學院：

1. 人文科學學院 (Humanities)：其學系為 (1) 基督宗教學系 (Christian Studies)、(2) 人類學和哲學系 (Anthropology and Philosophy)、(3) 心理學和人際關係學系 (Psychology and Human Relationship)、(4) 日文系 (Japanese Studies)
2. 外國研究學院 (Foreign Studies)：(1) 不列顛暨美國研究系 (British and American Studies)、(2)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系 (Spanish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3) 法語文系 (French Studies)、(4) 德語文系 (German Studies)、(5) 亞洲研究系 (Asian Studies)
3. 經濟學院 (Economics)：經濟學系
4. 企業管理學院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企管系
5. 法學院 (Law)：法學系
6. 政策研究學院 (Policy Studies)：政策學系
7. 數理科學和資訊工程學院 (Mathematical Science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資訊電信學系、數理科學系)

除此七個學院之外，南山大學還有五個幾乎都具有碩士班和博士班的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s)，六個研究院和研究中心 (人類學研究院，宗教、文化研究院，社會倫理研究院，管理研究院，人際研究中心，語言學中心)。另外，還有區域研究中心 (Area Studies Centers：美國、拉丁美洲、澳洲、歐洲、亞洲)。今日的南山大學學生人數已接近 9,000 人。

因考量到南山大學未來的發展，聖言會於 1962 年作了一個重要的決議，即劃定南山大學新的校地。在建築師 Anthony Raymond 的領導之下，聖言會蓋了新的南山大學，並於 1964 年將舊的南大校區遷往嶄新的漂亮住所。

南山大學也具有福傳取向，雖然像我們輔大一樣，教友同學及同仁的人數不多，但天主教的辦學精神吸引著年青人，甚至因天主教在日本從事學校教育使徒工作而影響了整個日本社會，使其對基督宗教有愈來愈接納的態度。南山大學的治校格言為：Homini Dignitatis（拉丁：為了人性尊嚴），此表達其大學教育的理念及全人教育的重要性。此種理想有四個基柱（1）基督精神、（2）學術研究的卓越、（3）國際性意識、（4）服務人群。其中，南山大學在其學子身上，追求培育一種對話交談的基本態度—人類沒有一個單一的世界觀，基督宗教也學習對他人良心自由的無條件接納。雖然南山大學像其他基督宗教大學一樣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弘揚真理，但它無法壟斷真理，因此除對話交談外別無它路。

聖言會第十五屆總會代表大會的文件〈聆聽聖神—我們今日對傳教的回應〉（2000 年）確認了「我們的首要傳教任務」做為先知性的對話交談：（1）與信仰團體及尋求信仰者交談、（2）與貧窮人及邊緣人交談、（3）與不同文化的人交談、（4）與不同宗教傳統及世俗理念者交談。此種態度即為聖言會南山大學的基本教育精神。

南山大學隸屬於聖言會（南山教育中心），為一教育綜合體，包括一所大學及其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兩所女中和三所高中。其所有教育機構均由聖言會或聖神會成立，如今有四十位聖言會會士和四位聖神會修女在南山教育中心服務。

（四）Divine Word University of Tacloban（1966-1993 期間、菲律賓）

Divine Word University of Tacloban（聖言大學於 Tacloban City 在 Leyte〔萊特島—菲律賓中東部〕）有其長期發展過程，不幸的是其突然的結束。一般來說，一所大學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展其功能及影響力，Divine Word University of Tacloban 也不例外。1929 年，Sofronio Hachang 成立「Tacloban 男生天主教學院」（Tacloban Catholic Institute）基金會，教育部批准之後，隨即有 78 位青少年開始讀書。1941 年聖言會接管此學院，自 1945 年以來此學校（高中）也接納女生。1947 年，此學校改名為 Saint Paul's College（聖保祿學院），同年成立

法學院。1961 年成立理工學院，1965 年成立病人護理學院。隨著此種發展，1966 年 3 月 11 日，學院已改名為 Divine Word College of Tacloban (Tacloban 聖言學院)，同年 7 月 2 日，此學院已發展成大學規模—Divine Word University of Tacloban。

其實，Tacloban 聖言大學已發展出一系列完整的學校教育機制，包括小學、中學（高中）、大學等教育系統。此大學於發展高峰時，曾有 15,000 位學生，八個學院：1. 法學院、2. 貿易經濟學院、3. 藝術與自然科學院、4. 中學教師培育學院、5. 小學教師培育學院、6. 家政學院、7. 技術學院、8. 病人護理學院。

Divine Word University of Tacloban 在它不長的歷史上，發揮了其宗教與社會的影響力，培養當地的知識分子及社會領袖，此外也和地方政府及其機構有密切的合作，協助當地在經濟、農業、家庭、衛生、行政組織等方面的發展。不幸的是，如此具備發展潛力的大學，在 1990 年代碰到很大的瓶頸。當時的大學工會與聖言會大學總部因要求提昇薪水之事宜而發生不可抗拒的衝突，到最後於 1993 年，Divine Word University of Tacloban 停止其運作。此對 Leyte 和 Samar 兩島的人口帶來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五）Universitas Katolik Widya Mandira（自 1982 年、印尼帝汶島）

Widya Mandira 天主教大學於 1982 年由 Nusa Tenggara 地方主教們、印尼省聖言會會長們及知名天主教平信徒共同成立。自 1998 年 3 月 27 日開始，只有主教們和聖言會會長們為此大學的所有人。「Widya Mandira」的意思為「知識之塔」，意味著此大學像一作又高又穩定的塔一般，勇敢地向當地人民弘揚知識和真理。其目的是以印尼文化為本的模式推動教育與教學，發揮科學方法以及建立相關機構。

此宗旨也有其三個目標：1. 幫助地方政府落實其政策，提供青年人高等教育的機會；2. 支持政府發展計劃、培育專家及不同學科領域的人才；3. 培養教師人才，尤其在精確科學（如數學、物理學等）方面，為了改善印尼學校教育，特別是在帝汶島。

Widya Mandira 天主教大學有兩個校園，一個在城市裡，另一個在其郊區城鎮（靠近國立 Undana 大學，那邊的 Widya Mandira 大學只有神哲學院和工程學院）。

此大學的七個學院分別是：

1. 教育與教師培育學院（1. 數學與自然科學系、2. 語言與藝術學系、3. 教育科學系）
2. 工程學院（1. 建築系、2. 公民工程、3. 公民工程之無學位計劃、4. 管理工程學系）
3. 經濟學院（1. 企管學系、2. 發展經濟學系、3. 會計學系）
4. 法學院（法學系）
5. 社會與政治科學（1. 公共行政學系、2. 公民行政學系、3. 大眾媒體學系）
6. 神哲學院（哲學系）
7. 數學與自然科學院（1. 生物科學、2. 化學系）

另外，Widya Mandira 天主教大學還有管理學研究生的課程：（1）財物管理、（2）銷售管理、（3）人力管理。

如今有十四位聖言會會士在此大學工作。基本上，他們都教書，以人文和社會科學為主，其中的八位還身兼行政工作。除了聖言會之外，也有十二位來自其他修會的男女會士及教區神父。雖然聖言會在 Widya Mandira 天主教大學不斷地努力發揮本會及天主教方面的特色，但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尤其需要一些聖言會的專家和老師。在宗教輔導工作方面，也需要新的會士投入，因此需要不斷地培養在大學工作的聖言會會士之使命感。

（六）Divine Word University Madang（自 1996、新幾內亞）

Divine Word University（聖言大學）為全國基督宗教大學。1980 年成立「聖言學院」（Divine Word Institute），1996 年此學院改為聖言大學。聖言大學是一所大公主義的（ecumenical）、對男女都開放的、且是私立的大學。其願景為當作一所名副其實的基督宗教大學：服務人群、秉持正義、發揮福音精神、關懷社會。此學校對所有人開放，無論其種族、膚色、信仰、性別等因素。聖言大學的學生來自新幾內亞不同的 20 省以及外國，它特別關懷清寒男女學生。另外，在與地方合作下也努力推動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聖言大學是新幾內亞高等大學改善的促進因素，亦協助政府發展其計劃。本大學包括六個學院：1. 藝術學院、2. 教育學院、3. 神學院、4. 企業與管理學院、5. 適能學習學院（Faculty of Flexible Learning）、6. 健康科學院（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所有的學科領域均有益於新幾內亞長期的發展。在此過程

中，大學生跟當地商業與企業界有著密切的關係，所有課程均以基督道德價值觀及促使個人人格的發展為基礎。大學部和研究部亦致力於培養負責任的專家，期使未來能為國家服務貢獻。

聖言大學的重要目標為當作有生命力的基督知識份子團體，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為一所卓越的大學。本大學跟其他教育機構參與三重使命：

1. 知識取得－研究工作的使命
2. 知識傳授－教學的使命
3. 知識應用－公民服務的使命

聖言大學所追求的卓越教育之理念為拉丁說法：sic currite ut comprehendatis—為贏而賽。然而此並不意味著一種不忍人之競爭力，而是鼓勵每一位學生盡他／她的本分，發揮其向上心以及達到高深造詣。

本大學的願景與使命為當作一所基督大學，為所有人開放，藉由教學和研究於基督宗教環境而服務社會，以促使社會均衡發展，增進人類福祉。現今有1700位同學，六位聖言會會士和一位聖神會修女在那邊工作。另外，總共有來自九個不同修會的九位會士，這批會士們全心全意地為落實此大學的使命而努力奮鬥。

（七）Holy Name University（Tagbilaran City、菲律賓）

聖言會將 Holy Name University（聖名大學）in Bohol 從本篤會而接管。其源起和理念為對三位一體的天主的信仰，追求通過教育、培訓和學術工作而建立當地的基督團體。其使命為：1. 不斷為福音價值觀作見證；2. 在所為所行中推求卓越；3. 建立獨立的，自力更生的基督團體；4. 推動文化之間的對話交談；5. 提高孩童、婦女、身心障礙者及社會邊緣者的生活品質；6. 保護受造物的環境。

其具體目的為：1. 使 Holy Name University 作為基本基督團體的表率；2. 推求卓越於教學、研究及社區服務；3. 與其他文化和宗教對話交談；4. 保護受造物環境。

The Holy Name University 在其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當中提出很豐富的課程，並且回應當地教育和社會發展的需求。

三、聖言會在大學事業上之使命

自以上有關聖言會所從事的大學事業報告來看，我們可以體驗到兩個重點：

1.除了日本南山教育合作性團體（也包括南山大學在內），聖言會並不是很主動去建立、組織及從事大學事業。大部分都是因為被地方教會邀請而接管大學工作。

2.此方面聖言會的動機和目的很單純—為落實教會的福傳使命而做。

教會的生活與活動中，除了純粹宗教的層面之外，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為改善窮人的貧困生活，如此將有助於人們更體會到他／她為天主之兒女，為一位具理性自由意志之位格（person）。因此教育、醫院、經濟發展等活動均成為福傳工作和基督徒生活見證的方法。聖言會幾所大學也是自此種精神而來，即是原來為「傳教大學」（德文：Missionsuniversität）。在此種詮釋上，最重要的是教會和聖言會對「傳教使命」的新闡發。

自梵二大公會議（1962~1965）以來，教會對「傳教」或「福傳工作」提出很多新的意涵：1. 整個教會的每一位教會成員（受洗者），包括教友都有責任傳教，因此傳教不只是少數專業傳教士的任務；2. 傳教以地方教會為主體，而不再是西方教會；3. 傳教的定義是在教會尚未生根的民族或人群中宣傳福音和培植教會（即傳教工作）。1975年教宗保祿六世（任期1968~1978）在《在新世紀中傳福音》勸諭中強調，傳教對象的整體性即是涵蓋整個人的生活（人的身、心、靈以及個人和社會、思想、經濟、文化之間的關係）。

現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其自1978年）在《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通諭（1990）重新提出教會及其成員福傳工作的重要性。有關於福傳方法，他強調幾個基本原則：

1.地方教會要儘量自己負責本地的傳教工作，外來的傳教士僅能協助。

2.現今教會更了解其他非基督宗教，承認它們也有聖的和善的成份，所以傳教的方法一定要以誠懇的對話交談作為基本的態度。

3.教宗鼓勵在傳教方面更用本位化（本土化）的方式表達信仰的意識。

4.天主的救恩是經過行動而體會的，所以傳教事業應該推動組成基督徒的生活小團體，在此種過程中，應該以窮人為優先。這也是聖經所肯定的天主的救世計劃。

總括而言，整個教會是傳教的，而宣傳福音的工作是天主子民的基本任務。除了教會本身對其基本任務及傳教和福傳工作的新詮釋之外，聖言會在其福傳

使命方面也進一步作了一些闡述；其實，亦可說是傳教工作的思想典範之轉移。有的會士說到，當今具有從以「教會」為主轉變為以「天國」為主的傳教取向，其他會士也提到自傳教的「征服模式」到「對話模式」的轉移。無論如何，我們聖言會把此種精神以及對傳教工作的新思想典範，以下列的陳述表達出來：

1. 「三重的逾越過程」(the threefold passing over) (聖言會第十三屆總會代表大會的文件，請參考《跟隨聖言 1》；1988 年，8 月)；
2. 「為合一而服務的傳教」(mission at the service of communion) (聖言會第十四屆總會代表大會的文件《跟隨聖言 5》)；
3. 《先知性對話》(prophetic dialogue) (聖言會第十五屆總會代表大會的文件；2000 年 9 月)，請參考(《與聖言對話》，2000 年 9 月)。

除此之外，此種對傳教工作的新詮釋也包涵具體思考方向：

1. 傳教並不只表達地理方面概念而更指「傳教的情境」(missionary situation) (聖言會第十五屆總會代表大會的文件《聆聽聖神—我們今日對傳教的回應》，載於《與聖言對話》，2000 年 9 月)；
2. 不再把傳教看成一種堂區為主的活動；

第二個構思讓聖言會出現和發展所謂 specialized apostolates (專業化的使徒工作之範圍)。重要的事為此對傳教的新思想典範導致傳教活動的分化。以前，聖言會的工作範圍大部分為「未開墾地區的傳教」、鄉間堂區、城市學校等。不過，現今聖言會的傳教工作則包括各種各樣的工作，如：街眾(街上孩童)、愛滋病人、移民、避難人、城市堂區、農業運動、漁民組織、聖經使徒工作、大眾媒體服務、正義與和平推動工作、福傳意識建立、宗教對話、合一交談等工作。以上工作範圍更需要專業化的準備。

當今與未來，聖言會在及其大學事業上，會碰到什麼樣的挑戰嗎？現任聖言會的菲律賓籍總會長 Antonio M. Pernia 於 2002 年 11 月 6-9 日在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參加亞洲太平洋聖言會主辦的大學協會 (Association of SVD-Administered Universities in the Asia-Pacific Zone) 會中強調兩項挑戰：1. 推動對話交談的精神及 2. 追求聖言會傳教士作證的崇高品質。

有關第一點—推動對話交談的精神—在現今世界的恐怖主義及基要主義背景上，他強調對話精神與大學之間的密切關係。大學本身是一個充分發揮對話精神的場所，中世紀大學已有對話交談的技能叫做 disputatio (爭論；辯論；討論；拉丁文 disputare：dis- 為分析；putare 為思考)，它的目的為：自不同的看法而出發，而進一步進行彼此批判，為的是一起找到共同之真理。如此，表

達三個對話精神的條件：1. 我們人類對生活世界沒有單一性的世界觀，2. 我們人類在認識真理上是有限和片面性的，不過 3. 我們都是人，屬於人類，地球上此為我們最基本的共同點。因此，1. 大學應該全心全意地承認追求理性，而反對任何基要主義，要支持科學發展而看透並排除所有意識型態之偏見，以及包涵在宗教信仰、哲學思想、科學研究、藝術品所呈現的多元世界觀的內容。2. 大學取向研究工作及實驗方法，此表示我們在努力中才接近所謂的「真理」，並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握所有的真理。3. 大學有其基本承諾，即為人群及其發展而服務，是基於人類團結一致的精神。因此大學的基本功能和使命為培育人的社會性，讓學生學習秉持正義，發揮其仁愛精神，而去關懷社會。終於，雖然我們有不同的、多元的世界觀，還是有責任與使命邁向世界大同。

以上是我們聖言會在大學工作的指導原則，亦即將大學作為「對話交談的學校」。有關第二點—追求聖言會傳教士作證的崇高品質—總會長從負面的可能性出發。在修道生活中，總有危險失去原來的和高尚的宗教性精神或情操，因此靈修更新是一個基本的要求。1989年12月8日，聖言會在史泰爾（Steyl，荷蘭：聖言會創立之地）建立了「愛諾德楊生靈修中心」（the Arnold Janssen Spirituality Center），表示我們楊生大家庭—即聖言會（1875年創立）、聖神婢女傳教修女會（1889年創立）以及聖神永禱修女會（1896年創立），不斷地更新我們的靈修生活，反省我們的使命以及努力為福傳勞動。為什麼需要這樣呢？因為我們聖言會生活裡，總是需要兩個部分的調和：一個為修道生活，另一個為傳教生活，此兩個部分應該形成一種和諧狀態。不過，在日常生活當中常常證明，總是有危險隔絕這兩個屬於聖言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此，有時我們雖然度著修道生活而沒有從事跟傳教工作相關的活動，或努力做傳教工作而沒有完全履行對修道生活的承諾。那些在大學工作的聖言會會士應該不斷地提高他們的宗教情操，吸引週遭的人一起來為其大學宗旨目標努力。

另外，修會的傳教士們，當然也包括聖言會會士在內，在面對著日常生活中的挑戰上，也會逐漸失去他們先知性的敏銳，意即修道傳教士太容易與他的生活環境打成一片，而逐漸失去其另類生活的模式。如此，我們也慢慢失去自我存在的理由，然而在大學從事高等教育工作的會士們需要一種先知性精神，自我生活的見證以及表達聖言會使命特色的能力。

承上所述，對我們的總會長而言，大學工作與祈禱生活，研究工作與宗教信仰，以及大學與靈修是息息相關的。聖言會會士們於大學事業中的靈修態度應該是走中庸之道，其兩個極端為相對主義（在追求真理上，絕望及否定之）

和基要主義（在追求真理上，確定唯一的一個絕對真理並佔有之）。研究工作也可以當作對此兩種態度的良藥。追求真理讓我們為永遠的真理而開放。也因為如此，在大學當中的學習過程、研究工作與教學皆是一種聖化之道。而不同的領域，如文學、歷史、藝術、哲學、心理學、物理學、社會科學等學科領域，都研究人類生活及其環境，如此人才能夠不斷地發現「意義」、創造「意義」並改造「意義」。這也代表天主教大學特有的使命及「藉著理性的努力，把兩個經常容易視為對立，好像矛盾的存有層面，即探索真理及肯定已知的真理的泉源，生活化地結合在一起」（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通諭《天主教大學憲章》，§1）。其實，從事高等教育大學事業的理念，也可說是來自於我們修會的名稱——「聖言」會。會士們有一個使命，即把「聖言」——天主父創造和救贖的智慧——耶穌基督，做為位格之真理，宣傳於追求和探討真理之大學團體。每一所天主教大學也都應該共同分享聖奧斯定比度所強調的真理之喜樂。

無論如何，聖言會在大學從事高等教育所具備的工作態度是：在靈修自我崇高品質的基礎上，追求專業知識和全人教育的卓越。天主教輔仁大學聖言會創辦單位於1990年11月12日確認其宗旨，至今亦可做為我們聖言會在大學中服務的使命和理念：

「天主教輔仁大學聖言會單位之理想在致力於卓越之大學教育，追求並與人分享真、善、美、聖的校訓。

因此，我們首要目標是藉著行政人員、教職員工及學生之間的交談，而建立一個和善及公平的校園團體。

我們願在基督信仰的激勵下，邀請所有學校成員為每個人的尊嚴、每個文化的價值、以及為我們社會和世界的福祉而共同努力。」

蔣百鍊神父生平及其精神

Richard Arens , SVD (1912-1990)

- 1939 年 赴中國山東省傳教
- 1944 年 於北平輔仁大學服務
- 1960 年 肩負起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的使命及任務
- 1974 年 返德，從事外交牧靈工作



蔣百鍊神父乃德籍聖言會會士，輔大在台復校的歷史性任務上，其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積極向國外募款成立理工學院並籌建校舍、添購儀器設備、延聘資深教授等。蔣神父擔任理工學院院務長多年，致力於外語學院的創立及聖言會單位許多硬體建設的規劃與募資，且秉持基督精神推動天主教大學的教育理想。

Richard Arens SVD (1912-1990)

- 1939 went to China, Shandong Province for mission work
- 1944 started his work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 1960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refounding of Fu Jen University in Taiwan
- 1974 returned to Germany, did pastoral work for diplomatic circles

Father R. Arens was a member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coming from Germany. He played a historical role in the refounding of Fu Jen University in Taiwan. Through his energetic management, the initial need of finance, especially for the 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s, was met by foreign Catholic agencies. He took care of the purchase of laboratory equipment and continuously extended the building program. He also recruited highly qualified professors. R. Arens was dean of the 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s for many years and participated in establishing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s far as construction work and fund-raising were concerned. In a spirit of Catholicity he totally dedicated himself to promote the ideal of education at Fu Jen.

百鍊垂成今輔仁

魏思齊

蔣百鍊神父於 1973 年 9 月 8 日任輔仁大學理學院院長，並獲教育部頒發最高學術獎章。其成就除在其促進中德文化交流方面有卓越的貢獻外，於天主教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的推動上，更是功不可沒。有人因此譽稱他為新輔仁大學之共同創立者。

蔣神父為德籍聖言會會士，在其畢生的傳教士生涯中，為中國人民前後共奉獻了二十三年的歲月。前十年(1939-1949)於中國大陸，後十三年(1960-1973)則在台灣。這二十三年的歲月，蔣神父眼看一批批學生們各個於求學求進中成長獨立，成為社會中之中堅份子。當時仍是荒蕪草地遍野的輔大校園，也在寸土寸金的耕耘中，欣見一棟棟的教學大樓林立。每每憶及這筚路藍縷的開創歲月，總令蔣神父倍感辛慰。其對中國教育的心血與貢獻，更是在輔大的歷史長河中源遠流長。

培育背景

蔣百鍊神父於 1912 年 6 月 2 日生於 Bochum Linden (德國.波鴻市)，家有九位子女，蔣神父為長子，其父從事家俱業維生。有四年的時光蔣神父在 Linden 上小學，後因當時蔣神父的家住處被法國佔領，生活環境不安定，故家人將蔣神父送往到 Warburg 唸中學 (1923-26 年)。該處位屬縣市，蔣神父受當地主教安排居住於學生宿舍。此時蔣神父開始接觸由聖言會所出版的刊物—「天主之城」(Stadt Gottes) 和「傳教使者」(Missionsbote)，藉此刊物蔣神父開始對司鐸生活及傳教工作產生濃厚的興趣。

1926 年，十四歲的蔣神父搬遷到 Bad Driburg 城，在當地聖言會所辦的中學讀書。1930 年完成進階學習，前往荷蘭史泰爾 (Steyl) 德籍外地中學際續進修。1932 年春天通過畢業考試，順利完成中學學業。1932 年二十歲的蔣神父隨即搬入聖言會聖奧古斯丁神哲學院際續進修 (初學 2 年，神哲學院 6 年，共 8 年)。

初抵中國

蔣神父於 1938 年晉鐸，並立即接獲傳教派令前往中國傳福音。後因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其中國的行程受到延誤；直到次年1939年底，經過俄國及西伯利亞及滿清國，由北京轉往山東，並在戴家庄學習中文。完成一年的中文學習課程後，於1940年12月被派遣到另一個傳教的地方，擔任Pielke本堂神父的副本堂。任副本堂期間，蔣神父將大部份的時間用來準備中文道理，並費心背誦之。一年下來，蔣神父準備了近30-40個有關宗教和道德生活的講道集，並有系統的巡迴訪視鄰近所屬將近有四十出之多的小堂；蔣神父在每一處停留約2-3天，向當地信眾講道並關懷他們的信仰生活。他在中國的第三年時，開始帶領一些道理班，每一個道理班約有30-70位望教友；為培仰望教者的信仰，蔣神父設身處地的與望教友們共同生活至少一個月的時間，幫助望教者將信仰落實於具體生活中。在蔣神父的回憶中，始終認為這是他生活中最美麗的一段日子。

於中國傳教期間，蔣神父深刻意識到中國天主教必須提升學術水準的培育，對本地天主教知識份子的培養尤其重要。當時雖經費結蹙，但蔣神父仍盡量將有讀書能力的年輕男孩送往山東城市受教育，以培養人才並準備教會未來的領導人物。

1944年初，蔣神父受派遣到北京輔仁大學，一方面繼續讀中文，另一方面擔任輔仁中學的學生輔導工作。同年，因為濟寧中學（聖言會創辦）的輔導老師去世，蔣神父便回去接辦濟寧中學輔導老師的工作。當時，蔣神父曾與當地共產黨討論有關辦學校及解放傳教士的相關事宜，並對國民黨的受傷黨員提供不少的醫療幫助。藉著此類的協調工作，他飛往南京與某將軍（美籍和平軍隊的率領者）和周恩來（當時共產黨代表），進一步協調山東傳教士的解放；並協調一些救濟品的需要及補給事宜。蔣神父也曾因此協調救濟工作而遭監禁，被污控為俄國間諜，在上海軍隊監獄中被監禁二週。後因教廷代表居間協調後被釋放，並轉調至輔大教授德文課程及擔任學生輔導工作。

1947年蔣神父任輔仁中學的校長。1949年1月中共獲掌政權之後，蔣神父轉赴美國進修，1952年在芝加哥大學獲教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共產主義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力」。之後，蔣神父放棄史丹佛大學的研究獎學金，而接受Unesco（聯合國的文教組織）的邀請往法國巴黎參加UK年度大會。1952年底至1953年於波恩大學進修及擔任柯隆UK機構的顧問。自1953年至1957年間蔣神父任菲律賓Daclobam 聖保祿學院研究所所長。1957-1960年於菲律賓San Carlos（Cebu）擔任教育學教授，及聯合大學中學部的校長。1957-1960年期間是蔣神父學術工作的巔峰時期，他在比較教育學和人類與文

化的研究計劃上，陸續在各專業期刊出版相關論述，並受到菲律賓多所國立大學基金的支持，推動許多精湛的學術研究計劃。

受命推動輔大在台復校計畫

1960年蔣神父受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任命為輔大在台復校，推動聖言會理外民學院之建立。基於蔣神父過去豐富的教學及校務行政經驗，他立即選派二十位聖言會神父分別攻讀自然科學、外語教學及語言學。除此之外，為了籌建輔大新莊校舍，蔣神父積極推動許多募款活動，與德國的政商界及教會頻頻接觸，奠立輔大復校工程基礎與具體協助。

為了進一步討論復校工作及推動募款作業，蔣神父於1960至1963年間，經常往返於台灣與美國等地。1961年6月他以「在台復校輔仁大學」之名籌劃復校工作的專題報告及相關備忘事宜。這項計劃就是後來他所落實建立的理工、外語學院的重要藍圖。

1963年初蔣神父抵台後，隨即於2月間購妥台北縣新莊鎮營盤里三十餘甲土地，做為大學復校的所在地。同年10月21日第一批學生在新莊輔大開始上課，1967年底，輔大聖言會單位所屬的校舍幾乎都已完成—第一大樓：理工學院（龍形樓300公尺：數學、物理、生物、化學四系）；第二大樓：營養學系大樓（家政及營養學系），第三：語言實習室（140個座位）；第四：兩所男生宿舍（格物、立言學苑，計800床位）；第五：兩所女生宿舍（宜真宜善、宜美學苑，計700床位）；第六：圖書館大樓（五層樓，可容納800—900讀者座位，藏書庫約200萬卷）；第七：行政大樓，即目前之耕莘樓（五層樓）。1968年陸續完成餐廳，及來賓招待宿舍的建築。在此時期為推動校務的發展，蔣神父不斷向國外募款籌建校舍，添購儀器設備，延聘資深教授等，他本人更是擔任理工學院院務長多年，及致力於外語學院的創立。

蔣神父在輔大在台復校的工程上，扮演歷史性的角色，也始終秉持著基督福音的精神，推動天主教大學之辦學理念與落實。除此以外，當時與蔣神父一起胼手奮鬥的復校合作者有：1、齊得方神父（德文系、語言研究所，1963—1993於輔大服務），2、文那神父（英文系1963-1992年），3、李嘉士神父（理工學院，1963-1969年），4、Brull（德籍教授，亦在北平建立化學系， ），5、歐斯德神父（物理學系，曾在北平服務，1964-1968年），6、扈伯爾（生物

系，1964-1982)。蔣神父也邀請聖神婢女傳教會一同參與復校工作，譬如：民生之母吳秉雅修女（1963-1980年）。

由於輔大聖言會單位所負責建築校舍的龐大經費，大部分（三分之二）是來自德國政府和教會資助；因此被視為是德國協助發展的重點及典範。其他的三分之一經費則是來自聖言會於其他國家的募款工作。

蔣神父完成在台復校之重大工程之後，於1973年9月16日返回德國，推動中德文化促交流促進活動。1972年，由洛杉磯大學遷往德國聖奧古斯丁，有一年的時間蔣神父透過北平輔仁大學於1935創立的華裔學志刊物（研究中國文化之不同問題為主的刊物），及其相關的研究所，投入中國現代史問題的研究。1974年，柯隆樞機主教Hoffner，邀請蔣神父從事英文外交牧靈工作，並擔任在柯隆教區內菲律賓籍外勞的牧人。在這牧靈工作上，蔣神父以其司鐸身份的熱誠及高超的外交素養，協助菲籍外勞在德國找到一塊屬於自己的家園。

1989年3月底蔣神父罹患骨癌，經治療後無效。他人生最後一段雖受病痛所苦，他不但未曾抱怨，反而加倍感謝天主賜給他充實和豐富的一生。蔣神父於1990年4月19日，逝世於波恩癌症診所。蔣神父終其一生對輔大在台復校之貢獻是永存不朽的，堪稱為在輔大台復校聖言會單位之創立人，亦如其名一百鍊垂成今輔仁。

Reflections on Fu Jen as a Catholic University

對輔仁大學作為一所天主教大學之反思

Frank E. Budenholzer, SVD 柏殿宏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sts of a reflection on the academic missio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in general and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articular. As background to the discussion, some key mo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are considered. Two models of the Christian university are then suggested – the “Christian academy” where stress is on under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a Christian atmosphere and the “Christian Research University” where the stress is on graduate education, the discovery and promulgation of truth.

When Fu Jen was re-established in Hsinchuang on October 21, 1963,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were still quite limited and the stress was on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in a Catholic atmosphere. The specifically Catholic character of the institution was most clearly seen in the religious, priests and Catholic lay persons who taught in the academic departments.

The situation today is vastly different. Fu Jen finds itself competing in a saturated educational market. The number of priests and religious serving in the university has declined, as has the number of Catholic students. These changes have shifted the focus of the Catholic character out of the academic departments and into university-wide units such as the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campus ministry and the newly created offices for mission and identity. The university has also taken on m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In this new setting, a key challenge for Fu Jen will be to develop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graduate programs and centers in areas related directly to its Catholic character.

Content

I. The Background

II. The Foreground

I. The Background

(1) Our Roots – the Intrinsic Value of Human Knowledge

For the Christian, a basic tenet of faith is that, despite the tragedy of sin, all of God's creation is good (Gen. 1:31). Furthermore, the human person ha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 terms of creation, this special relationship is expressed as our being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Gen. 1:26). Beyond this, the human person is also called to new life through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Rom. 6:5-11).

In this context, the Christian Churches have all stresse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human knowing and human knowledge [cf. John Paul II, *Fides et Ratio*, 1998]. The tradition of Christian schools and academies goes back to the time of the Church Fathers and saw a special flowering in the scholastic period. During the missionary movements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Catholic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in Latin America and Asia. The SVD San Carlos University sees its roots in this period. And already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Protestant colonizers of North America had begun founding schools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it was the large missionary outreach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that saw the foundation of largest number of Christi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Asia and Africa. And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the Church sponsored colleges of China were founded, first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somewhat later by the Catholic Church [Lutz 1971]. As a result of these developments,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now be found in almost every country of the world.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s an obvious heir of this tradition, founded in Beijing in 1925 and re-established in Taiwan in 1961. Most recently, the Catholic Church's commitment to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expressed in the *Apostolic Constitution on Catholic Universities* (1990).

While the shape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is clearly based on European and later American models, the roots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much broader. In China,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of self cultiv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s already stated clearly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was strongly encoura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Chu Hsi 朱熹 (1130-1200). The examination system of pre-revolutionary China had as its ideal that the rulers of

China would gentlemen-scholars, well versed in the classic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2) The Pragmatic Turn and Its Influ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The roots of contemporary Catholic education in Taiwan clearly extend back both to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and to the Confucian academy. But in recognizing this fact, it is important to equally recognize the huge transformations that have led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higher education.

John Henry Newman in his discourses delivered to the Catholics of Dublin in 1852 stated very clearly the ideal of liberal education as the purpose of the university. He said:

Surely it is very intelligible to say, and that is what I say here, that Liberal Education, viewed in itself, is simpl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intellect, as such, and its object is 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intellectual excellence. [Newman 1982, 91-92]

Newman did not deny the value of a university education to society, but it is always subordinated to the basic object of intellectual excellence. Further he said:

But a University training is the great ordinary means to a great ordinary end; it aims at raising the intellectual tone of society, at cultivating the public mind, at purifying the national taste, at supplying true principles to popular enthusiasm It is education which gives a man a clear conscious view of his own opinions and judgments, a truth in developing them, an eloquence in expressing them, and a force in urging them It prepares him to fill any post with credit, and to master any subject with facility. [Newman 1982, 134-135]

The liberal education model of the university in many ways resonates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ideal. The tradition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prepared local and national leaders not through a regimen of applied study but rather by forming leaders of true intellectual refinement.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continental Europe, especially in Germany, another ideal of the university emerged –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Kennedy 1997, 25-27]. The stress was on the discovery and promulgation of truth. Graduate programs, especially doctoral programs, became the hallmark of the advanced university. The

engine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s search for truth were the laboratories of the scientists and the seminars of the graduate faculty.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were primarily in the liberal arts tradition, with most school be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hurch related. For many, the opening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n 1876 as a purely graduate institution marks the turning point in American education. Other institutions of a similar mold soon followed – Stanford in 1885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890. Other established schools, such as Harvard and Columbia, revamped their structures to follow a similar line. [Marsden 1994]

But the Americans did not simply copy the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education. The universities, with their newfou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gradually were seen to be the engines of growth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Cornell University, founded in 1868, probably more than any other exemplified this pragmatic direction (1). Practical programs such as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were on an equal basis with the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program, both with and without a classical language component. Cornell also set a new direction by declaring its secular, non-Church status. [Marsden 1994, 115]

Other primarily American innovations includ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lective system of selecting classes and the gradual incorpor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such a business that had earlier been separate certificate programs, as full parts of the university. A further development came with direct service by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taff to industry, the clearest example being th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programs of the American state universities. [Tetlow 1983, 16-28]

Many of the same forces that caused a radical shift in educational goals in Europe and the North American were also present in China [Budenholzer 1999]. In 1903, during the waning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decree requiring Western scientific studies be added to the traditional school curriculum. In 1905, six years before the revoluti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was abolished. In the early years before the revolution, the Christian colleges of China were often compared unfavorably with the Confucian academies. However, very soon their curriculum of “practical subjects” such as foreign languages, commerce and the physical sciences became the norm for the universities of China [Lutz 1971].

(3) Pluralism and the Despair of Learning Truth

Section (2) above seeks to describe the factors that have shape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But there has been another factor that, while more subtle, is equally influential in shaping current university education. For lack of a better phrase, I have described it as “pluralism and the despair of learning the truth.” Modern scholarship has brought two questions to the forefront in any discussion – history and pluralism. History teaches us that no tradition, whether Christianity, Buddhism or Confucianism, remains static. Understandings in each age can be radically different which has led many scholars to despair of every really understanding the thought of earlier times. What history has done on a vertical level, pluralism has done on the horizontal. Radically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culture are continually brought into contact – sometimes with violent results. The result of these two forces has been for many a despair of ever learning the truth. The result is that the earlier mission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 the “discovery and promulgation of truth” -- has changed (many would say deteriorated) to the task of assembling internally consistent, but mutually independent, fields of knowledge. Thus while the level of scholarship generally remains high, communication and peer review take place among a small subset of scholars familiar with the given sub-field. This, along with the knowledge explosion, makes it difficult to keep up with developments outside of one’s own often very narrow field of specialization and makes any overall integration of modern knowledge seem an impossible task.

For many, radical postmodernism, essentially implying a *de facto* relativism, best describes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especially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great exception to this state of affairs i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The acceptance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scientists of a common research methodology has allowed scientis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o accept that science somehow develops, that there is in some sense a progression toward truth. This belief has been bolstered by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ed sciences (especially biological and medical sciences) that depend on what most people would consider quite esoteric scientific theories – quantum mechanics,

molecular biology and so for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act that science “works” and the fact that it has a generally accepted methodology leading to cumulative results has made science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the premier example of research in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universities. This has also increased the pressure on other disciplines to somehow imitate the physical sciences in their efforts at research.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 rift gradually developed between many universities and their Christian sponsors. In many cases the cause was not an open hostility to Christianity, but rather a belief that the norms of scholarship must stand apart from religious conviction. George Marsden in his book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describes this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8th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in religious circles, reactions to this situation have been varied. Many religious adherents have essentially accepted the impossibility of any kind of reasoned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espoused some form of fideism or fundamentalism. One result is what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Bible College.” A small school, often with very good intellectual credentials, that seeks to shape the curriculum in such a way to avoid the problems raised b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contemporary pluralism.

For many others there was a common sense recognition that life must go on, even if answers to the basic questions seem to evade us. This has led to a split between various applied disciplines and the more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that would be at their base. For example, applied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have more or less gone off on their own, leaving the basic or meta-ethical questions (freedom, human agency, the nature of the good) to a few philosophers. Similarly, philosophical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human person are kept quite separate from the applied research of those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and business and systems management.

(4) Christian and Catholic Universities in Today’s World

Given these changes, for the last 30 year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both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oncerned to clarify what makes them

Christian. The amount published on this topic is immense and continues to grow. For Catholics, the carefully prepared 1990 document *Apostolic Constitution of the Supreme Pontiff John Paul II on Catholic Universities* summarizes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Catholic university. It says:

Every Catholic university, as a university, is an academic community which, in a rigorous and critical fashion, assists in the protection and advancement of human dignity and of a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research, teaching and various services offered to the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Paragraph 12]

And it further says:

[E]very Catholic University, as Catholic, must have the following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 1) a Christian inspiration, not only of individuals but of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as such;
- 2) a continuing reflec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Catholic faith upon the growing treasury of human knowledge, to which it seeks to contribute by its own research;
- 3) fidelity to the Christian message as it comes to us through the Church;
- 4) an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 to the service of the people of God and of the human family in their pilgrimage to the transcendent goal which gives meaning to life. [Paragraph 13]

Given the forces shaping contemporary tertiary education, I would suggest two possible models for the Christian university. The first would be the Christian academy where the emphasis is on under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a Christian or Catholic atmosphere. The second would be the Christian research university. In fact, these two models are not exclusive, and there is a continuum between them, but they will serve as useful “first approximations” to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in Taiwan’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cluding Fu Jen University.

In the “Christian academy” the stress is on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ather than on the research. The ideal is a community of students and scholars who identify strongly with the larger Christian community. Fidelity to the Christian mission of

the institution is as important as academic expertise in hiring faculty. The stress is on training future leaders – gentlemen-scholars – rather than direct service to the country through research or community service. Here in Taiwan, Tunghai University, founded in 1955 in Taichung, most clearly announced this ideal, both verbally and in the design of the first campus buildings by the renowned architect I. M. Pei (2).

In the Christian academy, the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will normally include elements of both the liberal arts model and the professional model. In Taiwan, the professional model predominates. Education is seen as a direct prelude to a future career. This is the desire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arents and students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future economic situation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enter a career that will bring a reasonable degree of job satisfaction. However, the stress on career development does not preclude elements of the liberal arts model. Programs which go under various names – core courses, general curriculum, holistic education programs – purposely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more pragmatic curriculum offerings and seek to encourage learning simply for the sake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But even in the regular department offerings, the style of offering courses can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liberal arts model. This is most easily done in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fields of the humanities (literature, philosophy, history), but can also be accomplished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and fine arts. Even in the professions – medicine, engineering, law, business, education – courses can be offered that accentuate the excitement of intellectual discovery as opposed to training in preparation for a professional career. Normally Christian theology will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e curriculum.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 where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are not Christia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subjects such as philosophy of life (*Fu Jen, Providence*) 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Chung Yuan*) serve a similar role. With its stress on undergraduate studies and community, the Christian academy will place a relatively strong emphasis on campus ministry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tudents will be encouraged to find their identity in a relatively self-contained university community.

The second model is that of the “Christian Research University.” In such a university the stress is on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new knowledge. A much larger percentage of faculty time will be spent on research as opposed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activities. Stress is more on individual or department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rather than building a campus-wide community of scholars and students. Faculty recruitment will also depend more on excellence in the individual disciplines than on commitment to the university Christian ideal. Finally, the stress will be on training scholars who will train other scholars, rather than on forming a more general group of future leaders in society.

In the Christian research university, department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 theology, philosophy, the social sciences, fine arts and music – must be recognized as centers of excellence not only within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but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 continual challenge will be to encourage some kind of dialogue between these departments and the other departments of the university so that the “Christian character” is not limited to a few “Christian strongholds” within the university. With the stress on graduate education and department specialization, the students tend to be older and more concentrated on their department discipline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cluding campus ministry, are less emphasized and seen more as a matter of individual choice.

Most universities, both Christian and non-Christian, have elements of both models. This is even more so in Taiwan, where all the major universities, public and private, have large number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ess on education as primarily training for a future career as well as Taiwan’s policies on faculty hiring, promotion, department evaluations and the criteria for government funding all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direction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I. The Foreground

With this background, I would like to consider the situation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 will restrict myself to reflections on Fu Jen after its re-foundation in Hsinchuang Taiwan. Much of what I will say depends on my own experience here at Fu Jen. While not here during when the university was re-established, most of the early pioneers were still active when I first came in 1978. Historical comments ar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However, much of what I have to say would

equally apply to other colleges.

(1) The Early Years in Hsinchuang – Quality Education in a Catholic Atmosphere

There were several factors that are important in understanding the atmosphere in the year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re-establishment of Fu Jen University in Hsinchuang. First, college education was, at that time, what economists would refer to as a “scarce commodity.” The opportunities for university placement were relatively limited. This combined with a popul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had received reasonably good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s and were eager for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a university. Under these conditions, universities like Fu Jen and Tunghai were very much appreciated for offering an important service to the young people of Taiwan. This also meant that the average quality of students was quite high since only the better students would pass the examination to enter any university.

Initially most of the department chairs were priests, religious or laypersons who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Many had doctorates in their fields and essentially all had at least a master’s degree. This was at a time when many of the state universities still lacked faculty with advanced degrees. With the notable exception of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and a few others, almost all of Fu Jen’s students were undergraduates. While research that would be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journals was rare, smaller research and writing projects were often carried out which made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aiwan’s local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was oriented toward career development, the overall tenor of the university was very much that of the first model described above – the Christian academy. The purpose wa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in a Catholic atmosphere. This atmosphere was most clearly symbolized by the priests and religious who were often department chairs. These religious and priests were appreciated both for their basically generous Christian attitude as well as for their professional expertise which was, at that time, lacking in Taiwan. Several of the SVD confreres [SVD: **S**ocietas **V**erbi **D**ivini,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and SSpS sisters [SSpS: Congregation **M**issionalis **S**ervarum

Spiritus Sancti, Holy Spirit Sisters] who were deans and department chairs were well known nationally for the innovations that they brought to their departments. Examples would be Franz Giet, SVD with his introduction of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Franz Huber, SVD in electronic microscopy, Arnold Sprenger with his innovations in language education, Urbana Teuhaus, SSpS in the field of home economics and Maryta Laumann, SSpS in textile conservation.

Other factors also highlighted the Catholic atmosphere. As late as 1980 the percentage of Catholic students at Fu Jen was on the order of 10% and the percentage of Protestant students was around 22%. By 1988 this had dropped to Catholics 3.8% and Protestants 9.8%. Currently the percentage of Catholics is 1.4% and Protestants 2.5% [Ross 1981, 17; Ross 1988, 20; Wei and Budenholzer 2000, Table 1]. Before 1990, each class usually had a small group of Catholic, or at least Christian students, which presumably reinforce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atholic character of Fu Jen.

During this time relatively little thought was given to what it means to be a “Catholic universit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s to build a first-class department and it was presumed this would reflect positively on the Catholic Church.

(2) The Current Situation – Finding Our Place among Taiwan’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more specifically at Fu Jen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since the 1960s and 70s. Currently Taiwan has on the order of 150 tertiary institutions. In 2003,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umber of college placements will be larger than the pool of applicant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sponsoring a university such as Fu Jen is still offering an immense service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But the service is no longer supplying a scarce commodity, but rather Fu Jen is finding itself competing with other vendors in an oversubscribed market.

Given this situation, each institution has to find its place in the new educational reality of Taiwan. Many factors have pushed Fu Jen to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In the 1970’s and 80’s young Ph.D.s, many graduates of Fu Jen, were returning to Taiwan and taking up teaching positions in the universities. They

were looking to continue the research work they had begun as Ph.D.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grants and other funds became available to faculty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Gradually the level of research began to rise. Between 1980 and 2002, most of the departments at Fu Jen added MA [Master of Arts] or MS [Master of Science] programs and the number of Ph.D. programs rose from one (philosophy) to the current seven with more to come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he criteria for advancement in academic rank has gradually been strengthened. In 1985 in the sciences, often a single paper i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was sufficient for advancement. Today,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must appear in a highly ranked journal and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series of papers all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journals. Analogous statements could be made in other disciplines.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most of these same developments have occurred in most of the other large private and public universities in Taiwan. While Taiwan's private universities would like to emulate the success of the American private research universities,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funding schemes in the US and Taiwan make this very unlikely (3). Hence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re asking themselves what will be their special contribution – their niche – in the Taiwan educational scene. To simply emulate the better-funded state universities seems less than ideal. And yet multiple forces are pushing in this direction.

In terms of its Catholic identity, Fu Jen has seen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leading to a large relative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and priests on campus. When I first came to Fu Jen in 1978, all of the department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VD and SSp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Electronic Engineering Department, had at least one religious in the department. All of the college deans were either priests or religious. Now there are two SVDs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one SVD and one SSpS in the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s larger, but has also decreased. This trend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in the other colleges of the university. In some departments lay Catholic faculty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however their numbers also seem to be decreasing. At present, only one of the college deans is a religious. Several deans are non-Christian.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Catholic students has also declined precipitously. The percentage of Catholic students is on the order of 1.5%. Many departments have essentially no Catholic student presence. This drop, both in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serving in the departments combined the low of number of Catholic students has shifted the focus of the Catholic character out of the academic departments and into university-wide units such as the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campus ministry and the newly created offices for mission and identity. The Catholic administrators and faculty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maintain and, hopefully enhance, the Catholic character of the university. The three initiatives mentioned above are very hopeful signs.

The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 both in the three special courses related to Fu Jen’s Catholic identity (Introduction to University Lif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 (*t’ung shih k’e-ch’eng* 通識課程) – has attempted to retain something of the liberal arts model in an increasingly specialized and professionalized curriculum. It also has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 of younger religious and priests as teachers in the university. At present, the SVD has five members and the SSpS one sister teaching there. The challenge will be to maintain standard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so as to be accepted as the heart of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and not simply an “add-on” imposed from outside.

With reference to Fu Jen’s Catholic identity, the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is on the one hand a basic element in that ident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nsufficient in itself to maintain that identity. In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the specific curriculum offerings of the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as well as its overall spirit, will define the Catholic presence in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Yet the holistic education is in no way uniquely Catholic or even uniquely Christian. The need for a liberal arts core curriculum is recognized by many of Taiwan’s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4). And the specific slogan of “holistic education” (*ch’uan jen chiao-yü* 全人教育) has been taken up by several other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s defining their Christian character. Similar comments could be made about campus ministry and relate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ey are essential to maintaining Fu

Jen's Catholic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these activities will always be somewhat extrinsic to the core activities of the university – teaching and research.

(3) The Future – Challenges and Possible Directions

How can Fu Jen maintain and perhaps even enhance its Christian and Catholic identity? The first comment would be that there is no “one way,” “no magic formula” for Fu Jen or any other Christian institution to maintain its religious identity. Fu Jen will have to continue to work hard in many areas – undergraduate core curriculum, campus ministry,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tudent services, dormitory ministry, and so forth. At the same time, it is the basic contention of this paper that as graduate educ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 key challenge for Fu Jen will be to develop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graduate programs and related centers in areas related directly to its Catholic character.

The graduate program in philosophy clearly will have a place of honor whe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is written. However, at present its focus has shifted from scholastic philosophy to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The stress on Chinese philosophy is not in itself negative. In fact, it is the basis for a creative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al Christian and Chinese thought. However, if Fu Jen loses its contact with international Catholic philosophy, it will be hard pressed to maintain its presence as a center of Catholic identity.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is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departments on campus. In the spirit of Vatican II it has become a center of dialogue both with Buddhism and the folk traditions of Taiwan and China. This is a special contribution of Catholic Christianity in Taiwan, something very difficult for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coming out of the reformed Protestant traditions. However, the religion department cannot take the place of a department of theology in the Catholic tradition. Currently the theologate is academically quite isol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Arguments can be made whether an academic theology program and a professional theology program to train individuals for Church ministry should be together or separate. Whatever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 would suggest that if Fu Jen is to maintain a truly Catholic character as research is emphasized and the curriculum

becomes increasingly specialized, there must be a strong program in academic theology.

Other positive academic developments include the John Paul Center for Dialogue and Peace, the Center for Catholic Church History and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Currently, each center is essentially run by one person. The future challenge will be to make them real centers of dialogue among Fu Jen's diverse faculty as well as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enter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Applied ethics is an area where Taiwan's secular society will be looking to institutions like Fu Jen for guidance. The current program in professional ethics has set a good basis, especially on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Developing centers of ethical dialogue that can remain true to the Catholic vision and yet open in dialogue with the larger society may not be so easy. Fu Jen's professional schools – business, law, medicine and on a smaller scale, engineering, social work and education – could all be fertile ground for developing centers of ethical dialogue.

In arguing for graduate programs and center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I do not wish to suggest that the more “secular” departments should somehow be de-valued. One of Fu Jen'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its comprehensiveness. I am convinced that it will be the best and brightest faculty who will have the interest to move beyond their own disciplines and consider what the Catholic intellectual tradition has to offer. A similar statement can be made about students. If Fu Jen is to be a center of Catholic excellence, it must also be a center of academic excellence.

Having said the above, it should also be stressed that as far as anyone can tell, Fu Jen will always remain a primarily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tudents that somehow identifies with Fu Jen as a Catholic institution will not be eas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to the departments will be crucial. Campus ministry and the work of the offices for mission and identity all will have a role to play.

The educational situation in Taiwan and in most of the world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Distance learning and the increasing tendency to treat education as a commodity will have further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aiwan's educational scene. We are thankful for the work of those Catholic priests, religious and lay people who

laid the foundation here in Hsinchuang. But there is no way we can go back to those times. There is also a group who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larmed at the tumult in the academic world. They would suggest that rather than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larger academic world in a true dialogue, it is perhaps best to avoid the slippery slopes and move into a more defensive mode. I would agree that the tradition has to be preserved. But I would argue that the tradition will be preserved only by humbly, but also creatively, engaging in a dialogue with the wider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nd all segments of society (5).

So far I have spoken primar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ristian educator. However, I believe that Catholic education at Fu Jen is also very much in keeping with our basic thrust as SVD and SSpS missionaries. We are clearly rooted in our Catholic tradition and our Catholic faith. But we also recognize that God's Word is present in all of creation, that God's Spirit will move where She will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must first and foremost be a place of dialogue. I would suggest that work in such a university is very much in accord with the SVD and SSpS missionary charism. As the *SVD Constitutions* say:

The Divine Word became incarnate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situation. Jesus announced peace and salvation to all those of good will, showing special predilection for the poor. This example determines the way in which we participate in his mission. Therefore we try to insert ourselves i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ose among whom we work. With open mind and deep respect for the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peoples, we seek dialogue with all and present the good news of God's love to them. [*SVD Constitutions* 103]

Notes

- (1)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ornell University was a center of revolutionary thought for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Cornell's place in the rising tide of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see Kwo, p. 14.
- (2) Tunghai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955 by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Education in Asia, at that time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group of local

Christians. They saw their mission as continuing the work of the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at had been closed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design of the campus sought to facilitate the creation of an intimate community of Christian scholars and students [cf. Association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p. 89-92].

- (3) American private education is probably unique in its ability to maintain the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 Two factors, not present in Taiwan, made this possible. The first was the philanthropy of the 19th century industrialists that put a number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on a financial footing such that they could compete with the state funded schools. A second factor was that during an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und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in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For private schools, so-called indirect funding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paid direct research costs, but also funded indirect costs (libraries, laboratories, maintenance, etc.) at a level nearly equal to direct funding.
- (4) See, for example, the papers in the meeting organized by Fu Jen's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She-hui, jen-wen yü ch'uan-jen chiao-yü hsüe-shu yen-t'ao-hui* 『社會、人文與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 held on Friday, March 28, 2003 in the auditorium of th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 (5) In the first draft of this paper, I considered ending with a quote from Bernard Lonergan. While the context was somewhat different, Lonergan's words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say when considering the future of Catholic education. He said:

There is bound to be formed a solid right that is determined to live in a world that no longer exists. There is bound to be formed a scattered left, captivated by now this, now that new development, exploring now this, now that new possibility. But what will count is perhaps a not numerous center, big enough to be at home in both the old and the new, painstaking enough to work out one by one the transitions to be made, strong enough to refuse half-measures and insist on complete solutions even though it has to wait. [Lonergan 1967, 266-7]

Bibliography

- Association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ROC). c. 1999. *Directory of Member Institutions*. Taipei
- Budenholzer, Frank. 1999. "Religion and Science in a Non-Western Sett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Mission Studies* Vol XVI-I, 31, 43-72.
Published in abbreviated form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Tripod*. Vol. 20, No. 118 (July-August 2000).
- John Paul, II. 1998. *Fides et Ratio: Encyclical Lett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Vatican City.
- John Paul, II. 1990. *Apostolic Constitution of the Supreme Pontiff John Paul II on Catholic Universities*. Vatican City.
- Kennedy, Donald. 1997. *Academic Du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ress.
- Kwok, D. W. Y. 1971.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 Loneragan, Bernard. 1967. *Collection: Papers by Bernard Lonergan*. F. E. Crowe, Ed.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Lutz, Jessie Gregory. 1971.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rsden, George M. 1994.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man, John Henry. 1982 [1852]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Martin J. Svaglic, editor.
Notre Dame, IN: U. of Notre Dame Press.
- Ross, Daniel. 1988. *Religion at Fu Jen*. Taipei: Orchard Books.
- Ross, Daniel. 1981. *The Religious Life of the Students of Fu Jen University*.
Hsinchuang: Fu Jen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
- Tetlow, Joseph A., SJ. 1983. "The Jesuits Mission in High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and Contexts" in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St. Louis, MO: The American Assistancy Seminary, St. Louis U.

Wei Chia-hua, Po Tien-hung (Frank Buddenholzer SVD). 2001. *K'e-hsiue yü tsung-chiao: T'ai-wan dahsüe-sheng chih t'ai-tu*, T'ai-pei Fu Jen ta-hsüe, wei fa-piao kao-zi (魏嘉華、柏殿宏・2001・科學與宗教：台灣大學生之態度 台北輔仁大學：未發表稿子,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Attitude of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unpublished paper).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Reflections on my time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 Hesselfeld SVD

郝思漢神父 (Fr. Heinz Hesselfeld, SVD) 1930 年生於德國閔斯特地區，1952年進入聖言會，1958年晉鐸後被派到美國華盛頓天主教大學研讀物理學，獲博士學位。1966年於輔仁大學任教，1967-1978年任物理系系主任，1978-1980任所長，1973-1984任理工學院院長。1988年在中國江西省省都南昌大學負責成立中德聯合研究院和食品科技的研究中心。



本篇〈輔仁大學理工學院〉短文，是郝神父回顧他自1966至1987在輔大理工學院的生活與服務。除一般歷史性的資料外，他的文字呈現出一種「尋根」、「歸屬感」的特質，有助於我們在立志於天主教大學辦學精神的榜樣，使我們深刻體驗到郝神父是位聖言會熱忱的福傳者、教育家和科學家。

Roots and Planning

Funding and Architecture

Departments and Members

Questions About a Catholic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at a Catholic University

Examples of World Famous Scientists Who Had Religious Faith

The Strength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While looking back upon the time of my service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 am deeply convinced that these years from 1966 to 1987 were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fruitful years of my life. They were years when I enjoyed my best health, and had no lack of energy for shouldering my responsibilities as a teacher and administrator. I was 35 years old when I came to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fter my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was 57 when I was appointed to different duties.

Roots and Planning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Science departments of the former Fu Jen University in Peking had a very good reputation. There were several outstanding SVD priests as professors of Mathematics, Biology, Physics, Chemistry, as well as in the Applied Sciences like Home economics. Therefor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when in 1960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was reestablished in Hsin Chuang, Taipei, th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were ask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The Superior General of the SVD knew, that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us to assume this responsibility on our own, so he invite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the SSpS Sisters. These Sisters had also worked in leading positions in Peking. The SVD and the SSpS immediately selected and appointed a group of young members to study for Master's and Doctor's degrees, with a view to teaching in all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when the College would open. Thus in the very beginning, the Head of each department was either an SVD priest or an SSpS Sist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itment of the whole Catholic University,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was also dedicated to educate and cultivate the personal growth of the students. Our goal was that the whole community of academic personnel, together with the student body, should live and work on the basis of Truth, Goodness, Beauty and Holiness.

Funding and Architecture

To establish a new private university in Taiwan and especially a totally new College of Sciences need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funds. Through the energetic

management of Fr. Richard Arens SVD and Fr. Bernard Doyle SVD, the initial basic need of finance was met by Misereor, the German Catholic Aid Organization, and other supporting agencies, by German bishops, and by the SVD headquarters. The SVD University financing office in Chicago, headed by Fr. Ralph Thyken, SVD gave substantial help. The College was able to purchase the latest laboratory equipment and continuously extended the building program, as well as employ well-trained and highly qualified professors. To the amazement of everyone, the graduates of those initial years were most successful in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s. They have kept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College, even 35 years after their graduation.

Fr. Friedrich Linzenbach, SVD, was the chief architect responsible for designing the outlay of the whole Fu Jen University and all the buildings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Through architecture he wanted to suggest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moder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and therefore planned a visible sign of enculturation by designing the College in form of a big dragon, with the Chemistry department seen as the tail of the dragon, the departments of Biology,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as the body, and the Scienc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s the big dragonhead with an open mouth. According to his view, the Library Building was the golden ball placed in front of the eyes of the dragon.

Fr. Linzenbach also designed the student dormitories of the College, the building of the department of Home economics, the building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 lecture hall. The building program could not have been undertaken without the energetic work of the two engineers **Br. Albert Behrla**, SVD, and **Br. Michael Helsper**, SVD. Throughout the later history of the College, th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work of all buildings was offered by **Br. Franz Freisinger** SVD. and by engineer **Br. Norbert Ruf**, SVD.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lso housed the members of the SVD community and was named after **Cardinal Thomas Tien**, SVD, the first Chinese Cardinal and former archbishop of Peking and first Chancellor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Fu Jen University. The library building was named after **Fr. Johannes Schuette**, SVD, the Superior General of th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who is also remembered as one of the great prime movers f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Fu Jen, and who appointed very

able younger and older members of the SVD Society to study and work at Fu Jen.

Departments and Members

The whole College was influenced and certainly also shaped and formed by the first deans of the College, **Fr. Michael Richartz, SVD**, and **Fr. Richard Arens, SVD**, in addition to all the heads of departments. In a Christian spirit and according to the norm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whole staff of professors aimed at educating the students to be good persons and good scientists. That is, they concentrated on educating independent, competent and responsible members of society, and on qualifying them to take their places as professionals in their later lives.

There were SVD priests and SSpS sisters appointed to each one of the departments, most of them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they were well appreciated by their students and by the staff of their departments. Here is a list, giving their names and the departments in which they worked:

Department	Name	Position
1. Mathematics Dept.	Sr. Hildegard Pohanka Sps	Head, Professor
2. Physics Department	Fr. Michael Richartz SVD	Dean, Professor
	Fr. Franz Oster SVD	Head, Professor
	Fr. H. Hesselfeld SVD	Dean, Head, Professor
	Fr. John Koster SVD	Professor
3. Chemistry Department	Sr. Rita Liu SSpS	Professor
	Fr. Karl Specht SVD	Head, Assoc. Professor
	Fr. Frank Budenholzer SVD	Vice President, Dean, Professor
	Sr. Lee Wei Ping SSpS	Professor
4. Biology Department	Fr. Franz Huber SVD	Head, Professor
5. Homeeconomics	Fr. Amaldoss SVD	Assoc. Professor
6. Food and Nutrition	Sr. Urbania SSpS	Head, Professor
7. Textiles & Clothing	Sr. Evamonica SSpS	Head Assoc. Professor
	Sr. Chuang Wen Li, SSpS	Assoc. Professor
	Sr. Maryta Laumann SSpS	Head, Professor

This list contains only the names of the professional academic persons belonging to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is list several other SVD members and SSpS sisters should be mentioned, especially those who were in the service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engaged in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courses, or in charge of the Chaplaincy, the Library, the Finance Offic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the dormitories, or of the University Clinic.

Question About a Catholic University

People, especially abroad, have often asked us if, as a Catholic university, we can and do enroll non-Christian students, and employ non-Christian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In reality, due to the joint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proportion of Christian to non-Christian students 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s the same as at any other university in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parents as well as relatives and friends of our students have sometimes expressed the fear that religion might be forced on the students. In fact,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not obliged to attend any classes in religion, and there are no requirements for attending religious activities. While each of the professors is highly qualified in science, they may or may not be Catholics or Christians.

There is a religious coordinator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to help and advise students or employees if they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religion. The Catholic priests and sisters have always fulfilled their academic duti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and exemplary diligence. Everyone will agree that they knew well when to keep science and religion separate, and they remembered always when it was appropriate to teach one and not the other.

Natural Sciences at a Catholic University

It seems necessary to refer to the question of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There is a question that is commonly asked, namely, "How can a scientist believe in God?" "How can a natural scientist admit that there is a supernatural world?"

As scientists also the Catholic priests and sisters do not take things on simple trust. The scientist's way of knowing is a way of discovering and testing, rediscovering and retesting. Something is true, because other scientists have independently tested and verified it. However, there are other ways of knowing. For example, when a young child gains new knowledge, it does not use the way of science. Rather, the child knows something is true because his mother or father says so. Most religions use a way of knowing much like that of a child. That is, they decide what is true based on authority. I consider myself a scientist. I fully agree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by the scientific method is safe and certain. However, as to obtaining answers to the ultimate questions of our life (Why are we here? Is there an overall purpose of life? What happens after I die?) the religious approach to knowledge is most meaningful and satisfying.

By the presence of SVD priests and SSPS sisters in the 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s, one big prejudice seemingly has been removed: namely, that Science and Religion are in contradiction. They are not. A scientist can also have religious faith. A religious person can also be a qualified natural scientist.

Examples of World Famous Scientists Who Had Religious Faith

Christianity ha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western Europe and many founding fathers of science were devout Christians. They saw God's finger in Nature, and they used theological arguments with their logical methods of science. There are so many examples in history of famous scientists who had a deep faith in God. I will give five examples:

Blaise Pascal (1623-1662), brilliant mathematician who became a devout Christian at the age 31. He believed that it was useless to try to prove the Bible, because it would not help the unbeliever, and the Bible is sterile without Christ.

Isaac Newton (1642-1727) is a fascinating example of a prominent scientist who was also a devout believer. He developed theories of light and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and shares the honor of inventing Calculus with Leibniz.

Michael Faraday, (1791-1867), the leading scientist of his generation, is known for his pioneering work i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electric fields. He was a fully committed Christian who based his religion on a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Louis Pasteur (1822-1895), brilliant chemist who is the founder of physio-chemistry, father of bacteriology, inventor of bio-therapeutics. Pasteur's faith was as genuine as his science. This famous scientist writes about himself: Happy the man who bears within him a divinity, an ideal of beauty and obeys it, an ideal of art, an ideal of science, an ideal of country, and an ideal of the virtues of the Gospel.

These words are carved in stone above his grave in the Institute Pasteur.

George LeMaitre (1894-1966) introduced the Big Bang theory in 1927 and showed that religion and science -- or at least physics -- did not have to be incompatible. LeMaitre, born in Belgium, was a Catholic priest and physicist.

Although it is not often realized, there are many present day scientists who have religious faith, and do not see any contradi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Strength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While I was th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I once attended a meeting with Church leaders of Taiwan. The question was asked, what are the biggest obstacles to the present-day Church in this country. The answer was: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natural sciences in our days. - I believe definitely that there was never a dangerous over-emphasis to the detriment of religion in our Science departments at 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re will be not. I am proud of the dedication and devotion with which the professors in our College educate and train our students and do research to extend the frontiers of knowledge in various fields, in cooperation also with government institutes and local industry in harmony with the whole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s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o continue through 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 and administration to strive towards real knowledge of the pers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of God. (*See the Mission Statement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談如何以福音精神落實輔大的辦學，以回應當今台灣社會的需要

主講人：鮑端磊神父（Father. Daniel J. Bauer SVD）

翻譯：彭桂玲（Judy K.L. Peng）

耶穌福音和社會息息相關。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漠視當今台灣社會的需要，而輔仁如果不能融入當今的台灣社會，就沒有資格冠上「天主教」的稱呼。輔仁為台灣培育人才，他們在社會各界嶄露頭角、有所作為，許多正在就讀輔仁的學子也為這個社會貢獻了一己之力，這些都讓我們身為輔仁的一份子為傲。輔仁特別重視學生人格的養成，我們期許學生能夠關懷生命，明瞭自我的生命在服務他人與承擔公眾利益時得到快樂圓滿。

第一個問題是「福音精神」對於我們在輔仁的工作有何意義？雖然我們的宗教信仰不同，我相信我們仍然擁有相同的福音精神，因為我看到我們許多助教、職員、秘書、行政人員與教師在輔仁所表達的關懷與服務精神，就和耶穌在福音中所表現的一樣，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讓我和你們分享，對我最具意義的三項福音精神：仁慈、人性尊嚴與全人的人文精神。不管我們在輔仁的工作類型如何不同，不管我們的國籍與性別如何不同，我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認同這三項福音精神並進而實踐他們，同時我將指出他們和當今台灣社會需求的相關性。

仁慈

第一項福音精神就是為一切的不幸與苦難付出你的仁慈之心。如果想達成輔仁的教育目標，我們一定要讓學生明白，不是每個人都和他們一樣幸福，到處都有被遺忘或疏忽的家庭與個人，他們各有不同的難題：或生病、或貧窮、或在台灣政治與經濟結構中不被尊重與關心。這些人才是我們要關懷的重點，而我們不必外求，因為他們往往就在我們的身邊。我們的學生、老師、職員、行政人員或工友在最艱難的時候需要我們伸出援手，需要我們理解他們的難處

與不便，需要我們回應解決他們的難題，這些都是我們共同的任務。我常捫心自問，在課堂上如何來協助學生張開他們的眼睛，看見校園、家庭、台灣社會以及世界各地的不幸與痛苦。在專業倫理以及其他課程中，我所選擇的教材、指派給學生的作業、帶領學生討論的議題、教授給學生的智識，都會盡量地碰觸到仁慈這項精神，並教導學生將之融入日常生活當中。而我個人在許多會話課程中、在與學生晤談時候、在走廊上和學生與同仁的交談裡，每一天都有珍貴的機會去關心我身旁的這些人。簡而言之，仁慈就像我們的雙手一樣，與我們如影隨形。

人性尊嚴

我們看見耶穌在福音中不斷地實踐這項精神。對耶穌來說，每一個體都有其與生俱來的尊嚴。有沒有財富並不重要，在社會中所享有的階級不重要，教育的程度或獲致的成功也不重要，每一個人雖然是不同的個體，但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人性尊嚴，對耶穌基督來說都是一樣重要。

我們要怎樣來幫助學生更了解人性尊嚴的涵意？要怎樣來鼓勵學生關心重視人性尊嚴，進而一同來倡導這項福音精神呢？我的答案是，自己要先明白何謂人性尊嚴並以行動表現出來，這樣才能教導他人。

我曾聽某位院長說，我們的學生很少和校園中的工友打招呼或表達謝意，他們打扮得光鮮亮麗，認為自己是大學生，就比工友優越，就比許多為他們服務的輔仁教職員高等。這位同仁認為在宣稱培養耶穌福音精神的天主教大學裡，學生這樣的態度是錯誤的，雖然他本身並非是神職人員。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許多學生並不了解他們身旁這些人的重要性，也不明白「尊嚴」的意義。這些年輕的朋友經過一堆垃圾而視若無睹，把教室的課桌椅弄得亂七八糟，好像他們太有「尊嚴」了，顧不到別人的感覺，沒辦法清理自己造成的髒亂；好像他們的「尊嚴」太高貴了，而無法實踐一些平凡普通的事情。同樣地，有時行政人員或老師在情緒惡劣時苛責秘書、助教或學生，讓他們在眾目睽睽下感到被羞辱。有時助教或秘書會忘記學生常常是年輕愚笨的，需要耐心與親切的指導，而不是嚴詞相向。因此，不管我們是處於哪種位置，各人都有各人的尊嚴。人性尊嚴絕非是抽象的價值觀，耶穌教導我們人性尊嚴是一種對待他人的態度。

這其中還包括了尊重他人的隱私權。八卦學生、同事、主任或院長的私生活也許很有趣，但是我們卻剝奪了他們應有的尊嚴。輔仁理當成為一個讓大家放心傾訴困擾的地方，尤其是學生，我們更應該讓他們敞開心胸，向老師述說自己的健康狀況、家庭問題、或情感難題等，而不害怕自己會變成其他教職員生茶餘飯後的話題，我們應該讓學生免於這種恐懼。

行政人員如何能夠以應有的尊嚴來對待他人？我的答案是，行政人員應當在做出決策之前，和那些會受影響的下屬商量、蒐集相關人士的感覺與意見、提出請求、表現出相互體諒解決分歧的意願以及尊重他人尊嚴的誠意，而不是直接下達命令或要求。這些都是我們要让學生在輔仁看見的例子，讓他們在離開這裡進入社會之後，也能用真誠的人性尊嚴去對待他人。

全人的人文精神

耶穌將每個人都當成全人來對待，祂並未將人當成需要解決的「問題」，並未將人當成一個「案例」或一個「狀況」而已。耶穌在人身上看到感覺與希望、看到夢想與心碎、看到悔恨與喜悅、看到失敗與成功，祂看到每個人的每一個層面，祂將人當成一個整體、一個全人來接受。

許多政治、教育、工商業與醫療機構無法將人當成全人來看待，他們只能給予人一個編號或一張會員卡，或只是將人標誌在時鐘上的一個會面點，輔仁能夠做得比他們好，也必須做得比他們好。正因為輔仁是天主教的學校，我們看到的應該是「人」的整體面，將每個人都視為一個「人」來對待，而非一件「事情」或一個「物體」。每一個人都擁有其無法衡量的珍貴性，我們相信這種人類的珍貴性，並且欣然地接受它。

我們應當追隨耶穌，用我們的關懷與愛心來對待人的感情與希望。為我們服務的人都有他們的另外一面，這些都是我們在工作時幾乎沒見過的。一個工人不只是工人而已，他是有家有子，家人需要他。一位職員、秘書或助教不只是電腦專家或解決問題的人而已，她常常是個需要擔心經濟問題的年輕女孩，也許她會希望結婚生子。我們也應該要記住，學生的年輕與缺點並不會減損其重要性。這表示，我們需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應該以合理的態度去對待自己與

他人。如果我們也能將自己看待成「全人」，讓自己享受生命、家庭、個人志趣，成為一個快樂健康的人，成為一個模範，就能自然而然地影響學生，使他們更能成就自己生命的圓滿與成功，在台灣的社會中成為一個「全人」。

以上這些都是我在思考耶穌福音以及我在輔仁這十五年的生活點滴時所獲得的心得與感想，在這裡提出來跟大家分享。我深深相信耶穌的福音精神可以讓這個世界、我們的輔仁和當今的台灣社會更美好。我並不介意有人將我今天所說的話當成不切實際的空談或無法實現的理想。我是個充滿希望與信心的人，輔仁是我的家、我的生命，我來到這裡是信守自己的選擇。很感謝行政人員、同仁與職員，他們讓我在這裡的分分秒秒都充滿了歡樂。但是，我最感激的是學生，因為他們是輔仁存在的理由。能夠教導學生學習同情、重視所有人的尊嚴，認識成為全人的喜悅，是我們共同擁有的特別任務，我覺得這一切實在太棒了。

[外語學院]

北平輔仁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1927 年建系，是輔仁大學建系最早的三個學系之一。

根據統計，自 1927 年至 1951 年，就讀於輔仁大學各系的 12342 名同學中，西語系占 1454 人，名列全校個系第一。

輔仁大學在台復校

1956 年 7 月 15 日輔大校友正式在台成立校友會，發起復校運動，遂上書教廷呼籲在台復校，獲得教廷之贊同。其後數載，校友會即以復校為奮鬥之目標，與教廷及聖言會保持密切聯繫，並獲得聖言會的會士田耕莘樞機主教

（1890-1967 年）及胡魯士神父和聖言會新總會長（Johann Schütte，任期 1958-1967 年）之積極贊助。

1959 年 12 月 3 日，教廷發表任命于斌總主教為復校首任校長（Rector Magnificus），並蒙受若望廿三世教宗的祝福及其率先捐助之美金十萬元，以為倡導。美國波士頓谷欣（Cardinal Cushing of Boston）樞機主教隨即響應，募集美金一百萬元做為初步建校經費。輔大在台復校的責任不再由聖言會獨自承擔。

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當時是由中國聖職（中國主教團）、耶穌會、聖言會、聖神修女會和道明會聯合承辦。期間，方濟會表示願參與復校過程辦理外語組教學。1960 年，方濟會放棄辦理外語各系，聖言會於是接辦外語組教學。

1960 年 7 月 7 日第二次董事會議決定：由聖言會負責辦理理學院及外語各系。當時的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任命獎百鍊神父（Richard Arens, 1913-1990）為聖言會開辦理學院及外語各系的負責人。

1963 年 10 月 21 日，輔仁大學在新莊復校，有文學院、理學院和法學院三所學院。外國語文系雖隸屬文學院，但是由聖言會負責辦理，分英文和德文兩組。

1964 年成立「法文組」及「西班牙文組」。

1967 年，四組各自獨立成系。

1969 年成立「東方語文學系」，該系於 1984 年改名為「日本語文學系」。同年亦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語言學研究所」。

1972 年，本院五系及語言學研究所向教育部申請成立外國語文學院。1980 年，教育部核准該申請。於是，外國語文學院成立。

1975 年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德國語文學研究所」。
1976 年成立「英國語文學研究所」。
1982 年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
1984 年成立「法國語文學系研究所」。
1988 年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翻譯學研究所」。
1993 年成立「日本語文學研究所」。
1994 年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1995 年成立中華民國第一個「義大利語文學系」，並於翌年正式招生。
2002 年成立西洋古典暨中世紀研究學程。
2005 年，「德國語文學系」改名為「德語語文學系」。

歷任外語學院院長為：

- 1) 孫志文神父 (Arnold Sprenger, 任期 1980-1984 年)
- 2) 歐陽瑋神父 (Edward Vargo, 任期 1984-1990 年)
- 3) 雷孟篤教授 (Jose Ramon Alvarez, 任期 1990-1996 年)
- 4) 林水福教授 (任期 1996-2001)
- 5) 康士林修士 (Nicholas Koss, 任期 2001-2007)
- 6) 黃孟蘭教授 (任期自 2007)

1962 年聖言會團體的成員 (與外語學院相關人士) 及其任務：

1. 蔣百鍊神父 (Richard Arens, 1913-1990 年) 為團體院長；
2. 文訥神父 (Michael Richartz, 1893-1982 年) 為外語各系主任，外語圖書館館長；
3. 齊德芳神父 (Franz Giet, 1902-1993 年) 為外語實習所所長；
4. 柯蘭修女 (Laetifera Corazon 年) 為英文系副教授。

民國五十二年	成立外文系英文組與德文組
民國五十三年	成立外文系法文組與西班牙文組
民國五十六年	四組各自獨立成系
民國五十八年	成立東方語文學系及國內第一個語言學研究所
民國六十一年	本院五系及語言學研究所向教育部申請成立外國語文學院
民國六十四年	成立國內第一個德國語文學研究所
民國六十五年	成立英國語文學研究所
民國六十九年	本院由教育部核准成立國內第一個外國語文學院
民國七十一年	成立國內第一個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
民國七十三年	東方語文學系更名為日本語文學系
民國七十三年	成立法國語文學系研究所
民國七十七年	成立國內第一個翻譯學研究所
民國八十二年	成立日本語文學研究所
民國八十三年	成立國內第一個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民國八十四年	教育部核准本院成立國內第一個義大利語文學系並於八十五學年度正式招生
民國九十一年	設立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
民國九十二年	設立外交學程、翻譯學程
民國九十四年	德國語文學系更名為德語語文學系
民國九十七年	設立英語菁英學程
民國九十八年	外交學程更名為外交與國際事務學程、設立對外華語教學學程、財經法律翻譯學程
民國九十九年	語言學研究所、翻譯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所，整併為跨文化研究所
民國一百零一年	成立日本研究中心

外語學院為落實天主教輔仁大學追求真、善、美、聖之辦學宗旨與目標，透過不同語言了解各國不同文化的特質及優點，致力於全人教育，為社會培育具國際視野與獨立思考能力的國際交流人才。同時在生命教育的理念下，推廣服務學習的精神，提昇學生的人文情操，為社會培育“對人尊重、對事負責”的外語專業人才。

從時代考驗中，看輔大/外語學院 歷史與使命

前言：

輔仁大學的目標與理想 — 「輔仁以友，會友以文」：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發揚【仁 - 生命共同體、天下一家】精神

一、「北京公教大學」(1925--): 當時的時代背景

1. 在基督信仰的教育理想下，提供許多中國青年高等教育。並非只是一所專業學校，而是特別強調中國當時最需要的整體文化和學識。
2. 1927年9月26日正式開學，同年11月23日獲得（北洋）政府認可時，只設有文學院，由預科、中文、歷史和英文四系組成。並於1928年6月11日獲得北京的國民正備府核准，1929年增設理工學院及教育學院。

二、日據佔領時期 1937-1945

1937-1938年輔仁大學的發展

1. 1937年，輔仁大學增購了位於學校附近的恭王府，改為女院。當時候，輔仁大學為唯一在日軍佔領北京時仍然開課的的學校，女院的開設成為輔仁大學的主要計劃。滿足了龐大學生的需求。
2. 人性尊嚴：兩性教育權的推動
3. 「天主教的人生哲學包含人的全部 --- 智力與意志；心靈與性格。一所天主教大學不但要從事知識的探究和傳授，也要注重個人及其性格的發展。」這對於當時的中國格外重要。

三、中國天主教大學的理想

1. 聖言會士任教於輔仁大學時覺察到這個狀況，因此他們抱持著天主教教育是對於當時年輕人最有助益的想法，全神貫注於教育上。雖然身為傳教士，卻少有意圖直接傳教。

2. 一所大學必須具備配合大學的心靈與知性的價值觀。在一所天主教的高等教育機構裡秉持「大公」的意涵，表達出天主教對於科學的態度。所有科學的目標是求真 --- 全然的真理。
3. 大公意涵強調價值的體系，適合作為一種適當的科學訓練和人格發展的文化基礎，也因此保證其科學研究工作與其人格培育不致受到外國的過度影響。真理讓天主教大學總是準備好去承認與接受其他文化裡的真理與美善。這所大學必然會逐漸將它所研究和教授的真理與中國文化的真實價值結合為一，並將與中國的精神相互調合。籍此得以形塑人的思想與意志而不致於變形。
4. 天主教大學以清楚、正確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學，持有正確的價值體系和完整的人生哲學，給予人文學科應有的位。

四、北京輔仁大學教育理想的實現

陳垣校長在一九三五年輔仁大學創學十周年時提出了個目標：

1. 運用最新的西方方法論使中國的史科系統化。
2. 編輯和翻譯工具書籍以促進中國和外國學者的研究工作。
3. 瞭解漢學研究領域的最新發現，透過海外出版和發行來促進國際學術合作。

五、北京輔仁大學教育理想的實現

1. 中國史、國文和英文一開始就是主要課程，隨著理工學院的開辦，輔仁大學的人文與自然科學間達成一種平衡。
2. 為了將所有的學問整合在人生哲學當中，輔仁大學也將邏輯學和倫理學列為必修的通識課程。
3. 輔仁大學教育的目的不是以獲取知識為第一順位，形塑學生的品格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嚴謹的學風、著重學習和培養人格是輔仁大學的基本要則。

六、輔仁大學教育理念和陳垣的落實

按照吳梓明先生的看法，陳垣的教學方法有四個特點：

1. 注重基礎知識的教學

陳垣要求的「目的是使學生既能掌握必要的語文知識（包括古文基礎知識），又要培養較高水平的寫作能力。」他認為，學好國文，搞好「大一國文」教學，也是一個教師搞好歷史和其他國學課程教學的基礎。

2. 愛護青年學生，重視課堂教學

陳垣常教導輔仁大學的教師，對待青年學生，要多給予愛護、關心和幫助。他曾說：「初教書，先要站得穩，無問題，乃安心。認真多獎勵（即盡心之謂），要學生有精神，生趣味為要。凡說學生懶學生鬧者，彼教者不得法之過也。」所以，陳垣把直接指導學生的課堂，看做是教師搞好教學的關鍵環節：準時上課，全年的講授和每堂課詳細和豐富的內容，有預定的教學的計劃，在他的影響下輔仁大學的教師們都能積極地搞好課堂教學。

3. 重啓發，培養學生的獨立科研能力

陳垣在致學方面強調兩點：入手的方法和識別能力。有方法，學生就可以自行活動，識別力要隨讀書的增多不斷累積。

4. 重國學，激發學生愛國熱忱

七、外語學院歷史

1. 1950年，4月初，于斌校長返國成立校董會，推田耕莘樞機主教為董事長，正式向教育部申請復校。25日教育部核准復校。
2. 1964年成立「法文組」及「西班牙文組」。
3. 1967年，四組各自獨立成系。
4. 1969年成立「東方語文學系」，該系於1984年改名為「日本語文學系」。同年亦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語言學研究所」。
5. 1972年，本院五系及語言學研究所向教育部申請成立外國語文學院。1980年，教育部核准該申請。於是，外國語文學院成立。(1971，8784)
6. 1975年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德國語文學研究所」。
7. 1976年成立「英國語文學研究所」。
8. 1982年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
9. 1984年成立「法國語文學系研究所」。
10. 1988年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翻譯學研究所」。
11. 1993年成立「日本語文學研究所」。

12. 1994 年成立中華民國第一所「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13. 1995 年成立中華民國第一個「義大利語文學系」，並於翌年正式招生。
14. 2002 年成立西洋古典暨中世紀研究學程。
15. 2005 年，「德國語文學系」改名為「德語語文學系」。

八、歷任外語學院院長

1. 孫志文神父（Arnold Sprenger，任期 1980-1984 年）
2. 歐陽瑋神父（Edward Vargo，任期 1984-1990 年）
3. 雷孟篤教授（Jose Ramon Alvarez，任期 1990-1996 年）
4. 林水福教授（任期 1996-2001）
5. 康士林修士（Nicholas Koss，任期 2001-2007）
6. 黃孟蘭教授（任期自 2007）

九、外語學院辦學目標

1. 落實天主教輔仁大學追求真、善、美、聖之辦學宗旨與目標。
2. 透過不同語言了解各國不同文化的特質及優點。
3. 致力於全人教育，為社會培育具國際視野與獨立思考能力的國際交流人才。
4. 生命教育的理念下，推廣服務學習的精神，提昇學生的人文情操，為社會培育“對人尊重、對事負責”的外語專業人才。

十、外語學院之發展理念

1. 提昇教師專業能力以強化學生之專業知能。
2. 充實教學設備以營造良好的外語學習環境。
3.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開拓師生之國際視野。
4. 透過課外延伸活動提昇外語表達能力。
5. 透過服務學習，培育人文關懷。

十一、孫志文神父與台灣外語教學教育之淵源

1. 以創新的方式教授英文。方法為：「接近學生，幫助他們」；提出「小老師」制；打破「老師講，學生聽」的傳統，引導學生由被動化為主動，主動去蒐集資料，自己準備課業。
2. 孫志文神父當時的建議：
 - I. 教師們在課堂上應注意學生的反應
 - II. 學生的行為舉止是否正常
 - III. 為何總是教師在講話
 - IV. 課程內容是否合手學生的年齡和興趣
 - V. 為何沒有鼓勵學生採取主動性去做研究
 - VI. 學生是否需要那麼多的考試
 - VII. 考試對學生心理上有什麼影響
 - VIII. 學生為何沒有被教導認識真正的社會，教材應較生活化
 - IX. 學生在教家內的行為舉止為何和他們在外的生活有如此大的差別
3. 孫志文神父之教學目標：找山東西方相異之處；作科學與科技之研究；愛護學生。
4. 孫志文神父之教學思想：用哲學的眼光來辦外語教學；以哲學的眼光來看世界。

教育 - 在愛中追求真理

天主教大學產生於天主教會的核心，它有一個長久的傳統，一直被視為充滿創造力，並為人類福祉傳播知識的中心。它的任務是從事研究、教學、教育那些熱愛知識並自由與教師相處的學生。它和其他大學共同分享 聖奧斯定所珍惜的“真理之喜樂”。其特有使命是「藉著理性的努力，把兩個容易被看成「對立」、甚至「矛盾」的存有層面，生活化的結合在一起」。天主教大學是基督精神在每種文化中結出豐碩果實的活生生而充滿希望的標記。它帶領人們追求真理，也把知識傳給年輕人，使之學習謹慎思考，並以正確的行動，完善地為人類服務。（天主教大學憲章）

英文系

**系史: Gospel Witness to Service and Collaboration - The SVD – SSpS Mission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服務與合作之福音性見證—

聖言會與聖神會於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英文系之共同使命

by Daniel J. Bauer 鮑端磊

Content

Founding Years: 1963-1976

Years of Steady Growth: 1976-1990

Years of the New Taiwan: 1990-2003

Imagine you are standing before a large wall in a pleasantly decorated room. On that wall, you see photographs and drawings of people involved over a span of nearly forty years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Taipei, Taiwan.

Now imagine that each of these persons in the pictures is a Divine Word (SVD) Missionary Brother or priest or a Sister of the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SSpS), often called the Holy Spirit Sisters. *Then* what do you see?

You see men and women of several nationalities working as a team as they play exciting an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historic story of Fu Jen's English Department. That story will be forty years old on October 21, 2003.

These pages look back on SVD and SSpS participation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Fu Jen by dividing the years into three segments. The divisions are, of course, arbitrary, for they mark only the broad outlines of eras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 any number of ways. We will view these years of SVD – SSpS service according to Founding Years (1963-1976), Years of Steady Growth (1976-1990), and Years of the New Taiwan (1990-2003).

Founding Years: 1963 – 1976

In the early 1960s, Father Richard Arens, the founding Dean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Fu Jen, asked Father Peter Venne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lead it as its first chairman. From the beginning, it was, to say the least, a daunting task. Father Venne had to recruit and organize a faculty ready to meet the needs of an incoming class of some 50 Chinese students in 1964, presumably few of whom could speak more than the most rudimentary English. Father Venne knew that after its first year, his faculty would have to quickly expand in order to teach the number of classes necessary for the department as it grew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four years. After all, by 1968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ould be home for some 200 students.

Language with an appreciation for “political correctness” was still many years away. The day would come when his successors would call themselves a “chairperson” or simply “a chair.” Father Peter Venne, a German SVD priest with a doctorate in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Zürich, was quite literally the chairman of Fu Jen’s English Department.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he was also the department’s father.

One wonders if the department’s first chair ever imagined an SSpS would one day take his place in the spacious office at the end of the 3rd floor corridor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hat Holy Spirit Sister, was, of course, Sister Heliena Krenn,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critic of the writer Joseph Conrad. Sister Heliena chaired the Department from 1983 – 1988 and also followed Father Venne as editor of *Fu Jen Studies - -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 Jen Studies* is an annual journal of scholarly studies also founded by Father Venne in the early years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fter several years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 in the College Library, in the late 1970s and till the end of the 90s, Sister Heliena taught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nversation and composition, guided readings, Bible as Literature, 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and a variety of graduate seminars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When he began to turn the wheels that ra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 1964, surely Father Venne had no way to visualize the exciting story ahead. Could he have imagined the department would eventually include an undergraduate Bachelor of Arts program for approximately 320 students a year, with a faculty of some 25

instructors, not to mention a graduate institute offering Master of Arts degrees? (The master's program was begun by department chair Father Pierre Demers, S.J.) Also, Father Venne would have needed a crystal ball to look into the future and see that his successors would include the Jesuit Father Demers and a line of gifted lay scholars, one of whom was once an English Department student herself, Joyce Chi-hui Liu.

Department history shows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VD and SSpS missionaries worked in close daily contact with their colleagues of many nations and backgrounds. Some of the colleagues were members of other religious orders, such as Father Sheridan and Sister Rose Boudreau SP, and Father Demers and Father Sorrel, both Jesuits. Several colleagues were Benedictines, such as Brother Nicholas Koss, who went on to become a full professor and Dean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nd Fathers Robert Roche and Paul Maher. Most of the colleagues for the Holy Spirit Sisters and SVDs were lay people. Some were Catholic or Protestant in spiritual beliefs, but most were not.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founding years saw themselves as members of a team of educators, work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professionals who were devoted to the needs of their students and the larger university community at Fu Jen. For forty years, service and collaboration have been ideals and goals for which to strive for SVD and SSpS missionaries in Fu Jen's English Department.

The years of a rapidly developing Taiwan were still some distance in the future when Father Venne drew up his first class schedules and faculty lists in the mid-1960s. Thus, for faculty members he was especially indebted to the contribution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who served basic student needs with skill and enthusiasm, even if their grasp of Mandarin Chinese left something to be desired. What did that matter? From 1964 till the present, Fu Jen's English Department has been known all over Taiwan for insisting on English a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Even today, top scholars at respected public universities express public recognition for the quality of Fu Jen's education in English language.

The Holy Spirit Sisters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unding years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Sister Agatha Bramkamp from Germany, who at that time was called Sister Gertrude, was among the first and most active of the Sisters on the faculty. Sister Gertrude taught courses in phonetics, linguistics,

English conversation, and English composition. With other Holy Spirit Sisters, she also offered a course called “Womanhood,” which helped co-eds to develop self-confidence and self-understanding as educated young women who might well take on future careers in education, business or industry while still devoting themselves to family life. Sister Gertrude worked closely with SVD Father Arnold Sprenger in the late 1960s in offering government sponsored “How to Teach English” seminars for high school teachers throughout the island. During that time, she was reputedly the first non-Chinese woman to enter aboriginal villages in the mountain heights of Tefuyeh and Dapang, where she made tape recordings and gathered research for the stud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Chou tribe.

Sister Gertrude left Fu Jen to study German Literature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from 1974-75, and continued at Cornell University till 1984, where she finished her 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riter Ebner Eschenbach. She returned to Fu Jen in 1985 and continues to teach and do research in the German Department. She still offers occasional courses in the master’s program fo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other key player in the early story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as Holy Spirit Sister Cora Colett from the Philippines. Sister Cora was popularly known as Sister Laetifera, meaning “One Who Bears Joy.”

Sister Laetifera’s unique gift of joy centered on her life long passion for drama and the performing arts. After service at Fu Jen from 1965 till 1974, she studied theater at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riting her dissertation on Heinrich Ibsen. University theater productions in English are fairly common in today’s Taiwan, but that wasn’t the case in the late 1960s and 1970s. During her teaching days at Fu Jen from 1965 – 1973, Sister Laetifera’s lively and well crafted productions contributed much to winning a national reputation fo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s a place where foreigners and Chinese worked together to offer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perform world famous dramatic scripts in English.

This contribution to the teaching and sharing of the performing arts in the department was historic and immensely important. Drama has continued to be a mainstay in student activities not only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but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Fu Jen, which in 2003

comprises six departments. Interest in dramatic performances was an important impetu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autiful theater and conference center in the new Divine Word Building (Sheng Yen Lou) in the late 1990s. (The theater and conference center is named for Father Arens SVD.) Locally acclaimed director and professor of drama Stan Lai was one of Sister Laetifera's early student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Noted Taipei critic and playwright Casey Chi and the painter-poet-professor Lo Ching are also former English Department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who she influenced.

Student drama productions flourished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 the 1970s and throughout the 80s under the enthusiastic guidance of faculty members Donna Schaefer, Richard Cameron, and Father Edward Vargo SVD. During the 1990s, the department welcomed the services of Dr. Lyn Scott as College theater manager, English Department drama director, and instructor of performing arts. Doris Li-wen Chang, Margarete O'Connor, and Cecelia Hsueh-chen Liu have also made important recent contributions in theater direction for the department. The early vision and energetic spirit of Sister Laetifera, nurtured by collaboration between SVD and SSps missionaries with their colleagues, continues in the department till today.

When Father Venne developed his first curricula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 the mid-1960s, he needed to design course offerings that would meet an unusually wide spectrum of needs. In the opening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people of Taiwan consider English language to be an important and even vital language. Young people regularly flock to "cram schools" of various quality, which are called "puhsipans," to sharpen their English ability. For better or worse, cable television and Hollywood movies have made English popular or, as our young friends say, "hot."

Back in 1964 and extending into the late 70s however, English in Taiwan was a very different story. For many in Taiwan at that time, mastery of English seemed an all but impossible dream. American military personnel dotted the residential and business neighborhoods of Taipei, and English language was associated in the public mind with a culture far distant from the shores of Taiwan. Two small daily English newspapers struggled to survive as they served the needs of the expatriate English

speaking community, and when the American military left in the late 70s, media and government leaders speculated openly that Taiwan might lose its one and only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radio station. In time, after the departure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in 1979, station ICR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adio in Taiwan) came into being. In 2003, Taiwan enjoys the benefits of healthy competition between three daily English newspapers, each with reported readerships of approximately 100,000.

In the opening years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no need was more urgent for Father Venne than that of teachers of basic course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introductions to various segment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ather Venne saw any courses that kept students looking at English words and using them as useful. Early offerings in English pronunciation, travel English, business English, speech and debate, and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nguistics were common. Of course, offerings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and composition and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were plentiful.

For these basic courses, SSpS Sister Anna Marie and Sister Ellen offered valuable service. Their cheerful personalities and American accents seemed like gifts from heaven for department students especially thirsty for so called American accented pronunciation. Sister Ellen taught at Fu Jen for ten years. Father Arnold Sprenger SVD, chair of the German Department, also worked double time as a part time professor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is interest and research work in lingu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were valued areas of expertise.

In the founding years of the department, Father Joseph Stier SVD joined these Sisters on the faculty. As a young priest, Father Stier had served in mainland China and had spent time in a labor camp under the control of Japanese soldiers. In the mid-1970s, his northern Kentucky drawl both fascinated and confused students in an array of conversation and composition courses. Several of his students living in Taipei still treasure recollections of his enthusiastic rehearsals for the popular play, *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 which the English Department staged in 1978. Father Stier passed away of heart disease one year later.

Another key player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as a dedicated and colorful young SVD Brother from Philadelphia named Brother Norbert Hogan. Brother Norbert later took on his birth name and became known to

thousands of Fu Jen students as “Brother Pat.”

Brother Pat Hogan served at Fu Jen for more years than any American SVD, Brother or priest. He began in the mid-1960s as an assistant and then administrator of the Finance Office, and went on to teach language courses in the department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 work in linguistic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1970s. He returned to Taiwan ten years later and taught for another sixteen years in the Linguistics M.A. and General English program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guiding the Language Center as its Director. (The Language Center offers course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aiwanese languages to foreign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rother Pat was widely known for founding the Ecology Club (a first on Taiwan’s university campuses), in which several English department students were active. He also sponsored study trips abroad for Fu Jen students. Though no longer a member of the department faculty in the 1980s, Brother Pat was still respected for the publication of a set of English language tape recordings, which matched a textbook he had earlier written on English used in police and legal work.

Father Ray Lenn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another SVD who taught in the department in the late 60s. He served as well as a golden-voiced recorder in the College language laboratory.

As he sketched course plans and recruited faculty in the founding years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Father Venne had to meet basic interests among his students for fundamental conversation and writing classes. After the opening years rolled by, however, he beca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students with obvious intellectual promise who hoped to go on for doctoral work abroad and return to teach in the Taiwan educational system. These were students keenly interested in English, American, and various area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ome of these department students hoped to enter other discipline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such as art, cultural hist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anted to prepare these young people for careers that demanded a wide background of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In the early 1970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cours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mythology,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s well as more comprehensive surveys in masterpiece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ather Venn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courses in the department that dealt with the humanities. Sister Heliena Krenn SSpS and Father Edward Vargo SVD were among the professors who made this development possible. A number of foreign faculty were also valuable contributors to these efforts, including Donna Schaefer, Father Sheridan and Father Pierre Demers, S.J. Father Demers went on to serve as department chair and founder of the master's program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80s.

Years of Steady Growth: 1976 – 1990

Father Edward P. Vargo SVD came to Fu Jen University in 1974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Americ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nd an impressive list of dramatic and multimedia productions from his earlier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years in the 1960s and early 70s at Divine Word Seminary in Techny, Illinois and Divine Word College, Epworth, Iowa, seemed perfect preparation for a long and rich career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Fu Jen. When he moved to Assumption University in Bangkok, Thailand twenty years later, Father Vargo left behind him a legacy of which he and th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could be justly proud.

With a Ph.D. in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Father Vargo slipped quickly into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eek and Roman Literature, Film Arts, Performing Arts, and a variety of course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his later years he also taught Science Fiction and Film. His graduate institute courses in the department included seminars on John Updike, the subject of his Ph.D. dissertation, and William Faulkner and other major writers.

Father Vargo's experience and interest in theater were deep. At Divine Word Seminary in Techny, Illinois and later at Divine Word College, Epworth, Iowa, in addition to musical – media productions, he had directed six dramatic performances, including T. S. Eliot's *Murder in the Cathedral*, Paddy Chayefsky's *Gideon*, and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Sister Laetifera's earlier groundwork in English Department drama had sown seeds that Father Vargo would later bring to fruition in student dramas such as Moliere's *The Would-Be Gentleman* and Euripides's *The Trojan Women*.

Many at Fu Jen still remember Father Vargo's contributions not only to the

English Department, but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large, where he served as dean from 1984-1990. He was instrumental in beginning a series of College conferences o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and in founding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Years of the New Taiwan: 1990 – 2003

Father Vargo was an important mentor for a young SVD priest who first joined Fu Jen's English Department as an instructor in the late 1970s. Father Daniel J. Bauer had met him while a student in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at Divine Word College in Epworth, Iowa. The then-seminarian even appeared in a minor role in the earlier mentioned drama, *Gideon*. Father Bauer was a department colleague of both Father Vargo and Father Stier from 1977 to 1980.

Father Bauer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0 for doctoral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 Madison, and re-joined the department faculty in the fall of 1988. His Ph.D. dissertation wa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atirical portraiture in Wu Ching Tze's famous Chinese classic, Ju-lin Wai-shih and Henry Fielding's *Tom Jones*. He continues to teach a variety of courses useful for students in the undergraduate and master's program in the department. In recent years Father Bauer has been active in local Chinese-English and journalistic circles. His weekly Sunday column in the English newspaper the *China Post* views a issues related to society, politics, culture and education.

Father James Liebner SVD was an active and popular department colleague in the late 1990s. He served at Fu Jen for four years as instructor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nglish conversation and composition, and was noted for his skills as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Department students with a love for costumes and a festive American style Halloween party have this missionary to thank for the annual Students Association Halloween party, which Liebner helped to institute as an off shoot of his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 (In the inaugural Halloween party, Father Liebner dressed up as Huck Finn from the classic novel by Mark Twain.) He continues to teach today in his SVD ministry in mainland China.

Both the society and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SVD and SSps missionaries knew in the founding years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changed radically by the time the

late 1980s arrived. Martial law was lifted in 1987, freedom of the press gave birth to a veritable cultural explosion, and democracy arrived with at times tumultuous results for the island. Taiwan's economy also saw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1980s, even as its society struggled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values of respect for elders,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hildren, and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l standards.

Life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changed with the times from the late 80s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the 1990s. Religious missionaries who had been valued partners with the SVDs and SSpS in the department became fewer in number, and gifted lay colleagues moved into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both on the Fu Jen campus and in other local universities. Several lay missionaries and members of secular religious institutes, as for example Belen Sy, became beloved faculty members. Former students of Sister Heliena, Brother Pat, and Fathers Venne, Stier, Vargo and Bauer returned to Taiwan with doctorates or master's degrees in literature or linguistics, and joined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s bright young professors.

The mid-1990s saw the entir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hurrying to adapt to a spate of experiments and revolutionary new policies announc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s became more complex as decentralization occurred, and more power was given to individual faculty members in hiring and course planning decisions. Suddenly high school seniors all over Taiwan found it possible to enter universities not only by means of the traditional two day written examination, but by an exciting array of channels called by attractive names such as "Recommended Student," and "Direct Entry." Among the SSpS and SVDs, these developments affected Sister Heliena and Father Bauer, the most. Both were called upon to work more closely than ever with colleagues on faculty committees for these new admission procedures.

In the year 2003 only one SSpS and one SVD, Sister Agatha and Father Bauer, taught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Fu Jen. They continued to serve with pride and enthusiasm, however, grateful for their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ame before them, or who served beside them as colleagues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aiwan has seen incredible changes in its society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since the SVD – SSpS story began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Fu Jen thirty-nine years ago, the day to day

duties, except for high profile administrative posts, have not changed so very much. We continue to prepare our classes, to teach, to do translation, writing, and research, to participate on various committees, and to counsel.

Our SVD – SSPS mission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Taipei, Taiwan has always been a call to service and collaboration. We continue to do all we can to lend a helping hand for our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in these, the early days of the 21st century. It is our privilege to accompany our friends who share our love for young peopl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n the campus of Fu Jen.

典範人物

文訥神父 Fr. Peter Venne, SVD (1913.01.25 ~ 2009.03.25)

文訥神父

Fr. Peter Venne, SVD
(1913.01.25 ~ 2009.0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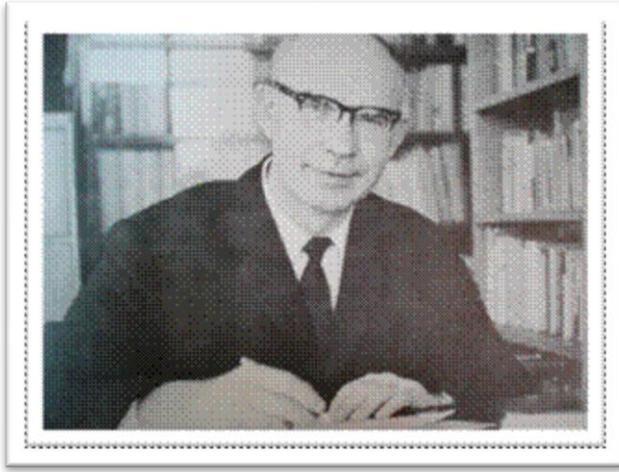


- 1913. 2. 25 出生於德國 Varense11(居特斯洛縣)
- 1933 入聖言會
- 1939 晉鐸
- 1940~1946 在北平輔仁大學(學習中文及教德文)
- 1947~1951 在瑞士蘇黎大學攻讀英國文學、中文及法國文學，並於 1951 年取得英文博士學位
- 1952~1961 於日本名古屋聖言會南山大學教英文及德文
- 1962~1987 服務於輔大英文系及德文系
- 1963~1974 為英文系在台復校第一任系主任
- 1979~1981 擔任德研所所長
- 1987 因健康情況而退休返德，先抵德國聖奧古斯丁的聖言會修道院，養病之餘仍積極參與當地的中國中心及華裔學志研究院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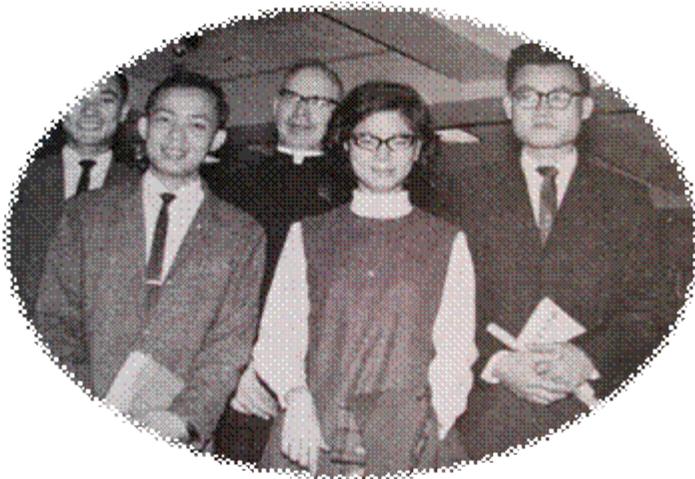
1999 轉往德國薩爾 SanktWendel 聖言會修道院所屬安養院
2009. 3. 25 逝世，享年 96 歲

復校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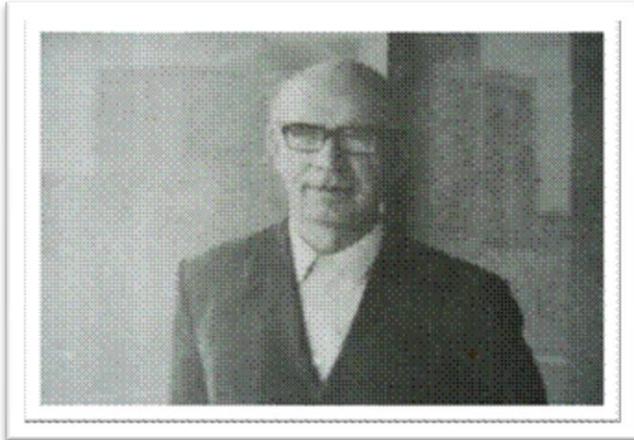
1962 年，來台協助復校工作。



1963 年，成立外文系並任英文組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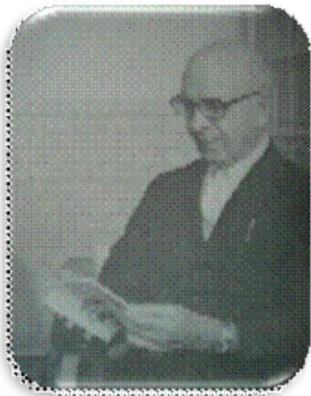


懷念師長



看完了文訥老神父的生平點滴，使我不禁身陷深深的回憶中，文神父的謙虛及從不麻煩人，還有樂於助人的美德更是讓我印象深刻，我記得那時候，他有時是因為上課或開會而延誤了用餐的時間，他會到廚房用靦腆又不好意思說，我還沒用餐可以給我一點簡單的食物嗎？我依稀記得他最愛吃的是馬鈴薯炒蛋加上一點培根，餐完之後還親自將餐具送返廚房，用滿足又誠懇的神情向你道謝，他就是一個如此謙虛又懂得尊重他人的人，還有我想你當會記得當年神父們的零用金祇有區區 400 元可是他從不自己花用，而是去幫助那些家境清寒的學生們，在輔大工作將近 40 年跟神父及修士們在生活有較近身的接觸，文神父確實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及懷念的一位神父，願他安息主懷永享主恩。

陳義民



1952 到 1962 年文訥神父在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服務，
1962 年到 1987 年在台灣輔大服務。

文訥神父在德國、瑞士、中國、美國、日本和台灣生活過，可惜他沒有留下回憶錄來記載他無怨無悔的、為教會和教學奉獻的、將進一個世紀的人生。



文訥神父最常做的事就是替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的刊物校稿，也替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或學生校對德文和英文論文，並且提出他的看法。



文訥神父很喜歡展示輔大學生的相片和明信片，每一張相片和明信片他都有故事可以敘述。。

李素美 修女 Sr. Rose Michelle Boudreau, SP. (1928-2004)

李素美 修女

Sr. Rose Michelle Boudreau, SP.(1928-2004)

生於：1928年4月29日，芝加哥，歿於：2004年12月4日，1947年7月22日加入團體，1950年1月23日宣誓，1955年終身誓約。

1972年取得全國加州舊金山大學 Applied Spirituality 碩士，1970取得美國北伊利諾大學藝術碩士，1963年於美國印第安那 St. Mary-of-the-Woods 學院取得教育學士。



1950年起擔任教職，1975-1980年擔任美國奧克拉荷馬州 Corpus Christi School 的校長，以及 Perria 教區之 Associate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芝加哥 Archdiocesan schools 之 curriculum director。

1980抵台，曾於台中靜宜女子學院擔任教職，1981年9月起於輔仁大學英文系擔任教職，1983年起為英文系專任講師，1992年8月1日於輔仁大學英文系退休後返回全國。

所授課程：

- 聖經與生活 Bible and Life
- 人生哲學 Philosophy of Life
- 創意寫作 Senior Creative Writing
- 西方文明史 Western Civilization
- 藝術鑑賞 Appreciation of Arts
- 空間藝術和時間藝術 Space Arts & Time Arts
- 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謝德樂 老師 Ms Donna Schaefer (1931~ 2001)

Ms. Donna Schaefer 謝德樂老師 (1931-2001)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onors : Albert Howard Fellowship Phi Beta Kappa

Born on March 13, 1931

Passed away on December 27, 2001.

Taught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from 1972 to 1995.

Ms. Donna Schaefer 於 1972 年起任教於輔仁大學，1973 年起於英文系擔任專任副教授，1995 年八月於英文系退休，1996 年九月返美。Ms. Donna Schaefer graduated Magna Cum Laud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Before teaching in Taiwan, She taught English Literature at La Roche College (1964-1972) and Mercyhurst College in Pennsylvania (1961-1964).

Ms. Schaefer 在輔大任教期間，主要教授西洋文學概論、美國文學、英國文學、歐洲文學、文學批評等課程，並擔任夜間部英文系系主任 (1979-1995)，為當時的夜間部英文系制定了健全的英文語言/文學課程，建立英詩朗誦、英語戲劇比賽等課外活動傳統、對夜間部學生影響甚鉅。

在教學上，Ms. Donna Schaefer 教授的文學科目既廣且多樣性，講課十分認真嚴謹，講解條理分明，一直是深受學生推崇與愛戴的老師。她對學生一如她的子女，只要學生願意分享任何心情故事，隨時都可以去她的輔園宿舍喝咖啡或茶，談生活、生命、文學。Ms. Donna Schaefer 不僅是經師，更是人師。她在許多人的生命中都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

Ms. Donna Schaefer 擔任英文系年度大戲、畢業公演導演，數十年如一日，其導的戲，無論是音樂、舞蹈所呈現的效果，都是藝術的饗宴。藉著每次戲劇的排練及演出，帶領學生許多知性、感性的啟發與成長。其所執導的劇目多達 25 齣，成果輝煌。

1974	<i>Trifles / by Glaspell</i> <i>The still Alarm / by Kaufman</i>
1975	<i>Suppressed Desires / by Glaspell</i> <i>The More the Merrier</i>
1976	<i>You're a Good Man, Charlie Brown / by Clark Gesner</i> <i>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 by Shakespeare (co-directed with Cameron)</i>
1977	<i>Man of La Mancha / by Wasserman</i>
1978	<i>My Fair Lady / by Lerner & Loewe</i> <i>Four one-act plays: The More the Merrier, The Will, The Still Alarm and Overtones</i>
1981	<i>Camelot / by Lerner & Loewe</i>
1982	<i>The Mikado / by Gilbert & Sullivan</i>
1984	<i>The Pirates of Penzance / by Gilbert & Sullivan</i> <i>The Mousetrap / by Agatha Christie</i>
1985	<i>Fiddler on the Roof / by Joseph Stein & Jerry Bock</i> <i>Blithe Spirit / by Noel Coward</i> <i>The More the Merrier</i>
1986	<i>The Potting Shed / by Graham Greene</i>
1987	<i>The Medium & The Telephone/ by Gian Carlo Menotti</i>
1988	<i>The Pirates of Pezance / by Gilbert & Sullivan</i>
1989	<i>The Beggar's Opera / by John Gay</i>
1990	<i>Iolanthe / by Gilbert & Sullivan</i>
1991	<i>Black Comedy / by Peter Shaffer</i>
1992	<i>H.M.S. Pinafore or The Lass that Loved a Sailor / by Gilbert & Sullivan</i>
1993	<i>Dark of the Moon / by Richarson & Berney</i>
1994	<i>Go Back for Murder / by Agatha Christie</i>
1995	<i>The Good Doctor / by Neil Simon</i>

Ms. Donna Schaefer 以老師、戲劇導演、及英文系系主任的身份在輔大服務了二十四年之久。我們英文系全體師生都深深感念這位曾經為大家付出許多的傑出女士。

賀永光 修女 Sr. Heliena Krenn



歐陽瑋 老師

德語系
系史

The German Department at Fu Jen University : A Wellspring of Service and Learning

The German Department at Fu Jen University : A Wellspring of Service and Learning

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

Sr. Agathe Bramkamp, SSpS

裴德 修女

Education - a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The basic concerns of education – “to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and “to make the search a life-long fruitful development of one’s talents and gifts in the service of others” – can summarize the ardent endeavor of the founding years of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All the efforts put in subsequently for survival, expansion and quality education beyond the beginning years and every step on the way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took its clue from this basic philosophy. One can truly say that these principles were upheld as the *raison d’être* in the sometimes hard struggle for fair consideration within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 A basic educational insight instilled from the beginning, still holds true today: that constant care for and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the challenge to unlock the best in them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our vision as educators in a catholic institution. No doubt, the situa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greatly changed in Taiwan, but these values are still essential. As we look at our relatively short history we realize that an honest educational response to the quick leaps of change in society has been our challenge from the beginning and was at the same time the source of growth and maturing.

Re – founding the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was among the first departments established in 1963 at the re-founding of Fu Jen University. As soon as the planning for the university began, the leadership of the SVD began to recruit from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young people for the university. They appointed them for studies in various field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many tasks ahead. Arnold Sprenger, SVD, who received such an appointment from the then Superior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Fr. Schütte, writes: “Originally, it seems, there were plans to commission the Franciscan Ord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s of the Foreign Languages. When they declined, Fr. Schütte committed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to take up this challenge. In a short time a teaching staff for the future English, German, French, and Spanish departments had to be assembled or trained. In this connection I received my mandate for studies in German and Linguistics from Fr. Schütte personally.” A similar situation fac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SSpS who had agreed to collaborate again with the SVD as they had done in the first Fu Jen University in Peking. Sr. Fieldis Gobbel and Sr. Agathe Bramkamp, both later on long time teachers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especially in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knew about their future assignment in 1962 and in 1964 respectively.

Why a department of German? What contributions could it make to the new institution, its student population, and society at large? There was no other such department in Taiwan at the tim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rough its lively trade activities brought about her opening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increasing need for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ideas as well as experience i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matters, seemed to cal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ormal program in the academic setting which would address this need. From the beginning the idea was alive that a culture comes into its own by reflecting on itself in the light of other cultures. This was seen as particularly relevant for Taiwan as it tried to become a player on the world stage and rapid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many countries and many economies. The need for openness toward the world and the

need for learning to understand other cultures other ways of thinking as a road to one's own rich heritage and as a way to share it with others, this was an openly promulgated stance in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when there was no general talking about multi-cultural settings or globalization ye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partment of German was, however, not without history as far as Fu Jen University was concerned. During its time in Peking the university has developed a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German, established in 1942, which in 1948 had become a divis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his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German had had its beginnings in German courses for business people. An entry in the university's chronicle of 1938 states that 349 students of German enrolled in the various classes taught i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high schools. A note of success is found in the *Fu Jen Magazine* of 1938, reporting on a "German Contest in Peking (organized by the Sino-German Association). Four Fu Jen students who took classes under the sinologist Dr. Gustav Ecke, professor of German and German Literature, gained 4 of the 5 prizes." The students were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Fr. Franz Giet, SVD, first chairperson

The new beginning of a German program in Fu Jen, Hinchuang, was part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group" together with English and a year later (1964) with French and Spanish, that 1972 was to become the firs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Taiwan. In 1967 when the English and German sections gained the status of full -fledged undergraduate departments. The German department came to be known under the name: Department of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incoming students would have no previous knowledge in the German language at all, unlike the student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ho could start their undergraduate studies with a basic knowledge of English, the most pressing task was to find enough qualified teachers for the task of starting from scratch and rapidly



building up a College curriculum.

The First Y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new venture were some remarkable people who set the stage. The first chairperson was Professor Dr. Franz Giet, SVD. He had done extensive research in the phonolog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various dialects during his years in China. He

had earned his degree in Phone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Bonn, had worked at Nanzan University in Japan and brought – unique for Taiwan –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anguage-lab technology to Fu Jen. A few months later, Fr. Ai Wen, SVD (艾文, 1925-1983) arrived for the first semester. These two, Dr. Giet as chairperson and Fr. Ai Wen as trained teacher of German and all -round helper accomplished the pioneering feat of getting the department going, enlisting the help of various teachers available in Taipei at the time. It was a humble beginning with even essentials not being readily available, as Fr. Sprenger writes in his reflection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Fu Jen and the 16th of the department in 1978. There was no experience with the Taiwanese educational system, there were no suitable textbooks available, there were few if any supporting teaching materials, no library to speak of, no contacts with Germany available to the students, and there were many other shortcomings, which made the beginning a difficult task. It can safely be said that the pioneers made great personal efforts and enthusiastically used all imaginable venues to gather materials and even write it or record it themselves. At the very beginning, for instance, were the personal contacts they established with visits to the DFG (the German equivalent of the NSC), the Goethe Institute and its teaching supply institution Internationes, with the Europe Institute and the Spinger Verlag. Since then the German department could annually submit lists with requested books, tapes and videos, free subscription to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for years. These gifts for the general library and the audio-visual section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steady development and enlargement of the teaching facilities. Fr.

Sprenger states that even in the early years some good results were achieved. Already from the first graduating class in 1967 several students went for further studies to Germany; in the early seventies our own graduates started to teach at Fu Jen as well as at other departments of German. When in 1969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was established some of the first students came from the German department. When three years later, in 1972, Hsü Chun-Fang, a former student of the German department, received his MA degree in Linguistics, it was proudly recorded in the department journal *Die Brücke*. Over the years a rather stable and dedicated teaching staff ensured steady progress.

From the beginning, too, a welcoming spirit for various visitors was present. In 1967 for instance, the department hosted the well-known author Stefan Andres to read from his works. In 1970 the playwright Inge Langer visited, and many guests of the German Cultural Center in Taipei also paid a visit to the German department for an encounter with faculty and students. Many visitors took interest in making Fu Jen University known abroad and, were delighted in finding it mentioned in German publications.

The Student Population

The students coming into the German department had not named German as their favored subject, but only as one possibility among many others. They were ranked according to their test scores and thus gained their place and subject of studies through the results of the joint entrance examination. Till the mid-seventies 40 places were allotted each year for the German department. Only three times within the first eleven years was this number reached, once, in 1969, 43 freshmen entered. While the number in most years was in the high 30ies, in 1965 only 29 new students came in. It was a common phenomenon for th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hat students would repeat the joint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 hope for a “better” placement. In 1971 the first graduates of German from Wen Tzao Juni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Kaoshiung came into the second year at Fu Jen. When one of their former teachers,

Fr. Meyer, came to visit his students at Fu Jen he could see for himself that they were doing very well, as the student magazine reports. The students from Wen Tzao did not only fill up the empty places, but enlarged the classes sometimes by 6-8 students a year. When the original allotment of students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to 60, then even to 70, and in addition a certain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were accepted, the number of incoming students swelled to 70 and more. Starting in fall 2003, however, the officially allotted number is again reduced to 60 students plus a few overseas Chinese. Currently there are more than 300 students in the German department.

In order to attract and invite students in the early years to make the German department their first choice in the selec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departments at the time of the joint entrance examination, a benefactor was found who donated small scholarship of NT 1500 for all freshmen who had put Fu Jen German department as their first choice. The stipend was announced for the school year of 1974. The number of recipients was not limited and the donor promised to increase the stipend as soon as it was possible for him. No records are available at this time as to how many students actually received this stipend.

The student population, like in most language departments, is to a great extent female. The ratio of women to men has always hovered between 85-90% and 15-10% respectively. Notable exceptions were the first few years when more men entered. Low motivation for studying German, traditionally perceived as a difficult language, has been a problem from the beginning. Fr. Sprenger took on this major hindrance for the learning of German on various fronts: battling the myth of special difficulty, battling an unproductive study and classroom culture, and opening new vistas of learning and expansion of mind and heart.

The Teachers



In the following account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department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s of some members of the faculty and the common effort toward achieving a distinctive direction and character. Fr. Giet's expertise and interest in phonetics bore direct fruit in various ways. The most obvious and innovative was the big language laboratory with 180 cabins in four separate rooms. He trained and supervised the teaching personnel and provid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a rich and well-organized library of audiovisual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easy access for all teachers. The liberal use of visual materials in language classes, for instance, was part of the teaching method that involved all the sens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was helpful in stimulating the imagination, providing easier and quick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of thought. Fr. Giet's books dealing with pronunciation of German and its special difficulties for Chinese students are painstakingly executed teaching tools that eventually were also used in other departments of German in the island. A third contribution, the staging of plays performed entirely in German, begun already in 1965,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the department and has set the stage for other departments to follow. For Fr. Giet working with students for a play was an all absorbing, arduous and joyful experience. He relished the success of each one of the performers and unlocked in many of them a sense of self that made a great difference in their subsequent attitudes. His very demanding discipline in preparing the plays was coupled with patience and unwavering faith in the ability of his students. He was convinced of the benefit they would gain from it. In fact, many

former students remembe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a play as the high point in their college career.

Fr. Arnold Sprenger, SVD, entered the German Department in 1965. He came with a M.A. in German Literature, a Ph. D. in Linguistics and a certificate for methodology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In 1967 he became the chairperson of the department after Fr. Giet. Fr. Sprenger's work was guided by a vision for the department as a



place of great possibilities and therefore great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udents and of the country. His concern with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young people, their growth as thoughtful personalities and potential leaders in their society made him search for ways to get the best possible out of their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This concern did not stop with students of German. He saw the whol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s an underdeveloped and

underestimated field of study in Taiwan. He became instrumental and very influential in a big curriculum reform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aiwan. His philosoph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und very practical expres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thods of teaching. In order to gain any ground in this aspect, teachers were needed to be trained. A number of native German missionaries, SVD confreres and SSpS sisters, together with some Chinese teachers who had studied in German, took part in this early development. Fr. Ai Wen had studied the language in German, at Fu Jen he taught German, Germa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He served with great dedication from 1964-1983. Fr. Wilhelm Müller helped from 1965-1969 with German courses and specialized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 Dieter Klementa was head of science and foreign language library, (1968-1971), but also taught German. Fr. Josef Meiners taught philosophy of life in the German department from 1965-1979 and endeared himself greatly to the workers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They kept his picture on the wall of their lounge and referred to his kindness and concern for them from time to time. Sr. Teresa Baues, SSpS, was administrator of the women's residence and a part time

teacher of German for many years, (1968-1985), especially contributing her experience in religious and biblical question. Ms Helene Reichl, ECC, and two clergy men who had returned from their studies in Germany, need to be mentioned here: Rev. Joseph Ti Kang, later Archbishop of Taipei, Chancellor and then Chair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Fu Jen University and Rev. Augustin Liu, OSF, now pastor in Taipei. Both taught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Sr, Fidelis Göbbel, SSpS, joined the French department in 1972 and in 1976 started to teach also on a part-time schedule in the German department. In a few years, 1983, she was to become the thir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In spring 1985 Sr. Agathe Bramkamp, SSpS, joined the faculty of the German department. She had earned a Ph.D. in Germ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fter serving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Sr. Leonora Sudhoff, SSpS, administrator of the women's residence, helped with second year writing and conversation classes from 1988 till 1995.

For all of them teaching German was an engaging work, never being limited to the classroom duties. It gave them many opportunities to get to know students, their dreams and their difficulties. The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plays and trips – the Graduation trip, started in 1969, in particular – brought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gether in friendly encounters. Often the concern included the parents.

The Program and its Reform

The program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in our case German, as set up in 1963, followed the rather fixed regul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t prescribed about 30 hours per week of common College courses with only 6 allotted to the new language. The arrangement of the second year with 18-20 hours of advanced German compounded the problem to the effort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many students to reach the proposed goal of their studies. Under the tireless leadership of Fr. Sprenger and his wholehearted dedication to the cause of better and more meaningful education for his young and promising student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inally, in 1970, gave permission to Fu Jen University to carry out sweeping changes in the language departments. The new curriculum devised for the

German department and its success in the first year 1970/71 was so convincing, Fr. Sprenger writes, that all language departments at Fu Jen followed its example. In 1972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rdered a restructuring not only of the language curricula, but also of all college curricula in the country. The new curriculum of the German department aimed at giving first of all a good foundation of the new language with 20-25 hours of classroom work per week. General courses were deferred to the second year. Another feature of the new program was the stress on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training of any student majoring in modern language.” 20 credits of English were built into the program and a minor in any other field could be acquired. The introduction of a minor field of studies was a major accomplishment, in fact, the German department of Fu Jen was the first college department in Taiwan with an officially approved minor subject as part of the curriculum. It was regrettable, however,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id not agree to make the chosen minor subject a prescribed part of the curriculum. Thus most students never approached it as an important and even necessary part of their education and preparation for future jobs.

A strong impetus that actually made waves in the whole foreign language scene in Taiwan came from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dvocated, tried and vigorously practiced in the German department. Already in 1968 the experiment of students teaching students, upper classmates tutoring first year students, was initiated. At the same time teachers were trained to use group-teaching methods in classes of 40, 50 and more students. Fr. Sprenger’s pedagogical acumen saw the potential in group work and group dynamics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on the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 together with the linguistic dimensions he stressed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this process held for the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learning process, their willingness to help one another, and to share what they had learned on the other hand, and the teachers readiness to cope with extra work and engagement on the other, made the experiment a success with model character for other departments.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however, lay in the fact, that a community spirit was being created where cooperation and service were beneficial for all participants.

Visitors from Nanzan University, Japan, report on their visit to Fu Jen in March 1975 that they encountered lively students, not afraid to speak with the visitors in German, and describing their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with personal pride.

In 1973-74 Fr. Sprenger was invit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conduct seminars on teaching English f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Sr. Agathe Bramkamp, SSpS, being a full time lecturer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holding a M.A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eaching ESL, helped in several of these seminar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Teaching methods however well devised and applied are not an end in itself, but to be seen as a teaching aid. The crucial point lies in the teacher and his/her attitude toward the students. Fr. Sprenger writes: “A teacher deeply concern about the formation of his students will know by experience that his interest in the growth of the students, that his being engaged fully in the daily exchange, the give-and-take with his students, will by far overshadow any of the so-called teaching methods.”

As a missionary concerned with people, as a teacher of teachers and many students, Fr. Sprenger set an example in the department and beyond, that has inspired many and is being remembered till today in simple words like these: We had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to our teachers; a familiar relationship; they were always there; their doors were always open to us; we often played football together etc. A student’s reflection on the four years of studies in the German department sums up the experience for the graduating fellow students: “I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be very courageous in carrying on in the spirit of our department – if they think there is one – to be of influence in our society, our country and even with our children.” This foundation of caring, loving, challenging, and serving relationship of teachers to

students has carried the department a long way. Although students and their needs have changed a great deal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ttention and love still open hearts and minds.

Chairpersons of the Department

Franz Giet, SVD	1964-1967
Arnold Sprenger, SVD	1967-1983
Fidelis Göbbel, SSPS	1983-1989
Jahr, Dai-shan	1989-1996
Hu, Kung Tze	1996-1999
Fidelis Göbbel, SSPS	1999-2002.01
Wang, Mei-ling	2002.02-2002.07
Chang, San-lii	2002.08 – presen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hen in 1974 the Graduate School of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as established, it was clearly a step forwar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but it was first of all conceived as a move toward depth in the study of German. Since there was no similar institution in Taiwan that could have served as model for the new venture, the first of its kind was created. The planning built around due consideration of educational situation in Taiwan and its future needs. The need addressed was first of all the lack of qualified teachers for the still developing department of German as well as other departments that were offering German courses for business, industry, and tourism.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teaching German and a strong push for research on methods of teaching German as well as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in general in Taiwan, was combined with the concern for training students in advanced writing,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The list of possible teachers for the proposed institute was quite extensive, since a number of degreed native speakers were already at Fu Jen and the suggested course of study included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philosophy, including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for example, the SVD priests Frs. Albert Czech, Josef Meines, Matthias Christian, and Heinz Hesselfeld could be recruited.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is graduate school came with the German exchange professors whose help grew invaluable over the years. Not only would these teachers take care of various literature courses, but also regularly guide a number of M.A theses, which up to 1997 were all written in German. The M.A program adjusted over the years, especially the much discussed prospect of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high schools dropped to a very low point on the agenda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90s this topic again revived and in fac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besides English became a policy in many high schools. Limited as the scale of actual implementation may be, it represents possibilities for our students to use their language skills in future teaching jobs. This again called for an adjustment and a broadening of the curriculum, thus making room for courses of teaching methodology again.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rman has remained the same over the years i.e. the important understanding that the degree

must lead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bring about a greater awareness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eads into this direction. To date about 150 graduates received their M.A. from this Institute. Many of them went on for further studies mostly in German and in the USA. A number of our former graduates from the Graduate Institute are teachers now not only in the various German departments on the island, but in other fields of learning as well. A number of them have gone on to government service posts, making their career in foreign relations. Others are in publishing and translating, in industry and business of many kinds, which often are related to German firms or internationally operating companies.

Director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ve been the following persons when this was a separate entity from the department:

Dr. Arnold Sprenger, SVD (1974-1979 and 1981-1987)

Dr. Peter Venne, SVD (1979-1981)

Dr. Agathe Bramkamp, SSpS (1987-1993)

Dr. Mei-ling Wang (1993-1996)

Since 1996 the department chair is also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German Department

1. The European Connection

As it i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t is to be taught,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native speakers of German are part of the faculty. Early on, from 1970 to the present, the department had an agreement with the DAAD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 by which one German exchange teacher would be sent to Fu Jen. The maximum length of stay in Taiwan would be five years. Till now there have been 9 such teachers. Some of them have remained in contact, have revisited and



From right to left Dr. Ingrid Plank, a DAAD lecturer, Fr. R. Kalesse, Ms Han, Sr. Agathe

have nurtured friendships especially with their former students at Fu Jen. The teachers who served the department in this capacity were the following:

Dr. Gunther Liebel	(1970-1973)
Dr. Ulrich Siegrist	(1973-1978)
Dr. Reinhard Wandel	(1978-1981)
Dr. Thilo von Bremen	(1981-1986)
Dr. Werner Wagner	(1986-1990)
Dr. Ingrid Plank	(1990-1995)
Burkhardt Allner,	(1995-1998)
Ms Katja Pahn	(1998-2001)
Dr. Andrea Keller	(2001-)

Each of these teachers brings a special interest or expertise to the department, some have had teaching experience in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all received special training as DAAD teachers in teaching methodology for German in a foreign country, all have the special mission to assist students in various ways of communicating with German institutions, to counsel on the intricacies of German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o administer tests, give interviews and select potential scholarship recipients. Since 1990 the DAAD teachers also took up the task of directing the annual German play and guiding the students in establishing contacts with German firms that would sponsor events in the department.

The change of teachers after a certain span of years gives the department the chance to keep flexible and to update and improve in aspects the individual visiting teacher has best developed. Beyond this arrangement other teachers have contributed who came without the backing of a German governmental institute, but were led by their personal interest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eachers like Dr. Hans Siebenhandel, R iger von Sanden, Dr. Ursula Ritzenhoff , and many others, Germans and Austrians, could be named as contributors to the diversity in the department. A special mention is due at this point of our long time colleague Dr.

Norbert Polzer from Austria who is with us since 1989. His field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sociology, gives an additional dimension to the curriculum, especially f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The Goethe-Institute not only sends DAAD teachers, but also invites Chinese teachers to Germany for refresher courses on methods of teaching Germ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Practically all our Chinese teachers have the chance to receive scholarships for these training courses in Germany; and this is not only a one time chance, but can be made use of repeatedly.

2. Junior Year Abroad

In the early nineties German universities sent big delegations of their foreign student officers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persons to Taiwan in order to recruit students and seek out other possibilities for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ne offer to the German department was the arrangement for a group of its students to spend one year of their college training in Germany. The German depart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Hu, Kung-Tze worked out a program with the university of Marburg. Since 1996 the German department sends 15-20 3rd year students for one year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burg. The personal benefits the students gain from the challenge to actually encounter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he people, having to struggle with the language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food, are remarkable. They learn to see and appreciate things both at home and in the foreign cultur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it is hoped that stereotypical concepts will be recognized as such and be corrected.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can grow as person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self and of their environment, and thus benefit for thei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far beyo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language skills. The faculty is very much aware that the linguistic gains of this year abroad are not the biggest gains, but that a valuable person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has taken place. This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preparation for a profession in modern society.

3. Intercollegiate Activities

From the early years till today a tradition of friendly interaction with the other German departments has been kept up. Students invite students for activities, plays, contests, and performances. A visit by the students of Tam Kang College in 1972 was like a workshop with common classes, a lecture on German studies and a play of soccer. The students comment on the event as an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and deepen friendship.¹⁹ The teachers from Wen Tsau College brought their students to perform their graduation play also in Fu Jen, and today, after years of interruption, they want to revive this tradition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it is good to make friends, to do things together, to stimulate and challenge each other in friendly competition. The German department of Fu Jen invites the other departments regularly to its plays; and the "Rhine Cup" tournament, started in 1975, is a real event of good interaction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It brings all departments together in friendly contests and enjoyment. This constitutes a real counteraction to the very competitive society where the vying for rank and honor, money and advantage, and any kind of success over others victimizes friendship and good will.

Very recently, May 2004, our department chair, Professor Chang , San-lii, extended the possibility of exchange and visits to the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in Peking. Our students went to see and to learn how their fellow Chinese are studying German, but their visit was also meant as an ice breaker, as the extension of a hand in friendship among young people. If the visits can continue, the stude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ght might unlearn some prejudices and become ambassadors of peace at least to one another.

Service to the Colleagues

What has been a good tradition on the student level had for many years no venue for teachers. There was no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the teachers of German, and there were no common conferences for almost 30 years. In 1989 Sr. Agathe Bramkamp started to work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ssociation of all teachers of German and German scholars in Taiwan. It took years to convince

enough teachers of the usefulness and profitability such an association would have for all. When finally in 1992 the association was registered, regular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started to take place. Sr. Agathe as the first president personally recruited most of the initial members, invited and encouraged the individual teachers of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personally to contribute their papers to the conferences. Now the various German departments take turns in hosting the conferences. The meetings are academically stimulat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appreciated opportunities to weave a net of relationships for mutual support and exchang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became the first regular publication of scholarly work in German studies and German language teaching in Taiwan. Sr. Agathe insisted early on that the association apply for memb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DV in order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ongoing exchange of ideas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Since 1993 the Taiwan association is a member of IDV and regular exchange with the teachers and scholars of German from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has been of great benefit to all participating members.

The Graduates

The alumni of our department are loosely connected in the alumni association. Very recently a new effort was made to revitalize the association and strengthen its connection to the university. The first 15 or 20 graduating classes have kept more or less in contact with their classmates, have come together at intervals and kept in touch with



Happy gathering with a class of alumni

teachers. The association for all graduates of the department was dormant for years. One event brought many alumni to Fu Jen or made them establish contact in other ways: the celebration of Fr. Giet's 85th birthday in 1987. Upon the initiative of Sr. Fidelis as chairperson at the time many alumni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holarship fund in Fr. Giet's honor. This fund "Fr. Giet scholarship

foundation”sheds every year money designated for scholarships for needy and accomplished students in the German department. Over the years alumni have contributed money to the fund as well as to the running expenses of the department. Their generosity is always greatly appreciated. Another cherished tradition consists in the visits of our outstanding graduates with the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The example of their life’s stories and their accomplishments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German department gives encouragement and helpful pointers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 teachers joyfully acknowledge the success of former students and relish the assurances that the college years were a most precious experience, enriched by fellow students and easily approachable and available teachers.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All SVD and SSpS who have served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s well as in other departments have come as missionaries to Taiwan and consider their teaching assignments and any other service they have rendered a contribution to the building up of the body of Christ. Their basic message is the Good News: The News of God’s Love for all humankind. As missionaries they are moved to share their faith in this Love. As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ir spiritual parents St. Arnold Janssen and Blessed Maria Stollenwerk who taught them that the greatest charity is to proclaim the Good News, they strive to live out of this conviction. Sharing God’s love naturally occurs in being loving persons, willing to give and capable of giving love and care. Being concerned with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their students and the members of the faculty is being concerned with bringing God’s gifts to fruition. It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mission; it is an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Church’s mission, and it is also their particular und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the mission of Fu Jen University. How can the concepts of Truth, Goodness, Beauty, and Holiness become workable and real in teaching, counseling, administering, i.e. in every day activities? This is a question every conscientious member of the Fu Jen community has to consider, and much more so every missionary working in Fu Jen.

Let us take the example of teaching literature! Not only is literature dealing with questions of life, love,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with values, goals and meaning, it is also always a reflection of and a participation in a whole culture. Teaching literature is therefore for Sr. Agathe a God-given opportunity to teach about human growth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 students’evolving ability to read with critical appreciation of ideas and ways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acting invites them also to look at self, at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it. Literature does not shy away from questions about God and ultimate meaning of life, but challenges the student into personal reflection and evaluatio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studies together with philosophy are actually fields of learning that are traditionally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spirit of a university, developing its cultural awareness as well as its openness for and capability of dialog.

Sr. Agathe's special attention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focused on women in literature, in culture generally, and by implication in society. Since most of her students are young women, many of the topics treated in class directly address the students, too. Moreover, questions of literature, treated like questions of life, cannot but touch on truth, goodness, beauty, and holiness or wholeness.

Sr. Fidelis'has developed courses in Bible studie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at have a rich and distinct comparative flavor. The biblical stories and their reflection in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biblical stories in relationship to many comparable stor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ther cultural expression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become a topic of fascination for many students every year, and for some Sr. Fidelis'bible courses bring about a new understanding of God's presence in the world or even a deep experience of faith in God. The very creative study reports of her students and their personal involvement in writing them are a good indicator of the Good News given and received.

Sr. Fidelis'other specially developed course, dealing with the modern literary form of radio plays in German, is not only a very interactive course where students produce their own message-packed plays, but it is treating a genre fond of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questions of life and death, love and hate, courage and failure.

Teach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s not only one of the oldest university subjects of learning, but it is also a subject that requires personal engag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d and heart of young people and holds real promise of spiritual growth.

Conclusion

The German Department at Fu Jen has had a history of a close-knit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a relationship carefully maintained by easy access to teachers, by their availability and the creation of an atmosphere of trust and kindness. The personality of each teacher and the teachers dealing with each other will influence the student and his/her education in social, mor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aspects in the students that are of real importance. The values by which the person lives will make for his/her ultimate success in life. If we as department want to continue to train valuable people for life in society, we also must be concerned about the message we give by our words and action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典範人物

齊德芳 神父 Fr. Franz Giet, SVD (1902.02.01-1993.09.18)

舊麥新穗香火永傳

齊德芳神父(1902-1993)其人其事

王美玲
德文系教授



1. 神父的生平與學歷
2. 神父與輔仁大學的關係
 - (一) 教學特色
 - (二) 學術專業
3. 人格特質與行事風格
 - (一) 處世風格
 - (二) 宗教信仰
4. 與同仁、學生以及會士們的互動
 - (一) 與同仁之間的互動
 - (二) 與學生之間的互動
 - (三) 與會士之間的互動

5. 師生、同仁、校友的緬懷與感念

一、神父的生平與學經歷¹

德國籍的齊德芳神父 (Franz Giet SVD) 于 1902 年 2 月 21 日出生於德國阿亨(Aachen)城附近的小鎮達爾海(Dalheim)。1915 年在荷蘭的史太爾(Steyl)求學,1922 年在波昂近郊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為聖言會的初學生(Novize),1923-1930 年進入奧地利聖嘉柏 (St. Gabriel) 的聖言會攻讀哲學與神學,1930 年晉鐸後,赴中國山東、河北從事教育工作。他在戴家莊學習一年漢語後,任職黃河附近的通明 (Tungming) 當副本堂神父;也在中學教授宗教課程,並負責教導新進會士中文。神父的聽力非常敏銳,享有「語聲高手」²之美譽。1945 年曾以輔導教師 (Präfekt) 的身份任教北京輔仁中學,課餘時以 800 位學生充當實驗,研究北方方言,但因政治現況不穩而作罷。

神父于 1947 年返回歐洲,先後在瑞士的蘇黎世,德國的漢堡、波昂攻讀語音學、民族學以及漢學,1949 年在德國波昂大學以論文「論述華北方言的語聲」(Zur Tonität nordchinesischer Mundarten)³,和最優越的口試成績 (summa cum laude) 獲哲學博士學位,之後赴美留學⁴。1951 年至 1961 年在聖召下遠赴日本,至聖言會在名古屋 (Nagoya) 的南山大學 (Nanzan) 從事教育工作,緊接著 1952 年創辦了日本第一所德、英『外語實習所』,1961 年出版了英語發音⁵,一本針對日本人學英文的書。

北京的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後,神父于 1963 年 1 月抵達臺灣開始在輔仁大學任教。1963 年至 1967 年擔任德文系系主任,在這段期間于 1963 年創建了『外語實習所』⁶,對教育學界有非常令人矚目的貢獻,造福不



最高榮譽十字勳章

少熱愛語言學習的同仁與學生，輔仁大學也因此出名。接著 1969 年創立了『西洋語文研究所』⁷，神父擔任所長，三年後再將此研究所轉型為臺灣第一所『語言學研究所』⁸。1970 年神父榮獲德國歌德學院頒發的「歌德獎章」(Goethe-Medaille)；1984 年榮獲教育部頒發的「木鐸」獎，五年後，即 1989 年，接受由香港德國領事館頒發西德總理的「最高榮譽十字勳章」(Bundesverdienstkreuz Erster Klasse)之殊榮。神父終其一生在中國，日本，以及最後在臺灣的輔仁大學以基督福音的精神致力於學術研究、教學與服務，于 1993 年 9 月 18 日逝世於台北耕莘醫院，享年 91 歲。

二、神父與輔仁大學的關係

(一) 教學特色

齊神父將工作融入生活中，就如他在北京的輔仁中學服務時，不忘在閒時以學生作為研究華北方言的對象；而在本校輔仁大學他對所閱讀的各類書報、雜誌等等出現與教學相關的隻字片語，都會以剪報方式收集在本子裡，作為日後的教材以及編著書籍的資料⁹。神父教授德語語音學，德國童話故事，德國詩選，德國短篇故事，德國文學史以及商用書信。他特別喜歡運用詩歌閱讀，使學生了解德語字面上及其隱涵意義，詩歌內容則偏好宗教信仰、倫理道德方面的傳遞。在課堂上為求使學生能正確發音，明白德語字義，他總是以各種生動、逼真的肢體語言來加強¹⁰，就如同他也會得體地運用模型、視聽教材作為輔助的工具，直到學生能完全瞭解他所要傳達的內容、含意。為了使會話課以及作文課更能達到效果，神父想盡辦法寫信至德國，向相關單位爭取可做為教材的資料，而且在『外語實習所』二樓建立了『圖片教材室』，收集德國史地，民俗風情，宗教節慶等圖片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神父從 1965 年開始至 1983 年從不間斷地指導德文系一年一度的戲劇公演，從挑選劇本、研讀、改編、改寫、編輯以及導演，舉凡舞台場景的佈置，戲劇服裝的設計，布料的選購、剪裁，甚至於演技、劇本發音¹¹以及臉部的化粧，無一不是經由他親手指導¹²，由此可確信他是個多才多藝的編劇家及導演。當時德文系也因為他對戲劇的特殊貢獻與成就，一直是臺灣歐語系中最傑出的科系。在這段期間，輔仁大學的德文戲劇公演對於在台灣的外籍人士更是不可多得的藝文活動，充分展現出德國文化特色，也同時達成輔大德文系與德國文化機構的交流，功不可沒。

（二）學術專業

齊神父的學術專業特別顯現在他所編著、編輯的作品以及研究論文內，舉凡是語音學領域，亦或是文學詩歌、宗教方面¹³，都可看出他治學態度的認真以及身為外籍教育學者在中國、日本以及臺灣對德國文化傳遞工作的使命感。早在 1972 年神父有鑑於中國學生「雖擁有精密的構思和豐富的字彙，但總是未能用之聯結成完整的句子」¹⁴ 於是編著《德文構詞用語》(Bau- und Sinnanzeiger im deutschen Satzgefüge)¹⁵。這本「隨時可供翻閱的工具書」¹⁶ 對當時德語學習者有莫大的助益，因為它除了讓學習者運用所列的詞彙表達德文，如何組織文法，瞭解「語詞與例句的意義」¹⁷，以及附上中文翻譯外，也標出「字重音」、「句重音」使學生「以正確的音調」¹⁸ 明確表達思想。

他在 1977 年編寫《形容詞的支配》(Rektion der Adjektive)小冊子，德一中對照，「有系統地提供您正確的形容詞用法」¹⁹；而在 1978 年所編輯的《德詩選粹》²⁰ (Anthologie deutscher Gedichte vom Barock bis heute)，為了使學生能洞察自巴洛克時代迄於現代，德國詩集的精髓與美感，特別再附上中文註釋。1980 年出版的《德語發音》(Lautlehre des Deutschen für Chinesen)，係針對中國學生

之困難所編寫，1991年修訂第三版，改為《德語發音指南》²¹。神父在此書之「緒言」前以如下的詩語來描述語言的含意：「語言恰似衣裳，以音以字織成，其內為我精神，與你與他問聞。」²²

德國波昂大學語音學教授 Heinrich Kelz 在齊神父 85 歲的紀念論文集內評述本書²³：

坊間所見之外語教材對於學習發音幾無助益，許多“由淺入深，循序編寫”的文法書對發音問題竟然毫無交代。然而誤認外語發音無需刻意教導，已經證明是有害學習，徹頭徹尾的謬論。有些專為學習發音而編寫的教材也都忽略了母語的音韻系統和由此而產生的學習困難，因而無濟於事。在目前諸多可悲的出版品中，齊德芳教授專為中國人編寫的《德語發音指南》書是極值得推崇的例外。此書不但針對中國人學習德語發音特有的困難著眼，更提供讀者諸多練習指引，處處可見作者對語音學理論基礎的涵養。

神父於 1990 年主編的德國小說選粹：《無價的畫像 — 愛的實踐》(Unschätzbare Bilder von Liebe mit Herz und Tat: Eine Anthologie. 40 deutscher Kurzgeschichten, die zum Nachdenken anregen.)，在每一篇結尾後皆



齊神父在德文系之工作室

附上編者小語，而所挑選的故事主要訴求，如「前言」所寫：「選擇的唯一標準，對我個人而言，在於文章中是否具有強烈的倫理訴求，可以在道德思想及行為上對於我們的讀者有所啟發。」²⁴ 在「編者序」內特別引證聖經《以賽亞書》以及《加拉太書》解說和平、大愛：和平，世人齊聲呼籲和平。然而，『和

平乃是正義締造的果實』²⁵，正義的歸依在於造物主的意旨，著重的是愛你我周遭的人們²⁶。無論何時，只要我們宣揚這種大愛 - 即時只是幾篇雋永的小品 - 對眾所渴求的和平也有貢獻。1985 年在其編著的《愛的人生》，以主題「愛」貫穿全書 35 篇之作品 - 朋友、男女、夫妻、父母，甚至對敵人的「愛」。每篇皆附上編者小語。1987 年輔仁大學德研所編輯慶賀神父 85 歲大壽的紀念論文集正是國內外學者、同仁共襄盛舉表達出對他在專業領域的推崇與尊敬。

三、人格特質與行事風格

(一) 處世風格

齊神父自我要求十分嚴格²⁷，絕不輕易改變所訂定的標準；但是當他發現他人處理事情的模式有別於自己時，他還是會以柔性的訴求使別人遵循其規範。他一向以積極樂觀及幽默的態度來看待自己神職人員的生活與工作，所以從他的儉樸生活方式可以看出他的謙虛，充分表現出修道者的精神所在。他對任何外來客，不論是學生的家人或是其他訪客一向都是親切接待，不分親疏，如同一家人。他與親友的互動關係也非常緊密、融洽，訪客是他一天內的重心，而他的確喜歡談話，交換思想。他無時無刻不惦念著週遭的每個人，尤其是當他聽到不幸的消息時，他會停下工作默哀。神父不會在乎讓人知道他的習性以及禁忌：例如他對日月星辰的運行以及朝夕變化的感受，在「月圓」時，會睡不好²⁸；以及在課堂裡教室兩邊通風而形成他所謂的「過堂風」(Durchzug)會讓他不舒服，他相當注意身體的健康。他一向勇於表達，喜形於色，外向開朗，尤其是在特別的場合時，與訪客談話時，或是當他接受頒獎時。

一般人對他的印象，都以為他是不苟言笑，不食人間煙火，幾乎被神格化的學者，或拿著柺杖指著人那種嚴肅的德國人。其實呢？私底下，他也有非常

風趣、幽默的一面。神父的童稚之心以及模仿的本事²⁹也表現在對人敏銳的觀察與反應。他常常會不經意的用一些特定的德文用語來糗那些聽不懂德文的訪客，也會模仿他們的鄉音。事後，當訪客離去，他會揣摩訪客的特徵與小動作與同仁分享，然後哈哈大笑。如果不是因他的年紀、身份與地位，別人對他的印象可能會完全改觀³⁰。

（二）宗教信仰

神父與其他聖言會士晚餐後在共同休閒時間裡，似乎不曾個別地甚至於公開地分享過他個人的信仰生活³¹，但他的信仰很深，常見他祈禱。他不會因為個人對宗教信仰的堅定，而要求或勉強他人、學生參與彌撒，或接受領洗成為主內弟兄姊妹，然而據說被他揀選在戲劇演馬利亞女主角的學生，後來多會接受領洗成為基督徒³²。神父也無時無刻，隨時隨地的以自身的生活準則以及教學、編著教材，來為宗教信仰見證，傳道，讓他人了解、接觸天主的愛。我們可從他教學領域以及研究，編著工作上³³看到他的信仰，例如他于 1960 年在日本出版了《談聖誕節的真正意義》（Christmas. A Conversation about its Real Meaning）；1978 年在台北歐語出版社編著從巴洛克時期至今所選出編輯成冊的《德詩選粹》，其中不少之詩歌闡揚宗教信仰的力量與偉大；以及 1981 年他為輔大德文系所編著的《聖誕節：談聖誕節的意義》（Weihnachten. Eine Unterhaltung über den Sinn des Weihnachtsfestes）³⁴。我們從「前言」所寫的內容可瞭解神父以「耶穌基督的信仰」來傳遞歐洲文化，對外國語文學習者有很大的幫助。神父于 1985 年在台北宇宙光出版中譯本《愛的人生》，也為他宗教信仰見證的表示³⁵。另外，他身邊藏有一些介紹聖經故事以及聖人之小冊子



³⁶，隨時找機會贈與學生或同仁，這也是他的傳教方式；他關心且參與輔仁大學聖堂³⁷之營建更可看出他那深度的信仰。

四、與同仁、學生以及會士們的互

（一）與同仁之間的互動

神父對身邊的同仁完全的信任，並給予充分發揮能力的可能性，他也能接受別人持不同的看法與見解，他的態度一向是很開放，喜歡多聽，多討論。也因為神父一向觀察入微且是屬於相當感性的個性，因此當同仁遇到瓶頸時，他總是給予適當、妥善的指導或是挺身相助、解決困難，似乎不曾有過對同仁所犯的疏失有任何嚴厲的譴責或是過份的責難。另外，他對同仁的感情生活也特別關心，就我所知在 70 年代時，每位助教的戀愛史他都瞭如指掌，也曾試著為他/她們或是語言學研究生「作媒」。也因為他那觀察入微的個性，他對當時『外語實習所』的全體工作人員相當瞭解與接納。那時實習所內在他的領導下個個充分地表現出團隊的精神，所內的氣氛像極了一個融洽的大家庭，而他是同仁的大家長。神父也不忘利用在工作相處的時間給予同仁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教育，讓他們有機會能深入了解德國文化、民族性的精髓所在，這是他身為外籍主管很特別的作風。

（二）與學生之間的互動

神父非常關注學生的生活習慣及他們的家庭環境，時常提醒學生服裝儀容的整潔，有時還會主動找「某些學生」，拿錢給他們要他們理髮或是買新的牛仔褲。他像極了學生的「爺爺」，外表看起來非常有威嚴，然而內心充滿對晚輩的關懷與愛。不僅如此，他還會找時機給予清寒子弟工讀的機會，賺取小額的生活補助費³⁸，甚至還幫助學生出學費的情形也曾有過。神父也時常告訴學

生無論在任何場所，都要隨時把握每個求知的機會，不要輕易放棄。他對學生在生活、學習方面的關懷與愛心終究得以延續：民國 77 年為歡慶齊神父八秩晉五華誕，特發起向畢業系友募款活動在德文系成立了「齊神父助學金」，旨在於補助「家境清寒且具服務精神之同學，發揮天主教仁民愛物之精神。」³⁹

（三）與會士之間的互動

齊神父 85 歲生日

神父與其他聖言會的會士之間的互動並不多，據說他非常喜歡玩跳棋。如果有國外來的會士訪客，神父很愛與他們聊天、開玩笑，從他那調皮的個性不難看出。由於神父是聖言會的大家長，受人尊敬的長輩，因此他說話的份量也特別「夠」。如果有會士衣裝不整，他也會「講」他。值得一提的是，打從我在 70 年代時就知道神父很「會」且「樂意」幫聖言會外籍會士取中文名字。但他並不是草率地以中文近音字來轉換，而是也再三思考如何配合每一位會士的外型、個性，翻了又翻《德漢辭典》來推敲、找到有意義且最恰當，最相近的中文⁴⁰；有時他會拿已經取好的中文名字來考其他人為什麼是這樣的取法，當這些人答不上來時，他會「樂在其中」。神父的個性實在可說是「知足常樂」型，而且隨時隨地都可看出他對生命充滿喜樂，熱愛他的工作。

五、師生、同仁、校友的勉懷與感念

我們懷念與齊神父在實習所當助教那段日子，一起編書、準備教材、改考卷，以及一起上課、指導戲劇、聊天、分享生活生命中的點點滴滴，我們感謝齊神父過去對我們的身教及言教，在共事的這段時間，對晚輩的學生我們，諄諄教誨與嚴謹要求，以信仰為生活的基礎，在在影響了我們日後的處事方式，也因此造就了不少專業人材，不論是在學術文藝界，或是在企業界、各行各業

都有相當的成就與表現。如「齊德芳神父百年冥誕紀念」書籤上所寫：「有一粒麥子死了，掉在土裡卻長出一大穗的新麥。。。」「相信聖言會的外籍會士們，每當他們聽到、用到自己的中文名字時，都會憶起當初為他們取中文名字的齊德芳神父 - 一位傳播天主的愛，活出信仰的輔仁大學大家長。最後筆者以德國詩人默里克(Eduard Mörike, 1804-1875)的「祈禱文」⁴¹，一首神父生前最喜愛的詩，來重現他的信仰生活：

主！賜給我祢所願意給的，
不論是美好的，或是痛苦的；
只要是來自祢的手中，
我都欣然接受。
祈求祢
不論是喜樂或是痛苦，
二者都不要過多，
因為高貴的謙虛是中庸之道。

參考文獻

外文：

Bramkamp, Agathe/Fu, Yi-chin/ Sprenger, A/Venne, P. (ed.): *Chinese-Western Encounter: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estschrift for Franz Giet,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5th Birthday*.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Publications, Asian Library Series No. 44. Taipei: Fu Je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rman, 1987.

Fleckner, Johannes SVD: „P. Franz Giet 1902-1993“. *Steyler Missionschronik* 1994/95. S. 169-170. (= *So waren sie. Steyler Missionare aus 19 Ländern*. Hrsg. v. Johannes Fleckner SVD. Band 2. 11. Kap.: Landesübergreifende Lebensbilder, S. 179-180.)

Giet, Franz (ed.) : *Weihnachten. Eine Unterhaltung über den Sinn des Weihnachtsfestes* mit einem Anhang von 13 Weihnachtsliedern sowie einem Vortrag von P. Christian, SVD und Glückwunschformeln zu den Festtagen. Taipei: Fu Jen University, 1981. 27 S.

-----: *Unschätzbare Bilder von Liebe mit Herz und Tat. Eine Anthologie 40 deutscher Kurzgeschichten, die zum Nachdenken anregen*. Erschienen im Selbstverlag.

Kelz, Heinrich: „Kann man Aussprache progress lernen?“ In: *Chinese-Western Encounter: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estschrift for Franz Giet,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5th Birthday. Ed. By A. Bramkamp, Yi-chin fu, A. Sprenger, P. Venne. Taipei: Fu Je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rman, 1987. S. 279-289.

Venne, Peter: „Biographical Sketch“. *Chinese-Western Encounter: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estschrift for Franz Giet,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5th Birthday. Ed. By A. Bramkamp, Yi-chin Fu, A. Sprenger, P. Venne. Taipei: Fu Je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rman, 1987. v-vi.

中文：

王美玲：〈舊麥新穗香火永傳。齊德芳神父百歲紀念〉。《益世評論》，萬象8。

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齊德芳（編著）：《德語發音指南》(Lautlehre des Deutschen für Chinesen)。修訂第三版。台北：歐語出版社。1991。(第一版：《德語發音》，1980)

-----：（主編）：《無價的畫像 一愛的實踐》。王惠玫，查岱山合譯。德國小說選粹。春暉叢書40。台北：光復圖書，1990。(德文版：Unschätzbare Bilder von Liebe mit Herz und Tat. Eine Anthologie 40 deutscher Kurzgeschichten, die zum Nachdenken anregen)

-----：（主編）：《愛的人生》。德國小小說選粹。王真心、查岱山合譯。四刷。台北：宇宙光，1990.

-----（編著）：《德語發音指南》(Lautlehre des Deutschen für Chinesen)。第三版。

台北：歐語出版社。1991.

-----（編著）：《德文構詞用語》(Bau- und Sinn anzeiger im deutschen Satzgefüge)。

第三版修訂版。台北：中央圖書公司，1986.

-----（編輯）：《德詩選粹。選自巴洛克時代迄於現代》(Anthologie deutscher Gedichte vom Barock bis heute)。附：作者生平。台北：中央圖書公司，1978.

孫志文 神父 Arnold Sprenger, SVD (1929~)

孫志文 教授

教育理念

以哲學的眼光來反思與推動外語教學，
以宗教情操與熱誠豐富教育使命，
以專業知識落實外語教學任務。
教育是為了人，
教育者猶如聖經裡提到的牧人—徹底的愛，
甚至願意為了他人犧牲自己的生命。

基本資料

1929年12月12日，生於德國小鎮 Willebadessen
(位於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

1958年，於德國聖言會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
修道院晉鐸。

1965年來台，於輔仁大學教授德語、德國文學、英語及語言學。

1967年至1983年任輔仁大學德國語文學系系主任。

1972年，參加台灣國高中師資英文教學法改進委員會，並彙編台灣國高中英語教材。

1980年，創立台灣第一所外國語文學院並任院長(1980-1984)。

1981年至1987年，任德國語文學研究所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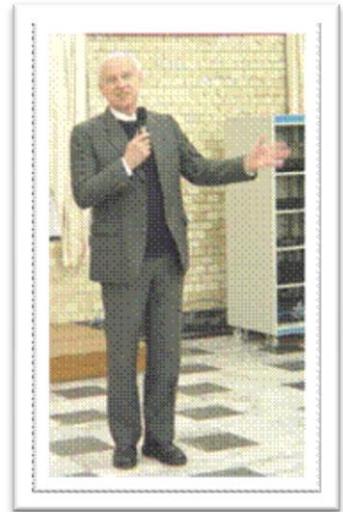
1987年前往中國北京，於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英語教學法、英語、古希臘與古羅馬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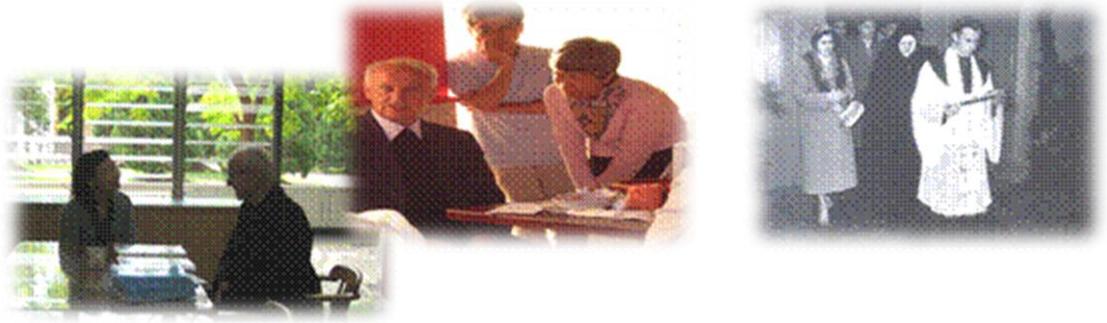
1989年參加北京大學英語教師工作坊。

2001年至2003年，於北京社會科學院進行研究工作。

2004年迄今，繼續投入管理工作、牧靈工作。

2005年3月14日，榮獲輔仁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孫志文神父 晉鐸金慶

五十年的奉獻，五十年的感恩

輔仁大學德文系系友會

會長 張喜會

孫志文神父(Prof. Dr. P. Arnold Sprenger)在1929年12月出生於德國西部地區帕德博恩(Paderborn)教區的威勒巴德森(Willebadessen)的一個農家。在九個孩子中，排行第九。他在戰爭與戰後的艱苦歲月中自1936年至1941年在家鄉上小學。1941年至1951年在沃爾堡市(Warburg)上中學(Oberschule)。1951年中學畢業後，他在同年進入帕德博恩市的教育學院(Paedagogische Akademie)攻讀教育學學位，一年後(1952年)他離開了教育學院，轉學至位在德國波昂市附近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的聖言會(SVD)所屬的神學院(Priesterseminar)攻讀神學(Theology)。1952年，他毅然決定加入修會開始他的修士見習生涯。當時很多人感到很驚訝，因為他個性很活潑開朗又非常喜歡體育活動，尤其是足球運動。他在1953至1955年修習『哲學』課程，並在1955年至1959年修習『神學』課程，此兩種課程引導了他對神的尊敬與理解，以及更深入地去面對天主，此影響決定了他日後重要的生涯規劃。

1958年的夏天他與其他另外20名神學院的學生發終生願，同年12月被祝聖為司鐸。他本來申請立即到海外(印尼)傳教，但總會長要求他繼續去美國進

修學習，因為當時聖言會計劃在台灣新莊市建立一所天主教輔仁大學大學。因此，他服從上級的命令，從1960年至1962年在美國華府的天主教大學修習文學課程，順利畢業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後來又轉到華府的喬治城(Georgetown)大學研究語言學，在1964年獲頒『語言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前往台灣，因為新成立的輔仁大學迫切需要外語教師。他首先在新竹修習中文課程。一年後，被任命為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外語系講師，從此展開了他的教育生涯。

從1965年至1987年他主要是在德文系教授德語和德國文學的課程。同時，也在英文系以及在語言研究所開課。不久後，教學任務變成了他自己的密集學習過程。教學的工作，引導他進入新的認知：從語言的理解以及語言的態度，來對中國的文化歷史提出問題，對臺灣的教育和學生的學習態度提出問題，以及對人類的形象以及宗教提出問題。這些問題使得他對這幾年來的工作倍感興趣，對他而言，用各種方法與學生們討論他們個人，尤其討論宗教方面的問題是很重要的。經由多次的討論、接觸，他與學生們以及學生們彼此之間，建立了深厚友誼，直到今日有些友誼仍存在。聖言會高等教育的使命：以基督信仰辦學，引人思考生命真相與意義，進而投身關懷人類福祉，尤以照顧貧困弱小者為重。

孫神父從1967年到1983年擔任輔仁大學德文系系主任，1980年到1984年擔任外語學院院長，同時有數次被教育部賦予教育改革會的工作。1983年以後，擔任『德國語言和文學研究所』所長。擔任外語學院院長的孫神父在1979年間在輔仁大學校內成立了翻譯中心，並且有了成立翻譯學研究所的構想，並於1981年在教育部會議中力主系統性譯介歐語辭典與著作的重要性，呼籲政府經費支持。此後，歐陽瑋神父(Dr. Fr. Edward Vargo)接任外語學院院長職，於1985年拜訪美國蒙特瑞國際學院(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瞭解該校翻譯課程規劃，次年並至日本收集同步口譯器材設備等相關資訊，並於同年11月採購完整的同步口譯器材設備。

1987年聖言會的決策高層決定派修會的幾位工作人員去中國，因此孫教授奉命與Father Wilhelm K. Müller SVD(彌維禮神父)等人前往北京，以58歲的高齡開始了生命中另一個新的歷程。經由前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的引介，1987年至1990年他在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師的工作，在英語系擔任講授“英語為外語的教學方法”(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TESL)這門課有四年之久。同時他也應聘對高中的師資繼續提供進修課程。這些課程也在北京其

他的師範學院被講授。孫教授在 1990 年和 1991 年間曾在海淀區和朝陽區的幾所學校協助培養英語師資，幫助改進教學方法。同時他也為當地大使館的外國人提供牧靈工作，而且還從事一系列書籍(德國文化叢書)的翻譯和出版工作。這些書在 90 年代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當時的讀物相當缺乏。他也幫助一些中國學生到外國留學。

從 1991 年到 2000 年，孫教授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德語，在那裡進行很多教育培養工作和指導的服務。很多他在台北輔大期間所用得到的教學方法得以成功的在此地再度被應用上。除了正規的語言課以外，他還負責翻譯學科(中文翻譯成德文)。對他而言，最令他感興趣的課程是“中國文化史 - 外國人看中國文化”。

從 2001 年到 2003 年他應聘在北京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系擔任“客座教授”的工作。這使得他有機會與中國的知識份子接觸，他們嚴謹的討論宗教問題，尤其是致力於研究基督教信仰的問題。2003 年以後，孫教授在北京繼續投入管理和宗教牧靈工作，又指導很多社會福利項目，例如建立孤兒院、造井、建設教堂等。他是一位博學又很謙虛的人，既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 又是一位充滿熱忱的神學家和關注群眾心靈需要的宗教家。

2005 年三月輔仁大學歡慶建校八十週年，孫神父與郝思漢神父 (Prof. Dr. Heinz Hesselgeld SVD) 返台由輔仁大學分別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與『榮譽理學博士學位』。孫神父認為大學的教授們，應該教導學生了解學習的目標是增進人生智慧與提升品格，為他們將來可能遇到的道德抉擇 (moral choices) 做預備，這些學問比什麼都重要。



孫神父強調：「教中國孩子學外語，要以中國的生活哲學為基礎。最主要的是要讓學生瞭解他們自己是誰？為什麼要學外語？並且要瞭解他們所處的社會狀態，而不是要他們經由學外語變成外國人。所以一定要從他們切身的需要

開始，要教的是『生活』。他分析一般外語言教學的癥結：「老師在中國學生心中，地位崇高，十分有權威，一般同學對老師非『敬』即『畏』，面對老師時多不敢開口。因此，教語言要從『人』著手，讓老師先和同學做朋友，親切自然地排除學生對老師的畏懼，自然容易開口。」。孫神父十分鼓勵老師多與學生聊天，他說：「同學不敢開口的另一個原因，是對問題的瞭解不夠，所以一定要多和同學聊天、溝通，訓練他們用外文思考、表達的習慣，而後自然敢說了。」

孫神父的是一位忠實的靈修者，一生致力於犧牲自己奉獻別人。他在台灣(1965-1987)與北京(1988-2009)從事教育工作長達45年，台灣與中國可以說是他的第二故鄉。孫神父熱愛教育，並與老師和學生互動良好，經常參與學校內外的一些活動，例如參加國際教學會議，每年返回新莊輔大校園與畢業系友們歡聚等。此外，孫神父非常重視清寒學生的教育問題，德文系的畢業系友們為了達成他照顧清寒學生，能夠讓他們無經濟負擔壓力而完成大學學業的心願，自過去數年以來紛紛慷慨解囊熱心捐款在輔仁大學德語系成立了『孫志文神父清寒學生及急難救助獎助學金』基金，供學生每年申請，嘉惠學生。

輔大外語學院創院院長孫志文教授長期致力於外語教學之推廣，在輔大服務期間，為教育界培養了許多優秀外語人才，並針對國人教育基本問題深入探討提出許多解決方案，豐沛的專業著作發表於國內外各學界期刊。孫神父一生秉持聖言會高等教育的使命，以基督信仰辦學，引人思考生命真相與意義，其教育思想、方法與理念值得敬佩與傳承，而且符合輔大特別重視”Mentorship”（傳襲機制）的使命特色。適逢孫神父晉鐸五十週年金鐸之慶，外語學院黃孟蘭院長與宗輔室呂慈涵老師，輔大聖言會團體代表魏思齊神父，以及外語學院各系所暨系友會，決定為校方推展孫志文神父『精神傳襲計畫』，出版其著作，建立網站平台，宣揚教學與傳襲理念，師生共享成果，永遠傳襲。



是使命不是工作

輔仁大學德文系 第二屆王琳娜

經歷了小學和中學填鴨式教育的我，來到了輔大德文系，讓我開了眼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因為我認識了德裔的孫志文神父 - 一位外型酷似華倫比提，個性溫文儒雅的語言學家。剛上大學那年，孫神父初抵臺灣，在新竹學華語。不時坐在我們教室後面旁聽。但不久就到德文系授課了。他的辦公室多年來都在外語大樓一樓的轉角邊間。他的門總是為學生開著，可惜害羞的同學們總害怕在走廊上遇到他，也許是因為沒有做好功課的緣故。也可能因為，我們還不明白，除了教書以外，他還想為我們多做些其他什麼事。猶清漸記得全系男生們最愛和他踢足球，在一同遊玩之中也有機會感受到他平易近人的一面。包括我們家的兩個女兒，至今對他無數次到我們家中作客都津津樂道。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自古至今都少有三者兼具的老師。在二十多年當中，受教於孫神父門下的學生們，都深深體會到這一位良師益友。而我有幸受教於他、當他的助教一年、從德國回系教書又常向他請益，直到神父被聖言會調派至北京為止。我在任助教期間有更多機會當系主任和學生之間的橋樑。在辦各種活動中體會到這是一位默默耕耘的播種者；禪述他的理念時永不氣餒。這必然是眾多門生致力於翻譯神父的論著成中文的動力，藉此他的精神得以傳襲下來。聖言會高等教育的使命：以基督信仰辦學，引人思考生命真相與意義，進而投身關懷人類福祉，尤以照顧貧困弱小者為重。



有幾件我親身經歷的事，在為孫神父慶賀之際，想和關心他的師生們分享：

在初任助教的那個夏天，大專聯考放榜後，有一位瘦瘦高高、眉清目秀的女孩來到外語實習所，我問明來意後，帶她引見了孫神父。要不是當年立即獲得孫神父承諾在經濟上相助，解決了她即將面臨到失學的困境，那麼我們國家今天就少了一位傑出外交官。像類似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孫神父做了一件事，對我一生有深遠的影響：當我們大四時有位馬教授，用著一張菜單「洋蔥炒牛肉」混了一學期的翻譯課。後來當我擔任助教時，馬教授仍是兼一門課，但卻時常臨時無故缺課。孫神父是系主任，認為太對不起學生了，就叫我這名助教上陣代課，當時我嚇得不知所措。他用德文跟我說：『你把一隻狗丟到水裡，牠是不會淹死的』。我壯了膽，走上講臺。就是這一步開始，也成就了爾後我一生最愛的教職。回憶當年若不是孫神父推薦送我赴德進修，以我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是無法成行的。

時光隧道沿伸到今年（2009）五月初，我首次踏上北京之行。抵達次日就在電話中聽到分別了二十多年的熟悉聲音。我們一家人立刻趕到孫神父的住所，也見到了另外兩位年輕神父。這些年來，間或知悉神父的生活起居狀況。如今和他面對面，竟感覺到他雖然不再那麼神采飛揚，卻仍是滿懷服務、奉獻的精神！老人家在臺著作等身，但卻願意在二十三年之前，委身當時物質環境比台北相差甚遠的北京，僅擔任一個小小的教職。在嚴禁傳教的環境下，他依然深信，芥菜的種子雖小，總有一天能成遮蔭大樹。我似乎剎時悟到 -- 撒種和默默耕耘是要具何等的情操和愛去實踐的。若非此行，我必難以體會到今年夏天，孫神父經歷了重大手術後仍不願回家鄉，在家人已為他準備好的安適居所中頤養天年，而迫不及待又回到北京。因為我的恩師致力的不是工作，是使命。

古怡心 修女 Sr. Fidelis (1936~)



基本資料：

- 1936 年 9 月 10 日 出生於德國 Bronsfeld (Eifel), Schleiden
- 1961 年-1968 年 於敏斯特大學 (Westfälische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
- 攻讀碩士學位，主修法文、德文，
通過國家考試取得學歷證明
(Wissenschaftlichen Prüfungsamt in Münster)
- 1970 年 通過法文、德國語文和文學的高等教育國家考試
(Staatsprüfung für das Lehramt am Gymnasium, Münster)
- 1970 年 來台於新竹華語中心學習中文
- 1972 年-2002 年 任教於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德語系
- 1998 年 榮獲國家頒發“優良研究和教學獎 1998”
(1998 年教師節”優良教師獎”)
- 2006 年 12 月 退休回荷蘭休養

古怡心修女為人謙和，是系上師生的良師益友，特別強調於教學上與學生的互動，其身教、言教及教育貢獻，堪為典範。

裴 德 修女 Sr. Agathe Bramkamp (1939~)

法文系

系史：外語學院法文系系史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法文系系史

黃孟蘭

輔大法文系

一、基本資料：

- (一) 系史與發展
- (二) 歷屆系所主任

二、特色：

- (一) 課程特色
- (二) 師資特色
- (三) 圖書及儀器設備
- (四) 系團隊特色及合作模式
- (五) 學生關懷管道
- (六) 系友會組織與運作
- (七) 獎助學金

三、人物特寫：

- (一) 會士在教學、服務和關懷上的典範
- (二) 資深教師同仁在教學、服務、關懷上的典範
- (三) 系友傑出典範與貢獻
- (四) 系友對系所及師長的歷史回憶(一~八)

四、系所發展宗旨目標與輔仁大學精神之落實

- (一) 法文系的現況
- (二) 近、中程願景

一、基本資料

(一) 系史與發展

本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三年，研究所成立於民國七十三年，現任系主任及所長為黃孟蘭老師。

目前專任師資十人，兼任師資十二人，皆為熱心教導、學有專精之士，其中趙德恕神父及李友仁神父於 1996 年 7 月分別獲得法國總理所頒發之軍官級教學成就獎及騎士級教學成就獎；1998 年 9 月洪藤月老師榮獲法國總理頒贈之騎士級教學成就獎。在系務行政方面則有秘書服務忠誠，為師生間意見溝通之主要橋樑。

法文系畢業生人數平均每年約五十至六十人，三十九年來，畢業生總人數約已兩千五百人。畢業系友或出國進修後返國，或立即投入工作市場，除了每年由法國、比利時、瑞士取得高等教育之碩、博士系友陸續回國服務外，其他系友就職單位包括政府高級行政單位、法國在台協會或公立文教機構、國外駐法或駐法語國家外交代表單位、教育部之高等教育單位、中等教育圈、知名法商公司、國內商業界及企業團體、或個人獨創事業。各系友在社會上表現卓越，堪為後進表率，不一而足，其中，第一屆系友邱大環女士已於 1996 年獲得法國總理所頒發之軍官級教學成就獎之殊榮；第二屆周功鑫系友則於 1998 年 7 月榮獲法國最高榮譽文學藝術騎士級勳章，第二屆李青青系友亦於 1998 年榮獲法國政府頒贈之文教類騎士級勳章。

(二) 歷屆系所主任

歷屆系主任為：

蘇 珊修女 (1964-1965)
趙德恕神父 (1965-1967)
安琪樂修女 (1967-1968)
謝 凡老師 (1968-1973)
古怡心修女 (1973-1976)
趙德恕神父 (1976-1985)
李友仁神父 (1985-1991)
黃雪霞老師 (1991-1994)
洪藤月老師 (1994-2000)
黃孟蘭老師 (2000 迄今)

歷屆所長為：

趙德恕神父（1984-1990）
黃雪霞老師（1990-1996）
洪藤月老師（1996-2000）
黃孟蘭老師（2000 迄今）

二、特色

（一）課程特色

（1）大學部：

教學計劃可分為兩大階段，前二年（大一、大二）以語言訓練為主，所有的課皆為必修課。後兩年（大三、大四）除了繼續部份語言課程，其餘皆為選修課，內容涵蓋法國文學、文化、歷史、法語教學、法語翻譯、新聞導讀、商用法文、歐洲聯盟等。

此外，為了增加就業的機會，我們鼓勵學生選修輔系和雙學位。同學可在大一下學期即著手準備。大三升大四欲前往波爾多修讀商業課程的同學，必須於大二選修本校管理學院開設之相關課程。

對法語教學感興趣的同學，我們每年也積極地向校方爭取法文教育學程的名額，自民國八十八年至今，已有多位大學部和研究所的同學取得在高中任教法語的資格，目前有兩位為專任教師。

未來本系也將努力為學生規劃並開拓實習的機會。實習環境除了由本系與法商公司、法國在台官方單位以及國內與法文相關的傳播媒體聯繫之外，也將透過畢業校友提供給後進學子及早認識就業環境的機會。

此外，本系亦積極爭取與法國知名學校合作交換學生計畫，自八十八學年度起，已遴選二十六名優秀且學習動機強烈之學生，前往法國波爾多高等商業學校（E.S.C. Bordeaux）修業一年。本學期又有二位對商業感興趣的同學至波爾多研讀一年。由於波爾多商業學校為輔仁大學之姊妹校，因此本校學生前往就讀只需繳納輔仁大學一學年的學費，而不需支付法國校方之學費。

此外，九十二學年度將與法國艾克斯-馬賽法律經濟科學大學締結姊妹校，自九十三年度起，學生可前往該校修讀法國語文之相關課程和商業文憑，為期一年，並可抵免系上之學分。

（2）研究所：

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的特色在於培養：一、文學、文化人才，以期幫助國家與歐陸的文化交流，二、翻譯人才，使國家的外來資訊多元化，三、法語教學人才，培育法語教師以因應中學第二外語教學之需求。為了讓學生在修業年限四年內順利取得文憑，本所成立了『論文審查與選課指導委員會』，其功能在審查論文大綱和指導學生選擇適合他們性向的課程。研究所修業章程也已擬

定，其中就論文的準備及撰寫方法皆有明確的說明。

此外，巴黎第四大學（以人文學科見長）也已與本校簽署合作計畫，自九十二年九月起，已有兩位研二學生赴該校修讀法語教學碩士之課程。本學年度也將與巴黎第三大學締結姊妹校，目前已有兩位研二學生在該校修讀應用外語和法國文學之課程。在法國修過之學分可抵免輔大法文研究所應修之學分。

（二）師資特色

本系所目前專兼任教師共有二十三位。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及所長	黃孟蘭	法國格勒諾勃大學語言學教學法博士
專任副教授	洪藤月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文學博士
專任副教授	黃雪霞	法國里昂第二大學文學博士
專任副教授	李友仁	法國巴黎農學院農學碩士暨天主教大學神學博士
專任副教授	楊光貞	法國格勒諾勃大學語言學教學法博士
專任助理教授	沈中衡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博士
專任講師	李瑞媛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文學碩士
專任講師	陳淑珍	比利時魯汶大學語言學碩士、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文化管理專業文憑 D.E.S.S.
專任講師	賈瑪琍	法國巴黎高等翻譯學院高等專業技職碩士文憑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兼任教授	魏蕾特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遠東研究所博士
兼任教授	趙德恕	匈牙利布達佩斯大學語言學博士
兼任教授	何金蘭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所博士
兼任副教授	狄明德	巴黎耶穌會神學院政治社會學博士
兼任副教授	賴慧芸	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歷史文化博士
兼任助理教授	陳泓易	法國巴黎第五大學社會學博士
兼任助理教授	范若霖	法國艾克斯-馬賽法律、經濟及科學大學環境地球科學博士
兼任專業技術人員	藍凱琳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中文學士
兼任講師	陳麗娟	法國弗朗史孔泰大學教學法碩士
兼任講師	鮑立仁	法國高等商業學校(H.E.C)貿易碩士
兼任講師	袁美瑜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現代文學碩士
兼任講師	華文軒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藝術史考古學碩士
兼任講師	雷石堅	法國南特大學公法系碩士
兼任講師	歐德尼	法國勒阿弗爾大學國際事務亞洲貿易碩士

(三) 圖書及儀器設備

- (1) 系辦圖書(約 1510 冊)及字典(約 125 冊),計有 11 類,其中「教材類」(約有 360 冊)、「文學類」(約有 665 冊)、「藝術類」(約有 15 冊)、「文化類」(約有 25 冊)、「歷史類」(約有 15 冊)、「戲劇類」(約有 115 冊)、「哲學類」(約有 10 冊)、「宗教類」(約有 40 冊)、「政經、商業類」(約有 35 冊)、「其他類」(約有 230 冊)、「字典類」(約有 125 冊)
- (2) 期刊約 48 種:報紙 7 種,雜誌 41 種/報紙

編號	刊名
1	Courrier International / All except US, Canada & Switzerland
2	Journal des enfants / For institutions /
3	Le Monde
4	Les Clés de l'actualité
5	Les Echos
6	Taipei Aujourd'hui
7	Taiwan Aujourd'hui

/雜誌

編號	刊名
1	Critique / Révue générale des publications françaises et étrangères / FR
2	Elle - French ED / Except US, Canada Quebec, / Belgium, Switzerland
3	Etudes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 / All except North America / Surface mail
4	FDM Fréquence Plus - Audio CD
5	Francophonies du Sud
6	GEO / France / All Except US, Canada / Quebec / Surface Mail
7	Information Grammaticale
8	Je bouquine / All Except Canada, Belgium, Spain & Switzerland
9	L'avant scène theater
10	L'école de lettres - premier cycle / All Except Belgium
11	L'histoire / All Except Belgium / Surface Mail
12	Langages
13	Le français dans le monde

編號	刊名
14	Le français dans le monde - Référence Package
15	Le français dans le monde - Recherches et Applications
16	Le français moderne
17	Le journal de la maison
18	Le monde et l'éducation / for Europe / for Merly / Le monde et l'éducation de la culture et de la formation
19	Le monde diplomatique / France / for Europe except Belgium
20	Le nouvel économiste
21	L'Expansion
22	Les Clés de l'actualité / All except US & Canada
23	Le monde sélection hebdomadaire / edition international / All Excus & Canada
24	Les temps modernes
25	Lire / Surface mail
26	Littérature
27	Magazine littéraire / Surface Mail
28	Nouvel Observateur
29	Paris match / France / for the Netherlands / Surface Mail
30	Phosphore / All except Belgium, Canada, Switzerland & Eastern US / Formerly / Record
31	Poétique / Surface mail
32	Positif / All exc US & Canada / Surface Mail
33	Pratiques / Metz France
34	Première / France / All except US CANADA
35	Revue de l'art / All Except Former Soviet Union
36	Revue du marché commun et del union européenne
37	Revue historique / All except Switzerland & Former Soviet Union / Surface Mail
38	Sélections du readers digest - Paris French ED / All except New Zealand / Split From / Readers

編號	刊名
39	法文月刊
40	Connaissance des arts / For Belgium, Netherlands & Luxembourg
41	Label France

(3) 儀器設備

/硬體設備：

除了視聽中心收藏豐富的錄音影帶、幻燈片及光、影碟外，本系在住教室亦設有系圖供教師與學生使用。另有收集歷屆研究生碩士論文供研究生參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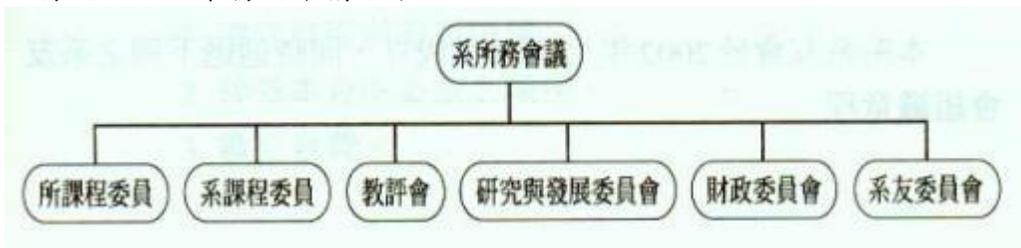
/軟體設備：

本系除定期介購法文相關書籍、期刊（分四類：政經、文學、文化、教學）及雜誌予圖書館，另在系辦公室設有系圖（當月期刊置放於系辦公室供教師參閱，過期期刊存放於系學會辦公室供學生借閱）供教師及學生使用，並收集歷屆研究生碩士論文供研究生參閱；此外，系辦公室亦設有多媒體區，收藏豐富之教學用錄影音帶及法文電影。

(四) 系團隊特色及合作模式

本系有一極佳之團隊，無論在行政、教學或研究等各方面均充分展現團隊之精神。

行政方面，系務之架構如下：



在此組織之下，每位專任老師必須參與兩個委員會，相關議題先交由委員會開會提出建議，再經由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再付諸執行。

教學方面，每學期召開系內教學會議，讓作文、會話、文法與讀本等不同組別之必修課任課教師交換彼此之教學心得並試著取得共識；此外，也就教學上之解釋難點及學生常犯之錯誤進行切磋。

研究方面，至今已出版數本法文發音和文法之教材，也於本學年度首度提出整合型研究計畫之申請，計畫名稱為「法語教學中之跨文化問題探討」，該計畫是本系成立三十九年以來首度結合中法籍專任教師之各項專長而進行之

大型研究計畫。

(五) 學生關懷管道

藉由導師工作之推行、畢業生就業輔導和免費之「暑期法語專業訓練課程」之提供給予學生多方面的關懷。

導師一學期至少與學生個別約談一次，協助學生解決課業及生活上的疑惑，並提供學生生涯規劃之諮詢，也透過「系友演講座談」之舉辦提供更多求職之經驗。

免費之暑期法語專業訓練課程為期三週，由加拿大籍魁北克政府前口語表達顧問授課，藉以提升學生法語口語表達之能力。

(六) 系友會組織與運作

本系系友會於 2002 年 12 月 8 日成立，同時通過下列之系友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輔仁大學法文系系友會。

第二條 本會宗旨在於維繫畢業系友之向心力，積極協助系務發展，並促進系友與在學學生之互動與交流，藉以達到分享經驗、提攜後進、與推展法語教育之長遠目標。

第三條 會址：輔仁大學法文系辦公室；
地址：242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
聯絡電話：(02) 2903-1111 分機 2581；
電子郵件信箱：fren2012@mails.fju.edu.tw。

第四條 本會主要任務：

1. 定期追蹤系友動向，更新系友通訊錄。
2. 發行不定期刊物。
3. 促進系友聯繫，舉辦系友聯誼活動。
4. 贊助「輔仁大學法文系所發展基金」。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凡輔仁大學法文系與法文研究所畢業系友皆為當然會員。

第六條 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1.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 出席各項本會舉辦之活動。
3. 接收本會之出版品。

第七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1. 遵守章程與服從決議。
2. 接受本會所委派之職務。
3. 繳交會費。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八條 本會設置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得每年召開一次。

第九條 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1. 選舉會長、副會長。
2. 議決重大事項與會務發展方向。
3. 制訂及修改系友會章程。

第十條 會員大會以無記名投票產生會長一人，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會長負責召開會員大會，策劃並執行本會會務。

第十一條 本會設執行秘書長一人。執行秘書長由系主任擔任，輔佐會長，實際策劃並執行本會會務。各屆設聯絡人一至二名。

第十二條 本會得設理監事若干人。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 會費一百元，每年繳交一次。
2. 其他捐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系友會目前設有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理監事六人，每年定期召開理監事會議。

(七) 獎助學金

第一至第三屆系友共捐助了兩筆獎學金：「徐珊教授紀念獎學金」和「法文系友獎學金」，每學年依系所獎學金頒發辦法提供獎助學金幫助經濟上有困難的同學。

三、人物特寫

在「人物特寫」篇中計有趙德恕神父、狄明德神父、李友仁神父、魏蕾特修女和古怡心修女等五位會士對法文系及台灣社會無私奉獻的典範；另有馬譚愛、路瑞（Andr* Noug ^、李符蓉和洪藤月等四位資深教師對法文系的服務與貢獻；邱大環、周功鑫和薩支遠等三位傑出系友在校內和校外的貢獻。最後一部分是七位系友：李瑞媛（第七屆）、陳淑珍（第九屆）、黃雪霞（第十屆）、

袁美瑜（第十三屆）、陳麗娟（第十九屆）、沈中衡（第二十三屆）、簡薇倫（第三十四屆）和林幼航（第三十四屆）等對系上及師長的回憶。

（一）會士在教學、服務和關懷上的典範

（1）趙德恕神父



匈牙利籍，為法文系創系系主任，擁有美國喬治城大學英語語言學博士，1965至1976年擔任系主任，之後出國進修，1975年返台繼續擔任系主任及法文研究所所長直到退休。

現年七十三歲的神父，編了三本法漢辭典，造福了許多法文的莘莘學子，出版兩本匈牙利詩集，另外也翻譯並出版了將近二十本英、法、德等語言之詩集。

趙神父在教學和文化上之貢獻，於1996年榮獲法國總理頒佈之「軍官及教學成就獎」、2000年榮膺國際詩人學會「桂冠詩人」殊榮，並獲贈黃金桂冠一只、並於2002年獲頒印度 Sphatika 國際詩人學會「詩人獎」。

除了上述的成就以外，趙神父對學生關懷備至，尤其對於經濟上遇到困難的學生，他更是慷慨解囊給予他們金錢上的協助。

（2）狄明德神父

1971-1975 法文系兼任講師

1976-1980 回法國進修博士班學位，並取得政治社會學博士學位

1980-1983 大陸武漢大學任教

1983-1986 在香港作中國新聞分析

1986-1993 在大陸作翻譯工作

1993-2003 與另一位同仁在輔大創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一職，於2003年卸任

1996 於輔大翻譯學研究所任教，並於2003年擔任譯研所所長一職

1998 返回輔大法文所任教，與賴慧芸老師共同教授翻譯課程



狄神父早年於系上任教時，鑒於當時與法國人接觸機會少，因此舉辦了一次為期兩週的「中法學生活動交流會」，讓學習法文的同學有機會將法文派上用場，也成立了外語學院的「翻譯學程」，提供給法文研究所同學一個機會去接觸法文以外的東西。

神父將於今年七月離開輔大，接受耶穌會的指派前往另外一個國家服務，他樂於接受挑戰的個性認為換個環境、接觸不一樣的事物對自己也是一種學

習。

(3) 李友仁神父



法國籍，擁有巴黎天主教大學神學博士的李神父，於 1983 年至法文系任教，擔任兼任老師，1985 年接掌系主任至 1991 年。

李神父在系上服務已邁入第二十一個年頭，他相信只要學生願意好好學習法文，將會有不同的價值觀，人生也會因此而有所轉變。他最感欣慰的是，同學透過法文的學習，培養了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在他教授長達二十一年的「法文作文」課中，他不斷地以各種方法訓練學生組織與邏輯分析能力，他的教學也獲得許多系友熱烈的迴響。

此外，李神父在其教學中也致力於中西方文化之比較，在跨文化議題上帶給學生許多啟示。

李神父在教學上之貢獻，讓他去年獲得「教學績優獎」，不但如此，多年來他也自願擔任導師的工作，關懷學生不遺餘力。

(4) 魏蕾特修女



法國籍，擁有中文博士的魏修女，在台灣已住了三十多年，除了在本系所任教之外，她也曾在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專任多年，目前她所授的課主要在法文研究所，由於修女的細心和對學生的主動關懷，所上大部分的研究生都找她指導論文，至今已有十五位以上的學生在她的指導協助之下，完成碩士學位。

最令人感佩的是，修女在教學之餘，將她全部的心力奉獻給新竹山區部落的原住民。一開始，由於當地的生活條件很差，修女的工作主要在醫療照顧與兒童的教育方面，當時山區沒有對外聯絡的道路，往往需步行五個小時方能抵達車站，後來隨著對外道路的建立，醫療制度的設立，觀光事業逐漸發展起來，山區居民的生活也獲得改善，因此修女的服務工作就轉移至慕道方面。

修女長期以來對台灣社會無私默默的奉獻足為大家的楷模。

(5) 古怡心修女



德國籍的古修女於 1970 年抵達台灣，在新竹學習二年國語後就到輔大法文系擔任專任老師，在趙德恕神父出國進修期間，兼任系主任，後來由於德文系的需求，修女離開法文系至德文系接任主任一職。

修女在法文系授課期間，造就了許多學生，特別是法文文法一科，在她清晰的講解之下，使得不少同學深深地愛上法文，而她慈祥和藹的臉龐配上一口流利的法文也吸引許多學生對法文的喜愛。

至今，修女和法文系一直維持著良好的互動關係，以前和法文系學生相處的點點滴滴也成為她心中美麗的回憶。

(二) 資深教師同仁在教學、服務、關懷上的典範

(1) 馬譚愛老師

馬譚愛 (Marie-Louise Ma) 是法文系第一任助教，當時系主任是趙德恕神父。Madame Ma 是越南華僑，懂得多國語言，包括越南話、廣東話、國語、法語和英語，在其助教任內，為系主任翻譯所有來自教育部和學校各單位的公文與信件，由於她的協助，主任才能了解所有公文的內容。此外，對於那些向她尋求協助的學生，她也竭盡所能幫助他們。

後來，Madame Ma 升任為講師，開始在法文系授課，一直到她丈夫被外交部聘用，外派到一個非洲國家，結束了她在輔大的教學生涯。

目前她在澳洲定居，但仍然十分懷念輔大。

(2) 李符蓉老師

李符蓉老師 (Madame Li) 出生於越南，原籍中國，1972 年在美國取得法國文學碩士學位，於 1974 年到法文系任教。

當時的大環境無法讓學生擁有原版教材，只靠泛黃紙張油印出來的講義學習，Madame Li 的視聽教學法對初學者在「聽」與「說」方面幫助極大，也因此奠訂良好的語言基礎。散文課中她也經常要學生將文章改編成簡單的劇本表演，這種學習方式的確可以激發對法文的興趣。

李符蓉老師目前與丈夫定居美國。

(3) 路瑞老師

法國籍的路瑞老師 (Andr* Noug ^，深諳多國語言，包括俄語、德語、英語、漢語。於 1967 年到法文系任教，至 1993 年返法定居，在輔大服務長達二十六年之久。

其教學向來十分嚴厲，早上八點十分的課，鐘聲一響完，教室的門即關上，不准學生進入，課堂上也不准有任何東西掉落在地上……總之，向來有「殺手」

之稱的他，對學生的要求極高，雖然其嚴厲之作風引來不少的抱怨，但他專業負責的態度令人十分佩服，往往是學生畢業之後感激最深的一位師長。

此外，對於努力向學的學生他也常常犧牲自己休息的時間來指導他們的學業。課餘之暇，他即埋入中國現代散文集的法譯工作，並由國立編譯館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路瑞老師是法國承認中國大陸政權之後在台灣的第一位官方代表。

他在台灣的教學、對學生的關懷以及在文化上的貢獻令人難以忘懷。

(4) 洪藤月老師

1977年，擁有法國文學碩士的洪老師至法文系任教，至今已有二十六年之久，其引人入勝之翻譯和文學課確實造就不少學生。

1994年至2000年的系主任任期內，她不但將法文課程多元化，也匯集更多的資源，導入系所教學環境中，進而提升教學與學習的品質。

(三) 系友傑出典範與貢獻

(1) 第一屆 邱大環學姊

• 學歷：輔仁大學法文系學士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語言學碩士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語言學博士

• 經歷：法國巴黎大學中文講師（1969-1971）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講師（1971-1972）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1975-1977）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1975-1981）

比利時皇家高等翻譯學院中文教師（1982-1985）

淡江大學法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1986-1990）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所長（1987-1988）

希臘國立雅典大學中文教授（1990-1991）

美國芝加哥社區大學英文 EIL 教授（1992-1993）

淡江大學法文系副教授（1993-1996）

巴黎台北新聞文化中心主任（1996-2000）

塞內加爾高級管理學院中文教授（2001-2002）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所長（2002-2003）

淡江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2002-2003）

- | | | | |
|-------|---------------|------|----|
| • 獎章： | 中華民國教育部獎章 | 1982 | 台北 |
| | 法國教育，騎士級勳章 | 1983 | 法國 |
| | 法國教育，官員級勳章 | 1997 | 台北 |
| | 法國文化及藝術，官員級勳章 | 1998 | 法國 |



今年初，其夫被任命為駐梵蒂岡大使，邱學姊因此離開教職隨夫前往。由其經歷可以看出她在文化和外交領域有相當傑出的貢獻。

(2) 第二屆 周功鑫學姊

- 學歷：輔仁大學法文系學士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藝術史博士
- 經歷：輔仁大學法文系助教
國立故宮博物院雇員、助教幹事、幹事、秘書、編輯、展覽組組長
- 現職：輔仁大學織品系、流行系、景觀設計系兼任教授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
- 1998 年獲贈法國最高榮譽「文學藝術騎士級勳章」
- 專長：中國藝術史與博物館學



周學姊於民國 58 年畢業，在學校擔任一年助教之後離開輔大，考入故宮博物院。至故宮的第一份職務是擔任導覽，民國 77 年前往法國巴黎第四大學修讀博士學位。

曾在系上和研究所兼課，後來在輔大創辦了國內第一所綜合大學的博物館學研究所。

曾經獲得法國文化獎、模範公務人員和輔大傑出校友等獎項。

(3) 第四屆 薩支遠學長

- 學歷：輔仁大學法文系第四屆畢業
巴黎第三大學法文教授學院語文高級班畢業
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國際關係系正期生畢業
巴黎第一大學國際關係博士班結業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
- 經歷：法國農業經濟研究中心 (CIDR) 研究
法國巴黎高等法院翻譯
駐法國代表處文化組秘書
外交部專員
駐法國代表處科技組組長
駐薩伊代表處代表
駐比利時代表處副代表
外交部研設會執行秘書
駐法國代表處副代表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及中央大學法文系兼任副教授
- 現職：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 副代表回部辦事
(工作內容：歐洲智庫聯繫、總統府法文傳譯)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及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薩學長在外交領域的貢獻有目共睹，他同時也是法文系系友會第一屆會長，在經驗的傳承上十分照顧學弟妹。

(四) 系友對系所及師長的歷史回憶之一

走入法文系的歷史 憶法文系第七屆 1970~1974 這一班 李瑞媛

1974年七月底，大專聯招會放榜，公佈了輔仁大學一年級新生名單：四十五位女同學與五位男同學共同開始了法文系第七屆的歷史。我們這一班同學完全吻合了文學院「陰盛陽衰」的特色。尤其五位男同學，更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反觀老師的陣容，除了一口廣東國語的「譚愛」助教與一口標準國語魯汶大學哲學博士的謝凡系主任之外，系上的法籍老師不是「神父」、「修女」，就是景仰漢文化飄洋過海來台的法國人。當時上課，我們猶如「鴨子聽雷」，比手畫腳，為了增進彼此的了解，總是用我們有限的幾個法文字「猜、猜、猜」。往往下課鐘響時，腦汁被榨乾的我們早已精疲力竭，虛脫的我們，衝出教室外以國語大聲喧嘩，宣洩上課時所累積的壓力！

當時法文系的入門規矩：大一第一節課，學生就得各憑直覺選擇自己喜愛的法文名字。一旦進入教室，儼然身處法國境內，以法文名字相稱；直到今日，班上開同學會時，彼此不知對方中文名字的竟然大有人在。

法文名字可以隨意自行決定。但是座位卻得依照學校的規定，按照學號排排坐，方便學校派人「外點」。無巧不成書，前面一半為外型時髦，家住北部通勤的同學；而後面一半為外型樸實，家住南部住校的同學。而五位男同學猶如「逗點」般，散落在南北女同學的段落間。法籍老師對於這五位少數男同學更為憐愛，尤其是徐德助教修女，常以「mon gar n」、「mon coco」暱稱，鼓勵他們認真學習。

大二時，十二位「法語能力高強」從文藻法文組轉學插班進來的女同學，促使這五位「極少數」男同學，不再遵守校規的固定座位，竟然五位一體，隱藏到最號一排的角落裡，企圖遠離班上強盛的陰柔氣氛。但老師們對他們的憐愛依舊。每每上課，杜葉老師總要傳喚 Philippe, Nicolas, Jean, Blaise, Emmanuel 坐到第一排，並不斷的問他們問題……。

往事點點滴滴，道不盡，說不完。當年學習法文的辛苦，是今日學子無法想像的：沒有課本的我們，所有的語言教材都由助教在打字機上，一字一字敲打影印出來，更遑論那本總是不夠用單薄的法漢字典。然而，我們擁有神父和

修女們的關愛卻是永不匱乏的。

承蒙李友仁神父的賞識，1988 年回到系上任教，再度走入法文系的歷史。而當年的師長，多不復見，令人不勝唏噓。所幸，個人還有機會能與尚在德文系執教的古怡心修女，法研所魏蕾特修女和翻譯研究所所長狄明德神父見面交談。三位師長當年懷抱著到遙遠的東方傳教使命感，來到台灣進入輔大。我們這一班，當年是這三位「不會說漢語的」老師首次任教的第一班，如今，他們卻能以流利的中文，對學生進行心靈輔導交談。回憶當年的「狄修士」，今日的「狄神父」，上法文會話課時以「異鄉人」中譯本為教材。根據他的說法，既然沒得買原文教材，中譯本便宜，他又希望我們認識法國文學書，於是在他的「每星期一問：生命意義為何？」之下，讀完全書。而這個嚴肅的問題卻變成日後我個人對生命意義的反省與信仰。

系友對系所及師長的歷史回憶之二
沒有影印機的學生時代
陳淑珍

外語學院在兩年前獲得校方補助在 20 個教室設置衛星電視，任何時候可以同步收看 BBC, TV5, NHK, DW, RAI, TVE 等 10 多個頻道。然而，卻只看見學生守著電視看牛象大賽或午間連續劇。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想像他的老師在沒有影印機的時代如何學法文。

1971 年中秋節輔大校園張燈結彩歡迎新生來受訓。不久就發生石油危機，全球陷入經濟困難。法文系的學生只捧著兩本黑白課本：盜版的 Mauger I & II 及油印本的 Parlez-vous français。說實在話，法文很難，第一個月，我已經有點撐不下去。但想到一個學期學費 3600 元是父親用來養活一家六口的兩個月的薪水，就開始拼命學法文。

當時所有的講義都是助教用油印紙打字印出來的。但上課的內容主要靠圖書館抄筆記或上課記筆記。老師大部分是法國人。加上中古世紀或十七世紀文學課由像 Monsieur Noug*, De Vilette 修女這些第一年抵台充滿熱誠，急性子，說話飛快，拿台灣學生當法國學生教的好老師，記筆記真是痛苦。往往下課幾個同學聚在一起對筆記。考前找個教室由幾個同學當小老師講解內容，下面同學拼命抄。當時竟然能夠每學期讀完好幾本原著。

那時只有學校有德國製盤式錄音機，上實習課 60 人一班，大多數同學都豎起耳朵聽。不必老師喊：大聲一點，就哇啦哇啦大聲唸，好讓助教透過機器糾正。否則，下了課就聽不到法文。上會話課，念慢了，或太小聲，Trouillet 小姐立刻罵：Grands b... 或 petites machines * r... er。現在回想，或許因此

同學的發音大多很不錯。

現在教室有衛星電視，視教中心有衛星電視和錄影機。電腦中心可以上網抓法文資料，聽新聞，看影片。視聽圖書館有許多法文錄音帶，錄影帶和光碟。學弟，學妹們，你們有充分利用嗎？當年我們可是得和同學搶借圖書，比賽誰先在借書單上簽名。

親愛的學弟學妹們，你們可要充分利用輔仁的資源和老師們的學習心得和傳承的熱情。

系友對系所及師長的歷史回憶之三

系主任，你在說我嗎？

黃雪霞

1988年春我完成博士學位回到台灣，因為帶著四歲的老大和一歲的老二，並不急於找工作。不過當然沒有忘記先回母校拜訪恩師路瑞。他除了為我高興外，也急著把我介紹給當時的系主任李友仁。第一次與李神父的經驗被我判定為失敗，因為他的態度並不熱絡，大概是和我沒有任何淵源的關係，而我也因為有點緊張表現的很差。難怪後來他跟路瑞說可以給我幾堂課，但無法給我全職。據說路瑞發揮母雞護小雞的精神，除了力保外還聲稱要把課讓給我，以便我有足夠的時數當專任老師。系主任在他老人家的堅持下就答應了（按照李神父現在的講法他當時的決定是對的！）。而我也在回饋母校的心情下接受了恩師的提拔。

在我的學生時代，趙爸爸是「永遠的系主任」，我回來任教時，教育部嚴格執行系主任一任三年可連任一次的規定，私立學校也不例外。怪不得會出現一位李友仁！總之，當時系上的老師都比我資深，不是當過系主任就是仍然在職進修，一邊授課一邊修學位。我是唯一已完成博士學位的人，所以1990年我接任法文研究所所長，隔年接任法文系系主任。不是我特別優秀，而是我沒有學位的壓力，但對一個剛完成學業，想在教學上盡情揮灑的年輕老師而言，學校的厚愛，早來的行政責任，顯得不是時候。到現在我都還覺得自己教學生涯有如「倒栽蔥」，不過早把行政義務做完也算一種解脫。

輔大法文系一直有一個很好的教學團隊，1991年到1994年之間當然也不例外。我的座右銘就是「無為而治」：當系主任把一門課交給一位授課老師，就不必懷疑這門課的品質；所有的疑慮應該在前置作業中完成，而不能事後再擔憂。以一個「外文人」而言，我個人一直認定大學應以教學為主，研究為輔，

故特別注重教學品質的提升，而我對同仁採取絕對信任的態度。但公關是我的最大弱點，記得我連學生的活動都鮮少參加，希望學生不是以為我高高在上，只是我覺得老師的在場徒增雙方的不自在，反而壓縮學生的發揮空間罷了。對外更是如此。幸好十年前，系所似乎沒有這麼多附加業務，法文系在穩定中發展，一切順暢。這幾年來，系上老師陸續完成學位，精英倍出，是時候讓教學上的先進掌舵了，所以三年一到我就欣然交棒，毫不戀棧。

系友對系所及師長的歷史回憶之五
對系上及師長的歷史回憶
陳麗娟

由輔大法文系畢業、出國留學、回國就業經貿、再度成為輔大的一份子，這一切之於我真是「見山又是山」的感覺！

在法文系與學弟、學妹奮戰法語的這些年，最常被問到的不外乎是：「老師，您為何會對法文如此熱愛與執著呢？學法文好辛苦哦！」；「老師，以前的法文系與現在的法文系有沒有差別啊？」或是「老師，您以前學法文時會不會像我們一樣害怕以後找不到工作啊？」諸如此類的問題。學法文的確是一條辛苦的路（其實學任何語言應該都是如此）；而且就業市場也並不寬廣。然而我因有幸得到一些好師長的陪伴，我得以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且堅持下去。過去與現今的法文系一定有所差別，然而差異來自於時代的不同而非系上師生的互動。而回想我在法文系的時光，我的內心充滿感恩！

甫入輔大，懵懂青澀卻好奇，大學生活與法文都是我陌生的世界，我的挫折不少於其他同學。陳如杏老師，我大一的導師，耐心地陪伴我走過那段學習低潮的日子。古怡心修女，像另一盞明燈，指引我進入法文的複雜語法中。她總是展現她獨特的邏輯力，抽絲剝繭且簡明扼要地讓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課餘時，我常與一些同學圍繞在古修女身旁向她吐訴心事，而她超凡且無私的包容心常讓我的心得到撫慰！想起路瑞老師，我腦中立刻連結到跑「八點」的情境，通車的我每次到了這堂課，前晚已經噩夢連連甚至失眠，那聲上課鈴，常讓許多同學被拒絕在教室外。一旦進不了教室，錯過的不只是「內點加外點」，更是一場引人入勝的散文解說。我必須坦白，在校的我怕極了這位老先生，但是畢業後我有幸定期與他討論中文古典小說的一些段落的中文意思（當時他正在研讀水滸傳，有些中文詞句看不懂），開始認識了另一面慈祥的他。他更熱心地將我大學四年的法文文法重新做了一次訂正，奠定了我後來法語教學的基礎！

大三、大四那些恐懼面對未來的日子裡幸賴當時的導師黃孟蘭，懷著她初執教鞭的熱誠，認真地舉辦許多心靈分享及人格成長的活動，讓班上同學融合並且豐富了彼此的學習生活。在我面對出國的茫然時，她更是竭盡所能地幫我釐清問題，幫助我勇敢面對陌生的國外生活。雷嘉理神父，數不清的日子裡，他與所有去找他的學生談話，他更開啟了我對自己內心的認識。我們幾個同學跟隨他的腳步，去關心智能不足的小孩，去台灣中部深山中避靜，在青山綠水中盡情體會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世界。

還有好多老師在我不同學習階段陪伴著我、影響著我。我想要感謝的太多，但能盡全的卻太少。這些師長的風範、陪伴、教學熱誠以及對法文的學養在我的法文學習及教學每個階段時時影響我。期望自己能追隨他們的腳步扮演好教育者的角色。

系友對系所及師長的歷史回憶之六 對於法文系的記憶

沈中衡

好的老師，會帶給學生許多啟示，而法文系向來就具備這個優點。

記得大一時，程鳳屏老師擔任我們的讀本課。由於當時程老師個人時間安排的需求，因此一週四小時的讀本課，都集中在週一下午五到八節，一次解決。上一節課已經是要人命，同一節課連上四節，簡直是要讓學生當場躺平。可憐的程老師，心地善良，性情溫和，不僅循循善誘，更必須要連哄帶騙，溫柔地向台下東倒西歪的同學打氣，「大家撐一下喔，快要結束囉，再一節課，大家一定要堅持喔」，才能完成一週的課程。

大二的時候，開始有法籍老師的課，而當時的兼任老師，有兩位是年輕的法國女老師，對於男生而言，上課簡直是天大的考驗，因為，上課無法專心，常常只專心看老師，但是上課不專心，又覺得愧對老師，因為每次老師問：「Il y a des questions?」標準答案就是：……………（沈默）

外籍老師之中，還有德文系的古怡心修女。不可否認，大二上古修女的文法課之前，有點小懷疑，怎麼是德文系的修女來上文法課咧？但是一旦開始上課，這層疑慮就完全消失了，因為古修女也是一位循循善誘的好老師，複雜的文法問題，在她的耐心及細心引領下，真可說是看到一線曙光……

還有，義大利來的康康老師（康華倫老師）也是法文系的「怪咖」之一，商業法文課下課 10 分鐘時，他往往就會在 LA 欄杆旁跟我們這一票男生抽煙聊天，而我們也曾經替康老師打工，他所經手的貿易出口業務需要出貨櫃，來不及裝櫃搬運，在他的吆喝之下，一票男生就去當捆工啦！

最後，絕對必須要向路瑞老師致敬！在他的嚴格教導下，我們的法文可以說是被修理得「金兮兮」（閃閃發光）。從發音（compagne campagne 不分）到文法句法（著名的路瑞 100 條文法戒律），都在他的修理範圍之內。除了法文之外，我覺得，路瑞老師給我們的更大的啟示，是在於求學態度，必須「嚴謹」「一絲不苟」。記得大四時，路瑞老師對我們訓斥：「Vous es nuls en français!」也許，他早就忘記曾經這樣說。但是這樣的重話，卻隨時提醒我，「學無止境」，必須時時刻刻保持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心，深入探討問題的細節，法文才能夠進步。

各路名師匯集，有本國籍、法國籍、匈牙利籍、越南裔、德國籍、義大利籍等等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師，齊聚一堂，我想，這是輔大法文系帶給我的最大資產，也是念輔大法文系最大的福氣！

系友對系所及師長的歷史回憶之七

對系上及師長的歷史回憶

簡薇倫

書架上大一的 French in action 課本已從亮麗的白色漸漸染了些淡黃，但課本中 Mireille 衣服的白及裙子的紅，在回憶裡卻依然鮮明；在書店看見小王子小麥色金髮時，總想起那隻被他馴服的狐狸，及大二《閱讀指導》時的法法解釋 *apprivoiser* 即為 *cr r des liens* 之意；大三文法課本中藍色、粉紅色及綠色螢光筆畫線，標示著老師提醒的不同重點；大四作文法文履歷練習裡一絲不苟的黑線，為離開學校後的生活劃下了第一個開端。是的，法文系四年累積的點點滴滴，不僅深深印記在腦海中，更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每當看見學弟妹們為了外語學院啦啦隊比賽，疊了三個人高的人牆，或是為了戲劇排練而認真地背誦法文台詞時，心中感動油然而生，想起以前大家在課業的壓力下，同時也積極參與系上事務：期初學會幹部認領規劃一學期的活動；迎新活動流程、人員、場地及時間的確定；法文週開幕宮廷舞的表演（記得我當時還反串成男生呢！）；為了校慶可麗餅能賣出佳績，之前大家還先試作並開發新口味；法韻獎登台演唱；復古耶誕舞會氣氛的營造……等。只要自己肯用心投入，法文系真的是一個充滿活力及生命力的園地，能訓練自己待人接物及籌備活動的能力，進而開發個人特質。

當然最重要的是法文系老師多元認真的教學，營造出一個利於法文學習的好環境。記得 M. Roch 的 dict ，用長長的法文唸出的標點符號亦納入扣分，著實讓剛上大我的我扣了不少分數；大二黃雪霞老師的閱讀指導，清晰明瞭的講解及心驚刺激的上課方式，幫助我記下了許多單字及法法解釋；黃孟蘭老師銜接大二及大三有系統、條理的文法課，並且在中法文語氣及用法上的仔細比較，更是難能可貴；M. Ricaud 的會話課，獨自面對台下同學及老師的個人法文

演講，不但讓我訓練出膽子，也更敢開口說法文了；還有陳麗娟老師偏重實務的商業法文課程，從小組實際作業中更能奠定商法基礎……等。另外，法文系老師們除了課堂上授業解惑外，更給予學生懇切的建議及適時的關懷，這點是學生我永遠感懷於心的。

系友對系所及師長的歷史回憶之八

對系上及師長的歷史回憶

林幼航

接到助教的電話；黃老師要我寫一篇對系上和老師的回憶。以當年我重修的質與量，還有因為不斷重修所累積的人脈；由我寫這個題目可說是實至名歸。在這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校時的一些回憶吧。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上法文課，第一堂是羅瑞光老師的震撼教育，他一開口就是一連串呼嚕呼嚕的法文，我的老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活跳跳的洋人在我面前說法文耶！驚訝之餘，我想也該轉系了吧！感覺接下來會是四年鴨子聽雷的痛苦旅程。還好，羅老師漸漸露出他善良和藹的真面目，還有令人驚訝的中文能力。說到中文，被李昱庭老師（Ricaud）教過的同學都知道，他是不講中文的。但事實上呢？……嘿嘿嘿，好像真的不會講，也因為如此，上他的課就會喚醒我們所有會說法文的細胞，上一堂課跟上兩堂一樣累；另一位老師舒毅寧（Chaubet）很多同學應該還記憶猶新，Chaubet 老師不但中文說的好，以他對台灣各方面的了解程度，一直讓人懷疑他是長的像外國人的台灣人；感覺很像法國人愛吃的 camembert 乳酪，外白內黃。教過我的外籍老師還有身材很魔鬼的李友仁老師，（跟他比我看起來真像中年人），漂亮的藍凱琳老師以及外形像耶穌的魏樂明老師。李友仁老師的作文課，認真聽可以學到很多老師獨

特的觀點見解，而且他批改作業非常認真，通常他寫的紅字比我原本寫的內容還多，藍老師講中文有很可愛的法文口音，大家一定都記得吧！魏老師則是不說中文一族，但是可以跟他談米蘭昆德拉，可以跟他談黑色慾望（法國搖滾樂團）；他上課內容豐富而且速度很快，通常只有前 15 分鐘能跟的上，之後就有騎捷安特跟法拉利飆車的感覺。

本國籍老師方面，教過我的可多了，有系主任黃孟蘭老師、洪藤月老師、楊光貞老師、黃雪霞老師、李瑞媛老師、陳麗娟老師還有許綺玲老師。本國籍老師除了教學上的專業能力不說，對學生的個人生活還有以後的規劃也很重視。

黃老師，您（為表敬意用 vous）讓我大三文法過了，我到現在還很感激您。

洪藤月老師文學方面的造詣大家有目共睹，對學生也非常的關心，這點大家可能就沒發現了；當年 Pascal 考上教育研究所的時候，老師特地準備了禮物送給他做紀念，還寫了一張卡片鼓勵他；讓我們感動好久。楊光貞老師可要好好介紹了，大一大二沒有上到楊老師的課，只聽說過老師的大名（因為少有老師能制住法文系的惡魔安東尼），大三大四的時候才體驗到老師的殘酷幽默……大四我要重修文法，拿選課單去請楊老師簽名，楊老師竟然誠懇的拜託去重修黃孟蘭老師的，還說她一定求黃老師讓我過，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心頭一陣酸楚…黃雪霞老師聽說近年來已經越來越慈祥和藹了，在我們那時候黃老師是出了名的當舖老闆，老師對學生嚴格，對自己要求也是很高的。我曾在老師的店裡打工一陣子，老師在店裡的時候只要有空就一直讀書，有心要學好法文的人要多多學習；李瑞媛老師當年對我們幾個可是照顧有加，雖然每次都威脅要當我們，不過還是讓我們過了，多謝老師高抬貴手；陳麗娟老師雖然只教過我一門選修課，但陳老師教的商用法文知識讓我開始上班的時候表現得比較不像外星人，有興趣走商同學可以多跟她請教請教；許綺玲老師教過我一年讀本，可惜我沒上到她的選修課，選過許老師課的人都說讚，可惜聽說老

師現在在系上沒開課了。

跟大家分享了這些以前的回憶，希望大家對老師們有多一點的認識，唸法文系，相信大家一樣，會懷疑以後有什麼出路。學校不是職業訓練所，不能交給你一身賺錢的本事，但你能在法文中得到更多人生的智慧，更多深厚的人文素養，更多能陪伴你一生的興趣。不论文學、戲劇、音樂或電影，法文能帶給你的，絕對比你想像的多。

四、系所發展宗旨目標與輔大辦學精神之落實

(一) 法文系的現況：

- (1) 入學管道：近兩年，我們實施大學部與碩士班推甄制度。大學部每年接受 6-10 名，碩士班 3-4 名，其餘學生經由考試進入本系所就讀。大學部招生之名額共計 60 名左右，研究所計 12 名〔兩者皆包含甄試生名額〕。
- (2) 教學特色：就大學部而言，教學計劃分為兩大階段，前二年（大一、大二）以語言訓練為主，所有的課皆為必修課。後兩年（大三、大四）除了繼續部份語言課程，其餘皆為選修課，內容涵蓋法國文學、文化、歷史、法語教學、法語翻譯、新聞導讀、商用法文、歐洲聯盟等。
碩士班的特色在於培養文學、文化、翻譯與法語教學的人才，培養法語師資以因應中學第二外語教學之需求。
- (3) 對外交流：目前有巴黎第四大學、波爾多高等商業學校、艾克斯—馬賽法律經濟科學大學等三所法國姊妹校與我們簽有合作協定。自 88 年度起，已有二十六名大學部同學前往波爾多就讀，自 93 年度起，學生可前往艾克斯—馬賽法律經濟科學大學修讀商業文憑和

法國語文之相關課程，為期一年，並可抵免系上之學分。在研究所方面，自今年 9 月起，也有兩位學生前往巴黎第四大學修讀法語教學碩士之課程。本學年度也將與巴黎第三大學締結姊妹校，今年 9 月已有兩位研二學生前往該校修讀應用外語和法國文學之課程。

（二）近、中程願景：

近、中程願景主要在下列四大領域的實現：

- 教學方面：透過系內專兼任教師之教學會議，持續討論「教學上的難點」進而提升教學水準。
- 研究方面：向整合型研究方向邁進，結合所有專任教師專長執行「法語教學中之跨文化問題探討」之整合型計畫。
- 對外交流：繼續與法國波爾多高等商業學校、巴黎第三和第四大學以及艾克斯－馬賽經濟法律科技大學交換學生，並在各種條件成熟之下交換教授。
- 系友會：編印系友會通訊錄，加強系友間的聯繫。

未來，法文系所努力的目標是在既有的堅固基礎上，不斷給自己增加好名聲，提升對外的號召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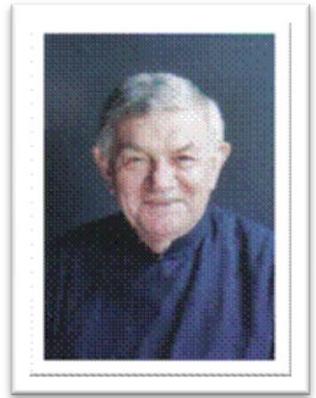
典範人物

趙德恕 神父 Fr. Imre Zsoldos, SVD (1913.01.25 ~ 2009.03.25)

我們摯愛的趙德恕神父 Father Imre Zsoldos, SVD (1931. 4. 16 – 2009. 11. 20)

趙德恕神父年表

1931. 04. 16 出生於匈牙利。
1948-1950 加入聖言會，在匈牙利
Köszeg(初學院)念初學。
1953-1956 在修道院念哲學、神學。
1956. 12. 03 翻越鐵幕到奧地利。
1956-1960 於維也納讀神學。
1960. 05. 26 於維也納晉升司鐸。
1960-1964 於法國 Sorbonne 大學念法文。
1964. 08. 04 抵達台灣，於新竹華語學院學習中
文。
1967. 09. 17-1975. 02. 28 於美國攻讀語言學博士。



回台灣服務於輔大法文系：
1965-1967 參與創系並擔任第二任主任；
1976-1985 第六任法文系主任；
1984-1990 創立並擔任第一任法文研究所所長。
1996. 7. 25 榮獲法國總理頒佈之軍官級教學成就獎
2004 榮獲國際桂冠詩人獎

我們的趙神父

Le Père Imre Zsoldos



趙神父的父親與母親

家中有九位兄弟姐妹





- 成長在二次大戰及共產黨入侵的困頓時代
- 多次面臨死亡的威脅
- 天資聰穎的神父，當電報兵時，常在廁所中讀聖經

柏林圍牆的石頭

- 1956.12.3 逃離鐵幕(匈牙利-奧地利)：半夜爬離鐵幕時，不忘剪下一段鐵絲
- 神父一生追求與捍衛自由
- 1956-1960 年在維也納讀神學，進入聖言會
- 1960.05.26 在維也納晉升司鐸
- 晉鐸後，奉命來台輔大建立法文系
- 1960-1964 年在法國 Sorbonne 大學念法文
- 1964.08.04 到台灣新竹華語學院學中文
- 參與創立法文系

- 在美求學時(1967-75)，
- 才有機會接待父親與兄弟來美國相聚。
- 匈牙利父母墳上的泥土。
- 神父囑咐將來這包泥土要與他一起入葬。
- 1975 年在美獲得博士後，返台於法文系任教。
- 直至 1998 年退休，作育英才無數。
- 趙神父視學生如家人
- 照相的趙神父
- 以戲劇公演的方式，呈現精湛的教學成果。
- 導演「犀牛」時，曾與大師相遇
- 神父熱愛自由、為人慷慨、寬容
- 熱愛中國文化與藝術
- 1996.7.25 獲法國總理頒佈之軍官級教學成就獎
- 1998.11.1 獲頒匈牙利中等十字勳章
- 2004 年獲國際桂冠詩人獎 12
- 退休後生活依然多采多姿，更積極牧靈。
- 2008.04.16 神父 77 歲生日慶生。



- 趙神父是吸引系友回娘家的票房保證 14 左至右：楊啟嵐老師、楊光貞老師、沈中衡老師、黃孟蘭院長、趙德恕神父、黃雪霞老師、洪藤月老師、陳淑珍老師、袁平育老師。
- 2009 年 3 月 14 日於高雄宗教交談活動後中風。• 在高醫、耕莘及台大等地接受治療，恢復良好。
- 在黃太太細膩的照顧及聖言會弟兄的關心中，復健穩定後，開始可以清楚語言表達。
- 十一月初，神父自覺即將離世，開始祝福近人，很愛與會內弟兄說話。
- 2009 年 11 月 20 日清晨突然身體不適送醫，於上午 6:00 安息主懷。

路瑞 老師 André NOUGÉ (1924~ 2008)

路瑞教授 (Prof. André NOUGÉ)



路瑞教授出生於 1924 年 6 月 22 日，卒於 2008 年 4 月 17 日，享年八十四歲。路瑞教授於 1970 年首度抵達台灣輔仁大學，兼任於法文系一年後，旋即開始二十一年之久的長期教職，首先於 1971 年起擔任專任副教授十三年，之後有鑑於法文界對文學、文化專才之強烈需求，路瑞教授曾於 1985 年專任於陽明山文化大學法文系一年，然後再度回到輔仁大學延續三年之專任教職。二十一年期間，曾多次增援淡江大學、文化大學課程，一直擔任輔仁大學法文系專任教職到 1989 年屆齡退休，之後依然留在輔仁大學，以兼任副教授身份任教至 1993 年，始返回法國終老。

路瑞教授在法國海外以如此長期之服務年資，深耕於台灣，儼然具備法國文化大使之風範，短暫期間，因為文化交流之實質需要，在我國與法國缺乏邦交的情況下，路瑞教授曾經首肯承擔台灣旅法簽證工作，使他於專業授課之餘，累增許多實質外交工作業務，由此可見他的服務犧牲精神之可貴。

路瑞教授之學識淵博，除了法國高等師資檢定資格以俄文為專業師資學歷之外

(Agrégé de russe)，還精通德語、英語，透過他所授課的法國文化史、現代散文名著選讀、作文等等高年級及研究所課程，帶給學生深刻影響，上課中所發生的趣事常常是學生津津樂道的內容。

路瑞先生是嚴師，但是也是許多人心目中的可敬長者，在他任教期間，曾辦中幫助許多學生完成更高一階層的求學美夢，不論是在金錢方面，或是在知識方面，都不吝於給予，除非受惠學生主動透露，他自己絕不會加以宣揚，因此讓更多人感念至深。

杜葉 老師 Annick TROUILLET

杜葉(1922-2002)

Annick TROUILLET

1922年12月14日出生於法國 SACONIN

學歷

1949年 巴黎大學英國語文文法與語法學學士

1950年 通過英國倫敦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1964年 高棉金邊大學法國語文文法與語法學學士

1965年 高棉金邊大學英國文學學士

教學經歷

1946~1949 法國蘇瓦松市(Soissons)語言中心

Institut de la Croix 教授法文、英文與拉丁文

1949~1951 英國倫敦天主教私立學校

Virgo Fidelis School 及 Overstone School 教授法文

1951~1954 法國巴黎天主教私立學校 Ecole de la Source 教授英文

1956~1972 高棉金邊法國文化協會擔任法文教師

1972~1987 輔仁大學法文系任教

記得 1971 年剛進法文系讀大一的深秋，我的大二直屬學長卓忠正(Paul)，現經濟部駐南非代表，就特別提醒我和同學再杜葉小姐(Mademoiselle Annick Trouillet, 1922-2002)生日那天一定要拎個蛋糕去陽明山她家拜碼頭，雖然她並不教大一，否則以後會死得很慘。現在回想起來，其實學長們體會到他對台灣年輕人的熱情與毫無保留地付出，呼喚大家要「惜惜」她，幫她熱鬧熱鬧，並非真的要拍馬屁。不過她無論外表或脾氣還真地挺恐怖的。那時她已 50 幾歲，長得瘦巴巴，鷹勾鼻又駝背。有回在個法國詩人演講的場合，有位坐在第一排左邊的學長趁她上台致歡迎詞時為她來個素描，還真像巫婆。這位學長還當眾送給她，她竟樂得哈哈大笑，秀給大家看。可見她挺有幽默感，人並不是真壞。

提起杜葉，被她教過的學生一定忘不了她的兩句上課口頭禪：Grand bébé！（長不大的娃娃）和 Petite machine à répéter！（只會重複唸的小機器）。她教會話課，針對情境主題介紹個句型後，一定點同學大聲口頭造句。不會造句或扭扭捏捏支支吾吾，立刻賞你一句：Grand bébé！大家全程神經緊繃，也沒人敢小聲或動作慢，因為會被罵個臭頭，罰唸到她滿意為止。之後，她會把正確的句子超在黑板上，另外點同學大聲唸一變。整個黑板唸完了，她一句一句擦掉，又點另一個同學背出句子。真是緊張恐怖到極點。唸玩了，不知哪點她不滿意，她就大吼：Petite machine à répéter！奇怪呢？不是她要我們一再重複唸的嗎？真冤枉。那時的學生不會也不敢說老師莫名其妙。也沒人敢去找系主任古怡心修女告狀，修女會說這是老師的苦心。可能是因為這種戰鬥營式地反覆大聲唸教學法，同學大致發音不錯。過了三十年不用法文也能來幾句。

不過，上她的課唱了不少法文怪老歌和童謠。那時沒有那麼多法語歌曲錄音帶也沒影印機可印歌詞，都是杜葉抄黑板，由她五音不全的唱一遍。我們班上有一群新竹女中的同學很會和聲，任何歌唱第二遍，她們立刻和聲進來。例如，”A la Claire fontaine” 合起聲來就挺盪氣迴腸的。所以杜葉更愛教我們唱歌。我們也樂得不用被罵，唱得更起勁討她開心，自己也討個清靜。到了三年級會話課幾乎都在演戲。先是改編法文劇本，後來，我們班分組把「戲鳳」，「孟母三遷」等編成法文搞笑版。尤其班上有個白白胖胖男生最愛男扮女裝，例如，演「貴妃醉酒」把杜葉逗得開心極了。記得有一回我演所羅門王故事中的一個

乞丐，演技可能太好了吧，杜葉竟然從最後一排衝倒在我面前指著我鼻子說：「我給妳 200 分」。結果那個學期會話課得 98 分。

大學四年我去了她家三次，每次都是不同的房子。不管是公寓一樓或有前後院的別墅，都可以看到杜葉用很簡單的東西把房子布置得很有味道。例如，門口擺個醬菜陶缸子裡面插把野外摘來的芒花。她做的法式沙拉酸酸的，色彩繽紛，真好吃。耳濡目染，我後來也很喜歡變化房子擺設也愛吃油醋沙拉。大一跟著學長去拜碼頭那一次，果然，四個年級全有代表到，有五、六個蛋糕。杜葉高興得給每個人來個兩下法式貼臉。不過，午餐後，一哄而散。我不知道為什麼和三個學姊留下來在書房席地而坐聊天。在昏黃燈光下，我竟然初生之犢不怕虎問她為什麼沒結婚？當然是學姐幫著翻譯。她說要結婚要渴望婚姻(Il faut le desirer)。可惜我記住這句話，卻到快四十歲人生碰壁了，想找個長期飯票避難時才領悟這句話的意思。可是青春已逝，沒人要，走上和她同樣的路。

杜葉退休回去法國，有很多學長在巴黎和她碰面。說她活得很自在，下午偶爾帶著一本小說去咖啡館蹲，她說不必每次都一個人在家喝咖啡。希望我老了也和她一樣會享受生活。雖然上課也很兇，當然沒她的十分之一兇，學生畢了業，偶爾和同學談起我也會感謝老師曾嚴格要求過，且聊起往事時也笑個不停。

西文系系史：外語學院西文系系史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系史

Historia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la Universidad Fu-Jen

馬巧音 Verónica Ma

輔大西班牙語文學系（第三十八屆畢業生）

一、系史與發展

- (一) 西文系大家庭的共同情感
- (二) 憶當年
- (三) 近年現況
- (四) 系址
- (五) 歷任系主任、所長

二、本系所特色

- (一) 師資
- (二) 助教
- (三) 課程
- (四) 課程科目及演變
- (五) 設備
- (六) 系學會
- (七) 獎學金設置
- (八) 與西班牙大學合作學程
- (九) 系所活動
- (十) 畢業生
- (十一) 畢業系友發展

三、未來前景與發展

- (一) 近期發展計畫
- (二) 中期發展計畫
- (三) 遠期發展計畫

寫在文後

特別感謝

附表：歷屆師長

一、系史與發展



(一) 西文系大家庭的共同情感

在去年 2003 年輔大盛大慶祝在台復校 40 週年慶之際，西文系同時也開始提前暖身，為即將到來的 2004 年，準備一連串盛大慶祝創系四十週年的活動。系主任帶領老師們以及系學會同學們，積極聯絡遍及各界的歷屆系友，並籌備出版第一本慶祝創系 40 週年之特刊，隨後更將刊物寄送到眾系友手中，以邀請系友們屆時回校，來參加此一意義深長的慶祝大會，共同見證西文系穩健地邁向 40 週年的生日。

西文系從草創，一步步地建立規模、擁有大量來自西語系國家的專業師資、同時也培育出許多優秀的台灣籍西語師資、並不斷地提昇教學品質，直到現今於社會上普遍受肯定為，全台最優良的學習西文之學術單位，在西文界長久位居於翹楚，這些傲人的成就都是由一批早期 60、70 年代來到台灣的西班牙人、中南美洲國家人士們的默默耕耘而形成；再加上一群熱心、認真且無私貢獻的神職人員，包括天主教耶穌孝女會、天主教伯利斯仁慈聖母傳教會（仁慈會）的修女們；以及天主教聖言會、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修士們不計代價地付出，所累積所共同建立起來的成果。我們活在當下享受前人留下的有目共睹的美名，展望未來的同時必定要感念前人的辛苦耕耘，沒有這些教授及神職人員們的付出，秉持一貫的教學精神，就沒有現在的西文系。

從 1964 年以來，西文系就一直以「我們是一個大家庭」自許，也許是拉丁民族的熱情血液始然，老師跟學生的感情，就像是朋友和家人一樣親密。老師們授予學生的除了課堂上的知識，也包含了人生經驗還有做人處事的道理，課後師生互動的收穫更是往往都讓學生們出乎意料之外。因為學生們能從書本

上學到的西班牙文跟文化其實很有限，老師們這時候就像是活教材一樣，一步一步帶領學生體會西班牙文的美、西班牙文化的精髓、西班牙人的熱情、西班牙美食的獨到之處，學生們也在同時受到潛移默化，對西班牙產生一種無法言喻的特殊的感情。系上大部分的外籍老師們其實中文程度都非常好，但是為了讓學生練習習慣把語言講出口，遇到學生的時候都一定會用西文交談，並且很有耐心的聽學生講完要表達的話。同時老師們也利用很多生動精彩的課程，為學生呈現各式各樣西班牙，例如帶領學生做西班牙料理、唱西文歌曲、看西文電影、請西語系國家人士來校演講與學生交談、遇特殊節日時更帶領學生穿著特殊服裝模擬節慶。因為這層對於西班牙同樣的歸屬感，讓融洽的師生關係，40年來從不間斷，並且在每年每年的新生中繼續發酵。除此之外，隨著40年過去，當初的資深教授們也大都退休或者由於年歲已較長，任課數目越來越少的情況下，本國籍的老師在未來更顯重要，具有更多時代意義，承先啟後，繼續培育新一代的新血，讓西文系的優良傳統及人道關懷延續下去，正是當前現任教師們的努力重點。



（二）憶當年

1963年輔仁大學在台灣復校，現今的西班牙文系前身為理學院（註1）外文系的西班牙文組，於復校第二年（1964），民國五十三年時正式成立，當時由劉巴丁娜博士（Dra. Remedios Bardina de Liu）（註2）擔任當時代組主任。劉巴丁娜博士學識淵博，擁有兩個博士學位，在當時的台灣有如此高學歷的教授很少見。她同時精通中文、西文、加泰隆尼亞語、德文，為人十分謙遜且和藹可親，當時任教於西文組，且實際上已經由



劉巴丁娜教授

其完全負責組上教學及發展事務，但劉巴丁娜博士不願居功因此並無正式接下主任一職，名義上僅為代組主任，直到 1965 年由天主教聖言會會士，安明德博士 (Dr. 華 gel Armend iz) 繼任為西文組主任。

草創階段的西文系歷經兩任主任不辭艱辛，全心投入西語教學，延攬西語系國家教師共同為西文系奠基工作努力。1967 年 (民國五十六年) 時正式改組為系，自外文系獨立出來成為西班牙語文學系，為台灣第二個西班牙語文學系 (註 3)。安明德博士為西文系改組為系之後的第一位正式系主任，繼劉巴丁娜博士之後的第二位主任 (註 4)。1968 年於任內發行系上首本系刊，名為 Faro，全用西班牙文刊出。此外自 1969 年本系開始有以西文發音的話劇公演之傳統，安明德博士擔任系主任迄 1970 年。



莫若蘭教授

第三任系主任由莫若蘭博士 (Dra. Carmen Morales) (註 5) 擔任，直至 1979 年六月於任內由於積勞成疾不幸逝世，在莫若蘭教授擔任系主任長達 9 年任內，繼續為系上擴充資源，自 1971 年開始採用新式密集教學法，大量自西班牙添購圖書雜誌，同時擴充教學設備、增加課外活動項目，舉辦演講、辯論、競賽及話劇演出，儘使本系在學藝、學術方面均日臻完善，系刊也於此時更名為 Dicho y Hecho 每年繼續發行。此時並開始製作系上回憶錄【Memorias】，紀錄系上的歷史、老師們的資料，以及每學期的活動、及系上重要沿革。

由於莫若蘭教授突然不幸逝世，臨危受命繼任的第四任系主任為天主教耶穌孝女會 (Hijas de Jes) 安秀貞修女 (華 geles de Dios Trilla)，安修女教學認真，對學生十分有耐心且親切仁慈，從本系尚為西文組時即在系上任教，並編纂國內第一本以西文解說之西文文法書及語法結構分析專書，嘉惠



安秀貞修女

學子，與劉巴丁娜博士同為本系創系之最大功臣。安修女擔任本系主任直到1982年，於任內積極籌劃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的雛形與未來發展方向，並於1982年報部通過，在第五任系主任上任時正式成立。



雷孟篤教授

隨後第五任系主任由雷孟篤博士(Dr. Jos* Ram 蘭 varez)接任，民國七十一年(1982)，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正式獲准成立，雷孟篤教授同時擔任系主任暨第一任研究所所長。研究所的成立開闢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所另一個里程碑，除提供有志者進修的管道外，更是培育國內西語教學師資的學術殿堂，以及提供百工各業西班牙語人才的需求。1985年西文系開始啟用溝通式教學法，從那時候起使用以此一教學法為架構的 Para empezar、Esto funciona 等為教科書。(註6) 1986年與外語學院其他研究所，共同發行外語學院研究生論文選刊以及 Research Paper 兩種刊物。1987年開始發行 Encuentros en Catay 《會晤在中國》西文學術期刊，出刊至今已十多年從未間斷。每年一期十餘篇國內外學者學術論文，研究主題包括文學、語言、藝術、思想、歷史、政治、經濟，並向國外推薦台灣文學與藝術，已與國外多所知名大學做此學術期刊交流。1988年，西文週活動(La semana Española)開始舉辦，讓除了西文系之外的輔大學生，也一同感受西班牙的魅力。雷孟篤教授擔任系主任暨西研所所，長達8年直至1990年，當時外語學院有另一重大的使命賦予雷教授，即是認命其為外語學院院長(註7)。



宓博多副教授

第六任系主任自1990年到1996年由宓博多副教授(Dr. Leopoldo Vicente Tavera)，擔任，同時期的第二任西研所所長則是由白安茂(Dr. Manuel Garc Bayo)博士擔任，兩位教授任內也持續為同學帶來更多西語學習資源，以提昇學生西文能力。宓教授任內多次接待西語



白安茂教授

系國家貴賓至系上參訪並進行演講，提昇學生視野並提昇系上國際知名度。白安茂教授以其在戲劇表演方面的專業，從多年前即開設表演藝術課並指導學生話劇活動及畢業公演，給予演技及技術上的協助，至今仍熱血沸騰地持續為戲劇貢獻心力。(註8)白教授於西研所所長任內，曾帶領研究生們自行發行報紙，名為 *Voces*，內文全由研究生以及教授以西文寫成。此外，白教授也帶領研究生進行西文戲劇劇本、小說等之西書中譯，完成數部經典作品，由中央出版社出版發行。

之後接任的第七任系主任暨第三任西研所所長，是卸下外語學院院長一職再次回到西文系掌重任的雷孟篤教授。1996年雷教授第二次擔任系主任暨所長一職直到1999年，於其任內1996年本系開始與西班牙大學締結姊妹校，先後與位於首都的馬德里大學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以及東部瓦倫西亞自治區的亞里坎特大學 (*Universidad de Alicante*) 大學合作，讓大三以上學生前往西班牙，進行一年的語言與文化學習課程。1998年並與外語學院其他各系，開始合辦外語週活動。雷教授精通中西文，長期研究中西文化比較及漢西互譯，並對西班牙文文法有其一套獨特易懂的教學法，此外並出版了為數眾多的西文學習相關書籍、辭典及詞彙，用著作等身來形容雷教授對台灣的西文界的貢獻或許還嫌些許不足。雷教授擔任西文系老師將近三十年，作育英才無數，並持續關注中西文化，長期擔任本系出版之 *Encuentros en Catay* 《會晤在中國》西文學術期刊總編輯。

以上7位前系主任及前所長皆為西班牙籍人士，千里迢迢自西班牙來到台灣並無私的貢獻出自己的所長，除了認真融入台灣的生活，也努力地傳授自己本身的西班牙文化給台灣的莘莘學子。在資訊尚不發達且來自西班牙的教學資源缺乏的時代，沒有多少西班牙文書籍可以使用，老師們通常都是自己準備講義，以自身學識的專長選擇適合學生程度的文章及教材，並且耐心的為學生們一次再一次的解釋，直到學生了解。教授們也不斷地盡其所能地，從西班牙帶

來許多各式各樣的書籍、文學名著、雜誌、旅遊資訊、百科全書、視聽教材、西班牙傳統服飾、……等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班牙文物，持續不斷，用心地豐富系上的西班牙風味。

(三) 近年現況

1999 年之後至今 2004 年，都是由本國籍教授擔任系主任暨所長的職位。分別為第八任系主任暨第四任所長的孫素敏博士、第九任系主任暨第五任所長的傅玉翠博士，以及第十任（現任）系主任暨第六任所長的杜東璫博士。此三位前後任及現任系主任都是由本系（所）畢業之系友，由此可見，前人的耕耘在西文系終於開花結果，三位系主任於任內皆以前人之犧牲奉獻之精神為榜樣，努力不懈，並與全系師生共同為西文系的發展而工作。



孫素敏副教授

孫素敏主任於 2000 年七月隨同夫婿因公務而前往中美洲後，由傅玉翠教授接掌主任一職。傅主任於任內除了秉持西文系一貫的教學精神外，更將西班牙活潑熱情的天性推廣到全系，鼓勵支持學生發展各項活動，並延續前人的讀



傅玉翠副教授

書風氣。2001 年並與位於西班牙中部學風鼎盛具有盛名的文化古城，薩拉曼加大學（Universidad de Salamanca）締結姊妹校，並於西元 2002 年起，讓大三以上學生前往該校就讀國際語言文化課程。2001 年並成立西文系所發展基金會獎助學金，至今補助多項西文系活動進行以及刊物出版，並提供同學獎助學金。

2002 年，邀請西班牙 Salamanca 大學西班牙語文系教授 Juan Felipe Garc Santos 蒞臨本系，進行為期三天，一共六場有關語言、教學以及文學演講，同年並與外語學院其他各系舉辦一系列之畢業公演

戲劇聯展。2003 年，大學部及研究所共五位學生，由一位老師帶領前往墨西哥展開為期四個星期的志工服務之旅；該年並開始籌備四十週年系慶，由系學會製作 Pionero 特刊一號。

2003 年由杜東璫博士接任系主任暨所長，杜主任非常重視系所傳統之傳承，並且努力將西文系的各種活動及表演向外推廣宣傳，讓外界對西班牙有更多的認識並分享我們努力的成果。2003 年配合輔大在台復校 40 週年，西文系擴大舉辦系慶活動，邀請所有畢業系友及所有師長們回校，並於系友回娘家之系友聯誼大會，經系友直選出第二屆系友會會長許淑悅女士（註 9）。



杜東璫副教授

（四）系址

外語學院大樓二樓 LA 217，上課教室遍及外語學院大樓 LA、LB、LC 及聖言樓。



(五) 歷任系主任、所長

歷屆系主任：

第任	姓名 (中文、西文)	任期
一	劉巴丁娜博士 Dra. Remedios Bardina de Liu	1964 - 1965
二	安明德博士 Dr. Ángel Armendáriz	1965 - 1970
三	莫若蘭博士 Dra. Carmen Morales	1970 - 1979
四	安秀貞教授 Madre Ángeles de Dios Trilla	1979 - 1982
五	雷孟篤博士 Dr. José Ramón Álvarez	1982 - 1990
六	宓博多教授 Dr. Leopoldo Vicente Tavera	1990 - 1996
七	雷孟篤博士 Dr. José Ramón Álvarez	1996 - 1999
八	孫素敏博士 Dra. Julia Sun	1999 - 2000
九	傅玉翠博士 Dra. Andrea Fu	2000 - 2003
十	杜東瑞博士 Dra. Regina Tu	2003 -

歷屆所長：

第任	姓名 (中文、西文)	任期
一	雷孟篤博士 Dr. José Ramón Álvarez	1982 - 1990
二	白安茂博士 Dr. Manuel García Bayo	1990 - 1996
三	雷孟篤博士 Dr. José Ramon Álvarez	1996 - 1999
四	孫素敏博士 Dra. Julia Sun	1999 - 2000
五	傅玉翠博士 Dra. Andrea Fu	2000 - 2003
六	杜東瑞博士 Dra. Regina Tu	2003 -

二、本系所特色

(一) 師資

輔大西文系是國內西文系唯一單班招生的教學單位，師生人數比例最為接近。會話課程由外籍師資擔任，以利同學訓練原文聽說的能力。文化、文法相關課程需多方講解與深度閱讀的教材，一、二年級學生以中籍教師為主，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三四年級時即以外籍師資使用全西文教學。依年級高低設有語言、文化基礎與進階課程，讓學生們奠定相當的語言基礎和文化素養。亦根據大學畢業生與就業市場可能發展的方向另開設各項相關實務課程，讓畢業同學在步入社會前能有更好的準備。研究所亦延續大學部辦學的宗旨，課程豐富，積極培養加強同學西語語言與文化專業深度

西文系所外籍師資豐富，皆聘用資深且富教學經驗，長住台灣多年之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等西語國度的西語教師，教授純正且符合時代潮流之西班牙文，他們了解台灣學生學習西班牙文之困難處且知道克服的方法。並由於輔大為天主教學校，有許多以西語為母語的外籍神職人員在本系任教，他們學識豐富，一生貢獻於教會並熱心致力於教育工作，課後也都樂意利用自己時間與學生相處，讓學生練習講西文，詢問課業問題，並樂意投入參與學生的課外活動。

從創系以來，外籍神職人員們對於西文系的持續茁壯，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這些可敬的修女、修士、神父們大致上來自四個天主教團體修會，分別有：

1. 耶穌孝女會(Hijas de Jesu): 梅文彬 Mar Piedad、范靜貞 Mar Josefa Garcia、古世芳 Pilar Gutierrez、安秀貞 Angeles de Dios Trilla、田松韻 Mar Victoria Eceizabarrena、陸佩芳 Juana Ros Gabarain、何美德 Josefa Gonzalez Velarde、賈玫瑰 Rosario Gallego。
2. 伯利斯仁慈聖母傳教會 (Mercedarias de Beriz) (仁慈會): 柏海星 Bego Alber、安韜怡 Alicia Gonzalez、李懿德 Margarita Gonzalez、孟哲慧 Isabel Arana。
3. 耶穌會(Compañía de Jesus): 穆宏志 Jesu Maria Muñoz、賴甘霖 Andrés Diaz de Rago、沈起元 Fernando Mateos、孔達仁 Ricardo Gonzalez。
4. 聖言會 (Verbo Divino): 安明德 Angel Armendiz、方友良 Juli Fernandez。



系上同時並延請，留學或旅居西語系國家多年的本籍教師擔任課程，以及讓已學習西文多年，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協助學生，期使學生能因經常接觸，在耳濡目染中獲得實際進步。尤其自西研所開始招生之後，已培育出許多優秀的西語師資，許多學生自西研所畢業之後也留在系上教書，以自身的學習經驗教授學生並成為學生學習模仿的典範。(註 10)

(二) 助教

西文系教師以外籍老師為多數，而大部分學生們進西文系時都是完全不懂西文，因此助教在系上扮演了很重要角色，成為老師跟學生的溝通橋樑，並處理學生的疑難雜症。早期系上助教有兩位，一位管理系務，另一位負責管理語言實習所，直到近幾年由於學校政策改變，助教改為由一人擔任，系上並聘請 1 至 2 位工讀生協助助教處理行政事務。第一任助教為本系第一屆系友許麗華及許錦玉，第二任為第三屆系友許淑悅及馬秀美。之後的助教有：姜靜瑜、劉德立、杜淑霞、柯吟真、陸孟雁、陳淑貞、張靜芬、王文華、周文麗、劉俊君、聶筱秋、陳千惠、郝寶芬、許玉燕、陳惠真（現任），其中大部分也都是本系畢業系友。

(三) 課程

學習外語最重要的是需具有良好的環境與優良的教師，西文系多年以來一直秉持的宗旨就是：使學生能學到純正的西班牙文而且能具有聽說讀寫之能力。課程的設計強調整體發展，舉凡語言、文學、藝術、文化、歷史、地理、商業、社會民俗等皆囊括其中；除了介紹西班牙，也將課程方向的視野擴及中南美洲，意旨在培養具備優良西語溝通能力與健全人文素養之專業人才。所以本系首重基礎語言之訓練，再進一步延伸至文學藝術、社會文化思想等深層領域，提供學生多元化之發展空間，使學生得以深入瞭解西方語言特質、人文傳統及文化

內涵，並能回饋社會，進而提升本土文化水準。

(四) 課程科目及演變

西文系非常重視語言基礎的奠定，因此課程幾乎全部都是西班牙文的專業科目。綜觀多年來課程的演變，可以發現早期的文法課為了及早奠定學生基礎，雖然只有在大一大二時有上，但是份量很重，有時是4學分，有時甚至是6學分。而選修課少，大部分都是必修及校定共同必修課程。三、四年級之後開始有各式各樣西文專業科目開設，以訓練學生習慣使用高級西班牙文。

早期學分數因應課程需要小有變動，大致學分數都為168~176之間，此一數目已算是大學中課業頗重的科系。近年來學分數已少了許多，自89學年度起，西文系畢業學分為158學分，但比起128此一大學規定的最低畢業學分仍多出許多，這顯示從創系以來西文系一直非常重訓練學生語言能力。研究所亦延續大學部辦學的宗旨，課程豐富，積極培養加強同學西語語言與文化專業深度

目前(2004年)學分要求大學部的大學共同必修課程為40學分，本系專業必修課程為102學分，畢業總學分數共158學分。研究所的專業必修課程20學分，論文4學分，畢業總學分數共36學分。

以下為第一屆畢業生課程內容

一 年 級
系必修：西班牙讀本及文法(4)Gramática y lectura de español
系必修：實用西班牙文(2)Español práctico
系必修：西語實習(1)Laboratorio
共同科目：國文(4)Chino / 英文(2)Inglés / 英會(1) Conversación de inglés / 英語實習(1)Laboratorio de inglés / 人生哲學(2) Filosofía / 理則學(2)Lógica / 西洋文學概論(3)Literature occidental

二 年 級
系必修：西班牙選讀(4)Antología de literatura española 系必修：西班牙語音學(2)Fonética 系必修：西班牙文作文(2)Composición 系必修：西語實習(1)Laboratorio 系必修：西班牙文化史(2)Cultura española 共同科目：大二英文(1)Inglés / 中國近代史(2)Historia china moderna / 普通心理學(3)Psicología / 英語實習(1.5)Laboratorio de inglés
三 年 級
系必修：西班牙會話(3)Conversación de español 系必修：名著選讀(4)Obras maestras de literatura 系必修：西文修辭學(3)Retórica 系必修：西語實習(1)Laboratorio 系必修：新聞體習作(2)Periodismo 系必修：翻譯習作(2)Traducción 共同科目：國父思想(2)Pensamiento del Dr. Sun / 西洋文化史(3)Cultura occidental / 社會科學概論(2)Sociología
四 年 級
系必修：西班牙文學(2)Literatura española (conc.) 系必修：會話(2)Conversación 系必修：名著選讀(4)Obras maestras de literatura 系必修：西語國家地理(2)Geografía (España e HA) 系必修：翻譯及習作(2)Traducción 系必修：應用文(2)Correspondencia 系必修：演講學(1)Oratoria 選 修：聖經文學(2)Biblia / 現代文學(2)Literatura contemporánea

第一屆的課程表已大致完備，西文系主修的重點都已具備，包括文法、讀本、名著選讀、作文、實習、語音學、翻譯、文學、史地……等等，除了上述的課程之外還有：修辭學 Retórica、國際組織與現勢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聽寫 Dictado、繪畫史 Nociones de arte、教育學概論 Pedagogía、藝術史 Arte española、教育心理學 Psicología de educación……等。近十餘年來隨著時代變遷，也陸續增加了西班牙文化概論、拉丁美洲社會文化概論、聽力訓練、經貿西語、媒體教學、詞彙與閱讀、流行文化選讀……等等課程。

（五）設備

本系教學資源豐富，設備完善。自然科學暨外語圖書館藏有西文專業書籍近一萬五千冊，西文相關期刊約四十種。其內容涵蓋極為廣泛，足堪符合同學求知需要。此外，學習語言必備之視聽教材，如錄音帶、錄影帶、幻燈片、投影片等，一部分由本系教授配合教學需要精心錄製，另一部分則直接購自西班牙，近兩年並廣為購置專業語言互動學習之光碟教學與應用軟體。目前統籌由本院語言視聽教學中心管理，自由開放給同學利用。為開闢多元化之語言教學管道，本系 1987-1988 年與空中大學及華視合作空大西班牙文課程，亦為可茲同學運用之優良教材。另外，本系教授並受邀於教育廣播電台開播西語教學課程，且支援本校推廣教育課程之西語教授，進一步提供同學自修需要。

本系辦公室另有許多外賓贈送以及系上自國外訂購的西文書籍及西文期刊供學生、研究生及老師們借閱，只要填寫西文系書籍借閱本即可借出閱讀。另外本系自 92 學年下學期，將於外語學院 LC2 樓之研究生研究室成立西文系所圖書館。

（六）系學會

西文系學會全名為：西班牙語文學系學生委員會，是西文系的學生自治組織，成立學會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學生的利益與權利，配合學校推行各項活動與行政項目，成為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樑。

在此之餘，學會更舉辦各類型的活動，以豐富學子的大學生活，並透過這些活動來帶動系上的氣氛，凝聚大家的向心力，讓老師和同學間的互動更加熱絡，並增進彼此間的情感。學會也始終如一，將西文系是一個溫馨的大家庭的氣氛繼續傳遞給學生們，大家互相提攜、關愛，一同攜（西）手邁向西文的知識殿堂。

系學會主辦的活動主要分為娛樂性、學術性，以及共融性三大類型。娛樂性活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消除大家鑽研知識的疲勞與壓力；學術性的活動目的主要是豐富大家的西班牙常識與知識，藉由演講或其他形式的各類活動，增加大家對西班牙和中南美洲這幾個國家的文化和人文風情的接觸，同時進一步了解彼此的獨特性和差異性互相了解。學術性的活動不但可以讓學生學習課本上學不到的內容，且相較於課本也更加具有趣味性，對於系上的師生有著莫大的幫助。共融性的活動目的分為兩種，一是團結本系師生之間的師生情誼，二是連繫本系與各校友系之間的感情。西文系學會雖然力量微薄，但會盡守本份辦好系上活動，配合學校進行各項學生事務。行有餘力，必將發揮人本及大愛之精神，為國家社會盡一份微薄心力。

（七）獎學金設置

感謝熱心教育之社會人士與畢業系友捐款。自民國九十年（2001）十一月本系所成立西文系所基金。捐款人名冊如下：

游標榮先生夫人（社會賢達人士）、陳惠姿女士（學生家長）

黃耀生先生、許藝娟小姐、陳貞伶小姐（以上三位皆為西文系畢業系友）

依捐款人指定用途，或由西文系所管理基金會決定用途。

1. 游標榮先生夫人獎助學金： 每學期申請一次，以本系學生在經濟上需要者為對象，至今每學期金額共二十餘萬元。受惠學生共五十七人次。
2. 系所發展基金： 曾補助民國九十二年（2003）一至二月為期一個月（一位老師及五位學生）的墨西哥志工之旅。

除此之外另有：1. 校友會獎學金：獎勵學業成績優良者。2. 校方暨外語學院提供之獎助學金多種供學生申請。包括全校性清寒、優秀獎學金之外，系上每學期由西文系基金提供十五至二十名 8000~10000 NT 獎學金（包括清寒及優秀獎學金）。另外第二屆系友會也在 2004 年 4 月 24 日正式成立【劉巴丁娜獎

學金】及【莫若蘭獎學金】，以紀念此兩位對系上貢獻良多的已故教授，會長許淑悅小姐並拋磚引玉率先捐款，之後陸續有多位系友也熱心捐款。

（八）與西班牙大學合作學程

多年前起西文系開始了大三學生赴西求學一學年方案。迄今已與馬德里（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大學、東部瓦倫西亞自治區的亞里坎特大學（Universidad de Alicante）、中西部薩拉曼卡大學（Universidad de Salamanca）締結姊妹校。近年來安排學生至學風鼎盛的文化古城，薩拉曼卡大學的西班牙語言與文化國際學程就讀，每學年評估考量，設計課程提供同學優良的學習環境。

此外並有西班牙大學暑期進修，定期舉辦暑假短期進修說明會，提供同學資訊前往西班牙進修。近年來與巴亞多利大學（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馬德里附近的阿爾卡拉大學（Universidad de Alcalá）合作經驗愉快，學生受益良多。

（九）系所活動

西文系舉行的活動非常多樣化，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從多年前就有話劇表演的傳統，全劇並以西文發音（註11）。早年系上的活動多由老們策劃，然後由老師們帶領學生進行，包括西文競試、朗誦詩歌、作文比賽、即席演講、校外旅遊、畢業旅行皆是。另外學生之間也有些自主性的活



動，例如曾有 La Tuna 合唱團、學生間的團體翻譯、學長姐與學弟妹間的小老師課業輔導……等。隨著時代改變，且系學會開始較



有組織後，大部分活動開始由學生企劃，並延請老師擔任顧問提供意見，以及邀請老師供同參予。

每年由大三系學會籌劃多項活動：行之有年的西文週活動，包括西語國家文化導覽、相關書籍展覽及語言學習資訊、西語國家美食烹飪、佛朗明哥舞蹈表演、西語電影放映，西文週壓軸的高潮為戲劇之夜的表演，同學編、演、導、幕前幕後合力完成，以西文演出，藉演藝活動體驗與實踐學習的成果。另外還有每學年初為了歡迎新生來到系上的迎新宿營活動，西韻獎比賽，鼓勵同學學習西語歌曲，提昇同學鑽研語言內涵的興致；廟口給他唱活動，則是在學校對面福營宮土地公廟舉行的趣味性歌唱比賽，讓同學在學習西文之餘也兼顧自身中華文化。每學期系刊 *Pionero*（前鋒期刊）作為師生發表文章之園地。每年由畢業班同學演出的畢業公演高水準的演出更成就了西文系多年的傳統與榮耀。

此外，並不定期的邀請外賓參與學術活動，主題擴及外交、經貿、文學、藝術、建築、電影……等專題。也有許多來自國外的訪客來到西文系參觀訪問並舉行座談活動，例如 63 年 10 月墨西哥 Guadalajara 大學之 Alma Mater 學報大篇幅的介紹輔仁大學西班牙文系，之後每年不定期皆有來自西班牙、巴拉圭、尼加拉瓜、烏拉圭、委內瑞拉、智利、祕魯、巴西、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拿馬等國的各式不同團體來訪，包括大學、新聞媒體、參議員、出版社、駐台領事人員……等。1989 及 1997 年西班牙兩位作家 Camino Jos* Cela 與 Vicente Alexandre 分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系上並大篇幅介紹此兩位作家，Camilo Jos* Cela 並於 1994 年造訪台灣，並專程來到輔大，當時其隨身翻譯張淑英即為本系所畢業之學生，並曾任本系教師多年。1998 年葡萄牙作家 Jose Saramago 獲諾貝爾文學獎時，本系出刊之 *Encuentros en Catay* 中也做深入介紹。

(十) 畢業生

本系第一屆畢業生人數為 36 人，第二屆 38 人，第三屆 34 人，第四屆 28 人，第五屆 44 人，第六屆 38 人，第七屆 44 人、第八屆 47 人、第九屆 41 人。早期每年級人數大抵都是 40 人上下到 50 人之間。近一、二十年，隨著經濟發展、教育普及，及學制的更動，加上旅居國外歸國之學生，人數基本上為 60 至 70 人之間。

(十一) 畢業系友發展

本系（所）提供國內各行各業所需的人力資源，堪稱國內西語教學單位首屈一指。目前國內現有西語教學單位：輔仁大學、淡江大學、靜宜大學及文藻外語學院，三分之二之中籍師資均由輔仁大學西研所培育出來。西研所成立迄今二十載，是國內最大的師資培育寶庫，也是有志繼續深造西語者第一志願的求學系所。多年來西文系所因應國內發展的需求與趨勢，不斷調整教學內容與方向，畢業生已有多位進入外交部、經濟部、新聞局擔任公職者；亦有修習教育學程擔任中學教師者；有進入各大美術館、博物館擔任導覽傳譯者；也有專事商業口譯工作者；國內廠商前往西語國家投資發展者，亦皆以本系所畢業生為優先考量，工作範圍擴：西文秘書、外貿公司外語人才、外交官、駐外領事人員、新聞局國際編譯、西文教師、專業口筆譯、文學評論、記者、各國駐台領館人員、外貿協會、中央通訊社、中廣海外部……等。

根據去年慶祝創系的系刊特刊內，針對的 1030 位畢業系友職業調查顯示，有高達 47.66% 的系友畢業後從事公家機關的職務；而公家機關包括：外交人員、國內外教師、公職人員……等等。並有 4.71% 繼續念研究所，及 4.43% 畢業後出國深造，其餘的 43.2% 則零星分布在航空業、補教業、金融業、服務業、電子資訊業、建築業、製造業、旅遊業、國際貿易及圖書出版業等多樣且不同性

質的職業類別中，而其中也有部分的系友畢業後從事的職業與西班牙文並無相關，但仍專職於世界各地的商務活動及服務業，這顯示西文系帶給學生的不只是西文方面的優勢，也更具有世界觀的國際優勢。

升學方面，自本系畢業者，主要的相關進修領域為：輔大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淡江歐洲研究所、淡江拉丁美洲研究所、靜宜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國外如西班牙、拉丁美洲各國或美國等相關進修機構，已有為數眾多的本系畢業生進入上列研究所，畢業後並從事與西文相關範疇的工作。從民國七十六年起，教育部提供留學西語國家之公費留考，迄今全數由本所畢業生考取，九成已取得博士學位，返國投入教學單位，自費者亦多數前往西班牙攻讀相關博士學位或碩士學位多人。



三、未來前景與發展

西班牙語是僅次於英語跨越最多大陸、橫渡最大海洋的語言，擁有最多學習的優越條件與誘因。西班牙語系國家為我國邦交國最多之國家，公職機會為僅次於英語系之需求。西班牙語為拉丁美洲四億人口使用的語言，是美國第一語外語，約有兩千五百萬西語人口。流行文化在音樂、電影方面西語/拉丁風橫掃全球，吸引世人的目光；嚴肅文學方面，多位西班牙語作家陸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肯定了西語文學在世界文壇的地位，也引起學界熱烈的討論與回響。二十一世紀在全球化的世紀潮流下，掌握外語便是掌握先機，我們希望學生藉此能夠培養另一種文化視野與更寬廣的胸懷與人生。

【學士班】1.根據新大學法的自治精神，對該系所課程的規畫方向作一大幅度的革新：(a) 將語言的學習過程視為一全面性的整體，而非個別獨立科目的總匯。(b) 調整教學方向，以符合學生未來面臨臺灣市場的實際需求。(c)

加強學生在西班牙語文以外的廣泛學習，包括母語（中文）的再學習及互為配合。2.鼓勵學生前往西國，從事為期一年的短期進修計劃。3.加強與已畢業系友的聯繫，建立良性的交流管道。4.發揮視聽器材的輔助教學功效，及配合國際網路資訊的運用。5.注重教學師資的持續培植。【碩士班】1.整合課程規畫，加強文化及社會層面的進一步研究。2.強調中文／西文及中國／西語系國家之比較研究。3.鼓勵學生前往西國，進行為期六至九個月的短期研究。每兩年邀請一位語言或文學專長之教授至該所講學授課。

（一）近期發展計畫

- 1.口筆譯人才培訓。
- 2.研究計畫推廣。
- 3.系所學術年刊之持續編纂。
- 4.促進升學就業機會。
- 5.擴展師生進修機會。

（二）中期發展計畫

- 6.研擬進修推廣教育計畫。
- 7.促進校友活動之進行。
- 8.拓展建教合作關係。
- 9.與校內外及國際學術團體加強聯繫，推動學術交流。
- 10.西書中譯與中書西譯。

（三）遠期發展計畫

- 11.設立西語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促進西語系國家之漢學研究。

12.持續推動國際性學術研究。

13.積極透過官方與外交單位，研擬於西語系國家設立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中西學術與文化交流之據點。

寫在文後

在這篇編撰西文系系史的文章裡，筆者期望能盡自己所能，除了盡量多方搜尋資料以紀錄系上歷史，也期望能以精確的文辭表達出這些離鄉背井來到台灣來的外國人，對我們台灣西文界的貢獻。整篇文章的完成，要特別感謝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的呂慈涵小姐以及西文系主任杜東璠的支持與鼓勵，還有西文系的所有現任老師的幫忙，熱心提供寶貴資料及系所資訊。在搜尋歷史的同時，一幕一幕的過往歷歷在目，老師們的諄諄教誨及親切可愛的笑容更是深深烙在筆者心理，筆者對西文系的愛，有幸能利用撰寫系史的同時在這短短的一萬餘字裡表現出來，真心感謝西文系和所有師長，讓我取之於西文系，也能回饋於西文系，願以此文獻給西文系。在此由衷感謝所有曾助過這篇文章完成的所有西文人，因為有你們，西文系才會越發光發亮，也才會繼續茁壯。

特別感謝

游淳傑老師 Prof. Lucas Yu

雷孟篤老師 Prof. Jos'e Ram A'verez

杜東璠老師 Prof. Regina Tu

蘇素嬌老師 Prof. Anita Su

傅玉翠老師 Prof. Andrea Fu

舒小珠老師 Prof. Francis Shu

吳碧蘭老師 Profa. A'geles Wu

張淑英老師 Profa. Luisa Chang

畢連德神父 Padre Paulino Belamide

呂慈涵小姐（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

許淑悅（第三屆）（第二任系友會會長）

許麗華（第一屆）

鄭如君（39屆）

呂宜臻（39屆）

參考資料

1.西文系所收藏之回憶錄【Memorias】

2.Encuentros en Catay 1999，Recuerdos de Remedios Bardina de Liu – Jos'e Ram
A'varez

3.Encuentros en Catay 2002，Espa les pioneros de la ense nza del espa l en
taiwan（1950-1980） - Jos'e Ra'om A'arez

4.Pionero 特刊一號（2003 六月出刊），西班牙語文學系/所現況與發展－傅玉翠
Andrea Fu。

5.Pionero 特刊一號（2003 六月出刊），學會活動 - 嚴文婷 Leonor。

6.致善達仁－天主教輔仁大學聖言會使命特色叢書系列之二。

7.網站「大學系所總覽」http://www.university.org.tw/foreign_lan/2。

8.輔大西文系網站 <http://www.span.fju.edu.tw/>。

9.輔大西文系學會網頁

<http://www.span.fju.edu.tw/instituto/new/html/infroall.htm>。

註解

註 1：外語學院為民國六十九年方才成立。

註 2：劉巴丁娜博士 (Dra. Remedios Bardina de Liu) 於 1999 年不幸逝世於美國，享年 92 歲 (1907-1999)。

註 3：台灣第一所西班牙語文學系為淡江大學西文系，成立於西元 1962 年。

註 4：本系感念於劉巴丁娜博士對系上無私的貢獻及付出，雖然其任代組主任時

西文「系」仍未正式成立，我們仍將其視為「第一位西文系主任」。

註 5：莫若蘭博士 (Dra. Carmen Morales) 於系主任任內積勞成疾，鞠躬盡瘁，逝世於 1979 年。

註 6：2003 年本系教科書改為由西班牙 Alcala 大學出版之 Sue 。

註 7：雷孟篤博士擔任外語學院院長 6 年 (1990-1996)，在此之後又重新在再回

到西文系擔任第七任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下文將會繼續介紹。

註 8：白安茂教授抵台任教之前，長期以來西文系戲劇公演均由大三學生擔綱，其中柏海星教授、穆宏志教授、瑞卡多教授先後為戲劇公演擔任指導老師貢獻良多。爾後則是白安茂教授與游淳傑老師戮力為戲劇表演奉獻心力。

註 9：第二屆系友會會長許淑悅為西文系第三屆畢業生，曾任系上助教 11 年。

註 10：全文後附有歷年教師資料。

註 11：本系第一次話劇演出於 1969 年，演出內容為西班牙作家卡索納著的「根乾而後樹枯」。系刊 PIONERO 慶祝創系四十週年之特刊一號內有詳細介紹歷年戲劇演出專題。

◎附表：歷屆師長

姓名	國籍	最高學歷	教授科目	進入本系所任教年度	備註
劉巴丁娜 Remedios Bardina de Liu	西班牙人 歸化中國籍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哲學博士 / 柏林大學心理學博士	西文 / 新聞習作 / 輔系	1964 - 1983 退休	前系主任 1999 逝世於美國
安秀貞 Ángeles de Dios Trilla	西班牙	菲律賓 San Agustin (de Ilo Ilo) 大學碩士	西文文法	1964 - 1982 退休	耶穌孝女會 前系主任
安明德 Ángel Armendáriz	西班牙	美國 Washington D.C. 天主教大學西班牙文學博士	文學	1966 - 1970	聖言會 前系主任
田毓英 Teresa Tien	台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西班牙文哲博士	文學	1966 - 1975 1982 - 1988 退休	
莫若蘭 Carmen Morales	西班牙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博士	作文 / 讀本西班牙藝術史西班牙文學史	1968 - 1979	前系主任 1979 系主任任內病逝
梅文彬 María Pérez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皇家音樂學院	讀本 / 作文 / 會話 / 發音訓練	1969 - 現任	耶穌孝女會
勞治國 Carlos del Saz- Orozco	西班牙	美國史丹福大學西班牙文學博士	語言學 / 西班牙文學(碩)	1969 - 1970 1987 - 1988	2003 逝世
柏海星 María Begoña Alber	西班牙	義大利羅馬 Regina Mundi 神學	西班牙文學史 / 文法 西班牙文化史 / 修辭學	1970 - 1992 退休	仁慈會
穆宏志 Jesús María Muñoz	西班牙	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博士	文學批評與分析(碩) / 西班牙戲劇(碩) / 聖經選讀 / 西班牙文學	1970 - 現任	耶穌會
陸佩芳 Juana Ros Gabarain	西班牙	西班牙 Valladolid 大學歷史學碩士	作文 / 倫理學 / 讀本 聖經文學	1972 - 1984 1997 - 現任	耶穌孝女會
范靜貞 María Josefa García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皇家音樂學院	西班牙地理 / 作文 / 會話 / 輔系	1973 - 1999 退休	耶穌孝女會

姓名	國籍	最高學歷	教授科目	進入本系所任教年度	備註
孔達仁 Ricardo González	西班牙	西班牙 Comillas 大學哲學碩士	西文 / 商西		耶穌會 已過世
張冠超 Rómulo Chang	台灣	薩爾瓦多 Francisco Gavidia 大學碩士	翻譯	1974 -	曾任助教
賴甘霖 Andrés Díaz de Rábago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醫學博士、神學博士	會話	1975 - 1990 退休	耶穌會
孟哲慧 Isabel Arana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皇家音樂學院	會話 / 輔系 / 文學史 / 當代散文	1975 - 1985	仁慈會 已過世
雷孟篤 José Ramón Álvarez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哲博士	文法 / 翻譯(碩) / 研究方法論(碩) / 文學史現代短論(碩) / 哲學概論東西思想與文化比較(碩) / 翻譯與口譯 / 語義學(碩)	1976 - 現任	前系主任 / 所長 前外語學院院長
沈起元 Fernando Mateos	西班牙	菲律賓 Baguio 學院 Teología en el Bellarmino 博士	研究方法論 / 翻譯及習作 / 文體學	1977 - 1999 退休	耶穌會
吳仁修	台灣	政大外交研究所	翻譯與習作	1977 -	
田松韻 María Victoria Eceizabarrena	西班牙	美國羅耀拉大學教育輔導碩士	會話 / 心理學文法應用與練習讀本 / 作文 / 修辭學	1978 - 現任	耶穌孝女會
方友良 Julián Fernández	西班牙	西班牙拿瓦拉大學哲學碩士	文學作品賞析 / 會話	1980 - 1983	聖言會
安靜怡 Alicia González	墨西哥	墨西哥高等師範學校物理化學碩士	會話 / 輔系 / 文法	1980 - 現任	仁慈會
古世芳 Pilar Gutiérrez	西班牙	西班牙 Zaragoza 音樂學院碩士	會話 / 西班牙地理	1980 - 現任	耶穌孝女會
陳明德 Roberto Chen	台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政治學博士	翻譯 / 口譯(碩)	1980 - 1986	已過世
鄭偉龍 Alonso Artero	西班牙	比利時 Ac. Royales de Beaux 美術系碩士	西文	1981	
林瑞龍	台灣	日本東京大學法學碩士	國際公法	1981 -	

姓名	國籍	最高學歷	教授科目	進入本系所 任教年度	備註
李鶴德 Margarita Gómez Lee	墨西哥	Instituto Normal Comercio y Administracion	會話 / 拉丁美洲史地 / 商用西文 / 新聞選讀	1982 -	仁慈會
包美芳 Vicenta Polo	西班牙	西班牙 Victoria 師範學院	會話	1982 - 1989	
夏嵐 Manuela Serrano	西班牙	西班牙 Valladolid 大學 歷史學碩士	會話 / 西文 / 文化	1982 - 1985	
柏安娜 Ana Posada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語文 學碩士	會話 / 作文	1982	
古尚潔 José Ellacuría		Licenciado en Filosofía - Comillas	文化	1982	
熊建成 Juan Hung Hui	台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哲學 博士	西語國家現況	1982 -	
林穎曾 Angela Lin	台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哲 博士候選人	翻譯(碩) / 文法 / 讀 本 / 輔系	1982 - 1990 -1992	
何美德 Josefa Gómez Velarde	西班牙	西班牙師範學院	會話	1983 - 1993	耶穌孝女會 已過世
瑞卡多 Ricardo Blázquez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 文哲碩士	會話 / 新聞選讀 / 西 班牙口語(碩) / 作文	1983 - 1989	
舒小珠 Francis Shu	台灣	尼加拉瓜國立自治大學 西班牙文學碩士	會話 / 語法與句形拉 丁美洲史地 / 讀本文 法 / 翻譯 / 作文	1983 - 1984 1990 - 現任	
孫素敏 Julia Sun	台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語文 學博士	會話 / 翻譯 / 讀本 / 文法	1983-1984 1991-2000	前系主任 所長
李智鋒 César Lee	智利	智利聖地牙哥大學電子 科碩士	拉丁美洲文學 / 文化	1983 - 1984	
練日扶 Manuel Lien	秘魯	秘魯利馬 Santo Tomas 大學碩士	翻譯(碩)	1983 -	已逝世
寇博多 Leopoldo Vicente Tavera	西班牙	西班牙 U.N.E.D 大學教 育學博士候選人	會話 / 文法 / 商西 班牙文前置詞研究 (碩) / 西班牙文句法 研究(碩)	1984 - 現任	前系主任

姓名	國籍	最高學歷	教授科目	進入本系所任教年度	備註
鄭敏士 Juan José Valero Moreno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史地碩士	西文 / 文學	1984 -	
鄭慧貞 Isabel Tseng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西班牙語碩士	西文	1984	
羅特克絲 Isabel Rodríguez Monge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語文學碩士	藝術史(碩)	1984 -	
宋麗玲 Esperanza Song	台灣	西班牙文學博士	西班牙文學	1984 -1985	
舒立彥 Fernando Shu	台灣	西班牙 Valencia 大學英國語言學博士	翻譯	1984 -1985	
白安茂 Manuel García Bayo	西班牙	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歷史學博士	表演藝術 / 藝術史 西語國家文學史 當代西班牙語文學(碩) / 專題研究(碩) / 當代西班牙電影研究(碩)	1985 - 現任	前所長
鄧念慈 Bernardo Acevedo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語言學院	翻譯 / 西文字源研究	1985 -1990 退休	
魏志德 Jordi Sitjas Guell	西班牙	美國佛州大學醫學碩士	會話	1985 -1986	
屈卡羅 Agustin Fernández Chicarro	西班牙	法國巴黎大學地質學博士	西方文化	1985 -	
林享能	台灣	文化大學政研所碩士	西語國家現況 / 拉美文化	1985 -1986	
潘水琴 Olivia Pan	台灣	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碩士	翻譯 / 文法	1985 -1996	
吳自蓉 Lucía Wu	台灣	美國 Arizona 大學西班牙文碩士	文學	1985 -	
梁秋吟 Nati Liang	台灣	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碩士	西文	1985 -1986	

姓 名	國 籍	最 高 學 歷	教 授 科 目	進 入 本 系 所 任 教 年 度	備 註
蘇素嬌 Anita Su	台 灣	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 碩士	西語聽力訓練經貿西 語 / 文法 / 翻譯流行 文化選讀 / 讀本	1986 - 現任	
傅玉翠 Andrea Fu	台 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拉丁 美洲文學博士	西語視聽教學 / 媒體 教學詞彙與句型 / 西 班牙歷史語法分析與 應用	1986 - 1989 1992 - 現任	前系主任 / 所長
高 薇 Wilca Drina Gallegher	美 國	美國賓州大學西班牙文 碩士	語言學(碩)	1986 - 1987	
連瑪娜 Manuela Ramos Gato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政治 社會學碩士	會話 / 文法	1986 - 1993	
何鵬齡	台 灣	日本九州大學法學碩士	國際公法	1986 -	
鄭 邵	台 灣	美國 Fordam 大學政治 學博士	國際關係	1987 -	
陳美琴 Anuncia Chen	台 灣	菲律賓 La Salle 大學碩 士	人生哲學	1987	
游淳傑 Lucas Yu	台 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當代 西班牙文學博士班	文法 / 讀本 / 散文選 讀漢西翻譯 / 文學概 論西班牙文化概論	1988 - 現任	
歐子天 Eduardo Ortubia Roncero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英國 語言學碩士	會話 / 翻譯 / 現代口 語西文 / 語言學(碩)	1988 -	
施美惠 María Saldaña Spiegel	秘 魯	美國紐約大學語文學碩 士	英西翻譯	1988 -	
鮑堤雅 Mario Portilla Chaves	哥斯大黎加	哥斯大黎加大學語言學 碩士	語音學(碩)	1988	
陳進賢 James Chen	台 灣	美國 Duke 大學法學博 士	國際公法	1988 -	
羅培斯 José López Rueda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古典 文學博士	西班牙、拉丁美洲文 學	1989 -	

姓名	國籍	最高學歷	教授科目	進入本系所任教年度	備註
高亞索 Jaime Collazo Odrizola	西班牙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哲學碩士	拉丁美洲歷史(碩)	1989	
李忍堅 Nicolás Lee	台灣	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碩士	讀本 / 文法	1989 -1990	
常永旭	台灣	美國 Connecticut 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際關係 / 公法	1989 -	
馬舒悠 Julia Masullo	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薩爾瓦大學語文學碩士	翻譯(碩) / 拉丁美洲文化	1990 -1991	
王傳瑾 Brigitte Wang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生物學碩士	西班牙文化	1990 -1991	
謝新平	台灣	法國里昂大學法學博士	國際關係	1990 -	
宋宏煦	台灣	英國南漢普頓大學國際關係碩士	國際關係	1990 -	
杜陸安 Luis A. Torres Massís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中央大學法學博士	現代短論 / 高級作文	1991 -2002	2004 逝世
白方濟 Francisco Luis Pérez	西班牙	西班牙拿瓦拉大學神學博士	拉丁美洲社會文化導論讀本	1991 - 現任	
狄安國 Angel Díaz Arenas	西班牙	奧地利薩爾斯堡大學語言學博士 / 西班牙奧維多大學語言學博士	語言學(碩) / 文學作品研究 / 塞拉小說研究 / 西文口語研究	1991 - 1993	
宋唐蓓蓓 Betty Tamasco de Song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翻譯學位	商用西文	1991 - 2000	
林惠瑛 Maite Lin	台灣	西班牙拿瓦拉大學藝術博士	西班牙藝術史 / 文法	1991 - 1994	
墨海門 Jaime Negrete	智利	智利聖地牙哥天主教教皇大學教育碩士	會話 / 拉丁美洲文化	1991 -	
許煥益	台灣	法國里昂大學法學博士	國際公法	1991 -	
吳碧蘭 Ángeles Wu	台灣	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碩士	文法練習與習作漢西翻譯 / 專業倫理	1992 - 現任	

姓 名	國 籍	最 高 學 歷	教 授 科 目	進 入 本 系 所 任 教 年 度	備 註
百里士 Francisco Javier Peláez	西班牙	美國 Missouri 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碩士	西班牙文化 / 英西翻譯	1992 -	
李昌麟 Michael Lee	台 灣	法國巴黎大學政研學博士	歐盟概論	1992 -	
張茂椿 V́ctor María Chang	台 灣	西班牙 Naverra 大學新聞學博士	翻譯 / 語言學(碩)	1992 -1994	
陳朝鈞 Jerry Chen	台 灣	美國楊百翰大學教育行政碩士 / 圖書館資訊碩士	西文實習 / 大學入門文法應用與練習全人教育英文課程	1993 - 現任	
張淑英 Luisa Chang	台 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	西班牙文學 / 極短篇選讀當代拉丁美洲文學 / 讀本 / 翻譯 / 西語短編小說理論與批評(碩) / 西班牙地理 / 拉丁美洲現代小說與電影(碩) / 西班牙小說與電影(碩)	1993 -2001	2001 - 任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吳榮鎮	台 灣			1993 -	
許玉燕 Hortensia Hsu	台 灣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讀本 / 文法應用與練習比較文學概論	1994 - 現任	1994-2001 任助教
法耶那 Federico Faerrón	哥斯大黎加	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博士	中美洲五國歷史及政治發展(碩)	1997 - 現任	
羅慕斯 José Ramos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西班牙文學博士	西班牙文化	1997 -1999	
林盤石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政治學博士	翻譯 / 國際關係	1999	
杜東瑞 Regina Tu	台 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語言學博士	西班牙地理西語語法與句型 / 西翻中	2001 - 現任	現任系主任 / 所長
林盛彬 Abel Lin	台 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	西班牙文學	2001 - 2002	
王鶴嶽 Carlos Wang	台 灣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語言學博士	作文	2003 - 現任	

典範人物

安秀貞 修女 Ángeles de Dios Trilla F.I. (1910-2008)

安秀貞修女 Ángeles de Dios Trilla F.I. (1910.12.12~2008.12.17)



年表

- 1910 年 12 月 12 日出生於西班牙薩拉曼卡
(Salamanca Villar de la Reina)
- 1932 年 畢業於薩拉曼卡的 Inmaculada 中學後，就讀於薩拉曼卡大學
- 1937 年 就讀菲律賓聖奧古斯丁大學 (Iloilo)，並取得碩士學位
- 1942 年 前往中國大陸，從事教職工作十九年，後因共產黨竊據大陸，
被驅除出境
- 1951 年 在日本生活兩年半，學習日文並教書
- 1954 年 來台後恢復教育的工作與崗位，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十六年
- 1964-1982 年 於輔仁大學西文組 (民國 56 年正式改為西文系) 任教；與劉巴
丁娜博士同為西文系創系之最大功臣
- 1979-1982 年 擔任西文系第四任主任，於任內積極籌劃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
的雛形與未來發展方向，並於 1982 年報部通過，在第五任系主
任上任時正式成立
- 2002 年 自輔大退休後，返故鄉西班牙
- 2008 年 12 月 17 日逝世，享年 98 歲

1954 年，安修女來台居住於青田街巷弄的天主教耶穌孝女會。



1964 年，輔仁大學西文組成立，安修女也在此展開輔大的教學生涯。



系所貢獻

與劉巴丁娜博士同為本系創系之最大功臣



擔任西文系主任時，積極籌劃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的雛形與未來發展方向，並於 1982 年報部通過，在第五任系主任上任時正式成立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開創教師陪伴學生前往 León 大學進行暑期課程活動，並為清寒學生爭取獎學金讓他們完成學業。



學術貢獻

編纂國內第一本以西文解說之西文文法書及語法結構分析專書「今日西語」，
嘉惠學子



服務精神

安秀貞修女更是新莊樂生療養院醫療服務的先驅者，與費濟時蒙席 (Msgr. Eugene Fahy, S.J.) 一同籌款建造了樂生聖威廉天主堂，為痲瘋病友服務。



師生情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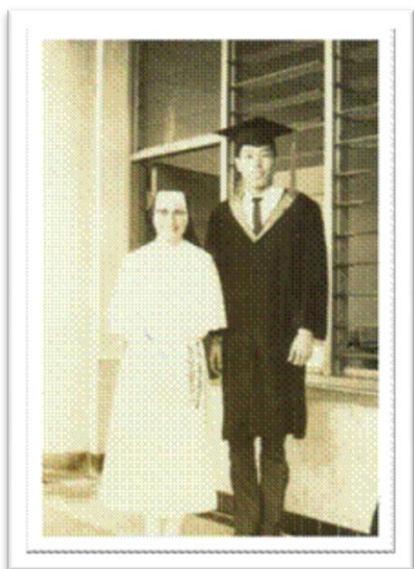
如果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位慈愛的恩師，安修女必定是許多西文學子深深感謝的師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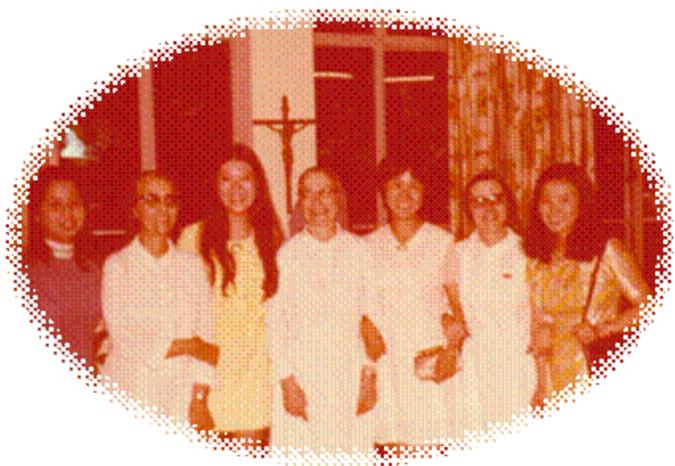
前外交部長程建人先生也曾言，在他就讀政治大學期間，安修女都會利用等校車前的一個小時，在教授休息室為他加強西班牙語，也因此奠定了他西班牙語的基礎。



1969年6月 圖為安秀貞修女與第二屆畢業生劉志英同學



1973年 青田街耶穌孝女會為西四同學舉辦歡送會



1977年3月31日於理學院圖書館五樓舉行“西班牙之夜，並邀請其他西語系之學校參加演出。圖為節目後大合照



1977年12月7日
巴拉奎“親善使者”合唱團應系上學會之邀請三次來校演唱，巴拉奎大使亦陪同來訪



1978年5月25日 西文系送舊晚會



1978年5月29日西四應屆畢業同學，應青田街孝女會之邀請，在此舉行畢業惜別會



1980年6月21日 輔仁大學復校第十四屆畢業典禮



1981年6月20日 輔仁大學復校第十五屆畢業典禮
圖為安修女與西文系畢業生



1982年，安秀貞修女從教育界退休，可是她還在工作，義務教西語、編寫文法書及從事福傳工作二十年。



在姪兒女的召喚之下，2002年安秀貞修女向台灣說再見，返回故鄉西班牙，定居於卡斯提亞中土。



2008年12月17日，安修女蒙主寵召，享年98歲



安修女將大半輩子奉獻給台灣、獻給了輔仁大學西文系…



懷念師長

她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師
一位台灣通
8、90歲還會自己搭公車去
博愛路買點小東西
她在 修女傳教生涯中
第一次換穿便服的時候
他告訴我
衣服是
她在博愛路買的
一件 190 塊而已
一位令人難忘的嚴師
也是一個朋友



陳朝鈞老師 Jerry Chen

「……到了末末了的時候……」這是安秀貞老師以前在課堂上常說的話。老師常常在課堂上講學長、姊的故事來勉勵我們，像媽媽一樣地教導我們要把握時間、認真學習。

游淳傑老師 Lucas Yu



念 安秀貞修女

多少青春歲月盡在華夏陸臺流歷
多少思鄉情懷遺忘在 SALAMANCA

多少慈祥醞藏在冷面嚴峻的眼神裡
多少卓絕的信念從青田街到西文系
Madre Angeles,

您是

安定西語教育的支柱
秀出福音文化的領御
貞固無私精神的典範



我們永遠懷念您

曾經獻花給您的學生
蘇素嬌
九十八年十二月



給安秀貞修女——我的導師

您是我大一的文法老師和導師。我用您的愛與關懷為台灣學生編寫的「今日西語」，在淡江大學教授我第一年西班牙文文法。

2005年，一個酷寒的冬天，學長 Vicente 把您從 Valladolid 接到 Salamanca 與我們同慶「西班牙校友會」成立大會，您以 93 歲的高齡赴盛會，在歷經風寒以及旅途辛勞後，大家都驚訝您仍是神采奕奕並且侃侃而談。去年您摔斷右腳，開刀，拄著步行架，緩慢、卻堅持行走；之後，又摔斷左腳，再開刀，拄著步行架，更緩慢、仍堅持行走。您用堅強的意志及基督之愛坦然行走人間…輔大西文系正循著您的足跡在堅強與愛中前進！

寫於西語系成立第 46 年(2009)系友回娘家日
您的學生 Regina TU 杜東璠敬上

“Muy querida Madre Angeles:

No estás sola en el pasado,
y vives ahora en lo eterno; estamos contigo
siempre para que el presente sea toda la
vida.”

Luisa Chang



2005年7月26日 (En el jardín de atrás de la casa“Comunidad Naza````ret”,
Valladolid)



劉巴丁娜 教授 Dra. Remedios Bardina de Liu (1907-1999)

劉巴丁娜教授 (1907-1999)

Dra. REMEDIOS BARDINA de LIU

1907 年生於巴塞隆納（西班牙）。

1999 年於美國病逝，享年 92 歲。

學歷：

1930 年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哲博士。

1933 年柏林大學心理學博士。

經歷：

1964-1965 擔任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西班牙文組代組主任。

1964-1967 任教於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西班牙文組。

1967-1983 任教於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Dra. REMEDIOS BARDINA de LIU

Nacida en 1940 en Barcelona (España).

Fallecida en 1999 en EE. UU. a los 92 años de edad.

Estudios:

1930 : Doctora en Filosofía y Letras,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1933 : Doctora en Psicología, Universidad de Berlín.

Experiencia:

1964-1983 : Profesora del Departamento de Lengua y Literatura Españolas,
Universidad Católica FuJen.

1964-1965 : Primera Directora del Departamento de Lengua y Literatura
Españolas, Universidad Católica FuJen.

莫若蘭 教授 Dra. Carmen Morales (1929-1979)

莫若蘭 教授 (1929-1979)

Dra. CARMEN MORALES

1929 年生於馬德里(西班牙)。

1979 年於台灣病逝，享年 50 歲。

學歷：

1971 年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博士。

經歷：1968-1979 任教於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1971-1979 擔任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系第三任系主任。

Dra. CARMEN MORALES

Nacida en 1929 en Madrid (España).

Fallecida en 1979 en Taiwan a la edad de 50 años.

Estudios:

1971: Doctora en Literatura Española,

Universidad de Luisiana, EE. UU.

Experiencia:

1968-1979:

Profesora del Departamento de Lengua y

Literatura Españolas, Universidad Católica FuJen.

范靜貞 修女 **María Josefa García (1920-)**

日文系

系史：外語學院日文系系史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日本語文學系所史

輔仁大學外國語學部日本語學科史

目錄

- 一、系所的成長與蛻變
- 二、方向與願景
- 三、教師培育
- 四、學生輔導的特色
- 五、系友會會史
- 六、青澀時代的回憶

一、系所的成長與蛻變

(一) 一步一腳印的歷程

國民政府於 1949 年播遷來台後，天主教輔仁大學也於 1961 年在台復校，持續擔負培育人才的任務。1963 年外文系英文組與德文組的成立，正式為本校外語學院在台培養外國語文人才奠立基礎。然而，為認識亞洲各國的語言文化及配合時代與社會需要，本校外語人才的培育方針也逐漸從歐美語文關注到東方語文。因而報部申請成立東方語文學系。

1969 年東方語文學系與語言學研究所(全國第一所)同時獲得教育部核准成立。報部申請成立目的乃是為培育東方語文人才，然而有鑒於當時台灣與日本的交流較其他亞洲國家頻繁，且日文人才的需要性較高，因此優先設立日本語文一組。此即日本語文學系的前身。創系之初，由於專業人才網羅不易，所以系主任一職暫由當時英文系系主任文納教授及訓導長于鳴冬先生代理。1971 年張則貴教授擔任系主任後，才正式確實本系「配合國家政策及社會需求，培育通曉日本語文人材，扮演中日語言文化交流的溝通角色。」的發展目標。

1969 年獲准成立的時期，正值台日關係逐漸緊張。1972 年，亦即張則貴教授擔任系主任隔年，台灣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正式斷絕，致使本系及學生發展曾經一度受到波及。然而，隨著台日民間交流的密切及政府對日關係的改善，日本語文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本系及學生逐漸受到校內外等社會各界重視。

由於歷時十幾年的東方語文學系並未增設其他東方語文學組，所以為求名符其實，而於 1982 年呈請教育部核准更名為日本語文學系。1984 年順利獲准更名，自此也為本系開啟另一新紀元。

八〇年代後期，台灣經貿急速發展，與日本的關係也逐漸深厚，因此大量需要通曉日本語文人材。為配合此社會需求及現象，特別報部申請增設一班學士班，而於 1989 年度起每年招收兩班。

九〇年代台灣歷經解嚴及經濟起飛與危機，社會形態改變，逐漸轉為多元化及國際化，因此培養通曉外國語言文化，並具人文思考能力的文化溝通人才成為當務之急。1993年報部核准成立的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即是在此風潮下成立，主要成立目的是「以日本文學、語學之研究為重點，兼及中日比較文學、語學、翻譯、日本社會思想、法律思想等，擬培養從人文社會角度深入研究日本之人才」。碩士班成立至今已屆十年，這段期間的確培養出不少通曉日本語言文化，及具有人文思考能力的日本研究及文化溝通人才。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自 1969 年成立以來，於歷屆主任與教師共同努力的經營下，已然奠定良好的基礎與特色。至今已經屆滿 35 年，其間作育不少英才，貢獻於國家社會，也建立不少口碑，深受社會各界肯定。2004 年 1111 人力銀行所做的「職場最愛晉用社會新鮮人前二十大校系大調查」結果就印證輔大日文系畢業生為企業界最愛晉用的日文人才。

目前專兼任教師共有四十多名。其中，專任教師佔十六名，均學有專長。專攻領域涵蓋日本文學、語學、文化、教育、翻譯、政治及經濟。整體而言，涵蓋層面廣泛，學術研究風氣興盛。

(二) 領航員名錄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自 1969 年成立東方語文學系至今，在各屆系主任用心經營下，才有目前系所規模。各屆系主任簡介如下：

- ①1969/8~1970/7：英文系系主任文納教授代理。瑞士雪黎大學文學士。曾任北平輔仁大學副教授。
- ②1970/8~1971/7：于 鳴冬老師。國立北平大學法學士、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曾任台灣大學教授與輔仁大學訓導長、東方語文學系教授。
- ③1971/8~1979/7：張 則貴老師。(1971/8~1972/7 為代理系主任) 日本東京大

學畢業。專攻哲學。曾任台灣大學副教授、中國文化學院教授、輔仁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教授。

- ④1979/9~1988/7：山崎陽子老師。天主教聖神傳教會修女。日本聖心女子大學文學碩士。專攻日本近代文學、有島武郎文學。目前服務於日本聖神修道院。



- ⑤1986/8~1987/7：周 錦樟老師。代理山崎陽子主任。日本筑波大學地域研究科國際學碩士。專攻中日對照語言學。現任日本南山大學外國語学部アジア学科助教授。
- ⑥1988/8~1994/7：林水福老師。日本東北大學文學博士。專攻日本平安朝文學、遠藤周作、翻譯理論與實務、台灣文學。現任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教授兼副校長。
- ⑦1988/8~1989/1：山崎陽子老師。代理林水福主任。
- ⑧1994/8~1998/7：陳明姿老師。日本東北大學文學博士。專攻日本平安時代文學、中(台)日比較文學、日本近現代文學。曾任國立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所主任，現任國立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 ⑨1998/8~2000/7：林水福老師。
- ⑩2000/8~2001/7：黃瓊慧老師。代理系主任。日本九州大學國語國文研究科碩士。專攻日本語學、日語現代語法。現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講師。

- ⑪2001/8~2005/2：賴振南老師。日本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專攻日本平安朝物語文學、日本近現代文學、翻譯實務與理論。現任輔仁大學教授兼總務長。
- ⑫2005/2~2005/7：何思慎老師。代理系主任。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法學博士。專攻日本外交、日本政治、日本近現代史、當代中日關係。現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 ⑬2005/8~：黃翠娥老師。日本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班肄業。專攻日本近現代文學、川端康成文學、日本文化。現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

（撰寫者：楊錦昌老師，1984年第十二屆畢業。現任輔大日文系副教授）

二、方向與願景

大學部為配合國家政策及社會需求，學術與實用並重。除培養學生紮實的日文聽說讀寫能力外，尤重文化藝術之陶冶與專業課程之啟發。希望藉由多元的課程設計，培育通曉日語文之專才，進而激發其個人潛能，習得日本文化、文學、政經等多方面專業知識與技能。以期培育語文能力與專業知識兼備之人材，扮演中日文化交流的溝通橋樑之角色。一、二年級以開設聽說讀寫之基礎課程為主，輔以如日本地理等基礎文化課程，規劃小班制，先奠定同學之日文能力。三、四年級時除繼續加強語學之基礎訓練外，並增加日本史地、文化、日本文學（近現代、古典）、日本語學等專業課程，一方面讓同學閱讀較有深度的日文文章及接觸其語言藝術外，並藉此讓同學對日本的文化、思想等有更深入的了解。開設政經及教育方面等實用課程：如日本現勢、日本文書處理與網路多媒體應用、商用日文、日本式經營、基礎口譯、進階口譯及日語教授法等。

研究所以日本文學、語學之研究為重點，兼及中日比較文學、語學、翻譯、日本社會思想、法律思想等，擬培養從人文社會角度深入研究日本之人才。此外，亦不定期聘請日本知名大學的教授蒞校開設「集中講義」課程，至目前已邀聘過小島孝之教授（東京大學教授）、太田登教授（天理大學教授）、仁田義雄教授（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菊田茂男教授（東北大學榮譽教授）、仁平道明教授（東北大學國文學研究室主任）、佐藤泰正教授（梅光女學院前任校長）森田兼吉教授（梅光學院大學前任校長）；赤羽淑教授（聖母清心女子大學教授）、神部宏泰教授（聖母清心女子大學文學院院長）、塚本照和教授（天理大學教授）、原土洋教授（東北大學榮譽教授）、佐倉由泰教授（東北大學教授）等知名教授蒞系開課。並舉辦講習會，希望透過日籍學者的觀點，使學生能夠更深入瞭解日本文學、接觸到日本文學中的各種領域，藉由不同國家學者之觀點，除能增進國際文化交流外，俾能開拓雙方之視野，且增進學生之學習興趣，並期在研究方面能有所助益。交換留學制度：本系所目前已與日本費利斯女學院大學、日本桃山學院大學、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日本佐賀大學、日本京都產業大學、日本上智大學、日本福岡大學、日本南山大學、日本藤女子大學、日本聖心女子大學締結姐妹校，雙方每學期彼此交換二到三名學生，暑期並有短期留學班，此外於教學及學術上舉辦不定期的交流活動，建立了實質性的友好關係。

(一) 入學管道：

八十七至八十九學年度舉辦高中生推薦甄試；八十九學年度起開辦申請入學，落實教育部大學多元入學之方針，並吸引了不少對日本社會文化有高度興趣的優秀學子進入本系。

(二) 設備：

圖書期刊：目前約有一萬二千冊的日本語文書籍、十五種期刊、三份日文報紙。亦與日本多所大學交換論文集，促進彼此的學術交流。日本交流協會、日僑工商協會機構常不定期贈送圖書，此外，姊妹校梅光女學院大學曾於八十九學年度贈送本系大批圖書，以供師生參考。每年本系的期刊、圖書經費約有五十五萬元可資教學上及研究上的利用。（二）視聽設備：錄音帶、錄影帶、幻燈片種類堪稱豐富，可供課堂上的學習與課後的借用。另外，亦有多間配備齊全的大小語言視聽教室，可觀看外國衛星電視節目的教室，供中日等各種語言環境使用的電腦教室，希望多元的視聽設備能讓學生有身如其境的體會，進而在吸收異國社會文化種種之同時並增強聽的技能。

獎學金：為了鼓勵學生的努力及學習成就，並且希望對於清寒的學生有所助益，分別設了獎學金、獎助學金。除每班的前三名可得輔仁書卷獎獎學金一萬元、六千元與四千元外，系友和相關的工商界機構每年亦提供獎學金給優秀的同學。在獎助金方面，校方和一般社會財團法人也積極地提供了許多贊助。

因應目前日文相關科系的驟增，以及畢業生升學與就業的激烈競爭，本系勢必要有各項因應之道才能面對現實的各種挑戰，才足以維繫本系在學術上和社會上的優良聲譽。其主要方向為爭取資源、落實教學、加強研究、活潑服務，透過活潑有內涵的網頁主動對外發出訊息，如此內外同步發展之下，才足以走在日文系之林的前端。未來本系的願景不外乎：培育出對國家社會有助益的人才；研究發展出對產官學界有主導性的學術報告及論文；師生個別或整體的服務腳步須改消極接受採積極爭取，並從校內走向校外，與系友會相輔相成充實並積極累積本系發展基金，以此協助系務發展、獎勵師生學術研究、提供學生獎助金、支援系上購置各項教學設備，並拓展對外公共關係。

（撰寫者：黃瓊慧老師，1984年第十二屆畢業。現任輔大日文系講師）

（撰寫者：何思慎老師，1990年第十八屆畢業。現任輔大日文系副教授）

三、教師培育

教師應為學生之品德典範及知識泉源，所以我一向認為在學校教育之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乃是「教師」，其他各項教學設施之整備則應居次。在我擔任系主任的九年（實際應為九年半）之中一直秉此原則並將理念付諸實現。

其法如下：

(一) 規定日文系專任教師資格為：

- 1.具日本國籍並獲碩士以上學位者。
- 2.本系畢業生留學日本並取得碩士以上學位者。

(二) 體作法如下：

- 1.與日本數所國立大學展開交流，並延聘各該校教員有意來台數年以上者至本系任教。
- 2.為協助本系畢業生赴日攻讀碩、博士，與日本各國立大學國語、國文科教授保持密切聯繫，並要求其接受本系畢業生。對無法負擔留學費用者，輔導其參加日本文部省獎學金（交流協會）考試，並協助其考前準備。在任職的二十年期間，共計有五十七名畢業生取得日本學位，其中獲得日本文部省（交流協會）獎學金者約佔半數。（最近尚有再度獲得該項獎學金者，全體人數似乎不斷增加。）然因本系教師員額有限，致使一些畢業生於取得學位歸國之後仍無法如願回母校任教。可是值得欣慰的是其中多數皆能受聘於國內其他各大學從事專業教職，且整體風評相當不錯。

(三) 規定進入本系任職條件為：

獲得於日本國立大學就讀時主任教授之推薦，人品優良，有持續從事研究

工作熱忱，並獲得系上教師認可者。至於擔任本系系主任者，我希望能營造全系良好氣氛，並與資深教師維持良好關係的人選。更重要的是，每年至少要在公開場合發表一篇論文，且須以教授升等為目標，持續進行研究並發表成果者。令人慶幸的是，至今已有數人升為教授，而年輕的教師亦能逐步升等。

由於年滿退休當年正是我教師生涯（包含在日任教期間）的第四十四年，於是我決定回到日本。我之如此毅然決定的理由是覺得從事在人之前與在人之上的工作的時間太長，而難免有些愧疚。歸國之後聽說日文系一如往常；教師繼續升等，而校內外對本系也一直維持高度的評價。最近聽說本系畢業生賴振南在圓滿達成系主任任務之後被校方任命為總務長，對此全系師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憂的是本系的重要人才勢必因執行學校高級主管業務而分身，然而又為本系畢業生能如此受到校方賞識擔任要職而感到無上的榮幸。深知個人的教師培育理念與方法並非完美無缺，但值得欣慰的是多年來的成果驗證了我當初的方向完全正確。

行文至此，我要感謝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得以為輔仁大學略盡綿帛的聖神會、聖言會及輔仁大學。謹借此一角聊表謝忱，並為輔仁大學的未來發展獻上由衷的祝福。

（撰寫者：日本聖神會山崎陽子修女，系主任在職期間 1979～1988）

（日本南山大學 周錦樟副教授 翻譯）

四、學生輔導的特色

（一）主要的輔導工作

輔大實施導師制度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日文系為例，不僅專任教師，連一部分的兼任教師都曾經擔任過輔導的工作。針對學生的任何問題，不管是課業、情感、或班上的紛爭、打工、升學、就業問題，導師們無不積極處理，因此之故，同學們常提到他的外校同學都很驚訝及羨慕日文系的師生互動狀況，甚至在日文系雙修的外系同學，也紛紛要求可以成為被照顧的導生。同學們畢業後，不管經過多少歲月，經常成群結隊回系上探望師長，或者辦同學會時，也都不忘邀請老師們出席。可以說，導師輔導的高品質是日本系的特色之一。

日文系有一項重要的導師工作是有關留學方面的輔導。因為要申請日本學校是一件十分艱辛的工作，從決定研究對象到寫研究計畫、申請學校等，事情繁雜、困難。在較早的年代裡，山崎陽子主任「介入」甚多，舉凡申請學校，與對方教授取得聯繫，書信往返，或準備交流協會的留學考試等，都是她一肩挑起輔導的工作，今日在日文界活躍的教師們都受過她的照顧。另外，先後陸續回國的楊承淑老師、林水福老師、陳明姿老師及黃鴻信老師，在系上也都扮演重要的留學輔導角色。早年民風保守，學生們沒見過什麼世面，學習日文的管道也不若今日多元，普遍來說，日文的能力不算出色，因而要前往嚴謹的日本唸書，還真需要十足的勇氣！正由於這些前輩們的打氣與提醒，才陸續有畢業生前往深造，而且這些前輩們完全無私地把日本的資源，特別是在日本的人脈上的資源轉移給後輩，讓後輩們得以擁有一個多采多姿的留學生涯。在日文系的學習期間，能夠得到這些師長們的照顧、輔導，真是身為日文系學生的一大福氣。現在系上的老師們也都把這個傳承的工作做得很好。

另外一項輔導，是有關交換學生、短期留學等方面的協助。這個工作除了系主任與助教之外，日籍老師出力最多，舉凡在日本學校該注意的事情以及該修的課程，交朋友方面……日籍老師除了平日的叮嚀、交代之外，在出發之前也都會為同學舉辦行前會，這些無非都是希望同學能在一年、半年、一個月後，攜回最大的收穫。日籍老師另外一項工作就是照顧來台灣的日本交換學生，讓

這些學生能夠很快就融入到輔大的學習環境中。

除了現階段的工作實態之外，翻開日文系的輔導歷史，不得不提到下列兩個特殊的輔導方式。

(二) 「靈泉會」的貢獻

早年的日文系不像今日一般重視導師與導生的互動關係，其實也不只日文系如此，全輔大應該都是這樣。當時的日文系如果學生有問題，當然直接找助教解決，助教解決不了就請系主任出面。不過，在當時導師制度尚未建立完備之前，輔導學生的重責大任，大多由神職人員擔負起。本系有一個叫做「靈泉會」的社團，是由在系上擔任日語會話課程的大木マリア (Maria) 修女擔任輔導老師，系上同學自由參加，每週固定一個時間，修女與同學聚會，大家唸唸聖經，唱唱聖歌，碰到教會的節日就特別慶祝一番，當然送別會、迎新會等是固定要舉辦的，除此之外，修女也常引用聖經裡的道理來解決同學們的困擾，可能是情感上的、可能是生活起居上的、可能是人生觀的問題等等。

我本人加入「靈泉會」是有一段緣由的。一年級時，對剛從宜蘭鄉下來到台北的我而言，不適應都會的環境也經夠慘了，居然學期初在大木老師的會話課中同學們紛紛就被指定上台用日文做自我介紹（當然 50 音是剛教過），台下除了老師、班上同學，連兩位助教都出席了，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台上，而我在高中之前從沒在公共場合講過話，於是不出所料，當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漲紅著臉，杵在台上，發不出任何一個聲音，而且私底下還費盡力氣才忍住嚎啕大哭的衝動。總而言之，說有多丟臉就有多丟臉！下課後，大木老師居然把我帶去休息室，我原先以為她要訓我一頓，沒想到她是帶我唱聖歌，我幾乎是邊哭邊唱（現在想來，還真是佩服當時怎麼能在同一時間裡讓鼻腔、口腔、丹田等切換得那麼順利。）以今日的輔導經驗來說，真是什麼跟什麼!! 怎麼會這麼沒效率呢？何不直接鼓勵學生「再接再勵」，或者直接教導學生「如何克服緊

張」？……的確，大木老師的作為對於當時的我如何從「羞愧感」、「恥辱感」當中尋出活路的這件事是毫無幫助的，不過她倒因此給了我一個願意親近她的機會，也成為我進入「靈泉會」的契機。我的四年大學生活中，就一直是這個會的忠實會員，雖然我始終都沒有因受到感化而成為天主教徒，但是它對我日後總是帶著喜悅的心親近教會活動是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的，說一句通俗，但卻是真實的話——它開啟了我人生的另一扇窗。

我的歷史是如此，但是參加「靈泉會」的成員，每個人的故事都不盡相同，有些同學後來成為教友。不過，也有一些特殊的故事。記得當時我們班有一位男同學，日文成績一直不好（很遺憾的是，現在他的事業成就卻又是無人能比的。）心想如果能夠親近大木老師，成績大概會比較安全一點，於是一整學期都「準時」參加「靈泉會」，聖歌唱得比誰都大聲，要出面服務也比誰都熱心，結果，一學期下來，會話課還是被當，而且分數還超低，真是身受重傷！現在每每與同班同學聊起他的故事，以及回想起他當時忿忿不平的表情時，雖然時隔 20 餘年，大家還是笑到東倒西歪。

這個時代裡的學生輔導，看不出現代化的輔導技巧，也沒有多元化的輔導內容……它有的只是陪伴，是「毫不相干」、「狀況外」的一種陪伴。但是，在往後人生中，你是不容易忘記它的。

（三）麻辣助教

日文系在輔導上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助教的角色扮演。雖然每個階段的助教在學生輔導上的策略不盡相同，不過，日文系整體來說，助教與學生的關係都很親近。助教對於學生而言，除了事務工作之外，亦師亦友，這樣的關係不僅能理解學生的困難處，協助學生解決，同時當學生對系上的措施有所誤解時，助教正好可以扮演說明、溝通的角色，在第一階段就化解系與學生之間的對立。另外就是在生活當中也經常與學生打成一片，例如，某個時期的助教還

跟學生一起穿著緊身衣，參加外語學院的啦啦隊比賽，還名列前茅呢！

在此，要特別介紹歷屆以來的一位特殊的助教，他姓黃，目前在某國立大學的日文系執教。這位助教之所以得以被歸入輔導老師的行列當中，當然是因為他極受學生的歡迎，不僅是跟學生打成一片，簡直是混在一起。60年代，學生尤其是男同學最多的休閒活動大概就是看看電影、打打牌，然後就是喝喝酒。這位助教經常於晚上時間帶著一群住宿男生到附近的田邊俱樂部（現在的建國路一帶）喝酒什麼的，一高興起來就超過了宿舍門禁的時間。早年的宿舍是一過時間，當晚就不會再開第二次門的，那怎麼辦呢？於是由助教帶頭爬牆進去，甚至後來一位中日交流協會官派的德高望重的日籍老師，也被他同化，加入了爬牆行列。當然此風不可長呀！不過從這當中，本人看到的是，這種特殊狀況下建立起來的「革命情感」，至今已延續了數十年的這個事實。當年一起為奸的幾屆同學，日後辦班上活動時，都不忘交代主辦同學：「我們班那個黃××，要記得聯絡！」，甚至更嚴重的是，當班上要出錢出力招待某位老師的時候，居然也不能放過他，理由是：「他是我們班的，可以不用出面喔？」……這種狀況要怎麼說呢？一個助教當成這個樣子，已不是一個「慘」字就能說盡的了！

他之所以受歡迎，主要理由當然是自己也好玩，跟學生臭氣相投。不過，要細究的話，可以說從這位助教身上，看不到日文系奉為真理的「優雅」、「謙卑」與「好禮」氣質，他不講究身段，但講究義氣；他不在嘴巴上讚美人（大部分時候都滿口粗話），但是卻會以行動相挺……，這種特質尤其容易吸引反體制的叛逆孩子，或者是在學習上低成就的孩子，因為他們發現雖然在課堂當中常挨老師的罵，但是一半代表教師身分的助教（助教在當時可以帶實習課，或教第二外語等課程），卻可以視他們為兄弟，甚至還發現助教的酒品比他們差，這真是個莫大的救贖！！也因此當時的學生跟系上很親，沒事就膩在系上。他當助教的那幾年，不僅男同學，連當時優雅、害羞的日文系女同學們也把他當哥兒們看。

這也算是一種輔導吧！是一種非常異類但是得以儔永的一種輔導。而他是我們心目中永遠的助教！也期許日文系多一些這樣的「重情重義」的麻辣教師、麻辣助教！

（撰寫者：黃翠娥老師，1980年第八屆畢業。現任輔大日文系副教授）

五、系友會會史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成立於民國 58 年，至民國 94 年 6 月止，已有 33 屆畢業生踏離校門，步入社會，分佈在全省各個角落，從事各種行業，默默為社會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民國 71 年，系裡有感於系友為數雖眾，卻由於平時缺乏聯繫，在茫茫人海中不免顯得孤單、薄弱，因此，為使大家團結起來，匯成一股沛然的力量相互扶持，並提攜後進學弟妹，乃由當時的山崎陽子系主任發起成立系友會，呼籲系友歸隊。雖然草創初期面臨諸多困難，但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就在有心系友的支持奔走下，於該年 12 月成立了系友會。民國 73 年，本系奉准更名為「日文系」，原「東語系系友會」亦隨之更名為「日文系系友會」。

民國 94 年 5 月於第 35 屆系慶擴大回娘家會上選出第八屆王柏立系友擔任系友會第十一屆會長，以維繫著系友會的整體組織運作，而日文系則負責系友與在學學子的橋樑工作。

系友會章程

1. 民國 71 年 12 月公佈實施。
2. 民國 75 年 12 月首次修訂，隨即公佈實施。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定名為私立輔仁大學日文系系友會。

第二條 本會以聯絡會員之情誼及協助在學同學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輔仁大學日文系辦公室。

第二章 任務

第四條 本會主要任務如下：

1. 調查會員動態事項，出版系友通訊錄。
2. 發行定期刊物。
3. 促進系友聯繫事項，舉辦系友聯誼活動。
4. 辦理系友會獎助學金，鼓勵在校學弟、學妹努力學習。
5. 協助母系舉辦之大型活動(如戲劇演出等)，另輔助會員、在學系友就業等。

第三章 會員

第五條 本會會員之資格及權利義務

1. 凡輔仁大學日文系畢業系友，為本會當然會員。
2. 本會會員，有選舉、被選舉為會長、副會長之權利。
3. 會員有遵守章程，服從決議，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六條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大會選舉會長，議決重大工作方案，並制定及修改會章。

第七條 委員會由各屆代表組成，視情況需要，由會長召集，決議並執行本會任務。

第八條 會長：

1. 本會設會長一人，由大會採無記名方式投票選舉產生。
2. 負責召開會員大會，委員會，策劃並執行本會任務。

第九條 總幹事或秘書長由會長推舉。

歷屆幹部

第一屆：1981年12月~1983年12月	
會長：陳茂慶 第一屆系友	副會長：李三坤 第二屆系友
第二屆：1983年12月~1985年12月	
會長：張煥 第二屆系友	副會長：馬章明 第二屆系友
總幹事：陳明姿 第二屆系友	
第三屆：1985年12月~1987年12月	
會長：張正賢 第二屆系友	副會長：林水福 第四屆系友
第四屆：1987年12月~1990年12月	
會長：黃正明 第三屆系友	副會長：陳光宏 第四屆系友
總幹事：黃鴻信 第三屆系友	
第五屆：1990年12月~1994年12月	
會長：黃如馨 第二屆系友	總幹事：林水福 第四屆系友
第六屆：1994年12月~1998年12月	

會長：歐崇敬 第十七屆系友	總幹事：楊錦昌 第十二屆系友
第七屆：1998 年 12 月～2000 年 12 月	
會長：文嵐君 第十一屆系友	秘書長：賴振南 第十一屆系友
第八屆：2001 年 1 月～2001 年 12 月	
會長：謝依倫 第十七屆系友	秘書長：何思慎 第十七屆系友
第九屆：2002 年 1 月～2002 年 8 月	
會長：賴振南 第十一屆系友	秘書長：何思慎 第十七屆系友
第十屆：2002 年 9 月～2005 年 4 月	
會長：賴振南 第十一屆系友	秘書長：劉慶瑞 第二十屆系友
第十一屆：2005 年 5 月～	
會長：王柏立 第八屆系友	副會長：黃翠娥 第八屆系友
	副會長：賴振南 第十一屆系友
	友

未來任務

近幾年來系友會在會長及秘書長的規劃之下，除了每年 12 月配合母校校慶而舉辦之系友回娘家活動之外，每年也為未來系友的在校同學舉辦升學與就業相關的活動與演講。另外，為讓日文系及全校師生對象徵日本精神之一的日本茶道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系友會結合日文系的資源，於 2005 年 5 月日文系第 35 週年系慶特別企劃的日文週中，邀請擁有 2000 多名會員的「日本真 ML 茶之湯 Community」團體，共計 25 名會員特別自日本蒞臨本校舉行該團體首次的亞洲日本茶道公演，會中不僅一連舉辦兩場演出之外，更在會後進行日本抹茶品嚐與體驗。此舉也創下國內首次的大型日本茶道演出，並獲得極大的好

評。

今後，系友會在秉持強化系友間的聯繫及在校同學對系上的認同理念上，仍將持續辦理相關活動。另外，也將儘速找到失聯系友的下落，以使系友會能更加成長與茁壯，相信未來在新任王會長的帶領之下，定會帶來一番的新活力與新氣象。

（撰寫者：劉慶瑞老師，1992 年第二十屆畢業。現任輔大日文系助理教授）

六、青澀時代的回憶

（一）那小巴黎那黑森林——輔仁大學建校八十周年感言

頂著一個小平頭從成功嶺下來，全身被中臺灣的陽光烤成古銅色，臉黝黑得發亮。「唷！老周呀！快認不出來了。」小李看到我：「來！我跟你介紹一下，這是我高中同學，他也姓李。」修長的雙腿，站在我前面的人好像是剛從瓊瑤小說裡走出來的似的，一臉帥氣。他撩了撩頭髮「聽說去年只錄取一個。」天吶！看那水泄不通的文學院走廊，心想今天豈不是來陪考了嗎？怪只怪什麼成功嶺的，學過的日文早被射擊、劈刺活生生地給逼出大腦。一只鯉魚在花間穿梭，不時浮出水面嚙動嘴巴，似乎在對我說：「快回去吧！」

國文和英文還好應付，但日文卷子發下來的時候，頓時一怔，好似後腦勺被人家敲了一記悶棍，半晌說不出話來。考題看似日文又有點兒像阿拉伯文。好一陣子苦思才發覺那是通篇平假名的手寫文章；漢字和外來語變了形不說，文章從頭到尾一氣呵成，沒有標點，沒有段落，甚至連促音和拗音也變成了大寫，再加上那龍飛鳳舞的字體，乍看之下好像是剛從羅塞達石（Rosetta stone）拓下來的碑文。瞪著天花板大半晌，幾經折騰之後總算在鈴響之前交了差。

班級不大，二十五個男生十五個女生。陌生的面孔裡我發現了李，心中的忐忑一時消除不少。第一節上的是日文會話，上野山老師要我唸一段課文，唸

完後只見老師頻頻搖頭說：「唸得很流利，可是重音有點奇怪。」下課後在系辦公室，找到原土老師。老師在我的課本畫上重音記號，又重複地帶著我唸，等第二節鈴響時，我發現老師手裡的 Dunhill 早已變成一大截的煙灰。走進教室，突然有人說：「老闆來了！」一時納悶，心想這節是中級日語哪有什麼老闆來的道理，直到張則貴老師走進教室，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老闆就是系主任。

輔大外語學院按當時院長孫志文 (Arnold Sprenger) 神父提倡的教學構想，從我們這一屆起成為全國第一個採用密集教學 (intensive course) 的學院；為奠定學生的外語應用能力，一年級不修通識，一切課程都以語言訓練為主。由於語言基礎扎實，二年級以後的專業課程都可以完全使用外文教材，並以外文教學。當然也因未修通識以致無法轉系，難怪系老闆說我們上了輔大就等於上了賊船。

輔大學風自由，對學生完全尊重，上課不點名，來去悉聽尊便。正因沒有管理所產生的對立，師生相處異常融洽，而大家也都相當自愛，相當用功。

迎新是一年一度的大事。傳統上要在這個時候抽籤決定學長和學弟妹的關係。基本原則是學兄配學妹，學姐配學弟。時間未到，準學兄們就已經開始品頭論足，個個都期待能抽到中意的學妹。開始或許難免有些動機不純，但這種學長制度代代相傳，使得整個系形成一串串的家族，彼此團結而且源遠流長。

連串的舞會、夜遊、拱豬、球賽之後；同學們借筆記的借筆記，到理圖佔位子的佔位子，聚齊之後便開始考前復習和猜題，連平常蹺課較凶的同學也都陸續地出現了。

曾幾何時，路面的瀝青已經開始蠕動，蟬聲穿過杜鵑花叢陣陣襲來令人昏昏欲睡，又是一年暑假的開始。校園裡已不見熙來攘往的人群，但是日文系的同學仍聚精會神地聽原土老師上課。就這樣，每年夏天原土老師犧牲自己的假期為同學們開課。心想反正待在家裡也是閒著，到了學校才發現大部分同學也都來了。下課後到校門口對面的柏拉圖，輕啜著咖啡繼續討論。當然啦！付

帳永遠都輪不到我們。

將學士帽的帽穗移到另一邊，大家跟著于斌校長從中美堂魚貫而出，緩步環繞校園。按捺心裡的激動，我悄悄地哼著「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那熟悉的陽光、那躺慣的草坪，此時更令人覺得依依不捨。畢了業，女的上班，男的入伍，從此各分東西，但那小巴黎的陽光、那黑森林的草坪卻化成了心中永遠的記憶。

在重慶南路下車，看到三重客運擦身而過，心裡頗有一些優越感，因為從今天起我可以堂而皇之到西站搭校車。車經盲人會時我的心跳已經開始加速，下車時就幾乎想打退堂鼓了。為了這堂課我已經準備了三天三夜，沒想到我卻體驗到人生最漫長的五十分鐘。寫黑板時刻意地將速度放慢，希望這段避開學生視線的時間能夠無限地延長下去。忽然聽到鈴響，心裡如獲大釋，擦擦汗故作鎮定，問同學們有什麼問題，這時一個學生舉手說：「今天是不是老師第一次上課？」我那一絲絲的優越感頓時飛到九霄雲外。

來到黑森林，大家在樹陰下圍成一圈，或坐或臥。沒有黑板，沒有桌椅，只有那輕拂臉頰的微風和那沁人心脾的露珠，我告訴同學說這叫「青空教室」。一堂課下來大家仍精神抖擻，一個學生拍拍裙子說：「老師！下禮拜可不可以再來？」

也許是玩心太重，也許是和學生的年齡差距不大，凡是學生的活動都少不了我，夜遊、烤肉、球賽、舞會……在輔大任教的六年期間我仍繼續享受著當學生的樂趣。

韋應物曾嘆：「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而我來此轉眼就是十五個寒暑。當初答應南山客座兩年，卻因種種原因一直賴到今天。南山和輔大外語學院皆隸屬於天主教聖言會，因這層關係雙方一直來往密切。以往日文系每年安排學生到南山來參加暑期研修，而南山的師生也經常訪問輔大。由於當時南山沒開中文課，於是在南山的利瑪（Robert Riemer）校長的邀請之下來到南山，

從此就搖身一變教起中文來了。

走上斜坡就是南山大學，兩排櫻花樹一直從校門口延伸到帕黑廣場(Pache Square)。一到四月初，櫻花就開始綻放，綠蔭大道似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粉紅的世界。可是當你還沒來得及佇足觀賞，花瓣又像一群頑童在湛藍的天空盡情地追逐，驚醒酣睡中的雲朵。玩累了之後才很不情願地飄落大地，在過道上、草坪上歇息，有些花瓣似仍意尤未盡，調皮地停在行人的肩膀上或頭髮上。幾天之後校園猶如初嫁的新娘，在薄如蟬翼的婚紗之後露出靦腆的嬌媚。

櫻花季節正值日本的迎新送舊。開花有一份期盼也有一份喜悅，但那稍縱即逝的燦爛也難免讓人體會到「諸行無常」的道理，而留下些許的感傷。上星期途經帕黑廣場，乍見一朵櫻花羞怯地掛在樹梢，於是吟詩一首：「春麗ら，待ち遠しきは，初桜。」以附會風雅。孰知今天花瓣已如雪花般在空中輕盈地飛舞，詩興再度湧現，又作一首：「花びらや，翼はばたき，青空へ。」望著廣場，我揉揉眼睛，映入眼簾的卻是那小巴黎的煦煦陽光和那黑森林的茵茵綠草。

(撰寫者：周錦樟老師，1978年第四屆畢業。現任日本南山大學副教授)

(二)我在輔大日文系 20 年

輔大日文系(前身為東語系)自1969年創系至今，已將近36年。我自1979年9月第一次踏入輔大後，生涯中就一日沒離開過她。除當兵和日本留學期間，心在人不在輔大之外，前後已整整20年都在她的懷抱中。有時會問自己，這到底是巧合呢？還是冥冥中有什麼力量的安排？

我本身是從南部北上就讀的鄉下小孩，上大學以前從未接觸過天主教或基督教，對宗教的概念僅是傳統的民俗信仰，雖然隨著家人禮佛拜神，但是向來懵懂不知何謂宗教。因著聯考成績分發到輔大東語系之後，我才意識到輔仁大學的存在，才弄清楚未來四年要唸的是日本語文，才知道輔大是天主教大學。

大一新生一開學，受到修女大木瑪莉亞老師的關懷特別多，大木老師除了每星期教我們六小時的日語會話課之外，還主動邀請我們參加她於課外為學生召集的「靈泉會（生活分享）」。此外，大木老師始終不忘她身為一位修女的福傳使命，透過課堂的教學活動以及課外的師生互動，她積極地從事福傳工作。我在大木老師積極又熱心的帶領之下，參加了每週一次的「靈泉會」生活分享聚會，更在她的推薦之下，我和其他兩位同班同學，開始跟著當時的淨心堂主任楊傳亮神父聽天主教道理。當時抱持著「為什麼修女會在大學教書」的好奇心，以及「天主教這外國宗教是什麼」的求知心，一步一步地接觸天主教、認識天主。雖然同班同學和系上學生都盡量迴避大木老師的傳教熱情，但是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依然不減，繼續接觸天主教的各種薰陶。很快地就在大一下學期的復活節，與班上另一位同學領受聖洗禮，成為一位天主教教友。領洗後表面上雖沒有所謂脫胎換骨、羽化成蝶的現象，但內心裡卻有不一樣的感受。

大一領洗後，若沒有加入天主教大專同學會這一社團，我的大學生活就不可能是一段黃金歲月。因為我在那個團體，除了持續加深天主教信仰外，還學會了如何與人分享，更在社團中結識了其他學系的朋友，因此生活變得多彩多姿，人際關係也不侷限於外語學院，活動範圍也廣及系內外、校內外。現在回想起來，那四年的大學生活，真可說是我個人的一段黃金歲月、最精華的成長史，所以對於輔仁大學，我始終都抱持著感恩的心情。

當然在日語文的專業上，我感謝日文系教導過我的每一位恩師：原土洋老師、陳山龍老師、大木瑪莉亞老師、張則貴老師、國立惠美子老師、大船隆司老師、謝逸郎老師、嶋美惠子老師、伊原大策老師、楊承淑老師、林水福老師以及陳明姿老師、黃鴻信老師等好幾位當時的助教們。特別感謝當時的山崎陽子系主任的教導與指導。由於山崎陽子系主任當時的教育方針（積極培育年輕師資），我才有幸受其輔導、指導並推薦前往日本知名的國立東北大學留學深造，也才有機會返回母校執教。我是報著回饋母校教育之恩的心情，回輔大校

園任教，也一直很盼望能在天主教辦學的大學服務，因為教學、研究或是行政工作縱使再如何辛苦、忙碌，才有為誰辛苦為誰忙的精神中心與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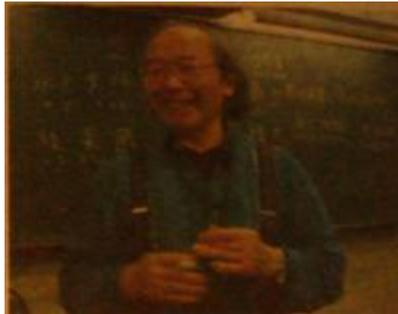
自 1992 年回輔大日文系任教以來，受到系上、校內外師長們的照顧與提攜，我才能一步一步平穩地走過來，也才能克服各種難關累積下學術成果和行政經驗。若一切平安，我今後還有 20 年能為輔大服務，我仍然一稟感恩的初衷，盡我一己之力，為輔仁大學（日文系）鞠躬盡瘁。祈願上主垂顧！

（撰寫者：賴振南老師，1983 年第十一屆畢業。現任輔大日文系教授）

典範人物

原土洋 教授（1930-2005）

原土洋 教授（1930-2005 日本・東京）



師於 1971 年受本校東語系（今日文系）之邀擢校授課，自此結緣，前後十載，傾心盡力為本校之日語教學帷幄規劃，影響所及，他校亦羣起效尤，台灣日語教學得有今日恢弘蓬勃之發展，開基者誠可謂師也；師於學子非獨傳道、授業、解惑，更且作之親，作之友。作之親，如父如兄，疼惜呵護，出諸以愛；作之友，忘年之交，關懷勉勵，發諸以誠。而學子於師固尊之為師，若父若兄，執弟子禮，不敢逾越妄詡為友。能不自慚乎？哲人已萎，典型常在，願共勉之。

（日文系第三屆系友黃鴻信先生）

原土老師教給我們最大的「財產」是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再呈現。無論智愚，不分門派，凡叩我們者皆誠心誠意教導。其次，不以在校成績論斷學生，人的價值不應以單一的標準衡量。（日文系第四屆系友林水福先生）

原土洋教授生平事略

學歷：

1956-1960 國學院大學文學部文學士畢業論文：「文の構造について」

1962-1966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 文學碩士 師承時枝誠記博士

畢業論文：「源氏物語解釈語學の発展」

經歷：

1965-1971 國際基督教大學助教、講師

1971-1972 中華民國日本大使館特別研究員

1972-1975 國際交流基金海外派遣專家

1975-1976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文化交流專家

1976-1980 輔仁大學文學院教授

1980-1982 聖德短期大學國文科副教授

1982-1993 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日語主任

1993-2000 拓殖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大學院言語教育研究科教授

1989-2005 財團法人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專門委員

山崎洋子 老師

學經歷

姓名:山崎陽子

國籍:日本國

出生年月日:1925 年 11 月 16 日

出生地:日本東京

所屬:天主教聖神傳教會



學歷

1943 年 3 月 東京都立第三高等女子學校畢業

1944 年 4 月 私立聖心女子學院專門學校國語科入學

1947 年 3 月 同校畢業

1948 年 4 月~1952 年 4 月 天主教聖神傳教會入會，研修聖經、宗教學、教理神學、生靈神學，天主教會史及語學等

1955 年 4 月 私立聖心女子大學文學院-國語國文學系入學

1956 年 3 月 同校畢業，取得文學士學位

1970 年 4 月 私立聖心女子大學研究所碩士課程國語國文學系入學

1972 年 3 月 同課程畢業，取得文學碩士學位

1976 年 4 月~6 月 在日本東京的 Berlitz 學校研修中國語

職業履歷

1947年4月~1948年3月	日本工商省工藝指導所就職，「所誌」從事編輯工作
1948年4月	天主教神聖(靈)傳教會入會
1952年4月~1963年3月	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私立聖靈高級中學校主任執教
1963年4月~1968年3月	日本秋田縣秋田市，私立聖靈高級中學校主任、校長輔佐、執教
1968年4月~1970年3月	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私立聖靈高級中學校主任執教
1972年4月~1976年1月	日本秋田市，私立聖靈女子短期大學執教 講師
1976年2月~1976年3月	日本秋田市，私立聖靈女子短期大學執教 副教授
1976年3月	受中華民國台灣省輔仁大學教職聘書，私立聖靈女子短期大學辭職
1976年8月~1981年7月	台灣台北縣新莊市，私立輔仁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執教 副教授
1981年8月~1996年2月	台灣台北縣新莊市，私立輔仁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執教 教授
1979年8月~1988年7月	台灣台北縣新莊市，私立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任
1996年2月	自私立輔仁大學退休，返回日本聖神傳教會

典範內容:

1. 奠定輔仁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在日本語文教學和研究上的領導地位及社會聲望。
2. 積極培養學生，推薦畢業生至日本著名國立大學(國立東北大學、九州大學、信州大學、岡山大學、筑波大學等)深造，鞏固日本語文學系未來師資陣容。
3. 推動與日本大學之間的學生交流活動。
4. 培養優秀年輕教師承擔行政工作，急流勇退日本語文學系行政主管職。
5. 推動系內「基督信仰」課外讀書分享會，鼓勵學生接近天主教信仰或領洗成天主教教友

義文系

系史：外語學院義文系系史

十年有成 —— 由青澀而茁壯

一、基本資料

(一) 系史與發展

輔大義大利文系成立於 1995 年，隔年開始招生，籌備過程歷時久遠。

1980 年，輔大外語學院院長孫志文神父計畫在外語學院開設義大利文輔系，並準備未來向教育部申請成立義大利文系。孫神父請當時擔任法文系系主任的趙德恕神父尋覓教授義大利文的師資，1981 年成功地在法文系開設一週六小時的義大利文輔系課程，為期兩年。

1984 年義大利文輔系暫停開設，原因如下：一、教育部規定若無本系就無輔系；二、教育部認為義大利文並非重要語言；三、學生人數不多。當時義大利和台灣並無任何外交關係，台灣雖在義大利設有辦事處，但在台並無義大利辦事處。輔仁大學遂將原義大利文輔系改成選修課程，開設初級義大利文及中級義大利文，每週二小時，為期兩年。該選修課程至九十一學年仍存在，現已納入學校全人教育課程中。

當時大家對如此改變感到極為失望。但是，上帝自有安排。

1993 年，擔任外語學院院長的是西班牙文系雷孟篤教授，雷院長認為義大利文不論就文化或經濟層面，對台灣而言都是極為重要的語言。同一時間，輔仁大學李振英校長在米蘭的天主教大學進修，十分肯定並仰慕義大利語言及其文化，聖言會的柏殿宏副校長也支持輔大多增設一系的計畫，且行政會議中聖言會代表郭維夏神父亦表贊同，加上台灣正值經濟高峰，所有大學都有擴展校務的計畫，成立義大利文系遂成為輔仁大學的首要計畫。

1994 年輔仁大學向教育部申請增設義大利文系，教育部隨即派員到校視察，於 1995 年正式行文批准，台灣第一也是唯一的義大利文系正式於 1996 年開始招生。

(二) 歷屆系主任

—1996~2002 年：康華倫教授 (Valentino Castellazzi)，義大利威尼斯大學中文碩士

康華倫教授為創系第一位系主任，初期有關師資延聘、課程規劃都由康老師一手承攬，為義大利文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康老師的積極努力下，義大利文系與義大利知名西也那外國人大學(Università per Stranieri di Siena)簽訂學術合作、學生交換等合作協議，彌補了國內並無其他義大利文系所可進行學術交流之缺憾；主辦輔仁大學外語學院之第三屆中世紀研討會《黎明前的曙光：但丁與其時代》，鼓勵國內外學者進行義大利語言文化研究及交流；舉行年度戲劇公演，以實踐寓教於樂的語言教學目的……。康華倫教授連續擔任兩任系主任，為期六年，是義大利文系由青澀而茁壯的第一功臣。

—2002~2005年：杜金換修女助理教授，羅馬宗座傳信大學神學博士

2002年康主任功成身退，由杜金換修女接任。輔仁是天主教大學，著重真善美聖精神，杜修女秉持天主教精神，身教、言教並重，推動義大利文系善用自身的外語專長，結合服務精神，發揮仁愛精神，善盡知識份子之責。杜修女以中立客觀立場，廣泛聽取老師對本系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協調老師之間的專業意見使能達成共識，維持充分授權模式，資源公平分配原則，以優先考慮學生未來就業需求為出發點，確認了義大利文系課程設計及系所發展方向。杜修女在任期間與義大利歷史最悠久的佩魯賈外國人大學(Università per Stranieri di Perugia)簽訂合作協議，推動長期交換學生計畫；帶領學生赴北京外語大學進行師生交流；在義大利駐台辦事處協助下，邀請威尼斯大學語言中心義大利語言教學學者來台進行義大利語教學觀摩活動。學生活動方面，杜修女也不遺餘力支持：92年12月8日舉辦第一屆系友大會，會中正式確立成立系友會組織，是為聯絡母系與畢業生、以及畢業生與在校學生直接溝通的橋樑；系學會承接學長姐的期望，對內建立縱向的家族制度，凝聚情感，此外除了傳統聯誼活動之外，也舉辦各類型文化活動如演講、電影欣賞、書展等，增加教室外自然學習的機會。

—2005~

姜豐瑞副教授(Alfonso Costanza)，義大利威尼斯大學中文碩士姜豐瑞副教授為系上資深老師，是與佩魯賈外國人大學簽署合作協議的主要推手，多年來為系務發展貢獻良多。未來三年可望進一步實踐義大利文系的發展藍圖。

二、特色

(一) 課程特色

義大利文系成立之初，台灣的義大利語人才嚴重短缺，因此本系成立之初即積極培養義大利語言人才，除了為台灣與義大利的文化、學術交流搭起

一座橋樑外，亦可為與義大利貿易往來頻繁的台灣產業界傳遞第一手資訊，並提供傳譯的語言服務。另一方面，義大利是文化古國，有豐富的文化資產，所以也加入有關義大利文學、文化及藝術等課程。

前兩年課程(大一、大二)結合語言訓練及基礎文化認識，所有的課皆為必修課，包括文法、語音、寫作、文化。後兩年(大三、大四)除了繼續部分語文法必修課程，例如與法分析、翻譯、文學外，其餘皆為選修課，內容兼具實用性及文化性，包括商業義大利文、口譯、聖經文化、當代義大利文作品賞析等。另外開有聖經故事、基督教文化等選修課程，讓學生能以認真學習的態度進一步認識宗教。

本系畢業學分要求共 152 學分。本系教學計畫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語言基礎訓練期，以小班密集語言訓練為主；第二階段文化素養培育期，除必修文化課程外，另提供多樣的文化課程，供學生以自由選修方式選擇，皆以小班制授課。為因應可能的就業市場專業要求，目前選修科目中開有商業義大利文，未來將進一步加強應用義大利文及義大利文翻譯訓練，以增加學生專業能力。

第一年語言密集訓練期：以奠定學生聽、說、讀、寫之基礎語言能力為主，採小班分組教學以達較佳之學習效果。

第二年語言-文化訓練期：繼續加強聽、說、讀、寫能力，並配合文史課程，以結合語言及其他學科，達到相輔相成之目的。

第三年進修、語言應用期：加強學生語言應用的能力，故語言課程著重於整體語法分析，另加入翻譯課程，加強學生對中文-義大利文之結構性認識及應用。學生亦可申請前往義大利大學進行學習。

第四年高階文化研究及專業訓練課程：為顧及應屆畢業學生就業或於國內外研究所繼續深造之不同需求，開設口譯、商業義大利文等應用性質課程，以期培育就業實用人才，另有古典、近代文學以期提供繼續深造學生加強人文知識機會。

為了讓學生能夠實際接觸語言環境，1996 年夏天，本系跟義大利西也那外國人大學合作，舉辦為期兩個月的暑修課程，鼓勵學生赴義進修。學生參加此課程後學習成果豐碩，不但突破心理障礙勇於用義大利文交談，而且對義大利的文化、歷史都有更清楚的認識。1998 年與西也納外國人大學正式簽訂合作計劃，凡輔仁大學義大利文系三年級學生可於暑期或單一學期期間，赴義大利修習語言、文化等課程，以便增進學生個人的語言能力。

2000 年，本系與西也那外國人大學簽約，負責台灣當地之義大利國家語言檢定考試(CILS)事宜，假輔仁大學義大利文系舉辦檢定考試，節省時間、費用，嘉惠台灣學子。凡通過 CILS 考試第二級者，可得多所義大利公立大學認可，可免參加入學語言測驗。

2003 年，本系更進一步與外語教學頗富盛名的佩魯賈外國人大學簽訂文化

交流協定，提供本系學生於暑期或單一學期赴義進修的機會。自 2004 年學年度起與佩魯賈外國人大學交換學生 2 名，為期一年，由佩魯賈大學提供學雜費全免形式之獎學金。

(二) 師資特色

有鑒於國內學習義大利語環境有限，故本系聘任老師中以母語老師所佔比例為高，提昇學生語言學習品質頗有助益。

本系專兼任教師專業背景包括語言學、文化比較、翻譯學、哲學、文學、宗教等，符合授課需要之外，亦能協助學生培養對不同領域的興趣。

近年來義大利文系規劃本系教師參與義大利語言教學方法之進修課程與交流活動，鼓勵未受專業語言教學訓練之教師配合所累積之教學經驗調整教學方法且提昇教學品質。2004 年已在義大利駐台經濟貿易文化推廣辦事處協助下申請義大利外交部補助之義大利語外語教學專業師資來台，進行為期 5 天之交流觀摩活動；並積極聘請非語言教學專業，但於文化、經貿等各領域學有專精之專家學者擔任兼任教師，讓學生以良好的語言為基礎，進一步認識文化議題。

(三) 專任教師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專 業
教授	康華倫 (Valentino Castellazzi)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中文碩士	義大利古典文學 義大利語教學
副教授	姜豐瑞 (Alfonso Costanza)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中文碩士	戲 劇 義大利歷史 義大利語教學
助理教授	杜金換修女	羅馬宗座傳信大學 神學博士	神 學 人生哲學
助理教授	圖 莉 (Antonella Tulli)	義大利羅馬大學 中文博士	義大利中世紀文學 義大利語言學 義大利語教學
講師	余哲安 (Brian Reynolds)	愛爾蘭都柏林三一學院 文學碩士	義大利古典文學 義大利文化 義大利語教學
講師	方錫華 (Francesco Nati)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中文碩士	義中文法翻譯分析 義大利語教學
講師	倪安宇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口筆譯理論與實務 義大利文化

			義大利當代文學
講師	博義道神父 (Paolo Cumin)	義大利特里也斯特大學 數學碩士	商務義大利文 義大利語教學

兼任教師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專 業
講師	多麗娜 (Dorina Alimonti)	義大利羅馬大學東方語言 文學碩士	媒體義大利文 義大利語教學
講師	柯士達神父 (Paolo Costa)	義大利波隆納大學 哲學碩士	基督教文化 義大利語教學
講師	羅志偉神父 (Attilio Rossi)	羅馬聖安瑟莫宗座大學 神學碩士	神 學 義大利語教學
講師	迪雅哥 (Perissinotto Diego)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東方 語言文學碩士	義大利語教學

(四) 設備

目前外語學院中文圖書總冊數為 46 萬 1 千 2 百 51 冊，而西文圖書總冊數為 30 萬 8 千 1 百 41 冊，其中義大利文藏書及義大利相關研究藏書近年來呈倍數成長，每年均追加圖書預算，購入原文圖書、字典、百科全書等以應教師研究及學生學習之所需。本系辦公室亦設有小型系圖，藏書多樣豐富。

期刊部分，性質包括教師研究用期刊（語言、文學、教學），及學生提昇閱讀能力、認識義大利資訊之一般性雜誌，平均每年期刊訂閱種類共 13 種，並按照教師及學生反應調整訂閱內容。

多媒體資源除了外語學院視聽教育中心現代化之視聽設備可輔助教學外，本系每年亦購進大量義大利文多媒體材料如錄影帶、CD、光碟等，供全校師生憑證件借閱。

硬體設備部分，每位專任教師皆都擁有獨立的研究室及全套電腦設備，包括電腦主機 12 台、印表機 14 台、螢幕 12 台、掃描器 3 台等，系上另有筆記型電腦一台及外接液晶單槍投影機一台供教師教學使用；影視語言教材及文化教材包括錄音帶、錄影帶、CD、VCD 及 DVD 共 1100 餘項。

(五) 系團隊特色及合作模式

義大利文系根據系務、院務及校務需求，成立不同性質之常態或專案委員會。各委員會之委員於每月系務會議中報告相關事宜進度，並在聽取其他教師

意見後整理並予以反映。以下為系團隊主要職責、任務之分配：

一主任：

召開本系各委員會會議；代表本系出席校務會議及其他相關會議；擔任校友會總幹事；監督並向系務會議彙報本系行政、教學、學生事務；監督並向系務會議彙報各委員會業務執行情況；編列本系預算，處理本系經濟情況及財產物品管理事宜，並向系務會議彙報；

一系務會議：

固定每月第一週召開系務會議，使系務之推動、最新訊息、教師之交流、溝通與合作等事宜有傳遞之管道，所有議題於會中討論以達成共識，若有意見不同，則以表決方式決議。本會出席人員包括義大利文系全體專任教師，並視議題之需求邀請兼任教師出席。

一課程委員會：

由全體專任教師組成，屬常態運作，針對本系成立之宗旨，修訂本系課程方向與組織，協調教師教授課程與研究專長相符；根據學生在校學習情況、未來發展方向，規劃本系每年開設之課程，整合教材之運用，並定期進行意見交換及檢討。

2005年6月為配合卓越計劃外語學院教材整備子計畫，於原委員會之下設立新的教材整備專案小組，以縱-橫向串連各學科之授課進度、教材內容，統一所有語言課程之大綱。

一學務交流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經系務會議推選，任期一年，得連任；積極拓展與國外同性質科系之交流活動，安鼓勵並輔導學生赴義進修，定期舉辦遊學說明會，爭取相關獎助學金，推動教師交換制度；爭取國外學生來台進修，以達互惠原則，並營造更佳的語言學習環境；內設義大利語言檢定考試 CILS 及 CELI 委員會，負責每年舉辦兩次檢定考試。

一校友委員：

該委員經系務會議推選，任期一年，得連任；推動校友會組織之成立；輔導並協助校友會達成組織章程訂定之目標；輔導並協助校友會相關活動之籌備與執行；於不定期會議中轉達校友會提出之愛系建言；鼓勵校友會配合校方推動之募款政策，以利學校穩健發展。

一圖書委員：

該委員經系務會議推選，任期一年，得連任；因應本系師生學習、研究之

實質需要，購置相關書籍、期刊；負責管理本系圖書經費；代表本系與圖書館維持聯繫、溝通與合作之相關事宜。

一視教委員：

該委員經系務會議推選，任期一年，得連任；因應本系師生學習、研究之實質需要，購置相關視聽教學器材與設備；負責管理本系視聽經費；代表本系與視聽中心維持聯繫、溝通與合作之相關事宜。

本系另有華裔學志漢學研究委員、以及系、院、校級會議代表及教評會代表，不定期依議題之需要在系務會議中或由系主任召開專門會議向全體教師報告相關事宜。

(六) 學生關懷管道

以 90 學年度到 92 學年度之生師比變化（90 學年度，1：31；91 學年度，1：26；92 學年度，1：23）可知平均每個學生可分配的教師時間增多。為顧及各年級學生需求不同，一年級導師以本國籍教師為原則，二、三、四年級之導師則為輔導學生語言學習問題，以義大利母語教師為主。

各年級導師每週安排學生分組約談，師生之間透過密切的接觸能夠使教師熟悉學生個別的學習狀況及適應生活等情形，導師工作之外，全系教師亦均扮演輔導者的角色，從授課中觀察學生的各項發展，如遇有學生身心障礙或個別學習困難者，將轉告主任及全系教師全力予以協助，同時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聯繫，必要時轉介本校學輔中心或宗教輔導室個案輔導。本系教師亦將針對學習進度落後之學生加強課業輔導。

非導師之專、兼任教師亦同樣肩負起關懷學生的責任，關心學生課內、外活動。並針對各年級不同需要，邀請畢業學長姐或專業人士與在校學生進行座談，協助在校學生釐清學習困惑，並提供就業或進修之相關資訊。本系有多位專兼任神職人員教師，定期舉行宗教交流聚會，隨時關心學生之心理及學業情況，發揮宗教博愛精神，為學生排憂解惑。

另有系學會每學期舉辦一次系週會，提供學生與老師對課業、系務等疑問直接溝通的管道；本系辦公室亦設有愛系信箱，學生可隨時對系上提出建言。

(七) 系友會組織與運作

輔仁大學義大利文系自 1996 年成立至今，轉眼已邁入第十個年頭。短短四年大學生活，同學們歷經了剛入學的懵懂，畢業前的徬徨，到今天在工作崗位上各司其職，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走過的痕跡想必難忘；同樣的期待、欣喜、猶豫，年復一年在每個同學身上重演，是所有校園或社會新鮮人必經的磨

練，自然也是收穫，但如果能有前人寶貴的經驗做借鏡，供學習，應該會有更不一樣的感受。

在此前提下，義大利文系決定正式成立系友會，建立起資訊網絡，讓系友與在校學弟妹維持感情交流管道，也能提供最新最快的就業資訊，讓求才、求職兩項需求在此交會。

系友會是為安排相關活動之固定組織，在 2003 年第四屆系友畢業前夕，舉辦了第一次系友大會，選舉系友會幹部，訂定大會章程。經過正式的政見發表、投票、開票過程，2003 年 12 月 8 日選出第一屆系友會會長為簡俊彥，現任職於長榮航運，積極籌畫系友會網頁企劃及相關系友活動。

本系已於民國 92 年 12 月 8 日舉辦第一屆系友大會，會中正式確立成立系友會組織，是為聯絡母系與畢業生、以及畢業生與在校學生直接溝通的橋樑；系友會成立之主要任務為：增進系友情感聯繫及加強互助合作，並協助母系推展系務；蒐集並更新系友資料及最新消息，公佈於本會網頁；協助學弟妹了解社會動脈，提供升學就業相關資訊和機會；藉由電子報提供系友職場就業訊息，將積極開拓相關管道。可視為本系教師之外最重要的學生自治之輔導單位。目前該系友會已為應屆畢業生舉辦過第一次就業輔導說明會，並計劃於本學期內持續推動就業及學術演講等相關活動。

93 學年度本系已經在系友會的贊助下完成系網頁更新，網頁中呈現了完整的系史紀錄及課程內容，供系友隨時得知系上動態，另附相關連結，提供系友畢業後繼續學習的管道；近日內可望完成的便是內附之系友會網頁，除收錄完整系友通訊、近況等資訊外，將發行電子報，主動聯繫系友與系上之感情。

(八) 獎助學金

一清寒獎助學金：

本項目是由學校生輔組提供，每年撥款各系清寒獎助學金一筆，由學生自由申請，在經系上主任及教師審核後，各學院院長再做最後批准。生輔組另外還提供校外相關清寒獎助學金資訊，學生可自行進入學校首頁瀏覽與自身條件符合的獎助項目。

一佩魯賈外國人大學獎學金：

佩魯賈外國人大學提供本系二名交換學生名額，交換學生擁有留學期間共九個月學費全免的助學金。申請學生以大三學生為主，歷年成績是主要參考資格。另短期留學學生亦有學費減免形式之獎學金兩名。

一西也那外國人大學獎學金：

以學費減免形式提供短期留學學生獎學金一至二名。

一其他：

目前義大利文系本系並無自我獨立開設的相關獎助學金，未來除向畢業系友們募款外，亦密切與義大利相關大學聯繫爭取更多的獎助學金利息本系學生。

其他

一系學會團隊

本系於 86 學年度成立「輔仁大學義大利語文學系學會」，旨在結合系上熱心服務同學，為系上策劃、組織學術性、交誼性之活動，以促進師生及同儕情誼。歷年來舉辦許多具代表性的活動，如義大利週，向全校師生推廣介紹義大利文化、美食、習俗，將教室內的學習經驗帶到外面與大家分享，同時也成功凝聚系內學生向心力。學會幹部由本系二年級同學擔任，設指導老師一名，由系上教師擔任。

一戲劇公演：

一年一度的戲劇公演向來是同學們最期待的活動，看不同年級的學生以流利的義大利文將自創或義大利劇作家的劇本搬上舞台，是學生跟老師共同努力一年後的成就感來源。曾經有兩年因為師資異動，一至三年級的戲劇公演暫停，但畢業公演在姜豐瑞老師的堅持下不曾缺席。姜老師擅長喜劇執導，國內重要劇團如表演工作坊所偏愛的 Goldoni 作品，也多次在校內的理圖劇場由義大利文系學生以義大利原文演出，獲得觀眾一致好評。

義大利戲劇以台詞多、肢體動作豐富聞名，所有演員必須深刻體認這樣的語言文化才能成功地詮釋劇本精神，因此畢業公演似乎成為所有大四學生最難忘懷的「畢業考試」。

一文週

義文週是每年外語學院外語月的本系代表活動之一，在歷屆學會的經驗傳承結合開創求變下，活動內容及表現日趨成熟。

除了傳統書展之外，近年來加入還音樂表演、電影欣賞、服裝走秀，並將知名的義大利美食品牌引入校園，舉辦美食講座，結合娛樂與飲食文化，寓教於樂。

以上活動影像紀錄，請見 <http://www.italy.fju.edu.tw/>。

三、人物特寫：

(一) 資深教師同仁在教學、服務、關懷上的精神與典範

康華倫(Valentino Castellazzi)教授，係本系創系最重要之推手暨第一任及第二系主任。早年即有感於台灣與義大利之間的貿易如此活絡，與教廷梵帝岡亦關係密切，卻極度缺乏義大利語專業人才，實為可惜，遂積極推動籌備創設義大利語文學系。籌備之初幾經波折，台灣之教育法規及政策令籌備計畫窒礙難行，康華倫教授鍥而不捨的費心奔走近十年，終於在民國八十五年於本校成立全台灣第一個義大利語文學系，並於民國八十六年正式招生。

創系之初，義大利語師資缺乏，康華倫教授遂又積極延攬義大利籍各領域專業人士暨商請本國籍專業師資到系任教，為學生打造優質之義大利語學習環境。此外，康華倫教授並協助學生拓展世界觀，推動與義大利學校合作簽訂姊妹校合作協議，讓學生可以透過語言交換的機會赴義大利快速學習，並實際從生活中體驗並交換兩國之文化異同。

康華倫教授相當了解東方學生在學習外語上可能遭遇到的困難，所以除了親自以中文編寫義大利文文法書籍，亦促請系上教師編寫教科書，期待能催生一套適合國人閱讀學習之義大利文教材。在教學上，康教授向來不吝於給學生鼓勵，與學生的關係亦師亦友，課內外均與學生相處融洽。

附帶一提的是，康華倫教授本身非常博學多聞，不但精通多國語言，並對各各領域都有所涉略，對於學生的提問無不傾囊相授，決不藏私，經常有慕名而來的求知者尋求其指導，如入寶山，決不會空手而回。

晃眼又是近十個年頭，本系已培育出超過四百名之義大利語傑出人才，目前正深入各領域發展專業；且看現今台灣，義大利文的使用雖不如英日語普及，但學習義大利文亦已蔚為風潮，康華倫教授雖已自義大利文系退休，但他留下的種子仍持續發芽茁壯。

(二) 系友對系所及師長的歷史回憶

熱情、快樂的義大利之旅

第二屆校友 Vittoria(李雅

惠)

大學四年的確是我人生中最豐富快樂的時期，剛進入義大利文系，內心充滿許多疑問與不確定，義大利對我而言是個陌生的國家，更何況要去學習她的語言與文化，所幸系上的老師都是義大利人，透過直接與他們的相處，感受到義大利人的直接與熱情，一年級時，像個小孩牙牙學語，老師們一字一句的耐

心教學，恍惚中學習一些簡單片段的字語，此時語言的感受離我還很遠，稱不上有什麼成效。在系上師長，康華倫主任、姜豐瑞老師等幾位老師熱心安排下，暑假到義大利 Siena 遊學，開啟我對義大利的驚奇感受，置身在義大利熱情、色彩豐富的地中海氛圍中，透過文化的感受力，讓我在大學學習義大利文更為努力。除了去義大利遊學的美好記憶，系上每年安排的戲劇公演，也是一種深刻的學習，義大利戲劇多半誇張並具幽默，藉由在舞台上的肢體動作，加上義大利語的台詞，讓我們用表演的方式，感受義大利文學、歷史及文化。

當時系上的師長，也是學習義大利語過程中鮮活的主角，康華倫主任負責打理系上大小的事情，他很可愛，小小的，每天都充滿活力，對學生總是耐心教學，很少看到他發脾氣，來台灣教學已經超過二十年，我們都說他是語言翻譯機，他會的语言大概超過翻譯機的八國語言了，當年也是他努力推動，終於在輔仁大學成立義大利文系，十分感佩他的努力精神。姜豐瑞老師則是開系大老，上課的時候，他總是會說：「哎呀！不對啦，你們不要用英文發音。」「哎呀！最討厭美國啦...我不是美國人，我是義大利人。」「哎呀！你們要用功一點啦，不然我要把你們當掉。」許多的口頭禪，他總是會在上課的時候說了又說，搞到我們都覺得很好笑，姜老師成為大家公認認真、有點嚴格的老好人，雖然他常因為我們不用功學習而氣急敗壞，但我們內心都知道，他是熱衷於教學並十分關心我們的學習。另外圖莉老師，對我們的期待與要求非常高，她上課總是準備豐富的資料，讓我們可以多學習一些義大利文。四年在義大利文系的大學生活，不論在課業學習上，各項系上活動中，產生栩栩動人的美好回憶，即使在畢業四年後，仍深刻的影響著我們對大學、對義大利國度的熱情喜愛。

那一段美好的時光

第五屆校友 Cecilia(呂宛儒)

義大利文，是這世界上最好聽的語言。也是我最喜歡的，*come la musica...* 雖然現在不在學校了，但是每次聽到義大利文的時候，都還是覺得好好聽，好懷念。每一字一句，都是老師交給我們的。從 *abcd*、*ciao come stai* 到念但丁，都很难不容易，小黃都翻爛了，才建立起一點點基礎。但是當你開始用義大利文買車票，或是看小說的時候，那種感覺真的好好。

我們有全校最可愛的老師，和全外語學院最溫暖的系辦。在義大利文系就讀的四年，是我最快樂的時光，我在這裡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很多可愛的同學，和每天都精力充沛的老師。每每看著台上的老師，都覺得這就是義大利，真性情，忠於自我。在這個系裡可以自由暢快的呼吸。在輔大的日子，讓我覺得日子過得很快樂。雖然還談不上充實，因為我還有好多事還沒做就畢業了。但是，可以在這個地方度過我的大學生活，覺得很幸運，也覺得好好。我們的老

師很關心我們，也很在意我們的義大利文好不好。而每個老師，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多半的時候開心，時而爆笑，有時情緒化，總總的總總，都非常的義大利。記得大一個時候，Andrea 把門窗關起來教我們義大利文的髒話和手勢，很多時候的晚上，請大家去他們家吃好料的。認真的 Antonella，每次上完課都有好多功課要做，也有上不完的課，讓我們來不及去上廁所。

帥氣仁慈的神父，在與你擦身而過時，會偷偷回頭看你。Alfonso 會在課堂上大喊「不要在上課的時候吃菜」「就是這個樣子」「全部亂一起了」有好多好多喔，還有中文很好的 Francesco.....。我們的老師有好多好多，我們的回憶也有好多好多。在義大利的那半年，瘋狂的旅行，想玩遍地圖上的每一個地方，每個地方都在我們心中深深留下痕跡。mensa 的中餐，吃了一盆又一盆，吃的那樣圓滾滾的，真的好懷念。也好像念以前坐在 Campo 上曬太陽的日子，吃著冰淇淋，看著鐘塔，悠閒的走在街上，一間間店慢慢逛，坐著全義大利最慢的火車(regionale)，由北往南慢慢旅行，反正我們有的，是時間。

畢業以後，大家各奔東西，但是那樣的回憶，一直放在心裡很重要的地方。沮喪的時候，拿起來安慰安慰自己，畢竟也有了這麼段美好的時光。

我愛義大利，也愛義大利文系。那段日子，雲淡風輕，也或許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段。

難忘

第五屆校友 Alice(翁毓屏)

我是 93 年畢業的校友 Alice，目前是國小的實習教師。

當初選擇義大利文系，純粹是想學個跟英文不同語系的外國語文，因為我本身對學習外語就有濃厚興趣，所以，並不是外界所言：因為考不上英文系才來義大利文系！

義文系才成立幾年，比起外語學院的其他系算是最年輕的；擁有充分的母語教授群，是義文系最豐厚的資源，使得我們這些學生，即使不必出國，在台灣即可從這些教授們的言談和交流間，看到以及學到義大利這國家的語言和文化，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母語人士，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是這個語言最自然、最實際、最道地的表現方法！我想，這是義大利文的習得過程中，最值得稱道的一部分！儘管只是跟教授短暫的相處，也是親炙義大利文和義大利文化最佳的「管道」！更重要的是這些母語教授們和學生的距離很親近，學生跟教授之間亦師亦友的互動，也是學習語言的好方法！

記得大學時，常聽到很多同學都很擔心未來的出路，當然包括我自己。通常到了大二或大三，就會有一窩蜂的人申請修輔系，成績夠好的人更選擇了雙主修，企圖在本系以外找尋比義文系更「值得」投資的籌碼；我想在這個年代，除了一些專門的行業，例如醫師、會計師、律師等需要「本科系」出身的以外，其餘的都很難一畢業就學以致用或保證就業！當然，如果可以一畢業就走跟義

大利文相關的行業算是最好的際遇。充實自己的技能，例如英文、電腦(或其他特殊的專長)，是無論哪個科系的學生都應該要具備的；這些加分項目，就是加權義大利文系的「附加價值」，這也是我在過去四年裡，師長一直耳提面命的：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以上是我對義文系和師長的回憶。

四、系所發展宗旨目標與輔大辦學精神之落實

(一) 現況

- 一國際化：為加強中西文化交流，同時也為彌補本系為國內唯一一所義大利文系之不足，分別於 1998 年、2003 年與西也那外國人大學(Università per Stranieri di Siena)、佩魯賈外國人大學(Università per Stranieri di Perugia)簽訂文化交流協定，確立學術合作關係，現已進行之合作項目為為期一學期之學生短期留學及為期一學年之學生長期交換。輔仁大學提供赴義修習之學生學費減免，義大利兩所大學也分別提供獎學金，鼓勵本系學生前往。目前每年平均有 30 名學生赴義進修，學生反應良好，語言能力明顯提升，成效卓著。
- 一整合化：課程部分是本系實踐整合化的主要著力項目。如前所述，本系原設有常態運作之教學委員會，即是為整合課程及教材設計、進度而專設之委員會，由全體專任教師組成，定期進行意見交換及檢討。2005 年 6 月為配合卓越計劃外語學院教材整備子計畫，於原委員會之下設立新的教材整備專案小組，以縱-橫向串連各學科之授課進度、教材內容，統一所有語言課程之大綱。
- 一精緻化：更新網頁，提供最新的系所資訊及動態，除服務在校學生外，亦可加強畢業校友的聯繫工作。結合學生活動與語言學習，朝寓教於樂的方向持續邁進。
- 一制度化：依不同目標需求成立委員會，切實執行負責業務；為遵循宗教合作及服務人群之輔仁大學辦學精神，已開設聖經故事、宗教文化等課程，並投入外語學院成立之外語志工組織，結合課程內容與社會關懷，加強學生學習服務的觀念。

(二) 近、中程遠景

- 一國際化：積極加強與國際間義大利語言教學師資之交流與觀摩；持續推動與姊妹校之師資交換或資訊、觀念交流；除延續 93 學年度在台舉辦之義大利語教學觀摩週活動外，亦可推動赴義進行教學觀摩活動；與

西也那、佩魯賈外國人大學合作籌辦學術刊物，以一年一期為原則，提供系內老師發表義大利語言教學等相關研究文的園地；應定期舉辦義大利研究之相關研討會，目標有二：鼓吹義大利相關研究，在台灣推廣義大利文化。刊物及研討會語言不限，惟研究內容必須與義大利語言或文化相關；以教學及研究為目標，積極邀請義大利客座教授來台；推動本國學歷獲得義大利承認之可能，爭取本系學生大四赴義大利就讀，取得雙邊承認之學歷文憑，這部分或許會是最艱鉅但也最有意義的挑戰。

- 一整合化：加強現有語言課程之互補、互動性，以期配合校方政策，精簡學分數，同時儘量縮減會話等語言課程的班級內人數以 20-30 人為限，以提高教學品質。鼓勵各科老師獨自或合作編寫適當地學生學習義大利文之專門教材。
- 一精緻化：學生學會活動方面宜加強文化性質活動，例如演講、電影-音樂欣賞等活動；另應加強系內學長姐與學弟妹之垂直互動，例如交換讀書心得或資訊傳遞。未來考慮分不同年級或以全系為對象，由系上統籌組織全系之演講活動，除可加強教師與外界交流，同時也提供學生課本外的知識，為未來選擇職場或進修做準備。
- 一制度化：明訂各年級輔導方向，設計相關配套活動，以便更積極主動提供學生所需諮詢及資訊。例如，大一以認識大學教育及環境為優先，同時佐以語言學習輔導；大二著重語言、文化課業輔導；大三提供學生未來就業或進修之選擇考量依據；大四輔導則應分兩方向進行：學生就業建議及諮詢、國內外進修管道及諮詢。

(三) 其他展望

與駐台義大利代表處積極合作，研擬專業實習、認識義大利廠商的機會。亦可視代表處主辦活動之需要，提供短期打工或長期合作的人力資源。

應積極聯繫與義大利有商務往來之大型企業如長榮、華航，或其他與義大利重要產業相關的台灣企業，除了加速取得徵才資訊外，未來亦可思考建教合作可能性，提供企業員工在職語言訓練之課程。

除了建立之前學生活動之電子檔案，作為情感的聯繫，同時應該就系友之就職情況做數據統計分析，作為未來學弟妹求職時的參考依據。

積極邀請系友參與系上定期舉辦之活動，如義文週、戲劇公演或學術研討會，他們不僅可以將外界的資訊帶入系內，作為本系與外界聯繫的重要橋樑，也可以了解本系的發展方向，提供精神與資源上的協助。

跨研所

翻譯學研究所
— 台灣翻譯專業化的開端

劉敏華
翻譯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謹以這篇文章，獻給以下這些有遠見、有使命感的人 — 因為他們堅持理想，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才得以創立：
齊邦媛、殷張蘭熙、Edward Vargo、Nicholas Koss、Etilvia Arjona

十七年前，台灣的翻譯界可以如此描繪：市場上找不到足夠的優秀翻譯人才，文人學者在從事正業之餘，偶而試筆，翻譯自己喜愛的作品；很少聽到以翻譯為專職工作的例子；翻譯書籍幾乎不見譯者姓名的蹤跡；各外語系多開有翻譯課，是聽、說、讀、寫之外的語言訓練工具。至於口譯訓練，除了台灣師範大學李振清教授於1983年在英語系開設口譯課之外，少有所聞。1983年國際青商會在台北召開世界大會，同步口譯第一次在台灣亮相，主辦單位臨時召集外語青年，接受密集口譯訓練，任務雖然達成，卻暴露了一個問題：台灣國際化的腳步已經急促，但是國際化過程中十分重要的翻譯專才卻嚴重面臨短缺，專業訓練則是前所未聞。

反觀國外，除了歐洲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成立口譯專業訓練學校之外，¹美國加州的蒙特瑞國際學院（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也於1966年成立翻譯研究所，專門培訓口譯和筆譯專才。蒙特瑞國際學院於1986年成立中英文口筆譯組，成為國際上第一所研究所階級的中英翻譯專業訓練學校。韓國外國語大學為了1988年在首爾舉行的奧運，未雨綢繆，設立通譯翻譯大學院，不僅創下亞洲翻譯專業訓練的首例，此舉也帶動了韓國口筆譯專業的快速發展，不僅培養出相當多傑出的翻譯專才，也帶動口筆譯教學和研究的發展。

國內教育界長久以來看不到翻譯訓練的迫切需求，究其原因，關鍵在於普遍不把翻譯當成一門專業。一般來說，高等教育機構增設新系所，往往反映當時社會對該領域人才的需求，或是看到該領

¹ 日內瓦大學的口譯高級學院於1952年成立，是世界上第一所專門培訓專業翻譯人才的學校。

域未來發展的潛力。有些時候，新增設系所的意義甚至超越以上各項目的，可能是開創新學科，也可能是帶領新的教學思維，其影響力往往是將某領域的教學方向完全扭轉過來。輔仁大學於1980年開風氣之先，設立台灣第一個外語學院，首次將外語習得視為高等教育語言教育的主體，即是一例。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輔仁大學在1988年創立全國第一所專業翻譯人才訓練機構——翻譯學研究所。這樣的研究所在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設立，不僅實至名歸，更是在台灣外語教育的發展進程中，具有歷史的意義。很少有一個系所的設立，是如此迫切，卻又如此受忽略。

翻譯學研究所成立的過程並非順利。在官方的記載中，我們也許可以看到成立期間的開會紀錄、呈報的正式文件等，但是卻看不到背後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事物。背後的故事，往往代表真正的現實，看到的不只是結果，還有過程。回顧歷史，從過程中也許更能學到寶貴的經驗。

一、走進歷史

每當我們走近一間學校，最先注意到的，也許是嶄新的建築、先進的設備、豐富的圖書收藏等，我們也許還會看到它的行政或教學運作，也許也可以看到完整的課程說明。通常，我們很不容易看到歷史，如果歷史的久遠可以從老舊的建築和設備看出來，我們仍然看不到歷史的進程。

今天，如果你有機會走進輔大宜真學院右側的一扇拱型玻璃大門，登上三級階梯，你會看到一個相當明亮，卻不寬敞的空間。沿著沉靜卻不晦澀的灰色牆壁，由左邊或右邊的穿堂走下去，初次來的人有進入迷宮的感覺。你會看到兩三間辦公室，一間擺了七、八台電腦的電腦教室、兩間像是教室和會議室的空間，各自在側邊都設有幾間同步口譯廂。在教室的另外一邊，有一間方正、明亮的圖書室，和一間有各式影視設備的視聽教材製作室。在這個坪數不到145坪的空間裡，擺設著一所翻譯訓練學校一切必備的設施。

1988年10月，翻譯學研究所舉行開幕式，政、商、教界人士在參觀時，見識到這小小研究所先進的設備，印象深刻。尤其當他們看到一間30坪左右的中型會議室中，居然設置了符合國際標準組織（ISO）2603號標準的同步口譯廂，以及只有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才會看的同步口譯設備時，無不嘖嘖稱奇。當時在電腦教室中，擺設了幾台全新的麥金塔電腦，更讓參觀者替譯研所的學生深感幸

運。現在，這樣的設備在國內的各翻譯研究所或翻譯系²都成為標準硬體設備，不足為奇。但是，這所現在表面看來平凡的研究所，卻有著十分不平凡的故事。

(一) 撥種和萌芽 (1981-1987 年)

1. 孫志文推動翻譯中心

1981 年，在一個正式的會議中，當時的輔大外語學院院長孫志文神父 (Dr. Fr. Arnold Sprenger) 有感於國內對翻譯工作的困難和迫切性認識不足，建議教育部成立翻譯訓練中心。其實在 1979 年，孫院長就已經在輔大成立翻譯中心，聘任全職翻譯人員，有系統的翻譯德國的哲學和宗教書籍。這套叢書出版後深獲好評，³也間接為輔大外語學院的翻譯教學奠定了根基。

² 繼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於 1988 年成立之後，國內陸續成立的翻譯系所包括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1996)、長榮大學翻譯系 (1996) 和翻譯研究所 (2001)、屏東商業技術學院翻譯系 (2000)，立德管理學院翻譯系 (2002)，以及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2004)。

³ 這套「當代德國思潮譯叢」由孫志文主編，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出版年代跨越 1980 年初到 1985 年左右。

2. 歐陽瑋催生翻譯學研究所 — 夢想成真

1984年，歐陽瑋（Dr. Edward Vargo）接任外語學院院長。他任內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成立一所翻譯研究所。籌畫過程中，歐陽院長積極聯繫國內外相關人士，籌開翻譯教學工作坊，拜訪美國蒙特瑞國際學院，瞭解該校翻譯研究所的課程設計。1986年，為了籌備輔大第一屆宗教與文學會議，並為未來的翻譯學研究所做準備，歐陽院長和當時的英語系主任康士林修士（Dr. Br. Nicholas Koss）前往日本新力公司（Sony）總部，收集同步口譯器材設備等相關資訊，並於同年11月為外語學院採購完整的同步口譯器材。宗教與文學會議圓滿成功，成為當年台灣文化界十大年度大事之一，但是在過程中同步口譯服務出現不少驚險狀況，也讓輔仁大學看到台灣口譯人才嚴重不足的窘境。歐陽院長從這次經驗中增長了信心，設立翻譯學研究所勢在必行。

1986年12月，輔仁大學首次向教育部提出成立翻譯學研究所的初步計畫。1987年4月，教育部經初步評估，核准該計畫。這在台灣教育史上是一項突破，1970年代曾有知名國立大學提出類似申請，卻遭到教育部否決。初步計畫核准通過後，歐陽院長開始著手擬定詳細創所計畫。1987年5月，歐陽院長邀請當時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系的周兆祥教授訪問輔大，協助草擬創所計畫書。周教授向歐陽院長推薦創辦翻譯學校經驗豐富的曾靄女是（Etilvia Arjona）女士。隨後歐陽院長邀請 Arjona 女士前來台灣，協助設計翻譯學研究所的課程和入學考試，並舉行教師訓練工作坊。此外，為了儲備未來的口譯師資，歐陽院長並選派教師分別到歐洲和日本接受培訓。

1987年9月，情勢逆轉，教育部否決初審通過的譯研所創所提案，提出的理由是專家審核委員多認為當時多所大學已經開設翻譯課程，翻譯訓練已經足夠，不需再另設翻譯研究所。歐陽院長和康修士為此四處奔走，努力和各方有力人士溝通討論，希望教育部能夠重新評估這個計畫。

1987年11月的一個星期天上午，聖言會的一位神父興高采烈的告訴歐陽院長，當天的報紙刊載，教育部批准輔仁大學設立翻譯學研究所。歐陽院長回憶當時的情形，他說，「這是我個人夢想的實現。」



左起Koss、Etilvia Arjona、Vargo

當時促成教育部重新評估先前決定的重要人士，就是台灣大學榮譽教授齊邦媛，以及中國筆會的創辦人和當時的主編殷張蘭熙。殷張蘭熙女士在後來接受 Arjona 所長訪問時，談到當時在教育部和教育主管溝通的情形：



左起齊邦媛、殷張蘭熙、Etilvia Arjona

我當時說，我們雖然教翻譯，但是卻不把翻譯當一門專業來教，只把它當作一種語言練習，做出來的東西又多半不成樣子...。我們需要訓練自己的年輕人，我們需要一個訓練中心，專門訓練有志翻譯的年輕人，讓他們能專心一志做翻譯...。我們如果這回不做，以後就沒有機會了。

我還說，人不能害怕改變現狀，那和愚昧沒兩樣...你們一定要改變原來的想法。(摘自 Arjona, 1990, 頁137; 筆者自譯)。

創立翻譯學研究的人，就是一群不怕改變現狀的人，就像輔大前校長李寧遠在譯研所校友返校日所說的：「他們很勇敢，不畏困難，就這樣去做了。」⁴

(二) 奠基—遠見、奉獻、竭力 (1988-1990 年)

在譯研所第一任所長 Arjona 的心目中，是 Vision(遠見), Giving (奉獻), Exhaustion (竭力) 這三個條件，造就了翻譯學研究所。⁵如果沒有前人的遠見，翻譯學研究所在當時也許只會是某些人腦中的一個想法而已。Arjona 所長不只一次指出，這個想法在當時許多人的心目中，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理想再崇高，概念再可行，過程中若沒有人肯付出心血、勞力，和時間，理想也不可能實現。在翻譯學研究所的創設階段，有許多無名英雄，從設計師、工程師、建築工人、木匠、電子技師，到秘書、工讀生，以及其他系所的教師和友人，這些人在各自的崗位上貢獻所長、竭盡己力，讓理想變成事實。Arjona 所長在 2001 年譯研所校友返校日的演說中曾感性的說到：「我要向那些(為譯研所)悄悄、不計名利，卻慷慨付出的人，表示由衷的謝意——你們為一個隨時可能消逝的夢想注入了生命」

⁴ 於 2001 年 12 月 16 日翻譯學研究所校友返校日的發言。

⁵ 同上。

(筆者自譯)。

1. 曾靄女是領軍—從無到有

1987年11月底，歐陽院長邀請 Arjona 女士擔任翻譯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所長人選一旦確任，歐陽院長積極尋求政府、社會各界，以及國內外翻譯界對翻譯學研究所的支持。經濟部外貿發展協會 (CETRA) 和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TICC)，以及香港國際會議中心等機構紛紛表示樂見翻譯學研究所成立，並對雇用譯研所的畢業生表達高度意願。於此同時，歐陽院長並開始尋求師資人選，為次年秋天第一屆新生入學做準備。

1988年2月，大年初一，Arjona 女士抵達中正機場，隨之從美國貨運而來的，是讓譯研所開始運作的基本家當。當時翻譯學研究所的所在地還只是設計圖上的線條，但是9月15日譯研所就得迎接第一屆的學生，時間緊迫，Arjona 女士心中萬分著急，腦中只有三個念頭：1) 成立臨時運作辦公室；2) 準備該年度5月份招生事宜；3) 草擬譯研所硬體設施藍圖。當時，輔大耕莘樓原翻譯中心的辦公室成為譯研所的臨時辦公室，聖言會並決定利用宜真學苑三樓的聖堂原址，作為翻譯學研究所的所址。

1988年3月，譯研所在耕薪樓生氣蓬勃的運作起來。還沒有固定的家，譯研所就已經吸引不少訪客到訪。Arjona 女士在忙著尋找員工、設計入學考試架構之餘，一面和設計師和工程師商討譯研所新址的規畫。六月中旬，宜真學院三樓原來寧靜的聖堂熱鬧起來，工程師和建築工人日夜不停的趕工，翻譯學研究所的一磚一瓦，就這麼從無到有，一天一天的樹立起來。Arjona 女士提到當時的情形：「(譯研所)空間不大，每一吋空間都得充分利用；每個櫃子、抽屜，都是和木工反覆溝通之後才定案。」⁶

兩個月後，翻譯學研究所搬進宜真學苑的新址時，洗手間還沒完工，木工的電鋸也還間歇不停的響，譯研所的教師、秘書和工讀生合力將所有物品從臨時辦公室搬到新址，找到定位，譯研所嶄新的空間漸漸開始展現了的生機。

另一件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是準備當年五月份的入學考試。Arjona 所長在這方面經驗豐富，但是礙於不諳中文，在設計好測驗的基本架構之後，緊急召集輔大的一群教師，訓練各科的出題人員。當年招生，決定招收中英文、中西文，和中日文組的學生。

⁶ 同上。

2. 第一批生力軍

1988年5月，輔仁大學碩士班招生考試，227人報名參加在台灣史無前例的翻譯研究所入學考試，角逐三組共15個名額。第一階段是筆試，中西文和中日文無人通過；經過第二階段的口試，英文組有四名學生通過考試，成為台灣翻譯專業訓練的第一批生力軍。



Arjona 所長當初的構想，是要培養會議口譯人才，並兼具筆譯專長，所以課程設計是以口譯課程為主，筆譯課程為輔。譯研所的口譯訓練備受矚目，各界對口譯的訓練方法和成果深感好奇。1988年9月中旬，輔仁大學開學，譯研所在只有所長、一名專任教師，⁷和幾位兼任老師的基本陣容下，開始進行充滿實驗意味的教學工作。就像任何倍受矚目的實驗工作一樣，大家在實驗還未見成果時，就對過程充滿了好奇。各界對譯研所的師生多所期待，除了希望邀請譯研所的教師協助培訓之外，外交部和外貿協會等機構甚至表示，希望聘用才剛開始接受訓練的3名學生，擔任兼職翻譯工作。⁸翻譯學研究所不僅必須盡到為輔仁大學培養研究生的責任，同時也承擔了台灣對優秀專業翻譯人才的殷切期望。

⁷ 筆者當時甫於蒙特瑞國際學院受完中英文口筆譯訓練，受聘為譯研所專任教師。

⁸ 其中一名新生因無法兼顧學業與事業，入學未久即休學。



翻譯學研究所開幕典禮，羅光校長和殷張蘭熙女士共同剪綵

輔仁大學和聖言會對這個具有特色系所架式的研究所，自然更是十分重視，無論在經費或行政上，都給予最大的支持。Arjona 所長在創所階段的兩年中，得以實現她發展世界一流翻譯研究所的許多構想。除了開設豐富的課程之外，更是史無前例的邀請了多位翻譯領域中的傑出學者和專家來所講學或舉行工作坊。這些人士的到訪，不僅開闊了譯研所師生的眼界，增長了他們的見識，也讓這些國際專家學者親眼目睹這個位於亞洲一隅，漸漸嶄露頭角的年輕專業訓練學校。此外，在學生上完研一的課程後，Arjona 所長並為他們安排豐富的海外遊學課程，讓他們有機會接觸與翻譯相關的人士和國際機構。

翻譯學研究所在成立後的最初兩年，以一個小小獨立研究所之姿，展現無比的企圖心。歐陽院長當時曾對譯研所有這樣的期盼：扮演翻譯領域中帶頭的角色。從台灣後來翻譯教學領域的發展看來，翻譯學研究所的確做到了這一點。在輔大翻譯學研究所之後設立的翻譯系所，無論是課程、設備、教學和測驗方式，各方面都是以輔大翻譯學研究所為模仿和參照的對象。

(三) 薪傳—在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求取平衡 (1990-2005 年)

1. 國際的專業

在 Arjona 所長於 1990 年卸任之後，接任的司徒羅斌（Robin Setton）除了致力於維繫翻譯學研究所的優良名聲之外，更進一步拓展譯研所在國際口譯界的知名度。例如，知名的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⁹有一套評估口譯教學品質的系統，每年對世界各地的口譯教學機構進行評估。司徒所長主動要求該協會對輔大翻譯學研究所進行評估。經過評估後，譯研所獲得二顆星的評價，代表在口譯教學品質、學生素質、國際聲望等方面都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另一方面，司徒所長結合譯研所的教師和校友，設立「翻譯學研究所教師和校友協會」，推動與國內的不同機構合作，以提升譯研所口筆譯服務的知名度。合作的對象除了學術單位、政府和民間機構之外，也包括電視台。1990 年波斯灣戰爭開打，國內一家無線電視台首度嘗試以同步口譯的方式，立即轉播波斯灣戰爭的衛星連線新聞，譯研所的師生當時即提供了台灣電視史上首次電視新聞同步口譯的服務，開啟日後電視台使用同步口譯的風氣。

司徒所長考量到口譯和筆譯分屬兩種不同的技能，以及台灣對這兩種專業人才各有殷切的需求，在 1991 年改變原先以口譯訓練為主，筆譯訓練為輔的課程，分別成立口譯組和筆譯組，分開招生，並各自建立一套訓練課程，聘用專門師資。在學生受完兩年的訓練之後，則邀請聯合國或國際組織的資深譯者來台擔任考試委員，希望藉此為學生打開國際市場。

1991 年，成立了三年的翻譯學研究所在中英文組之外，終於成功招收了第一屆的中日文、中法文，以及中德文組的學生。譯研所招生一向求精不求多，三組的學生人數雖然很少（中日組 3 人，中法和中德組各 1 人），但是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為台灣培養多種語言人才的優良傳統，在這一年又增添了一層象徵性的意義。

2. 本土的訓練

翻譯學研究所的第一任和第二任所長各自帶來豐富的國際經驗，奠定譯研所成為國際一流專業訓練機構的基礎，也開拓了一個年輕翻譯訓練學校的國際知名度。在此同時，台灣的翻譯專業風氣似乎漸漸打開：台北國際會議中心使用同步口譯的會議愈來愈多；市場上出現了幾家專業會議籌辦公司；翻譯書籍的封面上印上譯者的姓名已經成為常規；使用翻譯服務的人習慣會問到譯者是否曾接受過

⁹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1953 年成立，總部設在日內瓦，是國際上唯一代表會議口譯員的協會。

專業訓練；市面上開始出現供在職人士進修的翻譯補習班；外文系的學生畢業後選擇讀研究所的，在文學和語言學之外，多了翻譯這門實務取向的選項；輔大翻譯學研究所每年報考的考生都是在 300 人之譜。各種跡象顯示，台灣翻譯領域的景象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已經和從前大不相同。

國內風氣和需求快速增加，翻譯學研究所的訓練也開始漸漸朝向顧及本地需求的方向。1994 年在司徒所長卸任之後，續任的幾位所長都是台灣本地的翻譯專業人士，包括輔大日文系和翻譯學研究所中日文組的楊承淑（1994-2000 年）、翻譯學研究所中英文組的劉敏華（2000-2002 年），以及翻譯學研究所中法文組的狄明德（Dr. Fr. Dominique Tyl，2002-2004 年）。2004 年，第二任所長司徒羅斌在狄所長轉調國外之後，再度接任譯研所所長職位。

3. 教師和學生—專業傳承

從許多方面看來，翻譯學研究所和其他的研究所很不相同。筆譯和口譯本質上是實務取向的學科，但是長久以來，翻譯領域人士也熱衷致力於將翻譯學提升到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這趨勢可以從翻譯學研究所過去十餘年來課程的轉變看出端倪。譯研所課程中非實務課程的比例雖然仍不及實務課程多，但是理論課程卻漸漸受到師生的重視；教師從事翻譯本科的研究漸漸增加；譯研所對學生碩士論文品質的要求，也漸漸增加筆譯或口譯理論的份量。趨勢儘管如此，翻譯學研究所把持專業水準的原則卻未曾轉變。輔大翻譯學研究所堅持雇用專業人士從事口筆譯訓練，安排以譯入語為母語的人士教授該語言走向的課程，¹⁰專業考試聘用專業人士擔任考試委員等措施，

在國內各個翻譯系所當中，應該是執行最徹底的。

翻譯學研究所的學生組成也有其不同於其他研究所的特色。雖然每年報考翻譯學研究所的考生仍以語言科系的畢業生為多，但是出身理、工、農、法、商、傳、政等科系背景的學生也不在少數，其中甚至有已經擁有碩士和博士學位的考生。這些學生一旦進入譯研所，憑藉過去在專長領域中累積的專門知識，加上優異的語言能力，從翻譯學研究所畢業後，往往成為擔任各個專業領域翻譯工作最銳利的尖兵。

在其他研究所還很少有外籍學生就讀的情況下，翻譯學研究所

¹⁰ 以英譯中的課程為例，授課教師的第一語言多為中文。

從創所時期就吸引不少外籍學生的注意。每年都有數名外籍生申請入學，他們必須通過和本地生一樣的入學考試，一旦入學則必須接受同等的教學和通過同樣的考試。這些來自亞洲、歐洲和美國的外籍生畢業後，往往成為十分傑出的專業譯者。

翻譯學研究所自 1988 年成立以來，除了吸引有志成為專業譯者或有意繼續升學的社會新鮮人之外，也吸引了許多有心充實翻譯能力的在職人士。翻譯學研究所的課程繁重，在職學生往往入學後就立即感受到課業和工作不能兩全的壓力。有些學生忍痛辭去工作，專心學業；更多的學生則是不得不放棄學業。有鑑於此，加上終身學習、在職進修的風氣日盛，翻譯學研究所在 2002 年成立筆譯在職專班。學生來自各行各業，除了從事翻譯工作多年的譯者之外，也有來自外交部、海關、國稅局等機關的公務人員，大專、國中小學的教師，媒體工作人員等。這些在職生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往往需要用到翻譯技巧，進修結束後多半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

4. 校友一樹得以長大、茂盛

「這種子撒來，遍地都是大樹，大地青蔥一片。」齊邦媛教授在 2001 年 12 月 16 日翻譯研究所校友返校日上，對譯研所有這樣的期許。她說這話的當時，翻譯學研究所已經有將近 100 名的畢業生。¹¹這些畢業生從 1991 年第一屆畢業生投入台灣的就業市場開始，或擔任自由譯者，或擔任政府、民間單位、媒體的內部翻譯人員。這群經過專業訓練的翻譯生力軍，成了台灣翻譯專業化的具體象徵。我們常常會在諸如梁實秋翻譯獎、各種年度十大好書、金鼎獎等多項榮譽榜中看到他們的名字；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亞太經合組織（APEC）、總統國外參訪等場合聽到他們代為發聲。另外，多位校友則選擇投入翻譯教學工作，在輔大或其他大學擔起譯研所培養翻譯專業人才的使命任務。也有些校友選擇進修，繼續深耕翻譯學領域還不太肥沃的土壤，或是將語言知識和技能帶入其他領域，成為現代社會典型的多專長人才。

十八年前，當教育部還在猶豫讓輔仁大學成立翻譯學研究所是不是個正確決定，把翻譯學研究所當作是一個「實驗」時，可能無法預見現在翻譯訓練在台灣高等教育中的景象吧。除了前面提到繼輔大翻譯學研究所之後陸續成立的翻譯系所之外，近年來紛紛設立

¹¹ 截至 2005 年 7 月止，翻譯學研究所共有 102 名一般班的畢業生，包括中英文、中日文、中法文、中德文組的畢業生，以及 7 名在職專班的畢業生。

的應用外語系，幾乎都把翻譯訓練當作主要課程之一，加上許多大學和商業機構陸續開設翻譯推廣課程，翻譯儼然成為許多人的必備才能。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曾寫信給校友，很好奇在他們離開譯研所之後，回想在譯研所接受的訓練，如何看待這段時間對其個人成長和職業生涯的意義，這是他們的答案：

「實務面上的翻譯練習是有用的，外語能力的思考有進步；經過這些練習，的確在面對外在環境時增加信心。」

「進入（譯研所）就讀後，更加確認了我從事翻譯工作的決心。在（譯研所）認識了很多同樣有心在翻譯界耕耘的同好，算是最大的收穫之一。」

「（譯研所的）專業訓練，讓我對翻譯有更深刻的了解與認識，也磨練出紮實的翻譯技能，對成為一個專業譯者有很大的助益。」

「學習的過程雖然苦不堪言，但卻穩健紮實；（譯研所）不僅給了我專業知識，我的同學更幫助我開拓新的視野，建立新的人生觀。畢業之初，我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以身為（譯研所的）畢業生為榮，但如今我真的這麼認為。」

「在譯研所的日子很有價值；更重要的，我在這裡得到最好的個人成長經驗。沉浸在這樣緊湊、嚴格的訓練裡，不僅對語言能力是一大挑戰，對人格也是一種磨練。在那兩年中，我常常擺盪在全力衝刺和完全放棄之間，回想起來，當時的痛苦換來今天的收穫，非常值得：我學會了信心和毅力—兩個作為專業口譯員最重要的特質」（筆者代譯）。

翻譯學研究所的校友中，不是每位都從事和翻譯相關的工作，但是譯研所的訓練對他們來說，價值卻未減損。以一位校友的話為例：「翻譯學研究所的訓練加深了我對語言的敏感度，我現在雖然不從事翻譯工作，但是這種對語言的全心感受卻會讓我一生受用。」

二、面向未來

就像任何生命一樣，翻譯學研究所在成長的過程中，也曾歷經各種困難和不順遂。譯研所作為一個獨立研究所，人力和資源不足是常態問題，中德文組和中法文組在1996年和2000年分別停止招

生、作為教學主力的兼任教師流動率高，都是很難避免的後果。作為一間私立大學的研究所，當公立大學開設類似的研究所時，翻譯學研究所逐漸在招收優秀學生方面面臨一些挑戰。另外，教學上如何在實務和理論之間求取平衡，分別跟上市場的需求和翻譯學領域的趨勢，也是時時需要認真思考的議題，就如一名校友說的：「畢竟路不是只有一條，多點學術上的討論，(能)更增加大家對翻譯未來的思考。」

以上說的這些困境，其實不只單是翻譯學研究所的困境。翻譯仍是一門新興領域，在台灣如此，在世界其他地區也不例外。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未來要走的路，並不是一條孤獨的路，但是這條路並不好走。十七年前首創的研究所，在今天已經成為同類研究所中的老資格。然而，也許是因為翻譯學研究所當初創立時的輝煌還未褪去，也許是過去有太多人的個人夢想和它牽繫在一起，它仍然身負許多人的深切期許，有校友這麼說道：「(希望譯研所)能夠秉持初衷，無論是招生、教學方針和對學生的要求，都能夠貫徹當初創所時設定的目標」，「秉持以往的優良傳統，繼續為社會培育更多稱職的翻譯人才。」

或許，這十七年只不過是一段醞釀期，翻譯學研究所在台灣翻譯專業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還未卸下，一如歐陽院長在譯研所創辦之前曾說過的：「在我眼前，我清清楚楚看到一個大好機會，我們不僅可以為台灣、為中國做點事，也可以帶頭為整個專業做點事。」¹²

¹² 1987年12月18日，歐陽院長對Arjona所長的談話（Arjona, 1990）。

三、後記

寫這篇稿子的時候，翻譯學研究所創辦時的關鍵人物已各自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邁進：齊邦媛教授和殷張蘭熙女士分別自台灣大學和中國筆會的職務上退休；歐陽院長在泰國定居，專事熱愛的文學創作；Arjona 所長繼續在祖國巴拿馬從事教育工作，並於 2005 年 8 月 7 日獲頒「國際翻譯聯盟」(FIT) 的 Pierre-Francois Caille Medal 獎章，表揚她數十年來推動翻譯專業地位的傑出貢獻；康士林修士現任輔大外語學院院長，繼續推動輔大歷史悠久的外語教育。這些人的個人夢想曾經在翻譯學研究所聚集，結果是為台灣翻譯領域專業化的歷史寫下重要的一頁。在這段歷史中，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這個重要標記，永遠會和這些人的名字連在一起。¹³

參考文獻

Arjona-Tseng, Etilvia M. (1990). Curriculum policy-making for an emerging profession: The structur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creating a graduate institut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翻譯學研究所 (1991)。觀天：翻譯學研究所通訊報，第 2 期。新莊：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翻譯學研究所 (1992)。象言：翻譯學研究所通訊報，第 3 期。新莊：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翻譯學研究所 (2001)。校友返校日錄影。新莊：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翻譯學研究所 (2005)。翻譯學研究所網站 www.gitis.fju.edu.tw。

¹³ 寫這篇文章，要感謝 Dr. Arjona 提供譯研所珍貴的相片，李振清教授、楊文姬小姐、蕭啓良先生提供資料，更要感謝多位校友熱情答覆我的問題，在此一併致謝。本文在內容上有任何遺漏或錯誤，一概由筆者承擔。

語言學教育本土化
一個人輔仁經驗談
洪振耀、熊祐琪¹⁴
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摘要

本文以個人在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的經驗談起，所要探討的本土化是要從學習的認知建構和國力累積的角度來講本土化，而不是探討所謂的意識形態，意思也就是說，學生在學習語言學的時候他有沒有學到把語言學的觀念和技能，跟他自己所生長的環境結合在一起，然後在這片土地上發揮他的專業知識。這篇文章就內容而言有分幾個段落，前面有引言，接下來講本土化的定義，再來就從上述本土化的觀點來對本所的語言學教育做一個回顧與前瞻，然後還會談到本人在語言學教育本土化的經驗，最後的結語或可作為語言學教育的參考。關鍵詞：語言學教育、本土化、台灣語言學史、認知建構式學習、語言與教育。

一、引言

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在台灣自 1969 年秋季成立至今已經 35 週年了，自 1971 年至今 33 屆的畢業生總共 197 人，在台灣語言學的發展中可算是個重鎮，累積了相當的辦學績效，因此輔仁語言所的發展也可視為台灣早期語言學發展的縮影。

今天為了慶祝這個日子辦了一個學術研討會，我是本所早期的畢業生也是本所現任的專任老師，因此湊湊熱鬧為所上暖壽。我寫這篇文章的用意，一方面是為了所上暖壽，另一方面，本文受了湯廷池老師學術研究和教學理念相當大的啟發，因為湯老師算是我所接觸過的老師當中最先公開提倡語言學學術研究本土化的先進，所以我也想藉這個機會來與大家討論語言學教育本土化這個非常深刻的問題，不過這裡面難免摻雜我比較個人化的一些感想。

¹⁴ 本文感謝所秘書楊淑卿幫忙整理相關統計資料。

(一) 理性的回顧和多年的感想

本文標題雖然是嚴肅的語言學教育本土化的問題，這樣的題目牽涉到深刻的語言與教育的問題，但是我的副標題是講個人輔仁經驗，我 1975 年進入輔大語言學研究所，1978 年畢業，當完 2 年兵就出國唸書了，1989 年又回到本所任教一直到現在。在輔大語言所 35 年的歷史裡面，3 年的學生時代也算是在語言所草創的初期，算一算是第 6 屆的畢業生，所以等於說我的學生時代加上教學的時間，我在本所算是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了，因此在這邊有很多感情的牽繫。本文當中有一些是屬於個人感想與感情的發抒，所以這篇文章也算是感性的，不過也是對本所發展的回顧與前瞻，順便檢討從本土化的觀點看來輔大語研所從創所至今辦學績效為何，因為不像早期只有師大和輔仁有語言學研究所，現在台大、清華、政大、中正等等的學校都陸續成立了語言學研究所，我們有了更多的同好也有了更多的競爭，但是終究呢輔大語言學研究所，在台灣語言學教育上是一個歷史的里程碑。那我們來看看在這 35 來，輔大語言所在台灣的語言學教育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也方便我們做個回顧與前瞻。在場的諸位先進有一些也都是我的老師，個人不揣冒昧，野人獻曝、拋磚引玉，或許當中有一些是我們從事語言學教育的人可以參考的地方，總之只是希望我們大家一起來關心思考這個問題。

(二) 語言學之界定

要談語言學教育的本土化，我們要先為語言學做個界定。雖然大家都是學語言學的，但每個人對語言學的判斷及走向都不太一樣，比方說有些老師比較專注在作語法、有些老師作社會語言學等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而我個人是採取一個比較廣義的定義，只要跟語言有關的都可以稱作語言學，不一定是做結構分析的，甚至於是語言學與符號學的關係，語言學與其他科學之間的結合，不管是跟社會科學、心理學或是醫學、認知科學等結合，這些都可包含在廣義的語言學定義裡。因為要討論語言學教育本土化的話，就要先看我們是如何看待語言學的，哪些是屬於語言學的東西，哪些不是。有些人對於語言學的看法可能是比較狹義的，他們是用排除性的定義，說這個是語言學的核心，其他的都非正宗的語言學，而我是比較傾向於採用包含性的看法，只要跟語言有關的，都算在語言學的領域裡面。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基本上呢我認為語言學就本身的發展而言，還是個開展性的學科，而且就台灣社會來講，語言學是個有待推廣的學科，比方說就台灣的總人口 2 千 3 百萬而言，學語言學的人有多少？黃宣範老師也曾經講過，人有語言活動和心理活動，但是我們拿語言學和心理學做比較的話，學心理學的人就要比學語言學的人多很多，但是就這兩個活動層面來講是同樣重要的。也就是說我們語言學的專業人才事實上是比較不足的，

那之所以會這樣也有他的原因。因為一般人對語言學的認識就只是說話，這點大家都會，所以不需要特別去學，但是事實上當我們學了語言學才發現當語言學家在討論語言學相關問題的時候，就發現有時候別人都聽不懂，因為在這裡面是有術語或是特殊觀念的。那也就是說就全世界尤其是台灣的學術發展而言，語言學是處在一個開疆拓土的歷史時刻，要是我們採取一個狹義的定義，將會流失很多我們可以工作的領域，反之要是我們採取一個寬鬆的定義，將來的語言學家則可以有更多的出路。所以在廣義的定義下，不管你是做語音學、音韻學、構詞學、句法、語意、語用等等，或是研究與其他學科的結合，像是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認知語言學，或者是跟大眾傳播媒體之間的結合，在研究新聞或是選舉等等的，都可以算是語言學，那結合得愈廣時，語言學就需要更多的背景知識，也就需要更多的推廣，以上就是我對語言學的粗淺的認識。在界定了語言學寬廣的定義後，我們就要來探討語言學教育的問題。

(三) 語言學教育之界定

對語言學教育的認定來自於我們是如何從事教育的這個工作，我們這邊是個研究所，其教學目的只是幫助學生完成碩士階段的學位，還是在這當中傳遞一些教育理念呢？那語言學的教學真的只是一些知識的傳授嗎？還是這裡面也有一些是屬於價值觀的建立呢？教語言學只是單單跟學生解釋一些比較困難的觀念嗎？還是要教學生在做學術研究時有某種學術取向，或者講更深刻一點是要學生在人生的價值觀上有某種哲學判斷。有時我會有一些較深刻的想法，無形中在我的教學上難免就有了某種程度的使命感。基本上我認為語言學家之所以與研究其他學科的人不同，是來自於一個最基本的哲學判斷。就像 20 世紀初期美國芝加哥學派(Rogers, 1997) 的 John Dewey (1859-1952)和 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等學者所提倡的「符號互動主義(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一樣，語言學家認為要了解一個人是要從語言這個觀點切入的，他認為這是最核心的，因為語言活動是人類這種非常重要的活動，這點也是我們有別於其他動物的，所以當我們要了解人類的時候，從語言活動切入的話就是掌握到最根本的，而我們人都都需要了解自己，從我們自己的語言活動來了解自己的話，這個不單是最方便的方法也是掌握到最核心的哲學判斷。其他像經濟學家會從經濟層面來了解人，社會學家會從人類的社會活動來了解人，但是語言學家最基本的判斷就是從人的語言活動來切入了解個人和群體。因此在語言學的教育裡面，我認為要讓學生先接受這個哲學判斷，然後成為一個不管是在學術研究或是在人生裡的價值觀。假如我們只是講一些粗淺或艱澀概念的解釋是比較容易過時的，但是有了這基本價值判斷的話，學生可以張開他的眼睛，隨時隨地的去觀察，他就能夠發現問題並想辦法解決問題。何況我們這是個研究所，所以雖然我講的東西有點抽象和談高調，但這真的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四)個人經驗

從學生時代到現在，語言所的本土化的情形究竟如何？從學生時代到回國教學我都與輔大語言所息息相關，不管是在學習當中還是在我個人教書中，都會面臨到我們到底要學什麼或是到底要教什麼的問題。事實上我們這個研究所，在不同的時空可能會有不同的使命，要是我們把在國外學的方法都搬回來，硬是塞給學生的話，有些地方是不適合的。比方說我在德國唸書的科系是比較印歐語言學，是要去比較很早期的歷史語言，那固然算是近代語言學的發源，但是我們的學生對歐洲的語言並不是很熟悉，更不用談要去比較分析了，而且這可能也不是台灣所需要的。從我上面講的所謂對語言的認識、對語言教育的認識，然後再來看我們這個所，我們在這邊教課的時候，是要去調整到底我們想教學生什麼，學生能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獲得什麼，甚至學生能夠因為學習到這些專業，進而能夠從事工作嗎？學生在所上學習語言學正常的時間大概 2 到 3 年，有些情況較特殊的同學可能延長到 5 年至 8 年，那要是學生從事語言學的研究和思考，只是在這段念研究所的時間，其實是滿浪費的，所以我們希望學生既然有了這個專業也能夠把這個專長發揮出來，但是要是我們只是教書本上的東西，或者是教在別的国家所教所學的語言學的話，可能是不符合我們這時空的。可是要做調整的話，每個人的判斷又不一樣。這篇文章所要講的本土化並不只是我們上課的時候，是用中文還是英文教學，最核心的問題是我們的學生學到這些知識後，是不是能夠張開眼睛去觀察這個環境，是不是能夠在自己所成長和一輩子生活的地方去發掘並解決語言問題。事實上這裡面是有很多需要我們大家群策群力一起去解決的問題。總括一句話，我們的語言學教育跟我們的本土發展是不是產生了什麼樣的關係？為本地本國的發展累積了多少國力資源？還有我在這要強調的是，這裡的本土化重點並不在談上課所用的語言或是教材的語言，而是這個專業知識是不是能夠在現在這時空裡發揮效用。

(五) 語言學教學研討會

就我所知道，我們語言學界所辦的會議往往都是討論語言學裡面某種特定的主題，對哪個語言要做怎樣的分析，或者是哪方面的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或語言學習的問題等等，但是就我參加會議的層級所見，會議的名稱和目的是針對我們語言學教學本身的檢討或規劃的一般性大家都可以參與的會議是不多的。國科會或者語言學門內部有無相關的會議則不得而知。

政大1997年8月1日舉辦的語言學教學研討會

印象中我所知道是在1997年8月在政大曾經辦了一個會議，那個時候就是

所謂的語言學教學研討會，在那時是語言教學會議的第一屆吧，政大的會議是由主辦單位主動構思或者是由上級單位交辦而籌辦這次空前的語言學教學研討會不得而知，會議中有語言學教學方面相關議題的論文發表，也有相關教學工作坊的教學觀摩，在會後大家也提議說要再繼續辦，因為在會議中我們也討論到很多語言學教學和語言學發展的相關問題，可是在這之後就沒有下文了，一直到最近2004年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會議成立，才在7月17日召開了語言學前瞻研討會，這算是我所知道罕見的兩次。

無論如何這兩次的會議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大家雖然都默默的做但是適當的反省是必要的，因此我在本所35週年這個紀念學術會議上，我希望能夠討論這樣的題目，大家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這種機會實在是太難得了。

中研院2004年7月17日語言學前瞻研討會

今年（2004）的7月17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地下室演講廳舉辦了一個重要的會議，那就是語言學前瞻研討會。這場會議跟之前政大的會議足足隔了七年，這場會議顧名思義就是在討論語言學的走向，議程中討論到了一些很有發展潛力但是卻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因此這個會議是非常有價值的會議。

在早上的議程中，鄭良偉跟 Adam Kilgarriff，他們兩位都提到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當中有提到，在今日研究人員可透過網際網路的幫忙，將資料傳到網上整合在一個資料庫裡，互相分享資源，如此一來就有足夠的語料來做研究並且釐清問題，應用價值相當高。

在接下來的議程中，方萬全探討哲學與語言學之間的關係，周英雄則探討文學與語言學的關係，魏捷茲討論語言學與人類學之間的關係，在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的教授鍾蔚文，則是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語言學與人類新聞傳播溝通之間的關係，胡志偉則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語言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係，林永煬醫師則從神經科的角度來看語言學與神經科學的相關性，童寶娟教授則是探討聽語學與語言學的關係，這些題目都是不同的方向，也就在在證明了語言學跟其他學科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因為人類在從事任何活動時都會使用語言。

在下午的議程中，鄒嘉彥則提到法庭語言學的部份，在法庭裡不管是口語的宣判還是法庭的文件，甚至於是歷史上的條約與現在法律的條文，用詞用語都有很多語言學家可以介入探討的空間，這方面需要的人力是相當大的，但是很可惜我們語言學培育這方面的人才並不多。在台灣語言學的大老當中湯廷池老師就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我個人倒是有些疑惑，為什麼我們大家所如此敬重的湯老師似乎沒有帶領多少學生研究語言和法律的相關問題。

接下來的議題我們可以發現，有些人接受過語言學的教育，但是從事的工作卻是大多數語言學家不會做的，比方說何曼麗，他就是從商業的角度來看語言學跟商業的相關性，而薛念文和許玉玲則討論語言新科技，也就是現今我們是如何處理語言資訊的。比方說今年9月我個人在德國的汽車展裡，因緣際會參加了福斯汽車公司的記者會而得知，福斯汽車公司因為設計了一款聽障的朋友也能開的車子而得到獎項，他給予聽障的駕駛特殊的支援系統，讓他們能取得地圖、GPS 或者是能夠在高速公路上尋求協助，像這個就是牽涉到科技與語言的處理，而且又是提供給有特殊語言需求的人，給予他們幫助。而我們也一直希望，在新一代的電腦裡，能夠很準確的解讀語音和人類的口語溝通，如此一來，不能打字的人就可以利用此系統透過語音來操控電腦，而這些新科技，不管是做語音的處理，或是構詞和語法的處理，都是需要語言學家介入的。而張莉萍從語言教學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張憶萍則是談到語言治療的部份，張秀雯談到聽力學的部份。

在這次的會議中，有一個重點就是要看語言學與其他不同的學科有怎樣結合的可能性，從中我們也知道語言學是有很大的市場需求，只可惜這些需要在傳統的語言學課程裡都沒有，因此我們的學生都沒有被打開眼界，沒上過這些課，要能走上這些路都是很不容易的，要是我們在學生的養成教育中，都能夠告訴他們這些觀念，甚至於養成他們一些基本的知識，如此一來他們語言學的出路就能走的更寬廣了，那這個才是真正的語言學教育本土化。

一、本土化之定義

接下來我們談本土化的定義，本土化的政治意味非常的濃厚，愛台灣不愛台灣，反軍購不愛台灣之類的，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所要講的東西，我們講的本土化不是政治意涵的本土化。在學術界討論到本土化的問題，也是蠻早就開始的，比較早期的當然是作文化研究的或者是做社會研究的，他們會提到一些本土化的問題，那有些文化他會有不同的觀點，採取不同的觀點就會對事情有不同的解釋，歷史的解釋、社會發展的解釋，學術界討論到滿多的。這主要是一個觀點採取的問題，在這我們有些資料可以顯現這方面的歷史。

(一) 本土化的學術意涵

文化和社會研究

在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其實已經討論了很久。不過在1970—80年代說的「本土化」是在「中國 vs. 西方」以及「中國化」脈絡下的意思，而現在的「本土化」則比較含混，或有些人會和政治場域的「本土化」當成可借用的詞彙。

最早將「本土」抽象化使用的是國內的人文學者。他們認為，國內的人文學科研究，往往盲目地套用西方的理論，而產生張冠李戴的結果。因為西方文

化與東方文化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差異，以西方文化為研究對象所產生的理論，未必能完整或適切地解釋東方的文化。所以，他們倡導本土性的學術研究，要自己去建立適合本土文化的理論。

另一個運用「本土」概念的例子，就是從六〇年代開始，民間所興起的本土文化運動，包括古蹟維護、民歌採集、民間藝師的發掘等。具體的成就如鄉土文學的興起、雲門舞集的創立、朱銘的雕刻乃至侯孝賢等新銳導演創作的電影。隨著民主腳步的發展，社會的開放，台灣文化亦逐漸展現自己的特色。

何謂本土？『本土依字意拆開來看，“本”指自我與主體，“土”指與生長結合、特定地域有關的，「本土」二字合起來有“在地”或“在來”的意思』（楊裕富1995）。然而，台灣基本上是一個為多種文化融合之地方，從台灣原住民到早期的大陸移民，歷經荷蘭、明鄭、清朝以及日本的統治，至海峽分隔四十多年的今日，於今，台灣已經擁有自我的獨特風格，一種多樣性的文化風格。

從學術研究與藝術創作的本土化發展，至少可以看到「本土」的兩個重大意義。第一，文化的發展與藝術的創作必須紮根於本土，也就是與生活經驗結合。唯有如此，它才能有源源不絕的生命力與深刻的感染力。第二，我們必須在立足於本土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理論與特色，並且在國際上產生影響力。這兩點所昭示的「本土」，絕不是排外的，更不是固步自封的。相反地，它是要激勵傳統文化的提升，更有放眼國際，超越歐美文化的氣魄。

人類學

一九四三年一位人類學家定義本土運動為：「土著文化在西方文化影響之下，感覺到自己的文化瀕臨破產過程當中，所引起來的一種有組織、有意識，同時想把自己的文化復興起來，以便抵抗外來文化壓力的一種運動」。

根據人類學家的研究，一種本土文化一定處於特定的地理位置。本土文化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制度，而且本土文化之內的信息傳達具有封閉性的特點，不能把表面上的民族認同跟本土化的實質性混為一談，對表面文化的強調，不過是對全球化的一種機械性的反映，也有在政治上、經濟上保護和創造一種文化認同的目的。

本土文化是某個區域的民族，在應對生活的挑戰時，所約定俗成的精神、物質還有制度財富，而每個本土文化有其區域的獨特性，然而由於環境不斷地變異，因此挑戰也不斷地變異，所以本土文化的生存與發展，就必須不斷地創新，回應挑戰，以延續其生命力。

人類學就告訴了我們，每一個文化的發展，其實是一個自我豐富和自我肯定的過程，沒有一個文化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今天到底有否打擊，就不是看到底本土文化有否變化，而是看到底本土文化是前進了，還是衰退了。

(二) 本土化的政治意涵

目前台灣政治界處理本土化的議題，不幸都傾向意識型態的爭議，以分裂族群的方式作為爭取政治資源的手段，粗糙地將是否本土化和愛不愛台灣強迫連結，這是本文所不認同的本土化概念，少數較有見解的人提出愛不愛台灣應該以是否為台灣累積國力作為依據，這是本文所採用的觀點，就此觀點而言，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在教育崗位上的本土化工作，就看在教育上為台灣累積了多少專業人才和國力資源而定。

(三) 本文語言學教育本土化的界定

我今天要講的語言學教育本土化，主要用意是在於我希望我們的教育是有他的功效的。本土化也就是說我們在這邊辦教育能夠看到他的成效，是不是本土化是要看我們專業思想的傳播，有沒有對本土的建設發揮功效。所以除了上述在教育崗位尚未本地本國累積資源的概念以外，這邊我還想跟在教育上另一個觀念結合在一起，就是所謂的認知建構的學習。

基本上認知建構教學強調新知識要建立在學生原有的認知基礎上，也就是天生的能力或是舊經驗上。能依本土化的教育喚起學生的舊經驗去關心週遭的現象，就語言學而言就是要學生能依語言學去看自己所經驗和思考的現象。

(四) 本土化與認知建構式的學習

認知建構學習近年來在台灣好像帶著相當負面的意味，因為從數學的認知建構法，大家都蠻反對的，學生、家長、老師不太了解，在做的時候本來一個很簡單的習題，學生都已經知道答案了，老師卻還要講解半天，不過數學上的東西我們在這暫時拋開，我覺得認知建構法本身是無辜的，我們在做教育改革的時候，有時候理念是對的，但是在整個推廣的過程當中，要是理念沒辦法非常正確的傳達，很容易造成改革的失敗。教改政策性的失敗導致一般民眾對於認知建構教學的反感和誤解，實在非常不幸。

我記得我 1997 年在政大語言學教學研討會上，我也曾經發表論文談到認知建構和語言學教學的關係。我在這所談的認知建構是當我們在學習語言學的時候，有沒有從最根本的東西開始思考，有沒有從最鄰近的時空開始觀察這個問題，當學成的時候有沒有想到要在自己的週遭發揮出他的效用來，也就是說學生要從最基本的層面來學習語言學並發揮他的功效，這樣才是真正的認識了語言學。

學習活動可視之為認知建構之過程，此即所謂「認知建構學習理論」之基本觀點，因而教學的實務及可視之為師生所組成的學習共同體之間認知情意互動。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必須檢驗新觀念與就觀念是否吻合或有所衝突，經過驗證之後接受正確的觀念，此時學習活動並未完成，進一步還要看學生是否將此觀念作為今後的行動準則，甚至融入價值判斷系統之內，並且在思考、判斷、行動中反映出來，整個認知建構的學習歷程才算完成。簡而言之，就是是否能學以致用，其實這才是《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的真義，學和習的差別在於學是觀念的理解，而習是實務的習作，所以真知和即行兩者是一體的兩面。有了語言學的專業學位以後，不從事相關的專業工作，在職場上發揮專業知識技能，可以說其學習的認知建構並不完整，在教育資源上也有些浪費。

(五) 本土化的必要性

在教學上，在教育上本土化的必要性，爭議可能比較少一點，因為我們在教育上、學習上也必須要因地制宜，在什麼地方就教什麼樣的東西，就像英語教學這雖然是外語教學，但是呢，在英語教學裡面國情不一樣的話，教學上自然就會有所不同。英語教學並不僅是要讓學生講的跟外國人完全一樣，因為外國人他可能並不會接觸我們這邊的文化，我們飲食跟他們也都不一樣，還有我們有些風景名勝，是他們所沒有的，那要是得用英文來介紹我們本土的文化時，我們教外文的卻只是讓學生都跟外國人一樣，但是沒有能力跟外國人介紹我們本土的文化，這個並不是我們培育外語人才的目的，所以在任何學科的教學上，

都有一個本土性，在什麼地方就必須做一些調整。

語言學的教學也是這樣子，像我們在台灣教語言學就是要讓我學生能認識本土的語言環境，儘可能在課堂上要舉例時，不見得都要用課本上的外文例子，反而可以用本國語言的例子。我想在這方面也很多老師都在做了，而我這篇文章也是受到湯廷池老師很多的啟發，因為湯廷池老師在我上研究所課程的時候，他就一向非常的主張要用中文來從事語言學的寫作，那我們在思考的時候要關心我們自己的語言環境。所以我想在必要性上爭執是比較少一點，但是在作法上，可能見解的歧異會比較多一點，有些老師會把這個焦點擺在說上課的時候盡量用英文來上課，因為將來我們的學生畢業後很多都是要當英文教師，所以能夠在課堂上給予聽說的練習是比較好的，不過我們也可以回頭來思考說一方面我們要走國際化，一方面說要是我們本身沒辦法用我們的語言來表達語言學方面的一些思想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是歧視自己的語言，不過語言的議題並不是我在這要談的本土化最重要的問題，而是說我們能不能把我們的語言學專業知識用在我們現在所處的時空裡面，發揮我們專業知識的效用。

(六) 本土化的成果驗收

在這樣子的定義之下我們輔大語言學研究，語言教育本土化的成果驗收是不是也有一些標準，比方說我們的學生畢業了，他是從事什麼樣的行業，這我們是不是可以拿來做檢驗的標準。在這我想問的問題是學生畢業後究竟做什麼事，是否有從事相關的職業呢？有一大部分大概是從事教學的活動，但是我們也有部分學生是進入工業界，從事研發的工作，甚至有些是進入醫療界，做一些臨床工作，比方說像語言治療師的工作，目前國內只有兩個研究所培育聽語科學和聽語治療的人才，很多學生是出國進修的，但是在國外往往會被問到，將來你要回到國內工作，要治療的人並不是講英語的人啊，那學生要怎麼去調整呢？那這些專業知識也是要和語言學結合。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問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或一些方言，有些人的母語是這些，那當我們在從事這些工作的時候，不管是在教育機構裡面，還是整個學習心理牽涉的問題，或者是對於失語症的病患而言，他的母語復健是最必要的，這時候我們是不是也有培養相關的人才，同時具備語言學及相關的專業知識，像這些要是本土化的語言學教育到某種程度的時候，我們應該都有相當的人才，但是現在很顯然是有些不足。所以事實上我們語言研究所還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

(七) 本土化與國際化

再則有些人會認為本土化跟國際化是不是會有相衝突的地方，基本上我認為這兩者都是必要的，比方說你到國際場合中，除非你能開創新的學派，作為帶領學術研究的龍頭，否則上人家第一個要問的就是你來自什麼地方，那代表

你這個地方的是什麼，自己國家的語言現象又是如何，要是本身對本土不夠關懷的話，沒辦法用自己語言來作例子或是解釋語言現象時，那在國際場合中就沒有出席的必要了。語言的溝通倒是另一個其次的問題了，雖然專業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也都是我們必須培養的，我們希望學生除了有相當的英語能力外，第2外語也要加強，那就能將研究的成果更向國際推展了。

三、本所本土化之回顧與前瞻

(一) 授課所用的語言

因為我們本所創所當初的名稱其實跟英文研究所是沒什麼分別的，後來齊德芳所長一直在教育部發聲，說語言學不是英國文學，教育部雖然不是很懂，但總是尊重所長的專業，所以我們本所可以說是在台灣的第一個名稱叫做語言學研究所的一個獨立研究所。其他的所，有些像師大雖然成立的比輔大還早，但是也是一直附屬在英國語文學所下面的語言學組，後來又過了最近十年才有像台大，清華的一些語言研究所名稱成立，而像政大有些也都是還跟英文所有很密切的關係。

在早期大部分老師不管是外國籍或本國籍的老師大都是用英文授課，事實上大部分的外籍老師也都是用英文來授課，那時候我們的老師中文不見得是他們的母語，而老師一方面也希望學生習慣唸英文聽英文來提高他們的英文程度。

不過在我當學生的時候，記得我們本國籍的老師，像黃宣範和湯廷池老師，除非有牽涉當中的術語時才用英文，課程內容主體的部分一向都是用中文授課。我自己回國以後，在早期我們也是用英文授課，參酌學生實際學習情形，後來漸漸調整用中文上課，教材雖然還是會用外文的教材，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會有不同的變化的。

(二) 教材的語言

在這方面我們幾乎都是使用外文的書籍及講義，在口語則是本國語言比較多一點。那教材多是英文也是由於中文的教材較少，不管是講義還是書籍都少，雖然有編寫的但數量還是比外文的少很多。

(三) 教學內容

首先我們先談到本所開的課程，三十多年來我們不同的老師都開了許多各式各樣不同的課，從教學的義務觀點看來，有些是必修課，那有些是應用語言學的課程，那從一些課程名稱也可以看出有些在走本土化，比方說台語研究、方言研究、山地話的研究，或是研究台灣語言習得的問題，這些都是相當本土化的議題。那所謂的本土化，最重要是在於授課的老師在講課時，是否有考慮到與時空環境的結合，不管是上語意、音韻、句法等等，都能夠用一些與生活環境有關的例子，甚至在寫論文時，能從我們現處的時空環境中找題目。像這個在書面資料是比較看不出來的，但大家都有在用心，因為從論文即可反映出來，都是相當關心本土及本土語言現象的。

(四) 學術行政

行政規定

最主要是在於論文寫作的規定，尤其是寫作語言的規定。從本所成立以來我們的寫作語言一直都是用英文，直到 2001 年才開始開放可用中文或是學生的母語來寫。不過雖然開放了，但是學生實際用非英文來寫作卻是要到近期才開始的，也就是說在 197 篇論文中，真正用中文寫的真的是非常少。不過即使如此，論文研究的主題仍是與中文有關，所以不管寫作的語言是什麼，本土化都是勢在必行的。再則，從學生的論文中我們也可知道學生所關心的是週遭的環境事務，所以用自己的母語寫作也能夠將自己的意思表達更清楚些。而且就讀者群而言，也並非全部都是閱讀英文比閱讀中文容易的人，有些從事相關行業的人想要多了解語言這方面的東西，但是因為是英文，所以就讓他們退避三舍了。而早期用英文寫是不需要中文摘要的，現在則是用英文寫要有中文摘要，用中文寫要有英文摘要等等。因此在學術行政上的多開放，絕對能讓學生更能夠表達出研究的成果和學術思想。

配套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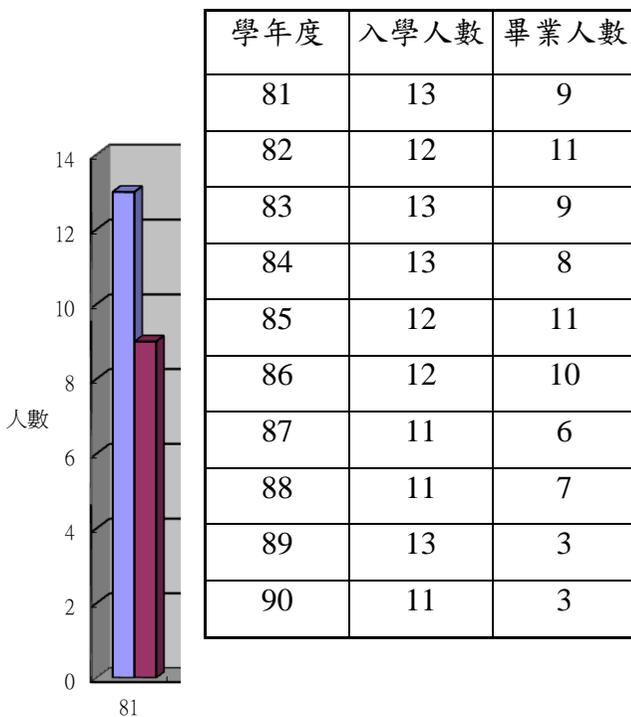
配套措施的實施是為了容納各式各樣的語言寫作，讓特定的讀者群能確實的得到我們研究的訊息。在早期之所以會規定一定要用英文寫作也是有他的原因，在那時有些老師的母語並非是中文，因此用英文寫作是當時的趨勢。但是一個學術的發展若不能用自己的母語表達出來的話，其實講嚴重一點是對本國母語的歧視，尤其一個語言的生命力是在於它能否在各式各樣的領域中被使用，如此一來這個語言才不會衰落，從這個觀點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讓中文在語

言學中衰落，不能到最後談語言學時都只能用英文，不過目前好像還是有這種現象，因為某些術語中文翻譯仍未確定，但是如果我們愈不用他們，那中文的術語就愈沒辦法統一。曾在本所任教的老師中，湯廷池老師是最大力推動用中文寫作的，雖然湯老師多種外語能力都很好，或許考慮到研究領域和潛在讀者的關係，湯老師自己的著作也大都用中文寫作。不過我們用中文寫作並沒有要讓我們的研究遠離國際，當國外人士對我們的研究有興趣時，我們也可以依場合而定用外文發表，而外國人是為了能更了解我們中文豐富的語料和研究成果，其實也不妨去學點中文，那這樣對中文的推動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五) 學生畢業論文

歷年累積及平均畢業人數

學生歷年累積的論文數是 197 篇，那我們創所已 35 年，以第一屆畢業開始算是 1971 年，到現在 33 年，也就是說平均一年才有 6 篇左右，但是入學人數卻是 12 人到 14 人，也就是說有一半的學生未能完成論文，這績效不太好，不過有些學生是直接到國外進修，而有些則是真的未完成論文與學位，那其實早期每一年收幾個學生不太清楚，不過我在 1975 年入學時，班上就已經有 14 個同學了。所以每年由教育部核可的 12 名招生名額應該一向沒有都大的變動。最近十年學生完成論文情況詳見下列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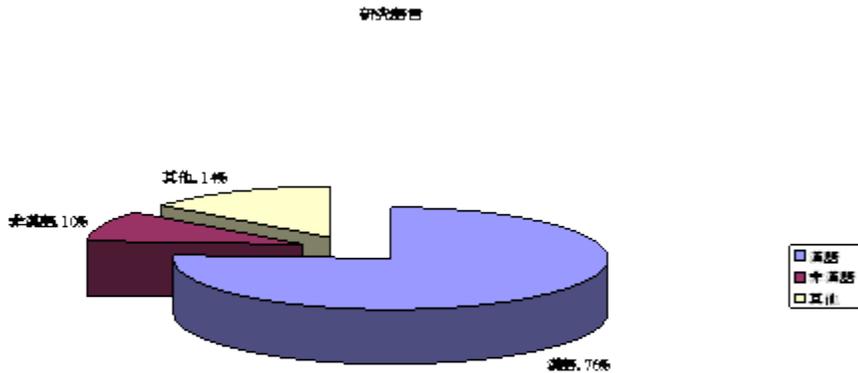


近幾年來學生畢業年限有越拉越長的趨勢，基本上學生在修課時都還很順利，但是卻有相當比率的學生在論文寫作上有相當大的困難，而導致這種現象，這真的是我們值得思考檢討的地方。

研究的語言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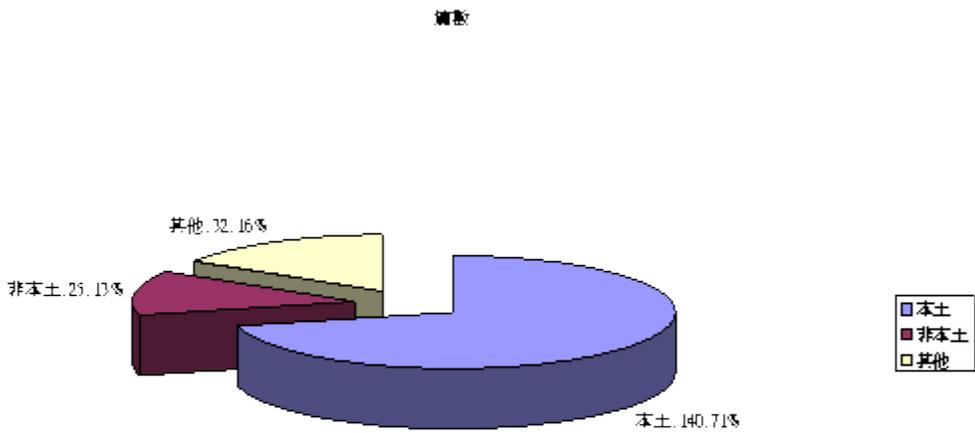
因為我們教育學生是希望他們畢業能用專業對本土有貢獻，所以一半未能畢業，真的是很可惜的事。那就已畢業的 197 篇論文而言，我們可以看出與本土語言現象是有很高的相關性的。那與語言學相關的議題，不僅僅只有語言結構分析與語言教學，有些是語言習得，而有些則是牽涉到語言與文化、教育、政治、法律等等的問題，那我們是不是在各方領域都有培育相當的人才呢。畢業論文研究語言分佈圖（詳細數字表過於冗長省略）：

上列論文所研究之語言只作漢語非漢語之分佈比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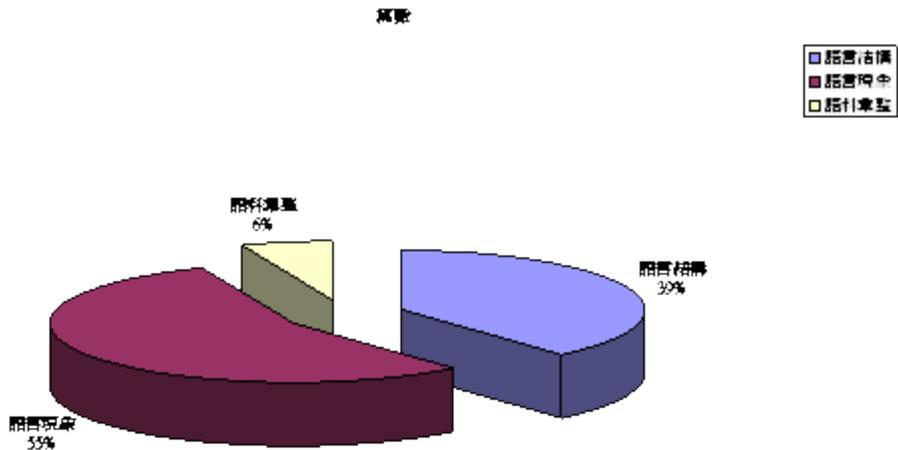


所研究之語言為本土或非本土大分類比例圖：

(例如：客家語、閩南語、原住民語等等為本土語)



研究之方向圖表：



在我的論文—語言學與聽語病理學：科際互動之回顧與前瞻 12 章中，我不是只有針對輔大研究所做檢討，對其他學校及師生也都有檢討。語言學能與哪些學科有互動的空間，語言學還有哪些待開發的領域，都是我們在訓練學生時要考慮到的，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培育出在不同的職場中的有我們的學生，這才是真的有實行本土化，不該只是都在教職，是要去開拓新領域的，為自己與別人尋找新的工作機會。

寫作的語言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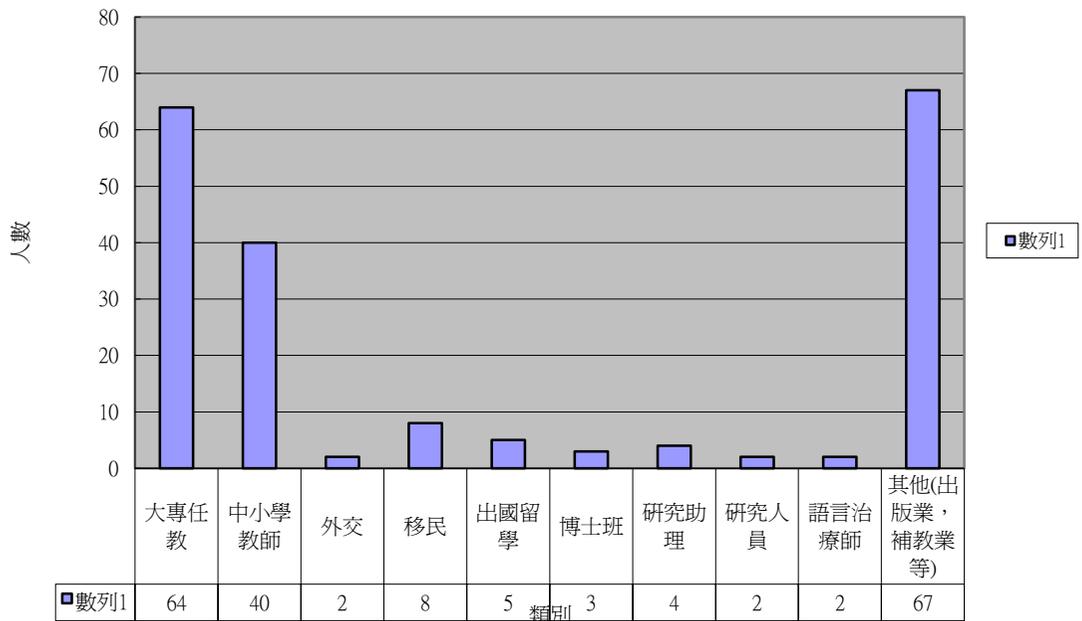
(六) 就業分佈

本所畢業生就業分佈情形可以參見下列圖表：

校友畢業服務	人數
大專任教	64
中小學教師	40

外交	2
移民	8
出國留學	5
博士班	3
研究助理	4
研究人員	2
語言治療師	2
其他(出版業，補教業等)	67
總數	197

就業項目



學生的就業情形應該可以作為教育本土化的成果驗收的重要參考。就業領域的分佈是客觀的，也是表面的。學生是否能夠學以致用更核心的問題是學生

畢業之後，拿到學位了，在他生命中不管是從事教學還是其他工作，在他的工作崗位上是否能夠不斷的去發現問題，直接或間接的去做弘揚語言學的工作，還是說即使他在學校學了語言學的觀念，仍然不能解釋給別人聽，甚至於教導別人比較狹隘的語言學知識，這樣我們的學生就沒有辦法做到很好的語言學推廣工作，這是值得檢討的地方。還有實際上老師要從事研究工作，很多都是值得做的，但是我們的學生在學時或是畢業後，除了一部分人留在學術界，但是沒有在學術界的他們平常在工作當中是不是也有在推廣語言學，這個也是值得思考檢討的。我想從這些角度可以來檢討本土化的成果驗收，也就是說我們是希望能夠將語言學在本土紮根的，但是假使我們總是讓出很多的領域，比方說只要牽涉到法律的問題，例如法庭語言學，我們就交給學法律的，遇到教育語言的問題就交給學教育的，遇到臨床的問題就交給醫學的，那在這樣子的觀念和作法之下，可能語言學會愈來愈萎縮。那將來我們的學生找工作愈來愈不容易的話，這對我們整體語言學的發展也是相當不利的，何況其他領域的人可能也期待學語言學的人能夠伸出援手。比較好的是學生在學習到知識後能夠與很多領域結合並且開疆拓土，進而走出語言學的另一片天，那這樣語言學才能愈來愈蓬勃發展。

四、個人語言學教育本土化經驗

在前文講過我學生時代在輔大 3 年，再加上我在此任教 15 年了，在這我也待了 18 年了，而本所成立 35 年，也就是說我在本所也待了一半的時間，不是學生就是老師，根本所有密切的關係。那在這我從我個人觀點來看。我的課有些與語音學或神經語言學相關，例如我在教授聽語學時，我就用中國的歷史人物—蘇軾的文章來作教材，學生的反應是不錯的。因為我們直接講太過理論的東西學生可能沒法接受，但是用他們所熟悉的人物就帶動了學習的動機，從

認知建構教學法的角度而言，就是要學生把他的舊經驗與新知識結合在一起，喚起舊有經驗來檢驗新知識，所以在講聽覺和身理解剖前，有名的蘇軾就是舊經驗，而他有這方面的問題，所以我們可從他的作品中看看他如何描寫，而從這作品也可看出東方人生命的哲學，像裡面就有充斥老莊思想，比方說講到「五蘊皆是賊」，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感覺器官都是殘害心靈的東西，這是非常不同的文化觀點，也讓我們知道不同的文化在面對病理時有著不同的觀點。另外的例子是我在教神經語言學史，一般都是從歐洲開始講起，1861、1864 法國 Paul Broca 他寫的文章是近代西方神經語言學的起源，而 1874 年德國的 Carl Wernicke 是講聽覺的東西，而失語症研究也是真正從他開始。那我們在談本土化那中國有沒有關於神經語言的記錄呢？其實從黃帝內經中我們可得到一些訊息。在第六十九篇中就是講失語症的現象，而且有探討到情緒困擾，「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他突然間得到這個病，他會容易生氣並且擔憂，說話聲音都說不出來了，然後從中國醫學的角度探究他的病因，他或許是發生腔道有阻塞，而皇帝也會問他要用針灸治療的話要刺哪各穴道「黃帝曰：刺之奈何」。就時間上而言，我們可得知其實中國也在很早時就有對此病症有很完整的相關文獻了。如果我們在教學上都只舉西方的例子，也許無形中會傳遞給學生一種文化自卑感，為什麼中國都沒語言學相關的學術思想和資料呢？但其實是不然的，在宋朝前其實我們的科技工藝是凌駕於西方之上，所以實施本土化能讓我們的學生更了解到自己本國的理論與文獻，不會一昧的只遵循西方的東西。

(一) 本人授課情形及使用的教材

蘇軾—耳聾賦

蘇軾詩集卷十一：詩七十二首【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聵。人將蟻動作牛鬥，我覺風雷真一噫。聞塵掃盡根性空，不須更枕清流派。大樸初散失渾沌，六鑿相攘更勝敗。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佯聵，故作嘲詩窮險怪。須防額癢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

黃帝內經《靈樞。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壅垂者，音聲之關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頰頰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於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致其開闔不致，故無音。黃帝曰：刺之柰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瀉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趙元任語言與音樂專題研究

透過介紹趙元任的聲樂作品希望學生能多認識中國語言學史和精彩的近代中國語言學家。

(二) 論文指導

歷年來我們的學生來的背景不一樣，稟賦才性與興趣也不一樣，所以有時候學生寫的論文涵蓋面比老師研究還廣。有些老師在帶學生做研究時，會抱持著我作什麼研究你們就跟著寫什麼的想法，不寫這方面的論文就別找我。而我自己的作風則是會看學生的背景適合寫哪方面論文，依照他們的興趣與才能，來跟學生討論，根據我的經驗，這樣學生寫論文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況，要是寫到他沒有能力又沒有興趣的論文題目，我想他會比較不容易寫好。下面我所列出的是我歷年指導的論文，大部分是本所學生，不過也有些是外校外所的。在本所成立35周年的紀念會上，我列出這些論文，是想表達出，因為這個所讓我有立足空間，而有些學生是我以本所專任老師身分到外校兼任，在這個機緣下完成這些論文的，有些學生則是本校德研所，或者有些是外校的學生，像是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因為知道我可以指導他們這方面的論文就這樣過來，那這就讓本所成為一個相關研究的中心，這也算是本所的一個成績。乍看之下這些論文好像與語言學本土化沒什麼關係，但是其實他們都是在為台灣語言學

留下建樹，累積資源，單單就這方面而言，就是一種本土化了。

(三) 研究所入學試題

研究所的入學試題不但有篩選學生的功能，本人認為也有對應試考生間接宣示開導本所語言學教育走向的功能，所以在出題時也可已有一些本土化考量的題目。

五、結語

「回首三十五載來時路，前瞻行遠自邇創新局」

在結語中，有些感慨與期許。在這 35 年中，只有 197 個學生畢業，這畢業率只有入學率的 50%，在這方面是我們有待改進的。是不是在教學當中我們要更嚴加督導，或是幫助他們逐步收集整理資料寫成論文。而牽涉到本土化的問題其實也與學生動機有關，那在這讀書的 2、3 年他是否對語言學有認同感，對本土有關懷，因為這些其實也牽涉到他能否找到題目寫出論文，破除萬難完成研究，甚至於把語言學是為他終身從事的事業。在我們今天的教育中，我們不談高調，不談人格教育，可是真正關心教育這方面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雖然有些方面本所仍不理想，但是相信老師們都是盡心盡力的，也都有相當成效的。最近數年來，基於台灣研究所教育品質過於浮濫和教育機構越來越吃緊的財務危機，本所在校內不斷接受校方口頭和公文，直接間接提到本所的裁併和退場機制，值得思考的是本所在台灣語言學發展的歷史上已經完成歷史任務了嗎？我們該退場了嗎？還是我們應該繼續找出新的方向，對台灣的語言學發展與工作能有更多貢獻，這是我們深切的期盼。那語言學現今與很多學科都結合了，例如與語言教學、翻譯學、電腦資訊處理、資訊科學、通訊科技、哲學、文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科學、教育學、符號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聽語科學、聽語治療、表達性藝術治療、表演藝術、傳播科學、法律學、跨文化溝通、溝通談判、諮商言談技巧等都有密切的關係，與這些學科的關係有些是淵源久遠，也有些是隨近代科技和社會演變應運而生的，因為語言學的本質就是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情況下和與很多學科結合，那要是我們現在跟國際上開展語言學的的走向有所偏差的話，現在是一個很好的調整時機，我個人相信，本所在過去對台灣語言學教育是有很大貢獻的，只要我們能就適當的調整，未來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的，願大家一起共勉。

六、參考文獻

Rogers, Everett M. 1997.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Tree Press.

洪振耀。1997。認知建構取向之語言教學。第一屆全國語言學教學研討會(政治大學)。

洪振耀。1996。語言學與聽語病理學：科際互動之回顧與前瞻。曾進興主編。語言病理學。第12章。台北：心理。Pp. 433-504。

孫志文。1978。獻曝者言。台北：聯經。

孫志文。1984。外語教學的反省。台北：聯經。

張川木。1996。學童學習概念與課程設計。科學月刊，27卷第2期，149-157。

1. 結合語言與音樂在作研究：邱淑凰。音樂用語中的語言隱喻：初步研究。黃千芸。Repetition and Variation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Music Therapy: A Preliminary Qualitative Case Study 溝通活動在音樂治療中的重複與變化：初步質性個案研究。

2. 結合語言溝通輔具，統計語言學語音頻之研究：周盈秀。中文音頻與溝通輔具中摩斯碼之編碼。

3. 研究自己的原住民語言：胡震偉。塞德克與太魯閣方言多媒體超本文雜議。

4. 外籍生研究自己母語在台灣的歌謠教學：松尾隆男。2003。台灣之日語教學中日語歌謠教學之研究。(輔大語言所)。

5. 不但本土又本校，研究語言的這些設備是否有發揮效用，採購上可做為參考：苗莉莉。語言實驗室教學理論與實務：輔大外語學院個案研究。

6. 跟表演藝術的結合：王念華。兒童戲劇與兒童社會互動的發展。(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洪嘉璐。兒童參與創造性戲劇活動引導者角色之研究：以九歌兒童劇團實施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

7. 台語語言病理的研究：郭令育。閩南語神經性構音障礙病患子音時長之聲學研究。(政大語言所，與台大醫院神經科邱銘章醫師共同指導)。

8. 結合語言學與精神醫學：游雅茹。精神分裂症病患言談結構的停頓研究。

9. 使用本土的材料—藥名來研究古代音韻的保留：黃婉而。1999。專業術語中所反映的語言的泛時性：《本草備要》台語藥名的語料庫語言學研究。(輔大語言所，與中國醫藥學院張賢哲教授共同指導)。

10. 結合語言學與大眾傳播：張瓊文。從言談分析探討新聞報導中的權力再現：以第九屆總統副總統直選報紙用語為例。(政大語言所，與政大新聞所鍾蔚文教授共同指導)。

11. 將語言學與法律用語結合，研究生本身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學生：謝舒凱。刑法用語文體之語料庫語言學研究。

12. 語言病理，關心盲人，是很寶貴的研究：陳俊仁。盲人言談轉接之研究。林

- 香均。盲生點字錯誤之語音及動作分析。
13. 雙胞胎語言發展，牽涉到發展遲緩的問題：尹承俊。同卵雙胞胎語言發展遲緩之個案研究。(政大語言所)。
 14. 研究聲母時間長度的問題，實驗語音學方面的研究：陳達德。國語聲母的時間維度：聲學語音學基本參數的研究。(中正語言所，與中正語言所蔡素娟教授共同指導)。
 15. 做食譜跨文化之研究：許菁珏。Interkulturelle Studie vo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Kochrezepte. 中德食譜之跨文化比較研究。(輔仁德研所)。
 16. 中國式的題材：謝欽仰。《黃帝內經》語言病理詞彙的語料庫語言學研究。
 17. 台語臨床語音學研究：蘇瑩君。痙攣性發音障礙病人的台語語音分析。
 18. 對德語戲劇教學的研究，德文系創所到現在戲劇的整理與研究，語言學與表演藝術的結合：陳淑芬。Aspekte des deutschen Theaters an der Fu Jen Universität. (輔仁大學德語劇場之面面觀)。(輔仁德研所)。
 19. 台灣孩童認字之問題研究：李忻雯。1992。中國兒童認字策略之發展。
 20. 本土聽障學生的一些測量問題：郭芳容。1992。聽力正常與聽力障礙學童對國語語音結合之辨識。(靜宜外研所)。

邱淑鳳。2004。音樂用語中的語言隱喻：初步研究。(輔大語言所)。

周盈秀。2003。中文音頻與溝通輔具中摩斯碼之編碼。(輔大語言所)。

胡震偉。2003。塞德克與太魯閣方言多媒體超本文雜議。(輔大語言所)。

松尾隆男。2003。台灣之日語教學中日語歌謠教學之研究。(輔大語言所)。

苗莉莉。2002。語言實驗室教學理論與實務：輔大外語學院個案研究。

(輔大語言所)。

李俊徹。2001。自閉症病患情緒用語的理解與表達。(政大語言所)。

王念華。2001。兒童戲劇與兒童社會互動的發展。(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

洪嘉璐。2000。兒童參與創造性戲劇活動引導者角色之研究：以九歌兒童劇團實施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

黃千芸。2000。Repetition and Variation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Music Therapy: A Preliminary Qualitative Case Study 溝通活動在音樂治療中的重複與變化：初步質性個案研究。(輔大語言所)。

郭令育。1999。閩南語神經性構音障礙病患子音時長之聲學研究。(政大語言

- 所，與台大醫院神經科邱銘章醫師共同指導)。
- 游雅茹。1999。精神分裂症病患言談結構的停頓研究。(輔大語言所)。
- 黃婉而。1999。專業術語中所反映的語言的泛時性：《本草備要》台語藥名的語料庫語言學研究。(輔大語言所，與中國醫藥學院張賢哲教授共同指導)。
- 張瓊文。1998。從言談分析探討新聞報導中的權力再現：以第九屆總統副總統直選報紙用語為例。(政大語言所，與政大新聞所鍾蔚文教授共同指導)。
- 謝舒凱。1998。刑法用語文體之語料庫語言學研究。(輔大語言所)。
- 陳俊仁。1998。盲人言談轉接之研究。(輔大語言所)。
- 尹承俊。1998。同卵雙胞胎語言發展遲緩之個案研究。(政大語言所)。
- 陳達德。1998。國語聲母的時間維度：聲學語音學基本參數的研究。(中正語言所，與中正語言所蔡素娟教授共同指導)。
- 王華陵。1997。台灣兒童戲劇研究：「光寶文教基金會」戲劇教育活動之個案分析。(文化藝研所)。
- 許菁珏。1997。Interkulturelle Studie vo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Kochrezepte. 中德食譜之跨文化比較研究。(輔仁德研所)。
- 謝欽仰。1997。《黃帝內經》語言病理詞彙的語料庫語言學研究。(輔仁語言所)。
- 林香均。1997。盲生點字錯誤之語音及動作分析。(輔仁語言所)。
- 蘇瑩君。1996。痙攣性發音障礙病人的台語語音分析。(輔仁語言所)。
- 陳淑芬。1996。Aspekte des deutschen Theaters an der Fu Jen Universität. (輔仁大學德語劇場之面面觀)。(輔仁德研所)。
- 李忻雯。1992。中國兒童認字策略之發展。(輔仁語言所)。
- 郭芳容。1992。聽力正常與聽力障礙學童對國語語音結合之辨識。(靜宜外研所)。

外語學院比較研究所所史

比較文學研究所的歷史

康士林、李玉璽、郝寶芬
與 劉紀蕙、簡瑛瑛、羅基敏
合作共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於民國八十三年呈報教育部核准後成立。輔仁大學擁有全台灣最佳的外語學院，院內有英、德、法、西、日文系之大學部、研究所和語言學研究所、翻譯學研究所，歷史悠久；以及擁有在學術界享有聲譽的文學院之中文系所、歷史系所、哲學系所、大傳系所和神學院。故於八十一學年度起，當時之英文系系主任劉紀蕙積極地推動比較文學研究所之成立工作，並獲得當時的輔仁大學聖言會單位與外語學院院長雷孟篤教授的支持，於八十三學年度開始招生。劉紀蕙教授擔任比較文學研究所首任所長，首批專任師資包括羅基敏教授以及簡瑛瑛教授。劉紀蕙教授卸任後，由簡瑛瑛教授接任，現任所長為康士林教授。

※詳細內容請參閱比較文學研究所網頁：<http://www.complit.fju.edu.tw/>

比較文學研究所成立構想及發展重點為：(1) 各國學術機構皆設有比較文學研究所，台灣可提供完備的，兼括古典及現代兩方面的中國文化與文學資源的環境；(2) 台灣亟須普遍提升人文精神教育，培育人文科學之研究與教學人才期創造具有自發原創、亦能有國際水準的文化，成立比較文學研究所可加強人文學科專門研究人才之培育；(3) 以跨文化、跨學科之觀點，討論中外文學與文化中各種文類之文本，並進而對種種人文現象提出詮釋。比較文學範疇內所謂跨文化研究意指處理兩種語系（如中、英、德、法、西、日、義等）以上之文學研究，而所謂跨學科研究則意指兼研兩種以上人文學科（如文學與藝術、音樂、電影、戲劇、哲學、宗教、歷史、語言及翻譯等）之文學研究。

比較文學研究所成立以來歷任所長與全體教師，均秉持上述之成立構想與發展重點累計了豐碩的教學與研究成果。多年來在每位師長的努力下亦不斷革新與發展，不論是在所內訂定之各項招生考試辦法、歷年錄取榜單、畢業相關規定、開設課程、校內外合作支援的教授、主辦或協辦各類學術活動等。

以下將從下列三個時期分開來概述：

- 壹、民國八十三年至八十七年，草創及成形時期，首任所長劉紀蕙教授
- 貳、民國八十八年至九十年，發展時期，第二任所長簡瑛瑛教授
- 參、民國九十一年迄今，成熟時期，現任外語學院院長兼所長康士林教授

一、民國八十三年至八十七年，草創及成形時期，首任所長劉紀蕙教授

八十三年創立比較文學研究所的三位專任師資展現了本所之跨文化與跨學科研究之特色：

劉紀蕙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曾任教於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暨英文系並兼任行政職務。研究方向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一年側重於中西比較文學，由一九九一年後著重於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近年來研究興趣大致朝著三個面向發展：(一)由精神分析出發所展開的文化理論為起點，探索語言、無意識、符號與身體之間的隱微關連；(二)回溯台灣與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從二十世紀初期到當代，所引發的論述、意識型態、認同模式、文學藝術再現以及知識結構的變遷，以及這些問題在亞洲脈絡的轉折痕跡；(三)透過視覺文化的各種細節，捕捉文化史、心態史的複雜層面。專長涵蓋文學與藝術、東西比較文學研究、電影敘述理論、浪漫主義、超現實主義、台灣文學、精神分析理論與文化研究等。重要專書有《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The Perverted Hearts: The Psychic Forms of Modernity*) (台北：麥田，2004)、《文學與電影：影像·真實·文化批評》(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Orphan, Goddess, and the Writing of the Negative: The Performance of Our Symptoms*) (台北：立緒出版社，2000)、《文學與藝術八論：互文·對位·文化詮釋》(台北：三民書局，1994)等，持續有著作、發表論文、進行國科會研究計畫案，並獲有國科會研究成果優等獎及甲等獎等。

羅基敏教授

德國海德堡大學音樂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所及表演藝術研究所教授。曾任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暨音樂研究所教授，並曾於台灣大學、中央大學、東吳大學、台灣藝術大學(前藝專)、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等校音樂系及音樂研究所任教。研究領域為歐洲音樂史、歌劇研究、音樂美學、文學與音樂、文學與音樂、文學與歌劇、十九世紀歌劇中之國家主義、歌劇中的中國形象、音樂與文化等，經常應邀於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重要中文著作有《當代台灣音樂文化反思》(台北：揚智，1998)、《浦契尼的〈杜蘭朵〉：童話·戲劇·歌劇》(台北：高談，1998)、《文話／文化音樂：音樂與文學之文化場域》(台北：高談，1999)、《愛之死—華格納的《崔斯坦與伊索德》》(台北：高談，1999)、《杜蘭朵的蛻變》(台北：高談，2004)、《古今相生音樂夢—書寫潘皇龍》(台北：時報出版，2005)等專書及數十篇學術文章。並曾應邀為德國

薩爾邦國立劇院、義大利威尼斯翡尼翠歌劇院、義大利羅馬歌劇院、法國史特拉斯堡歌劇院以及奧地利薩爾茲堡藝術節之《杜蘭朵》演出節目單撰寫專文。

簡瑛瑛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為本所延攬自美返台之優秀教師。曾於任教國內外大學：美國羅格斯大學比較文學系、美國伊利諾大學東亞研究、美國賓州州大比較文學、女性研究學系、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外研所。在台灣及美國各地研究、教學與服務均朝跨文化與跨學科方向發展，著重東西比較、女性/性別研究、台灣/中國文學、東亞研究、文學、藝術與宗教等領域之研究與實踐。研究成果以專書、期刊及文化評論等形式發表於國內外學術界，重要著作有 *Women Crossing the Wild Zone: Gender, Identity and Multi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Bookman, 2003)、《跨國女性主義》專輯，《中外文學》(台北：台大外文系，2003)、《女性心靈之旅：文學、藝術影像再現》(台北：女書店，2003)、《女兒的儀典：台灣女性心靈與文學/藝術表現》(台北：女書店，2000)、《何處是女兒家：女性主義與中西文學／文化比較》(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等，並協助本所籌劃設計《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主編第一輯專號《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台北：立緒文化出版社，1997)。主持女性主義、中西比較研究計畫，曾榮獲國內外多項獎勵，除國內的國科會、教育部、中基會、國家文藝基金會、輔大外語學院、中西文化研究中心等，並獲美國 National Endowment of Humanities，及 Penn State University 的多項人文藝術獎助及 Fellowships。

(一) 招生構想：

鼓勵不同語言、不同文化及不同人文學科之間的溝通與整合，並培育具有跨文化與跨學科反省能力之人文研究者。

入學考試方式：

八十三學年開始辦理第一年博士班入學招生。

八十四學年起至八十八學年止，增辦博士班甄試入學。八十七年修訂考試辦法，增考筆試。

(二) 八十三學年至八十八學年錄取名單：

1. 八十三學年第一屆研究生五位：賀淑瑋、葉振富、林文賢、陳淑純、姚金維。
2. 八十四學年第二屆研究生七位：簡素琿、張黎文、楊錦昌、蕭瑞莆、林慧雅、莊又紘、黃臨芳（於九十學年下學期，博士候選人階段時，因病過世）。

3. 八十五學年第三屆研究生四位：楊如英、馮慧瑛、陳正芳、張士達。
4. 八十六學年第四屆研究生四位：唐維敏、何麗霞、劉婉俐、江足滿。
5. 八十七學年第五屆研究生四位：呂文翠、洪力行、盛鎧、馬丙杰。

(三) 畢業相關規定：

八十三學年至八十八學年入學生，須於修業期限之間完成以下要求：

1. 修滿三十六學分（其中至少九學分【方法論及批評理論】，九學分【比較文學專題】，九學分【主修及副修學科】）。
2. 修業期中鑑定考試。
3. 語文能力測試：三種語文(包括母語，外語之一為英文)，外語需具有閱讀能力。
4. 博士班候選人資格考：學科考：a. 比較文學方法論、b. 主修學科、c. 斷代、d. 主題或文類上列第三及第四項包含主修及副修學科；論文提要口試。
5. 博士論文及口試（論文以中文撰寫）。

(四) 開課原則：

1. 開設課程均為三學分。
2. 必修課程【比較文學方法論】三學分，固定開設於每學年之上學期。
3. 基本上課程以三年為設計單元，每三年輪換一次。但亦可依教師與學生需求調整增刪。
4. 本所學生除在本所修課之外，亦必須在各文學研究所選修國家文學學分。外語學院各文學研究所開設之課程。
5. 本所學生欲選修「獨立研究」課程者，必須配合個人之研究方向或是學科考範圍，由該生及授課教師共同擬定書單，擬定見面討論方式。

依據博士班成立之發展重點，以及學生畢業學分要求，本所之課程結構及設計原則條列如下：

1. 【方法論及批評理論】(九學分)：比較文學方法論、東西文學理論。
2. 【比較文學專題】(九學分，可自本所開設專題課程中任選)，本所比較文學專題分跨文化及跨學科二大類。此二類皆可透過：文類研究、斷代研究、主題研究、跨學科研究為討論材料之原則，亦可由平行研究或影響研究進行。

民國八十三年學年至八十七學年開設之課程如下：

八十三學年至八十七學年						
方法論及批評理論 (9 學分)			比較文學專題 (9 學分)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比較文學方法論*	劉紀蕙	跨文化研究	台灣文學專題研究*	劉紀蕙		
西方當代文學批評理論議題：跨藝術研究理論*	劉紀蕙		現代主義文學與變異	劉紀蕙		
西方當代文學批評理論議題：解構/符號學/心理分析	劉紀蕙		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	簡瑛瑛		
中西視覺理論	劉紀蕙		中國文學專題	簡瑛瑛		
西方當代文學批評理論議題：文化、性別、後殖民論述	簡瑛瑛主持		西方戲劇專題研究	紀蔚然		
文化批判與後殖民論述	簡瑛瑛		西歐傳奇傳統	石 苓		
女性主義理論與女性文學*	簡瑛瑛		西歐國家史詩	石 苓		
當代電影理論研究	陳儒修		世界後現代小說	康士林		
當代電影思想*	陳儒修		斷代研究	二十世紀藝術史專題	劉紀蕙	
中國歷代文學批評理論議題：中國符號學研究	張漢良			二十世紀音樂劇場	梅樂互	
符號學	古添洪			二十世紀東歐詩	蕭笛雷	
後現代理論與文本研究	劉紀雯			西方現代詩派	蕭笛雷	
藝術心理學：瘋狂與藝術	宋文里			當代歐洲思潮	簡瑛瑛	
		歐洲世紀末文學(德)*		裴 德		
		西歐中世紀戲劇(英)		石 苓		
		現代戲劇---中西研究		紀蔚然		
		後現代空間·後殖民抗拒		劉紀雯		
		日本古典文學研究(日)		林水福		
		主題研究	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康士林		
			美國文學中的中國	康士林		
			電影中的中國	陳儒修		
			文學中的青少年形象	王美玲		
			日本新感覺派文學對台灣、大陸文學之影響	林水福		
		跨學	文學	文學與歌劇*	羅基敏	
				文學與音樂	羅基敏	

科 研 究	與 藝 術 、 宗 教 、 哲 學 、 語 言	文學與音樂專題：霍夫曼的浪漫文學與音樂	羅基敏
		文學與歌劇專題：十九世紀歌劇中的國家主義與地方色彩	羅基敏
		文學與音樂專題：音樂世界中的「浮士德」	羅基敏
		阿當諾：試論華格納	羅基敏
		神/童話與藝術	羅基敏
		文學·藝術與宗教	簡瑛瑛
		文學與宗教*	康士林
		超現實主義在文學、藝術及電影中的符號系統轉換	劉紀蕙
		莎士比亞與歌劇	蕭笛雷
		台灣電影與文學	陳儒修
		文學與藝評·藝評文學	許綺玲
		當代美詩與視覺藝術	蕭笛雷
		性 別 研 究	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
	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與女性作家		簡瑛瑛
	女性與藝術		裴 德
	文 化 研 究	精神分析與文化符號	劉紀蕙
		台灣現當代藝術與文化研究	簡瑛瑛
		台灣文學與文化比較研究	簡瑛瑛

* 以下僅概略介紹幾門課程內容，其他詳細各科課程大綱請參閱本所網頁：
<http://www.complit.fju.edu.tw/main.htm>

【方法論及批評理論】

* **比較文學方法論**：3 學分，一年級學生必修，每學年秋季班開設。在兩個文化文本(cultural text)或是文化模子(cultural mode)發生交集時，我們要比較其中的相同處還是相異處?如何比較?為何要比較?要尋找什麼?證明什麼?比較文學研究如何能幫助我們更了解與尊重不同的文化、藝術形式與文本，以及如

何能使我們具有跨文化與跨學科反省與詮釋觀點？此門課將從以上幾個問題出發，檢視傳統到現代的幾種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討論各種方法的長處及限制，並幫助學生開始進行個人的研究計畫。

* **西方當代文學批評理論議題**：此門課程屬於演講與討論系列，將邀請專門學者針對當代西方批評理論的幾個重要議題發表演講。議題包括：解構主義、符號學、女性主義、心理分析、文化批評、後殖民論述等。

* **女性主義理論與女性文學**：介紹當代歐美及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理論思潮，文學批評（如 feminist critique, gynocritique, l'écriture feminine, 及 women of color 論述等），及代表評論家（如 Showalter, Cixous, Spivak, Trinh, Saadawi）；並以這些理論為起點，重新審視中西女性作家（主流派、激進派、第三世界等）及其作品中的一些重要課題（文學正典、女性傳統、歷史、種族、階級、同性戀等）。

* **當代電影思想**：自有電影以來便有電影研究，特別在 1968 年之後，逐漸有「電影學」的觀念出現。同時電影研究開始進入學術殿堂，並且引用各類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思想，如今已有一套完整的電影思想。此課程將把電影本體研究帶入人文科學認知的領域。不僅在於認識電影本質與電影機制，還要探討電影背後的哲學基礎，並將研讀當代（以法國為主）之電影理論大師的著作，以及其他相關論述。

【比較文學專題】

* **【文類研究】：台灣文學專題研究**：此門課的設計以史為縱軸，以主題與文類歸類，從比較文學的觀點，探討台灣文學相關議題。課程涵蓋的問題可於一門課中合併處理，亦可分年以專題開設。主要議題如下：(1) 台灣文學的界定與史的分期；(2) 國族文化認同的問題；(3) 政治文學，從日治時代與國府時期解嚴前後的政治迫害，國共對立，白色恐怖；(4) 鄉土文學論戰與寫實文學；(5) 兩次現代派論戰與橫的移植，包括六〇年代與八〇年代的西方影響；(6) 八〇年代小說與詩實驗，科幻小說，未來小說，都市詩，錄影詩，後設小說；(7) 女性文學，女性問題與女性書寫。

* **【斷代研究】：歐洲世紀末文學（德）**：歐洲「世紀末」（ca.1890-1914）是個文學、藝術、政治與科學等不同領域都呈現高度創新而多元分歧的時期。此門課程將介紹世紀末時代的種種觀點與主題，並探討維也納地區文學、藝術與心理分析之間所展現的各種相互依存之關係。討論議題包括印象派、新浪漫派、象徵主義以及當代藝術中的幾種主題：夢、舞蹈、死亡、女人與青少年。

* 【跨學科研究】：文學與歌劇：文學和歌劇之間的關係自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歌劇開始在義大利北部逐漸成形、發展以來，就有很密切的關係，二者之間的互文關係亦隨著歐洲各國文學和音樂語言的發展而有其時代的不同性。二十世紀裡，許多歌劇作曲家直接以文學作品作為歌劇劇本，省去編寫歌劇劇本的過程，如何刪減文學作品成為歌劇劇本以及音樂如何和戲劇性結合為本課程的中心。

* 【跨學科研究】：文學與宗教：此課程首先探討文學與宗教跨學科研究之方法論。其次將閱讀中國與西方文學中具有宗教層面的代表作品，並略覽針對此問題的研究資料。而後學生將依據以上所學之方法論與應用方式，自行挑選作品深入研究。

(六) 比較文學研究所師資：

外語學院支援師資：

師資	現職/學歷	專長
雷孟篤 José Ramón Alvarez	西研所 西班牙馬德里中央大學 文哲博士	文學與哲學 中西哲學
賀永光 Heliena Krenn	英研所 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 英國文學博士	康拉德中的中國 中世紀英國文學
康士林 Nicholas Koss	英研所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中西 小說比較研究·文學與宗教· 翻譯與文學·華裔美國文學
裴德 Agatha C. Bramkamp	德研所 美國康乃爾大學 德國文學博士	歐洲世紀末文學 女性文學與藝術 十九、二十世紀德國文學
鮑端磊 Daniel Bauer	英研所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諷刺文學 英國小說 十九世紀世界文學
施玲達 Lynda Scott	英研所 美國路易斯安那大學 戲劇博士	劇場史 宗教與戲劇
王美玲	德研所 德國波昂大學 德國語言文學博士	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青少年小說
林水福	日研所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 文學博士	台灣文學與日本文學之關係· 日記文學·日據時代的台灣 文學·中日比較文學研究
白安茂 Manuel Bayo †	西研所 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 文哲博士	西班牙文學 唐璜與唐吉軻德

黃雪霞	法研所 法國里昂第二大學 文學與藝術博士	浪漫時期文學與藝術
蕭笛雷 Raphael Shulte	英研所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英美文學博士	英美當代詩·東歐詩 現代詩與視覺藝術 莎士比亞與歌劇
石苓 Caroline Scott	英研所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英美文學博士	中世紀文學·史詩傳統 文藝復興時期戲劇
劉紀雯	英研所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英美文學博士	現代文學·文化理論與實踐· 後現代理論與文本· 國家敘述與後殖民文學

其他校內、外支援師資：

師資	現職/學歷	專長
梅樂互 Maehder Jurgen	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伯恩大學 Universitat Bern 音樂學博士	音樂劇場
陳儒修	輔大傳研所 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 電影理論博士	電影理論 電影中的中國形象 文化研究與中國電影
張漢良	台大外文研究所 台大外文研究所 英美文學博士	符號學 比較文學 中國符號學
紀蔚然	政大西研所 美國愛俄華大學 英美文學博士	現代戲劇·西方戲劇 當代美國戲劇 美國短篇小說
古添洪	師大英研所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中國古典詩學 符號學·記號詩學 中英抒情詩類研究
宋文里	清大社人所 美國伊利諾大學 諮詢心理學博士	藝術心理學 宗教心理學 人格與社會心理學
陳鵬翔	師大英研所 台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主題學理論研究 現象學與詮釋學 比較詩歌

(七) 學術性相關研究與活動：

為推廣比較文學之研究，比較文學研究所除開授相關之課程外，並積極舉辦相關之學術活動。劉紀蕙所長於八十一學年度創立了「文學與藝術工作室」，此研究室的基本理念認定人文藝術學科交流之重要性，並期促成具有整合人文學思惟視野的學術研究與課程設計；歷年皆透過教育部顧問室經費補助，承辦研究計畫，並提出具體研究成果。截至目前為止，本研究室從設計文學與藝術跨學科課程多媒體教學光碟片，到文學與藝術網路教室，累積了不少有關改善教學、多媒體製作、多媒體教學、文學與藝術課程設計、網路教學、網站設計等具體經驗與心得。「文學與藝術研究室」於一九九六年開始發展出研究與教學資源網路化。此長程研究計畫之基本理念在於強調教學與研究應廣為利用網路所能夠提供的各種研究資源，連結研究人力與資源，為本土的學術社區成立不同類型的研究資源網站，例如網路教室、課程設計彙編、學術網路論壇、理論站台、電子文本、電子期刊、線上書目、學術搜尋引擎或是學術活動公告。劉紀蕙教授亦於一九九八年二月成立「跨藝術研究網站」，領導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學生發展設計，內容包含以論文、藝評、圖像資料庫等方式，處理文學、繪畫、攝影、電影、歌劇、音樂等不同藝術形式。簡瑛瑛教授成立「女性主義工作室」，探討與女性主義相關之議題，並舉辦多場相關之演講及研討會，成果豐碩。

八十三學年度：劉紀蕙所長獲教育部補助主持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文學與藝術跨學科課程規劃及教材編製」，進行比較文學學門之相關教材研究及設計，以便推展台灣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教學。本所於八十三年十二月四日至八十四年一月四日間舉辦五場「廿世紀音樂劇場」講習會，邀請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梅樂互教授(Dr. Jürgen Maehder)主講，講題包括：「二十世紀音樂劇場的基礎：『文學歌劇』、十二音列音樂、序列音樂和歌劇舞台的影響」、「義大利的歌劇傳統」、「劇場為個人理念之整體呈現」、「極限音樂歌劇及電腦音樂的使用」、「六〇和七〇年代之實驗音樂劇場」，以及「八〇年代之德國『文學歌劇』傳統」。八十四年三月至五月舉辦「文化、性別、後殖民論述」系列講座，包括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廖炳惠教授主講：「從後現代到後殖民到後國家：談一些後遺症」、台灣大學外文系張小虹教授主講「殖民論述與性別政治」、中興大學外文系邱貴芬教授主講「台灣的後殖民身分—認同」、台灣大學外文系廖朝陽教授主講「影像、認同與公共空間」，以及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李有成教授主講「離散文化(Diaspora Culture)」。八十四年四月至六月間舉辦「當代台灣作家」系列座談會，邀請林雙不先生，主談「政治小說」、亞弦先生主談「現代詩在台灣的發展」、林耀德先生主談「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學」、羅智成先生主談「台灣都市詩」、黃春明先生主談「台灣的小說發展」，以及陳

黎先生主談「談政治詩和情慾詩」。除上述之講座外，本所並邀請國外之學者蒞校舉行演講：德國 Ruhr 大學東亞研究所馬漢茂教授 Dr. Helmut Martin 演講「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中文研究所倪豪士教授 Dr. William H. Nienhaus 演講「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以及美國夏威夷大學英文系 Prof. Rob Wilson 演講「亞太地區的美學的探索：美屬太平洋區的文學與文化認同」。

八十四學年度：更擴大與外校之學術交流，與中央大學、東吳大學合辦「文學、音樂、文化分析」系列講座，邀請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 John Neubauer 教授於本校主講「歐洲世紀末文學及其他藝術中的少年形象」、於中央大學主講「文學、音樂及文化分析」，於東吳大學主講「音樂的再現」。

八十五學年度：劉紀蕙所長邀請本所羅基敏教授、簡瑛瑛教授、英文系康士林教授，以及台大、中央等校之相關學者進行國科會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聚焦與失焦：文學與藝術中『中國』符號的延變」。劉紀蕙所長並獲教育部顧問室補助進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全球資訊網路上文學與藝術跨學科虛擬教室課程發展及課程設計」，開始進行網路多媒體教學之研究與設計，設立文學與藝術研究室，收集相關之文學與藝術之研究資料，並設計專屬研究及相關之教學網頁，開創比較文學教學之先鋒。八十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間舉辦「女性主義與台灣文學」系列演講：李元貞教授主講「女性主義與台灣婦女運動」、靜宜大學中文系陳芳明教授主講「台灣文學中的女性」，以及台灣大學外文系江文瑜教授主講「台灣女性歷史書寫」。學術演講包括美國 Temple 大學、中央大學英文系交換教授 Prof. Cindy Patton 演講“Refusing the Figure in the Text: Black Performance/White Audience”「抗拒自傳文本中的修辭位置：黑人表演／白人觀眾」、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古繼堂教授演講「台海兩岸新詩發展方向」、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Prof. Jean Lancry 演講「造型藝術中的情愛表現：吻」，以及淡江大學英研所 Prof. David Wible 演講「黑人女性靈歌·聖樂與藍調」。本所羅基敏教授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於十一月廿日至十二月四日赴法國巴黎文化中心舉辦「台灣作曲家樂展—巴黎一九九六」三場音樂會，向歐洲介紹台灣傑出的音樂家，成果豐碩，大受好評。本所於五月十七日協辦「第廿一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負責「網路工作坊」，劉所長擔任引言人，向全國學者分享本所於網路教學及網頁建構之研究成果。本所在學術方面之研究成果獲國科會肯定，受國科會委託，於七月十二日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分校國際演講廳舉行國科會「科技與人文對話」第六場「文學、藝術與科技」論壇，邀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所教授，清華大學藝術中心主任彭明輝教授及政治大學英文系陳超明教授主講，開拓文教基金執行長陳正然先生、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張恬君教授、國家圖書館閱覽組宋建成主任與劉紀蕙所長進行對談。

八十六學年度：邀請北京大學電影研究所戴錦華教授來台講學，戴錦華教授教學經驗豐富，來台曾赴美擔任交換教授，除於本所開設「中國電影文化史」課程，並帶來許多許多中國早期的電影作品，其中有很多作品是台灣難得一見的，擴充本校相關之電影作品收藏，除本所師生受惠外，台灣其他各校也邀請戴教授前往演講進行學術交流。本所並持續進行教育部顧問室之「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文學與藝術研究教學資源網站」，以及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第二年計畫。本所於五月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分校國際演講廳舉行「第廿二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會議中共有學者四十餘人發表論文。十二月間，由比研所與國科會贊助，漢雅軒與女性文化工作坊合辦的《Judy CHICAGO 與台灣女性藝術家座談》在輔大外語學院 LC501 室舉行。邀請了參加台北縣新莊市辦的女性藝術展《盆邊主人——自在自為》中的幾位女性藝術家，如美國的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日本的島田美子(Yoshiko Shimada)、韓國的安畢妍(Ahn Pil Yun)及台灣的徐洵蔚、林純如、賴純純及蕭麗虹等與會座談。本所為推廣比較文學之研究風氣，籌劃出版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系列，邀請國內外學者撰寫專文，宗旨在凸顯台灣跨文化與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之活力，以及本地學術界對台灣人文藝術文化之關切；亦期發展國際格局，反應當今世界各地學者思索東方與其他地區之各類文化文本的互動關係。對於文化文本，本刊的定義包含古典以至當今之文學、音樂、藝術、電影、表演以及各種大眾文化形式。於十一月推出第一輯：《當代文化論述：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簡瑛瑛教授擔任主編，由立緒出版社出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epartment)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應本所所長劉紀蕙教授之邀，以「從世紀末華麗到小說書寫：談晚清到當代的中國文學」為題向本所同學發表演講；詩人向陽主講「尋找心中的靈魂——“歌詩就是歌詩”」。

八十七學年度：持續進行教育部顧問室之「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整合性人文學網路學程規劃與教材編撰」，以及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第三年計畫。本所之教師研究成果豐碩，簡瑛瑛教授發表新書《何處是女兒家：女性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羅基敏教授發表新書《浦契尼的杜蘭朵》、《文話/文化音樂——音樂與文學之文化場域》。邀請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舉行「與林懷民談舞創座談會」，會場座無虛席，學生反應熱烈。八十七年度上學期再度邀請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梅樂互教授(Prof. Dr. Jurgen Maehder)來台，於本所、東吳大學德文系以及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舉行六場系列演講，主題是「湯馬斯·曼之小說《浮士德博士》與二十世紀音樂現代思潮的形成」，講題包括：「華格納的承傳 -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文保守派的代表：費茲納、史特勞斯與湯馬斯·曼」(The Heritage of Richard Wagner --- Pfitzner, Strauss, and

Thomas Mann as representative of conservative German culture before World War I)、「解讀《浮士德博士》之文化轉借」(Decoding the Cultural References in Thomas Mann's Novel Doktor Faustus)、「曼的音樂導師-恩斯特·卻瑞內克 vs 阿多諾」(Mann's Musical Mentors --- Ernst Krenek versus Theodor W. Adorno)、「『論樂』之為阿當諾藝術哲學之原型以及阿當諾《美學理論》中藝術的類音樂結構」(Das "Sprechen über Musik" als Modell von Adornos Kunstphilosophie und die musikanaloge Struktur der Kunst in Adornos Asthetischer Theorie)、「非直線的戲劇設計---談二〇年代音樂劇場之敘述性」(Nichtlineare Dramaturgie --- Zur Erzählhaltung im Musiktheater der Zwanziger Jahre)，以及「《浮士德博士》預見之歐洲前衛音樂」(The Anticipation of European Avantgarde Music in Thoma Mann's Doktor Faustus)。與清大外語系、交大外語系、政大外語學院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教授 Paul Anderer 舉行「崩裂的穹蒼之下：日本現代小說、電影和文學批評」系列講座，舉辦「文學、藝術與宗教」系列演講：日文系林水福教授主講「日本文學與宗教—遠藤周作文學主題的轉換」、德文系裴德教授主講「女性文學與藝術」、作家陳若曦女士主講「理想的追尋：陳若曦的人生經驗與創作」；「台灣原住民與口傳文學」系列演講：排灣族作家利格拉樂·阿女烏主講：「原住民部落經驗與女性書寫」，並舉行「原住民紀錄片影像展」，邀請紀錄片攝影導演林為道(Baunay)，泰雅族服飾研究者尤瑪·達陸(黃亞莉)演講「尋找石壁部落的衣服」。此外還邀請台大外文系廖朝陽教授演講「拉康式的凝視」、清華大學中文系于治中演講「阿爾杜賽與意識形態的物質性」、台大外文系張小虹教授演講「愛情魅物」、蘇州大學文學院院長朱棟霖教授演講「比較文學與廿世紀中國文學」、清大外文系陳傳興教授演講「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之建構」、台大城鄉所夏鑄九教授演講「如何建構台灣的公共空間」，以及台大外文系劉毓秀教授演講「從精神分析看男女身心奧秘」。

二、民國八十八年至九十年，發展時期，所長簡瑛瑛教授：

(一) 畢業相關規定，八十八學年修訂本所【修業章程】，八十九學年度入學學生須於修業期限之間完成以下要求：

1. 原畢業要求三十六學分，修改為修滿三十學分（其中至少三學分比較文學方法論，六學分文學批評理論，六學分比較文學專題，九學分主修文學與兩門副修學科，六學分其他學科）。
2. 廢止修業期中鑑定考試。
3. 語文能力測試：三種語文(包括母語)，外語需具有閱讀能力。
4. 博士班候選人資格考：學科考試修改為 a. 比較文學方法論與專長領域合併、

b. 主修學科、c. 副修學科兩科上列第三及第四項包含主修及副修學科。博士論文綱要口試。

5. 博士論文及口試 (論文以中文撰寫)。

(二) 入學考試方式，八十八學年至九十一學年依據博士班招生入學考試規定辦理。同時期停止辦理甄試入學考試。

(三) 八十八學年至九十學年錄取名單：

1. 八十八學年第六屆研究生六位：鄭印君、李桂芳、吳婉筠、李寒賓、郝寶芬、橫路啟子。
2. 八十九學年第七屆研究生七位：徐雪蓉、許玉燕、李銀鳳、黃漢婷、傅玉香、魏亞萍、林柏欣。
3. 九十學年第八屆研究生十三位：蔡祝青、洪淑娟、黃建融、張墨菲、吳慕雅、李小清、黃玉蘭、吳宇棠、陳淑娟、洪雅文、張正霖、盛業瑋、黃文珊。

(四) 民國八十八學年至九十學年新開設課程，以不重複列出為原則。課程依畢業學分要求，調整為【文學批評理論】與【比較文學專題、主副修學科】：

八十八學年至九十學年					
方法論及批評理論 (9 學分)			比較文學專題(6 學分)主副修學科(9 學分)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比較文學方法論	簡瑛瑛	跨文化研究	文類研究	台灣文學史	劉紀蕙
精神分析與電影理論	劉紀蕙			台灣與世界華裔文學	簡瑛瑛 康士林
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導論	簡瑛瑛			獨立研究：藏傳佛教傳記	簡瑛瑛
文學理論專題：寓言與後現代	廖朝陽			原住民與少數族裔文學/文化	簡瑛瑛
跨國女性主義理論	簡瑛瑛			性別研究：台灣女性小說	劉亮雅
精神分析進階討論	劉紀蕙			日本宗教文學研究	林水福

翻譯研究與翻譯理論	洪振耀 李爽學 胡功澤 羅基敏	斷代研究	台灣文學：現代主義與 鄉土文學	劉紀蕙	
跨藝術研究：理論與實踐	羅基敏		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	林水福	
中國三·四〇年代文化論述	劉紀蕙		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研究	林水福	
精神分析與文化研究導論	劉紀蕙		日據時代台灣作家研究	林水福	
主題研究	羅基敏		主題研究	文學中的青少年---青少年文學	王美玲
國際批評理論專題	廖炳惠			華裔美國女性作家的中國想像	簡瑛瑛
互文性	許綺玲			芥川龍之介與日本說話文學	林水福
克莉絲蒂娃專題	劉紀蕙			漢語現代小說專題	彭小妍
				芥川龍之介與中國：獨立研究	林水福
				新女性與現代性矛盾：獨立研究	劉紀蕙
		遠藤周作宗教觀		林水福	
		中西上古神話比較		張善禮	
		中國現代小說中的道德觀		康士林	
		但丁與《神曲》		康華倫	
		跨學科研究	文學中的音樂	羅基敏	
			二十世紀音樂與文化	羅基敏	
			阿多諾與艾斯勒：電影音樂	羅基敏	
			女性文學·影像與藝術	簡瑛瑛	
			陰性書寫與圖像	簡瑛瑛	
			羅蘭巴特寫圖像	許綺玲	
			影像閱讀與解析	陳儒修	
			家庭照片與藝術	許綺玲	
			語言與文化	洪振耀	
		馬克思主義與文化研究	劉紀雯		

		、 語 言 、 文 化	詮釋學專題：宗教、哲學與文學	陳德光 張漢良 武金正
			薄伽丘《十日談》與中世紀社會	康華倫

(五) 比較文學研究所師資，自八十八學年起支援本所之教授：

外語學院、比較文學研究所師資：

師資	現職/學歷	專長
康華倫 Valentino Castellazzi	義文系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中文博士	薄伽丘《十日談》與中世紀社會 但丁與《神曲》 文學·語言學·語義學 詞源學·翻譯
洪振耀	語言所 德國哥廷根大學 語言學博士	翻譯研究與翻譯理論
張善禮	德文所 德國海德堡大學 德與語言文學博士	中西上古神話比較 德語語言學 文化學
胡功澤	德文所 瑞士佛利堡大學博士	翻譯研究與翻譯理論 翻譯

其他校內、外支援師資：

師資	現職/學歷	專長
彭小妍	中研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	漢語現代小說專題 中國現代文學 中西小說比較 臺灣現代文學
李爽學	中研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翻譯研究與翻譯理論 中外文學關係 宗教文學 翻譯與中國文學的互動

劉亮雅	台大外文研究所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 文學博士	英美現代主義文學·美國黑人 女性小說·女性主義理論與小 說 同志理論與小說 90年代台灣小說
許綺玲	中央大學法文系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美學博 士	羅蘭巴特寫圖像·互文性 文學與藝評：藝評文學 家庭照片與藝術
陳德光	輔大宗教所 比利時魯汶大學宗教學博士 神學博士	詮釋學專題：哲學 宗教聖經學舊約研究 神秘主義研究 比較宗教學
武金正	輔大宗教所 輔仁大學神學博士、奧地利茵 斯柏路克大學哲學博士、神學 碩士	詮釋學專題：宗教 德國觀念論、康德、胡賽爾研 究宗教現象學、宗教研究方法 論、宗教現象諸人文向度
廖朝陽	台大外文研究所 美國 Princeton University 東亞研究博士	文學理論專題：寓言與後現代 文學理論 文化研究
廖炳惠	清大外文系 美國加州大學(UC San Diego) 文學博士	國際批評理論專題 後殖民論述·性別研究 性別與電影、文化論述
廖咸浩	台大外文研究所 美國史丹佛大學 比較文學/亞洲文學博士	精神分析專題 比較詩學·當代文學與文化理 論 英美現代詩·台灣現代文學
賴慈芸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 系博士(原中文及翻譯系)	英文閱讀能力訓練 翻譯、寫作、高階閱讀

(六) 學術性相關研究與活動：

八十八學年度：劉紀蕙教授卸任，由簡瑛瑛教授接任。仍舊持續接受教育部顧問室補助進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比較文化研究整合性學程」。為呈現本所於台灣研究方面之成果，於十二月十七～十八日假本校聖言大樓國際展演中心舉辦「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學術研討會」，發表十餘篇相關之學術論文，開創台灣比較研究風氣之先。八十八年十二月推出由劉紀蕙教授主編的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系列第二輯：《框架內外：藝術、文類與符號疆界》，以藝術文類的框架轉換為編輯原則，分別收錄四部份的論文：第一部份「圖畫與文字的並置閱讀」，第二部份「詩文再現繪畫的詮釋空間」，第三部份「音樂與文字的符號對話」，第四部份「電影影像的異質書寫」，共十三篇論文。邀請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樂系梅樂互教授 Prof. Dr. Jürgen Maehder 舉行三場演講：「浦契尼(Giacomo Puccini)的《姜尼·斯吉吉》(Gianni Schicchi)：一部源自但丁《神曲》的歌劇」、「雷昂卡發洛(Ruggero Leoncavallo)的《梅第奇家族》(I Medici)與十五世紀佛羅倫斯文化史」、「德國浪漫文學與音樂中音響色澤的詩文化」；「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論專題系列演講」邀請王美玲副教授講演「主題與母題：中德比較文學研究」、中興大學外文系邱貴芬教授講演「文學史研究：台灣女性文學史」、台灣大學外文系系主任張漢良教授講演「比較文學與理論研究：詮釋學」、台灣大學外文系張惠娟教授講演「跨學科研究：文學與科技」、大山大學文學院院長鍾玲教授講演「影響研究：中美詩學比較」、清華大學外語系廖炳惠教授講演「比較文學與理論研究：理論旅行」、英文系康士林教授講演「文學與宗教研究」，以及外語學院院長林水福講演「中日比較文學翻譯研究」。與日研所合辦「台灣女性作家與藝術家系列演講」邀請台灣大學外文系劉亮雅教授講演「性別、族裔與階級：非裔美籍女作家的美學表現」，以及女性影像藝術工作者侯淑姿講演「猜猜你是誰？」。其他的學術演講包括邀請藝術創作者湯皇珍講演「鄉愁的黑洞：創作中的時空符號」、俄國莫斯科州立大學、語言學大學教授 Valery Belyanin 講演「從精神醫學的角度談俄國文學」、藝術家陳順築講演「創作中對家族老照片的運用」、美國女導演 Barbara Hammer 講演「溫柔小說：真實與謊言的建構」、思想悟子 Mr. Christian Utz 講演「以音樂作為不同文化交流之論述」，以及美國匹茲堡大學 Prof. Cecile Sun 講演「由中詩英譯的局限看中西詩歌的差異」。

八十九學年度：簡瑛瑛所長發表由女書店出版之新書《女兒的儀典：台灣女性心靈與文學／藝術表現》、劉紀蕙教授主編之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第三冊《他者之域：文化身分與再現策略》由麥田出版社出版，側重以跨藝術符號呈現「他者」的再現，而此跨藝術的疆界遊走拓展了一個文化身分與性別策略的異質空間，一個「他者之域」。本冊亦收錄四個部份的論文：第一部份為「符號中國」，第二部份為「思索台灣」，第三部份為「中國、亞洲、他域」，第四

部份「異質疆界與政治版圖：以加拿大為例」，共十五篇論文。本所繼續執行教育部「比較文化學程」課程設計計畫。於十一月假本校聖言樓國際展演中心舉行「女性心靈之旅—文學、藝術、影像國際研討會」、十一月十一、十二日假聖言樓國際展演中心舉行「浴震重生迎接第三千禧年：心靈之旅—文學、藝術、影像國際研討會」、十二月十一日至九十年三月十一日與高雄市立美術館合辦「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與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高雄市立美術館合辦四場「二十 e 世紀女性藝術文化座談會」。與日研所共同邀請楊千鶴「花開時節：日據時代台灣女性文學」、邀請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張維安講演「現代主義與現代性系列演講 I：韋伯與現代性」、邀請政大新聞系副教授方念萱講演「現代主義與現代性系列演講 II：啟蒙的辯證—哈伯瑪斯、現代性與公共領域」、與英研所、日研所共同邀請美國猶他大學少數族裔研究及政治學系連培德教授講演「亞裔及原住民之文化與族裔認同：由華美女性的經驗談起」、與日研所、譯研所共同邀請台灣知名女性小說家、專欄作家、〈中國時報〉主筆、台大新聞所任教、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平路講演「破碎與重組：文學中的『家庭』」。

九十學年度：簡瑛瑛所長之專書《女性心靈之旅：文學、藝術影像再現》由女書店出版。十二月四日至廿四日舉行比較文學月系列活動：與視教中心合辦「世界女性心靈影像大賞」；假宜真學苑舉行比較文學／性別研究聯合書展。十二月十七～廿四日與台大外文系及師大英語系共同邀請國科會訪問學者史書美教授於本校耕莘樓舉辦四場「國族越界、全球化、與他者的視域」系列演講及座談；九十一年一月五～八日與外語學院、中文系、宗教系、中山大學文學院、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荷蘭天主教尼墨根大學、美國安多華·牛頓神學院、德國《華裔學志》於聖言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辦「第二屆聖經與中國：聖經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邀請師範大學英研所梁一萍教授講演「後殖民·書寫與記憶」、台大外文系主任廖咸浩教授講演「文化研究如何『後殖民』？：自慰、慰安婦、前衛運動」、邀請德國藝術家 Bettina Flitner 座談「女性藝術表演」、與法文系、織品服裝研究所共同邀請當時本校博物館學籌備小組負責人、織品服裝系所及法文所周功鑫教授講演「十七世紀中國款彩漆屏風與法國耶穌會士」、與德文系所共同邀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林文寶教授講演「台灣文學的發展與現況」，舉辦「台灣、全球化、與跨國女性主義」座談會，邀請美國 UCLA 大學史書美教授主講、中興大學邱貴芬教授、台灣大學廖朝陽教授及劉亮雅教授座談。

三、民國九十一年迄今，成熟時期，現任外語學院院長兼所長康士林教授：

(一) 未來發展重點

1. 每學期每一研究群組【中西文學關係、性別研究、跨藝術、跨亞洲文學關係、文學與宗教、翻譯以及台灣文學（用比較文學觀念探討）】至少開設一門相關課程。為一研究群組規劃一系列課程。
2. 協助本所學生能有較多時間出國研究。
3. 自海外延攬更多學有專精之教授來本所授課。
4. 分別與美國（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班締結友好關係、建立交流管道。
5. 與中國（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上智大學）、歐洲（德國、英國、法國）之比較文學博士班發展既有之友好關係，進而拓展學術交流。
6. 增進校內所際合作：開放所內課程，提供校內相關系所學生選修；本所教師支援校內相關系所課程；鼓勵本所學生至相關研究所修課，已達校內人力資源共享。

(二) 畢業規定，八十九學年迄今比較文學研究所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完成【修業章程】之要求。

※詳細內容請參閱比較文學研究所【修業章程】：<http://www.complit.fju.edu.tw/>

(三) 入學考試方式，九十一學年起修正報考資格需具有二種外語證明，並恢復辦理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1. 依據博士班招生入學考試規定辦理：報考資格：公私立以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獲有人文社會學科碩士學位者；具有二種外語能力證明；具有同等學歷資格者。考試辦法：資料審查；筆試：文學概論、英語閱讀能力；口試。
2. 恢復辦理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報考資格：得有文學研究所或相關研究所或人文社會學科碩士學位者，應屆畢業生碩士論文應已完成三分之二以上；曾修習兩種外語。考試辦法：資料審查、筆試、口試。

(四) 九十一學年至九十四學年錄取名單：

1. 九十一學年第九屆研究生十四位：胡龍隆、賴孟君、劉乃慈、林翠真、方婉禎、賴玉琴、周萬隆、林龍興、鄭雅佩、于善祿、鄭淑玲、朱衣仙、彭佳慧、廖詩文。
2. 九十二學年第十屆研究生十二位：鄭美里、孫立銓、張明敏、楊罄綺（釋大愚）、陳美靜、黃千芬、胡慧如、蔡秀卿、許素霞、蔡明玲、陳采玉、朱貞品。

3. 九十三學年第十一屆研究生九位：廖桂蘭、莊郁馨、洪仲敏、陳耿雄、林文玉、林麗裡、陳榮彬、郭淑雅、謝慧青。
4. 九十四學年第十二屆研究生十位：陳姿伶、管美燕、何致和、林憲宏、許馨之、陳家倩、林熙強、賴靜毓、郭家珍、袁民慧。

九十四學年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目前研究生在學生共有七十位，來自不同學科背景，例如：中國文學、日本文學、英美文學、德國文學、法國文學、西班牙文學、戲劇、電影、藝術史等。

(五) 民國九十一年學年至九十四學年新開設課程：

九十一學年至九十四學年						
方法論及批評理論 (9 學分)			比較文學專題 (6 學分) 主副修學科 (9 學分)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比較文學方法論	康士林	比較文學教學	康士林			
主題學	羅基敏	比較文學歷史與教學	康士林			
性別族裔·與邊緣文化論述	簡瑛瑛	跨文化研究	女性移民文本	梁一萍		
馬克思主義	洪謙德		中西文學關係專題研究	李爽學		
翻譯與後現代理論	李爽學		二十世紀法國小說	洪藤月		
性別論述與女性主義理論	簡瑛瑛		女性成長小說	劉雪珍		
浪漫主義	羅基敏		中國比較文學	楊乃喬		
敘事學	顧正萍		亞洲/亞美文化研究	簡瑛瑛		
佛洛伊德專題：夢與前夢	易 鵬		比較小說	康士林		
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	劉紀雯		獨立研究：西班牙當代兒童與青少年文學專題	張淑英		
符號學	張漢良		斷代研究	法國二十世紀自傳體小說探究	洪藤月	
				獨立研究：法國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小說美學專題	洪藤月	
		1890-1918 的德語文學作品		王美玲		
			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研究	林水福		

	平行研究	日本現代私小說研究	林水福	
		近代私小說研究	林水福	
		古代符號思想研究	張漢良	
		德、日文學中的主題比較探討	王美玲 賴振南	
		中日小說基督宗教形象比較	林水福	
		中國（台灣）與歐洲文化之比較	雷孟篤	
		道教與理性：東方與西方	雷孟篤	
		但丁的《神曲》與屈原的《離騷》之比較	康華倫	
		《十日談》與《坎特伯里故事》比較	康華倫	
		《變形記》與中國類似神話相比較	康華倫	
		《神曲》與《失樂園》之比較	康華倫	
	跨學科研究	文學與藝術、宗教、哲學、語言、文化	台灣文學與文化比較研究	簡瑛瑛
			當代華語電影	林文淇
			電影與文學之敘事分析	顧正萍
			獨立研究：性別研究與台灣女性視覺藝術	簡瑛瑛
			羅蘭巴特與影像	顧正萍
			獨立研究：宗教、性別與傳記文學：從女基督徒的自傳探討試煉、創傷與復原	簡瑛瑛
			世紀末德國文學藝術	裴 德
			台灣當代文化與視覺藝術研究	簡瑛瑛
夢與文本	易 鵬			
獨立研究：後殖民與當代文化	簡瑛瑛			

		獨立研究：第三世界女作家/藝術家	簡瑛瑛
--	--	------------------	-----

(六) 比較文學研究所師資，自九十一學年起支援本所之教授：

外語學院、比較文學研究所師資：

師資	現職/學歷	專長
賴振南	日研所 日本東北大學文學碩士	日本文學中的主題比較探討
劉雪珍	英研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研究所	女性成長小說

其他校內、外支援師資：

師資	現職/學歷	專長
顧正萍	輔大中文所 法國巴黎第十二大學 比較文學系博士	比較文學 比較文化研究 文學理論
梁一萍	師範大學英語系 美國麻州安城分校	女性移民文本
洪謙德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政治研究所博士	馬克思主義
林文淇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比較文學博士	當代華語電影 比較文學
張淑英	台大外文系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 拉丁美洲文學博士	西班牙當代兒童與青少年文學 專題 拉丁美洲文學
蕭瑞莆	實踐大學應用外語系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文化研究·比較文學 電影中的後設性 跨文化電影研究
易鵬	中央大學英文系 台灣大學外文系博士	精神分析研究 佛洛伊德專題

楊乃喬	比較文學研究所（客座教授） 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中國比較文學 比較詩學
-----	---------------------------------------	----------------

(七) 比較文學研究所歷屆畢業生及其現職：

1. 民國八十九學年劉婉俐通過博士論文《藏傳佛教傳記的主體性與空性：伊喜措嘉佛母密傳的敘事研究》口試，指導教授簡瑛瑛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華梵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2. 九十學年賀淑瑋通過博士論文《黑色幽默在中國：毛話語創傷與當代中國「我」說主體》口試，指導教授劉紀蕙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中華工學院英文系助理教授、清華大學外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3. 九十學年陳淑純通過博士論文《霍夫曼（E.T.A Hoffmann）的樂論與文論之綜合研究》口試，指導教授羅基敏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致理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副教授、輔仁大學德文系兼任副教授。
4. 九十學年陳正芳通過博士論文《台灣魔幻現實現象之「本土化」》口試，指導教授劉紀蕙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暨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5. 九十學年林慧雅通過博士論文《性別、族裔與民間信仰：第三世界女作家作品中民間傳說的策略運用》口試，指導教授簡瑛瑛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銘傳大學應用英文系助理教授、武陵高中教師。
6. 九十二學年蕭瑞莆通過博士論文《召喚/釋放禁錮的記憶：德瑞克·賈曼的酷兒影音記憶術》口試，指導教授劉紀蕙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副教授。
7. 九十二學年江足滿通過博士論文《陰性書寫/圖像之比較文學論述：西蘇與台灣女性文學、藝術家的對話》口試，指導教授簡瑛瑛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清雲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8. 九十二學年呂文翠通過博士論文《現代性與情色烏托邦：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研究》口試，指導教授劉紀蕙、陳平原聯合指導，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中央大學中文系專任助理教授。
9. 九十二學年鄭印君通過博士論文《遠藤周作文學中的宗教觀—人與神聖論述會晤》口試，指導教授林水福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立德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10. 九十二學年林伯欣通過博士論文《近代台灣美術與博物館形構：一個視覺文化史的探討》口試，指導教授劉紀蕙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

服役中。

11. 九十三學年洪力行通過博士論文《法國文學界的「華格納風潮」---從文學與音樂之跨藝術角度探討》口試，指導教授羅基敏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繼續留任母校輔仁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博士後研究。
12. 九十三學年盛鎧通過博士論文《一九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與美術中鄉土意識之總體性考察》口試，指導教授宋文里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系助理教授。
13. 九十三學年廖詩文通過博士論文《日本近代文學與影像的跨文化研究》口試，指導教授林水福老師，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興國管理學院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八) 學術性相關研究與活動：

九十一學年度：十月二十三日比較文學研究所邀請輔仁大學德國語文學系王美玲教授講演「主題學與中西文化」。九十一年十一月八日邀請東方白（林文德）作家講演「創作奇談」。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邀請陳千武（陳武雄）詩人講演「東亞現代詩的交流與比較」。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邀請靜宜大學生態學研究所趙天儀教授講演「陳千武詩的創作與翻譯」。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邀請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彭鏡禧教授講演「翻譯學與跨領域研究」。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邀請淡江大學中文系范銘如教授講演「話說從頭：台灣女性小說綜論」。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邀請孫筑瑾教授講演「中英比較詩學：重複－興與模仿」。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邀請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曹順慶教授講演「比較文學的三個階段」。

九十二學年度：簡瑛瑛教授之著作「女性心靈之旅」獲提名金鼎獎。三月比研所簡瑛瑛教授應邀參加由輔仁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辦講演「性別政治與文化再現」。四月比研所簡瑛瑛教授應邀參加由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與女性文化研究室舉辦「女性影像與文化再現講座」講演「女性影像與文化再現」。五月比研所簡瑛瑛教授應邀參加由靜宜大學舉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年會」講演「與路得面對面：重讀《舊約》〈路得記〉」。八月一日一九九〇年七月卅一日比研所簡瑛瑛教授獲國科會人文處、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逆境與重生：第三世界女性心靈與文學藝術表現」。九月比研所簡瑛瑛教授應邀參加由台北縣立文化中心舉辦「女性影展國際論壇」講評。十月比研所簡瑛瑛教授應邀參加由國家圖書館舉辦「藝術/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題引言。十二月比研所簡瑛瑛教授應邀參加由世新大學舉辦「台北高等教育性別研討會」專題引言。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比較文學研究所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合辦東亞比較文學會議。

九十三學年度：本所獲國科會補助延攬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楊乃喬教授至本所講座四個月，並開設”中國比較文學”課程。講座系列於輔仁大學聖言樓九樓遠距教室舉行，共八講分別為：九十四年四月二十日第一講、比較視域與比較文學本體論的承諾（上）；九十四年四月二十七第二講、比較視域與比較文學本體論的承諾（下）；九十四年五月四日第三講、後現代性、後殖民性與民族性——在世紀之交，藝術創作與批評應該追尋一種比較的視野；九十四年五月十一日第四講、終極緣光——西方詩學本體論的“向日式隱喻”；九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第五講、儒家詩學的“向日式隱喻”——論隱喻美學作為一種官方的話語權力；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第六講、闡釋與誤讀——論玄學誤讀的文化暴力與儒家詩教之“鼎”的坍塌；九十四年六月八日第七講、從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向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退卻——在瘋狂和自虐中崛起的大陸學院派文學（上）；九十四年六月十五日第八講、從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向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退卻——在瘋狂和自虐中崛起的大陸學院派文學（下）。

九十一學年迄今暑假期間外語學院「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開設至少十五門課程，亦提供本所研究生修習拉丁文與希臘文等課程，並幫助學生能夠進一步了解西方文化與閱讀古典西方文學作品。

※詳細資訊請查閱網站詳細資訊請查閱網站：<http://cmc.fl.fju.edu.tw/>

外語學院院長康士林教授兼任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後比較文學研究所大幅增加參與外語學院每年定期所舉辦之【中世紀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中世紀學術研討會：騎士精神、騎士文學】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輔仁大學百鍊展演中心舉行

第五屆【中世紀學術研討會：歐日中世紀文學中的無常觀】九十三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於輔仁大學百鍊展演中心舉行

第六屆【中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世紀之哲學、宗教與宮廷騎士文學】九十四年五月六、七日（週五、六）於輔仁大學聖言國際會議展演中心舉行

※詳細資訊請查閱外語學院網站：<http://www.fl.fju.edu.tw/medieval/index.html>

